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敦煌学十八讲

DUNHUANGXUE SHIBAJIANG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和莫高窟保存的艺术品，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是每一个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生应当熟悉的内容。本书在包含敦煌学范围上超出了以往的介绍敦煌学的论著，同时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概述必备知识的基础上，为深入研究提供参考文献索引，同时配有大量的随文图片辅助文字说明，在注释中详细介绍了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

荣新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敦煌学十八讲
DUNHUANGXUE SHIBAJIANG



荣新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学十八讲荣新江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
ISBN 978-7-301-04771-2

Ⅰ敦…　Ⅱ荣…　Ⅲ敦煌学-高等学校-教材　Ⅳ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1302号

书　　名敦煌学十八讲
著作责任者荣新江　著
责任编辑　刘　方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04771-2/K·029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出版部62754962
编辑部62752022
印　刷　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21.5印张　366千字
2001年8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5次印刷
定　　价32.00元

绪　论

一　何谓“敦煌学”

“敦煌学”是个约定俗成的名字。然而到底什么是“敦煌学”它的内涵应包括哪些内容学者间的意见并不一致。

1930年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正如陈寅恪先生在文中指出的那样在当时“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1]。刚刚从国外游学回来的陈先生站在世界学术的高度不仅把敦煌当作一门学问而响亮地叫了出来还指出了20世纪敦煌学迅猛发展的趋向诚可谓远见卓识。

敦煌的魅力何在敦煌学的研究范围有多广

从陈寅恪先生《劫余录序》的上下文来看他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是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以后随着敦煌当地考古工作的进步特别是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敦煌汉简和吐鲁番文书、西域文书的大量出土以及海内外所藏敦煌绢纸绘画等美术品的发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敦煌学”的范围应当扩大。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中说“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复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2]这里表述的虽然不十分科学但姜亮夫先生强调应当把“敦煌学”的内涵扩大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献实已为敦煌学界广泛接受。

然而从整个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框架里很难摆放一个所谓的“敦煌学”。

学贯东西而又对敦煌文献做过深入研究的周一良先生在《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序》中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3]后来他又在《何谓“敦

煌学”》中进一步指出“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4]周先生还建议把“敦煌学”永远放在括号里。

周先生的看法极有见地“敦煌学”的确是一门不成系统的学问。这里特别提请人们注意周先生这一看法的原因是目前的敦煌学研究有一种就敦煌而说敦煌的倾向把自己完全封闭在敦煌学的范围里使敦煌学的路子越走越窄。我们切不可把敦煌学孤立起来而应当利用各个不同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敦煌吐鲁番材料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敦煌的问题这样往往可以在自己所研治的对象之外获得更多的知识。

因此有关敦煌学的存在问题首先涉及到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这也涉及到我们在大学课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序列里如何安排“敦煌学”的位置。比如在大学里“敦煌学”的课程往往被放在“隋唐史”、“历史文献学”下面作为“三级学科”对待其实这不仅不伦不类而且也遮盖了敦煌学的广阔内涵。

从目前来看敦煌学也确实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主要是因为敦煌学所研究的材料主要是写本和我们常常使用的印本书籍材料不同使用的方法也就不一样此外这些资料都出自边远的敦煌、吐鲁番等地需要对当地的时代背景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比较合理地利用这批资料而且敦煌学提供了一些研究敦煌、吐鲁番、丝绸之路等等问题的特殊材料从而出现了新的课题供我们研究此外有关敦煌学的研究日益壮大而且逐渐概括出一些有系统的研究方法并大体上自有其研究范围可以作为一门学问而存在。

二　敦煌学的现状

敦煌学的发展虽然有材料分散、内容庞杂、语言多异等种种困难但各国学者孜孜不倦苦心孤诣使敦煌学日新月异加之敦煌文献陆续公布敦煌考古也续有发现到了八十年代敦煌学一跃而成为世界学林中的一门显学。

事实也正是如此。就以关于敦煌的学术会议为例1983年在兰州1984年在巴黎1985年在乌鲁木齐1986年在台北1987年在香港和敦煌1988年在北京和京都1990年在威尼斯、台北和敦煌1992年在北京1993年在香港和敦煌1994年在敦煌和柏林1995年在嘉义1996年在成都和兰州1997年在伦敦、布达佩斯和杭州等地几乎每一年都有综合的或专题

性的敦煌学术讨论会召开。2000年6月22日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在此前后北京、香港、敦煌、蒙特利尔等地都举办了高水准的敦煌学国际会议。

此外除了创办《敦煌学》、《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等杂志和专刊外还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著。据我和赵和平先生在编辑《敦煌学大辞典》时的初步统计自1980年至1994年海内外出版的敦煌学研究专著共有近四百种之多。1997年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以主题索引的方式查有关“敦煌”的著作映入眼帘的多达数百个名目而今年200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网页上竟能检索到六百多笔。敦煌只是唐朝边疆的一个小州但有关敦煌的著作远远多于唐朝的都城长安的著作。

在敦煌学的领域里仅就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来说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比如有关历史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利用敦煌资料研究北朝隋唐均田制、赋役制、租佃关系、寺院经济、法制文书、氏族、兵制、归义军史、唐五代西北民族、丝绸之路等等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同时在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等学科也利用敦煌资料有程度不同的学术贡献。由于中国学者在八九十年代的突出表现可以说在敦煌汉文文献方面国外的研究者越来越少中国的研究者越来越多。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一些出版社对敦煌写本的影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一系列大型图录正在陆续出版如《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等等这极大地改变了过去阅读资料的局限而《俄藏敦煌文献》等首次刊布的新材料也大大推动了敦煌学许多领域的具体研究。

敦煌资料的大量公布使得一些个案研究得以深入所以近年来对敦煌文献的分类研究如书仪、变文、佛经目录、社邑文书、星图日历、俗语词、归义军文书等方面的工作确实比前人更为完善。但我们没有像王重民先生那样的大家我们对整个敦煌古籍还没有清楚的把握也没有能够把世界各地的敦煌目录统编为一个分类目录。在深入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目前敦煌学的研究似乎有忽视基本工具书的编纂的倾向而且未能有超出个案研究的鸿篇巨制问世。

三　敦煌学研究的旨趣和难点——以归义军史研究为例

我本人的敦煌学研究方向之一是对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史的研究。现在就以归义军史研究为例来说明敦煌学研究的旨趣和难点所在这两方面的内容对于一般的敦煌学研究特别是敦煌历史资料的利用具有普遍的意义。

1归义军研究的旨趣

归义军本是唐朝在大中五年851设立的一个军镇但由于位于中原王朝“王命所不及”的西北一隅又处在中西交往的孔道上以及周边地区都为回鹘、吐蕃、党项、于阗等民族占据所以这个存在了将近二百年的汉人为主体的政权自有其特殊的研究旨趣和历史意义。以下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旨趣之一我们可以摆脱旧史家的束缚独立地审视历史。

大家知道传统的旧史家为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如正史、编年、政书、纪事本末等体裁的史书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常常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但是与之俱来的一个缺点是今天的历史研究方向和结论不能不受到旧史家的影响因为我们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出自官僚士大夫们的手笔。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书却提供给我们一批从未经过任何史家所整理、订正、甚至篡改过的原始材料。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可以利用一个事件发生的当时所遗留下来的材料来看这个事件本身。甚至我们可以从原始的文件揭示出旧史所掩盖住的某些历史真相。比如归义军建立的初期唐朝方面所留下来的史料记载大多数都着力渲染张议潮的归降和献款唐朝对归义军如何如何优待等等。但是我们通过敦煌文书可以清楚地看出张议潮乃至张淮深统治时期的归义军政权与唐朝有着明争暗斗的情形从而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归义军作为晚唐的一个藩镇与中央朝廷之间若即若离的真实关系。

旨趣之二我们可以根据最原始的材料来直接撰写没人写过的历史。

归义军是唐朝的一个边远的藩镇五代、宋初则成为实际上的“外邦”新、旧《五代史》附在《吐蕃传》中《宋史》则编入《外国传》

《宋会要》列为“蕃夷”这个奉中原正朔却被屏除于中原之外的地方政权在中国历史上自有其独特的性格。传统的中国史书都是以中央王朝为主干而加以记录的所记大多是帝王将相的事迹。敦煌文书中的归义军史料提供给我们多方面的资料从统治者归义军节度使和其手下的文臣武将到敦煌地方的僧俗大众甚至于妇女和学童都有丰富多彩的文献可供研究。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还包括许多传世史料所没有的非汉字所写的其他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如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等等记录了敦煌当地及其周边各民族的状况以及他们和归义军政权及民众的关系这些胡语文献用本民族的文字记载本民族的史事较汉文的记载更加真实也更加珍贵。可以说有关归义军的敦煌史料提供给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出发点和新的视角。我们利用这些材料可以揭示出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之间的战争和文化交往的许多史实完全超过了旧史所记两个回鹘政权向中原朝贡的那么一点点记录。

2归义军史研究的难点

然而归义军史的研究也有其自身材料性质所造成的困难。

难点之一在做历史研究之前先要整理档案式的史料。

略微翻捡过敦煌文书照片图录或缩微胶卷的人都知道这些文书大多数是残缺不全的与传世史籍的保存状态完全不同。另外这些文书都是手写体有些还是行书或草书要比传世的印刷体史书难认得多。因此研究归义军史与研究某个断代史或专题史有所不同。中国古代断代史的研究几乎都有各个朝代的正史、编年史、别史或其他史书可以依靠专史的情形大体相同可以根据这些已有的史书条理出大致的脉络。归义军史则完全没有详实的史书可言。敦煌文书中虽然保存下来大量的公私文书但由于出自佛寺大多数是作为佛寺藏书的附属品而保存下来的所以杂乱无章。我认为这些文书原是位于莫高窟前三界寺的物品或者是佛教文献的附着物如裱纸或写在经卷背面或者是留待用于抄经或裱经的废纸。研究者在进行归义军史的研究之前首先要像处理最原始的档案资料一样做文字的校录工作将残文书整理成可读的文献然后才能参互对比进行历史研究。当然有不少研究论文是把两项工作结合在

一起做的即先录文然后做研究。这样往往使得一篇文章有大段的按行校录的文书原文影响文章的文风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难点之二敦煌文书散在四方收集不易。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书有年代记载的文献从406年至1002年从内容上看大体上来说是年代越后资料越多年代越后世俗材料越多也就是说封存于归义军后期的这批文书以归义军时期的材料最多。但是由于发现以后没有得到妥善的保存所以这批总共约有五万件的文书现分散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中国、日本等国的公私收藏者手中。归义军史的研究是随着敦煌文书的发现而开始的但是由于资料的分散前辈学者虽然取得不少成就最终被条件所局限而无法全面地探讨归义军史。六十年代公布了英国图书馆藏和北京图书馆藏的大部分文书缩微胶片情况有所改观但“文革”使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处在停顿状态。七十年代末包含世俗文书最多的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卷全部公布使我们有条件全面掌握敦煌文书最主要的三大馆藏的资料才使得归义军史的全面系统的研究成为可能。这也就是我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自觉不自觉地开始系统收集材料来研究归义军史的学术背景。

六七十年代所制成的胶片和照片清晰的程度还十分有限特别是法藏文书由于原件上面包了一层薄纱拍照的照片效果很不理想所以有很多重要的文书无法识读。还因为负责交换胶片的人没有认真核查使得法藏的藏文文书部分有许多文书没有拍照而且常常是比较重要的文书。我们知道法藏藏文文书的目录拉露目录编在汉文文书目录之前在拉露编目时把许多编在汉文文书部分而背面有藏文的文书提到藏文文书部分编目使我们在汉文文书部分无法找到原件照片。而英图和北图公布的胶片也非其馆藏的全部。我在研究归义军史的十余年中有不少次机会出国调查抄录未公布的或者不清楚的敦煌文书我的《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有不少录文是从胶片或照片上所看不到的文字。敦煌文书不过五万左右的编号但由于分散收藏在世界各地甚至秘藏在公私收藏者手中学者难以利用使得归义军史的研究较利用普通书籍所作的断代史或专题史研究在获取资料上要困难得多花费的时间和经费也要多得多。

难点之三归义军史的研究和其他敦煌学门类一样学术研究的规范还没有建立。

归义军史的研究没有许多传统古籍那样的各种版本甚至标点本史籍可供参考。如前所述归义军史料的整理往往和研究论文一同发表。由于敦煌资料不少收藏在国外首次发表的材料又有不少是外文研究文献这样就使得引用归义军资料时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还要翻捡大量的中外文学术论著以便在前人取得的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但有一些研究者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好好做基本的学术积累以为找到一件文书就可以写文章注引出处无非就是给出编号而已。更有甚者转抄别人的校录文书的成果而只注出编号好像都是他本人从法国或英国抄来的一样。这种不遵守学术规范的做法在归义军史研究乃至许多敦煌学的研究论著中大量存在。归义军史的研究涉及大量敦煌文书要做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积累并非一日之功特别是现在敦煌学研究起点已经很高不是随便拿来一篇文书就可以写文章的。由于学术规范的不健全产生了一些重复研究、水平不高甚至结论错误的论著使得我们做一篇文章时往往先要费些笔墨来清理本不应该有的错误费时费力。

四　本书的基本内容提要

《绪论》

分析“敦煌学”概念的形成和局限概括介绍敦煌学研究的现状以归义军史研究为例阐述敦煌学研究的旨趣和难点最后介绍本书的基本内容。

第一讲《中国历史上的敦煌》

综合利用传世史书、石刻材料、敦煌文书、考古文物资料概述从秦汉到明清的敦煌地方史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看看作为中原王朝边远城镇的敦煌如何随着中原王朝的历史脉搏而跳动。

第二讲《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

利用史籍特别是敦煌文书和考古材料阐述位于中西交往的孔道上的敦煌如何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而兴盛与败落以及在中西文化交往促进下融汇东西南北各种文化因素的敦煌其自身文化的发展和对周边地域或民族的促进作用。

第三讲《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文物的早期流散》

讲述清末敦煌莫高窟的状况和王道士发现敦煌藏经洞的故事收集零碎的资料追寻斯坦因1907年到来之前所流散出来的绢画和写本以及

它们的目前所在。从敦煌发现的历史来总结中国文物流失的沉痛教训。

第四讲《敦煌藏经洞的原状及其封闭原因》

根据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最初描述和留下的照片探讨敦煌藏经洞发现时其收藏品的原状从而推测敦煌藏经洞宝藏原来的性质即它们原本是莫高窟前三界寺的供养物它们的封闭不是废弃而是为了保存。

第五讲《敦煌宝藏的收藏与整理》

介绍入藏英、法、俄、中、日等国的敦煌收集品的情况概要介绍各国学者对海内外敦煌文献的编目、整理和刊布情况。

第六讲《于阗、龟兹、楼兰、高昌宝藏的争夺》

回顾以斯文赫定、斯坦因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掠夺敦煌宝藏的前后对新疆各地文化宝藏的掠夺过程概要介绍瑞典、俄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所攫取的于阗、龟兹、楼兰、高昌等地出土文献材料的学术价值。

第七讲《敦煌学对欧美东方学的贡献》

略谈欧美各国所获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不同对欧美东方学特别是汉学格局的影响。分析介绍欧美学者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对东方学特别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

第八讲《中国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

分析几乎同时接触到敦煌资料的中国和日本学界对敦煌资料的利用和不同学术走向阐述敦煌资料在建立中国和日本现代学术上的贡献以及战后两国敦煌学研究的优劣。在本讲中将特别表彰北京大学对敦煌学研究的贡献。

第九讲《敦煌学与隋唐五代政治、经济史研究》

从第九讲到第十六讲根据学者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分别介绍敦煌学研究对中国学术研究的主要贡献。本讲集中在隋唐五代政治、经济和制度史方面特别是文书制度、官制、兵制、均田、赋役、财政等。

第十讲《敦煌学与中古社会史研究》

介绍敦煌学资料对于中国中古的人口、下层社会、佛教社会、僧尼生活、民俗等方面研究的价值和成果。相对于研究比较充分的政治、制度史敦煌学资料涉及下层社会较多因此对社会史的研究将会发挥更大作用。

第十一讲《敦煌学与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

介绍敦煌文献对吐蕃王朝史、吐蕃统治敦煌、禅宗入藏、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于阗王国研究的贡献以及在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如祆教、摩尼教、景教、中印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价值。

第十二讲《敦煌佛教、道教文献的价值》

介绍敦煌材料在佛教文献学和佛教史方面的价值特别是与社会史密切相关的三阶教经典、禅宗文献的情况。同时阐述敦煌道教文献和道教思想史对整个中古思想史研究的贡献。

第十三讲《敦煌四部书抄本与中古学术史研究》

介绍敦煌文献中保存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的情况分析何以有些典籍有存有些典籍无存的原因并据以说明它们在探讨中古学术史上的价值。

第十四讲《敦煌学与语言文学研究》

介绍敦煌保存的汉语韵书、字书、音义书以及各种民族文字材料藏、回鹘、于阗、粟特利用前人有关研究的方法说明这些文字材料对于敦煌语言文字研究的价值。介绍俗文学作品的内容、价值特别是后者反映的社会情貌和民间文学的流行状况。

第十五讲《敦煌学与科技史研究》

讲述敦煌文献在天文、历法、数学、医药、造纸、印刷等科技史研究方面的贡献。

第十六讲《考古、艺术视角中的敦煌》

根据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成果介绍敦煌石窟形制、雕塑、壁画、图案的基本内容和时代演变情况从图象的角度来看敦煌石窟绘画的丰富内涵和研究旨趣。

第十七讲《敦煌写本学》

就整理、研究、利用敦煌文献时所遇到的问题介绍有关敦煌写本纸张、装潢、形式、书体、字体、书写格式、题记、印记、年代、正背关系、缀合、断代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第十八讲《敦煌写本的真伪辨别》

面对流散的敦煌收集品的大量刊行分析如何辨别敦煌藏经洞文献和今人伪造的“古代文献”并据前人研究成果和笔者考察真伪写本的经验提出敦煌写本真伪辨别的几个原则以利于敦煌写本的正确使用。

《后论》

从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角度展望21世纪的敦煌学研究。

敦煌学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固然是敦煌、吐鲁番等西北边陲出土的文物、文献以当地人的写本为多但也未必全都是敦煌、吐鲁番所写其中有长安、洛阳、河西、中亚各地所写的文书而流传到敦煌、吐鲁番的敦煌或吐鲁番是唐朝丝路城镇汇聚多种文明的典型代表。

敦煌学的丰富内容可以使我们得到一种多学科的、综合的学术训练你可以通过这一课程了解敦煌学的内涵在丰富历史知识之余增进对宗教、艺术、文学、语言等多方面的了解或者进而利用敦煌文献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这就是本课程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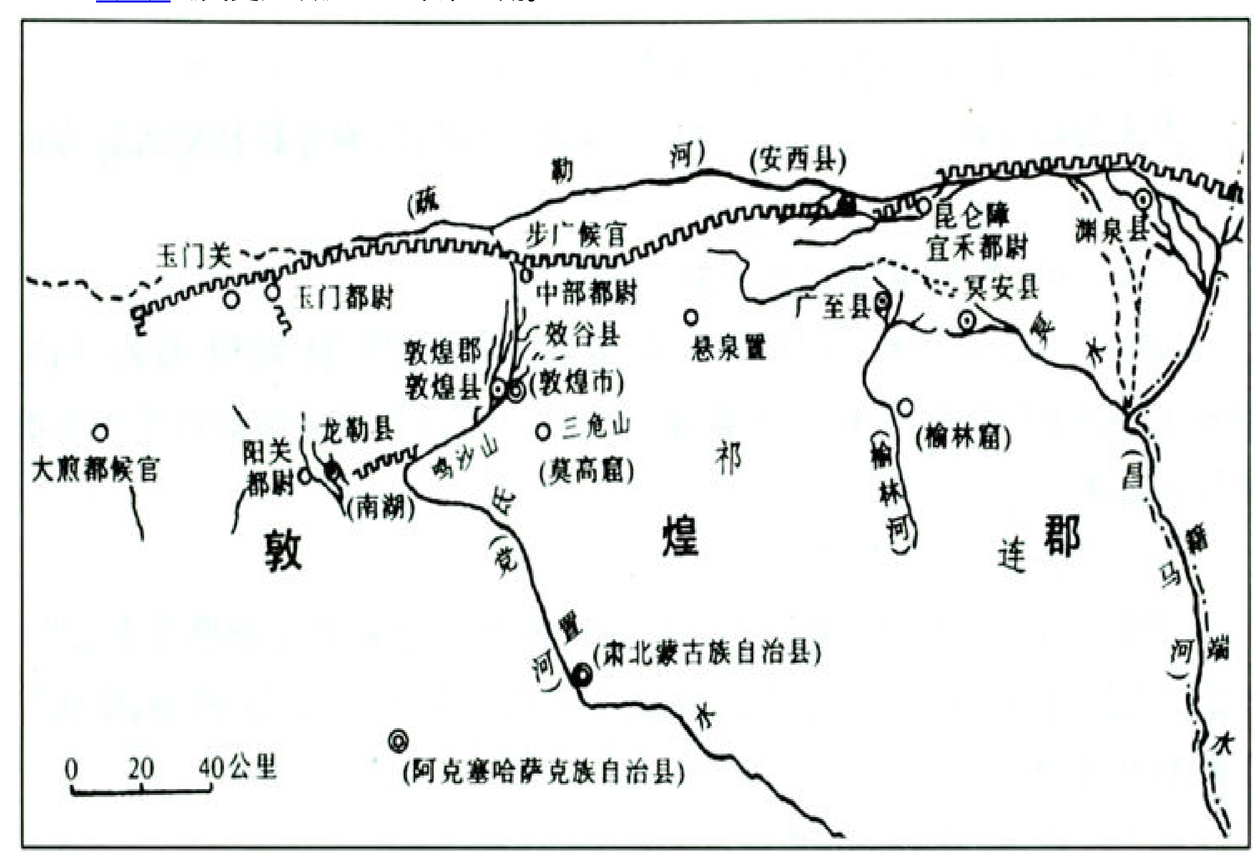
注释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3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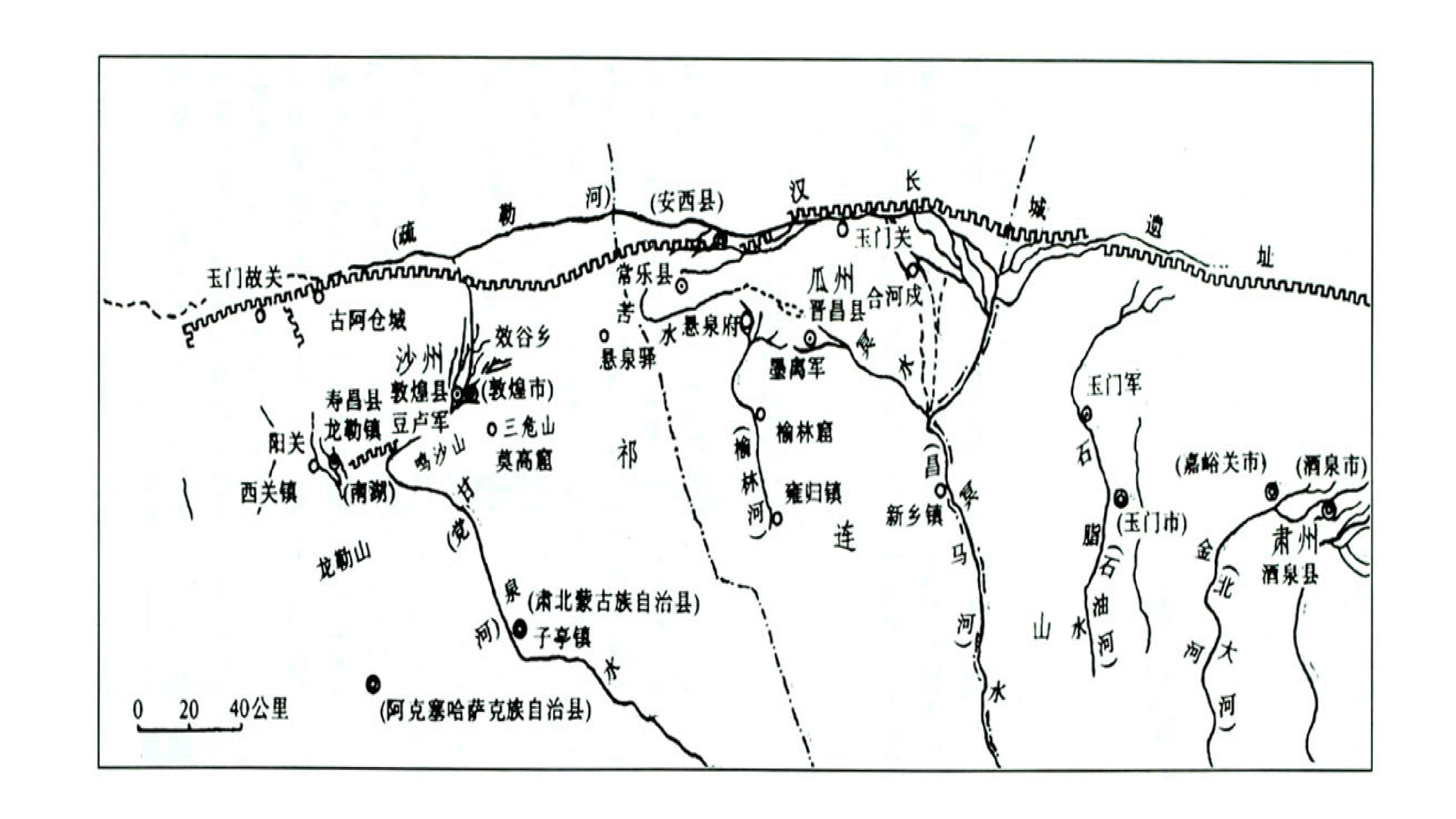
〔2〕《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3〕中华书局版1984年。

〔4〕《文史知识》1985年第10期。



地图1　西汉的敦煌郡及长城



(疏勒河)
(安西县)
汉长城遗址
玉门故关
古阿仓城
常乐县
玉门关
瓜州
晋昌县
合河戍
苦水
悬泉府
悬泉驿
墨离军
效谷乡
沙州
敦煌县
(敦煌市)
寿昌县
龙勒镇
豆卢军
三危山
莫高窟
鸣沙山
阳关
西关镇
(南湖)
祁连山
榆林窟
(榆林河)
雍归镇
新乡镇
(昌马河)
冥水
甘泉水
(党河)
龙勒山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子亭镇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玉门军
石脂水
(石油河)
(玉门市)
(嘉峪关市)
(酒泉市)
肃州
酒泉县
金河
(北大河)
0 20 40公里

地图2　唐代前期敦煌及其周边

第一讲　中国历史上的敦煌

敦煌位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连接着东西方文化的陆上丝绸之路干道就从这里通过。敦煌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它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一　两汉时期的敦煌

敦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当时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是月氏人他们的游牧区域是以敦煌和祁连山为中心的范围十分广阔向东到达河西走廊东部和陇右地区向西进入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天山东部地区。大约在秦朝前221—前207末叶月氏势力日益强盛击败了同在河西走廊西部地区游牧的乌孙人迫使乌孙西迁到天山以北地区。就连蒙古高原的强悍民族匈奴也不得不把首领头曼单于的儿子冒顿送到月氏那里去当人质[1]。

秦汉之际匈奴在新的首领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强大起来先是打败了东边的强邻东胡又乘秦汉交替时中原战乱的机会夺得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然后向西击溃强大的月氏迫使月氏人大举西迁河西走廊成为匈奴控制的地区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西部归匈奴的浑邪王统治东部则由匈奴休屠王驻守。随后匈奴又向南吞并楼烦王、白羊王和河南王的领地并进一步向西控制了西域地区成为中国北方从东到西的霸主。新立的汉王朝也备受匈奴的侵扰由于没有力量反击只好用和亲、赠送缯帛的方式换取短暂的和平[2]。

汉朝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渐渐富强起来。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后开始筹划反击匈奴的战争。有充足的物质准备再加上张骞第一次西行所获河西匈奴情报的帮助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春将军霍去病率军越过祁连山直接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同年夏霍将军再次进入河西地区使匈奴的统治秩序遭重创匈奴浑邪王率部下四万余众投降汉朝。匈

奴人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3]从此河西地区归入汉朝的版图。

就在夺取了河西走廊的元狩二年汉朝设置了武威、酒泉二郡敦煌一带归酒泉郡管辖。十年后的元鼎六年前111又分武威、酒泉两郡之地设张掖、敦煌二郡[4]。与此同时汉朝又把长城从酒泉修筑到敦煌以西并在敦煌郡城西面分别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扼守西域进入河西、中原的大门。这就是《汉书·西域传》一开篇所说的“列四郡据两关”。

敦煌郡是从酒泉郡中划出来的是随着汉朝军事力量的向西开拓和灌溉农业区的扩展而设置的。开始时敦煌只是一个很小的郡但因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很快就发展起来了。西汉时的敦煌郡下辖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个县包括今天敦煌、安西两县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一部分。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敦煌有11200户人口38335每户不到四人[5]。虽然从人口密度来看每平方公里只有0.3人但这些人口集中在六个县中比以前要多得多了。人口的增长推动了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产量的提高敦煌六县之一的“效谷”就是由于任鱼泽尉的崔不意“教力田以勤效得谷”而得名的[6]反映了敦煌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敦煌发展的基础也是西汉进取西域的必要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将军李广利第二次西征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时敦煌就安排了兵六万人牛十万头马三万多匹其他牲畜数以万计奔赴前线[7]。为了巩固这一基地汉朝一面迁徙内地贫民、囚犯来此定居一面征发大批士兵到此戍守[8]图1。中原汉族民众的迁入改变了河西的民族布局推动了生产进步。因此可以说自从建郡以后敦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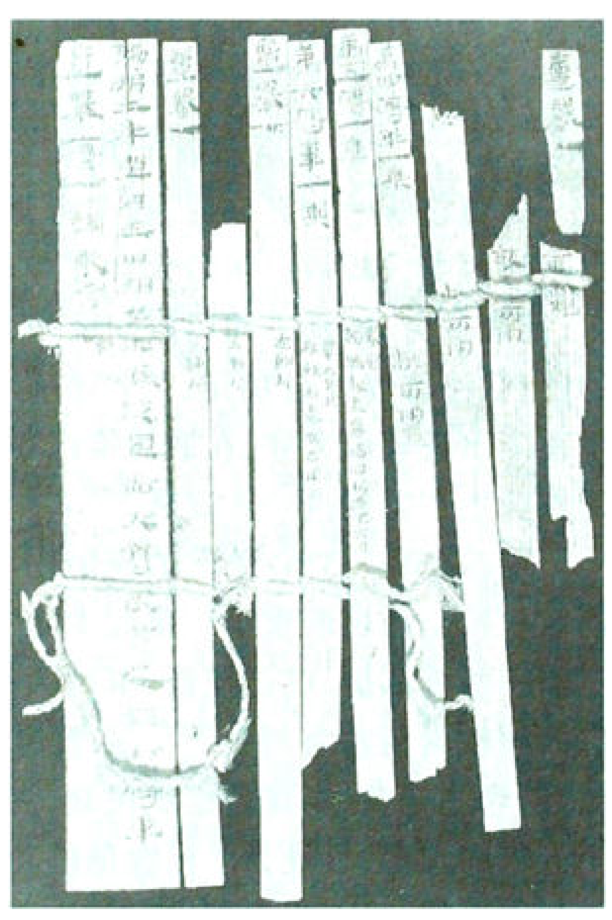


图1　敦煌汉简

西汉末中原动乱河西却富庶平安许多中原的大族避乱西迁在河西定居下来。大族的到来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也为河西地区增添了熟悉农业生产技术的大批劳动人手。东汉时河西东部地区常常受到羌人的起兵扰乱西部却相对比较平安。同时北匈奴重新强盛控制了西域汉朝在西域的统治逐渐崩溃代替西域都护主管西域事务的护西域副校尉长驻敦煌而敦煌太守成为汉朝在西域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实际负责人。清朝初年在新疆巴里坤湖畔发现的汉顺帝永和二年137立的《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就是敦煌太守率军进击匈奴呼衍王的记录[9]。敦煌可以说是当时统治西域的军政中心。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

东汉末年中原军阀割据混战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敦煌在曹魏的统治下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晋虽然有短暂的统一但

很快就是八王之乱291—306、永嘉之乱311接着是西晋灭亡316、晋室南迁318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批中原的士人逃到河西。十六国时期304—439敦煌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五个政权。

曹魏在统一北方以后魏文帝曹丕委任尹奉为敦煌太守继续维持西汉以来河西屯戍政策。明帝太和元年227仓慈继任敦煌太守抑制豪强势力抚恤贫穷鼓励不同民族间通婚并对来往的西域商人提供贸易和交通的便利使敦煌社会稳定生产和商业得到发展[10]。齐王嘉平元年249皇甫隆出任敦煌太守在敦煌推广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使敦煌的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11]。

前凉313—376张氏的统治中心在河西东部的武威但敦煌仍然是河西政权控制西域的重镇。张骏太元二十二年345前凉把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合并称作沙州治所在敦煌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12]。据敦煌写本唐朝地方官府所修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记载杨宣曾组织民众兴修水利建五石斗门堰水溉田建成长十五里的水渠百姓为了纪念他的功绩称作“阳杨开渠”。杨宣还用自家的粮食万斛买石头修理城北北府渠上的平河斗门保证不再被水冲坏。另外沙州太守阴澹也曾在城西南修渠长七里被称作“阴安渠”[13]。

前秦376—387是由氐族苻氏建立于长安的政权。苻坚建元十二年376前秦灭前凉控制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十八年382派吕光进攻龟兹。为了巩固经营西域的基地建元二十一年385苻坚迁江汉百姓一万户、中原百姓七千余户到敦煌。大批中原士族和百姓的到来促进了敦煌耕地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

前秦政权因淝水之战的失败而瓦解。386年吕光从西域返回河西在凉州武威建立后凉政权386—403。麟嘉七年395后凉内乱“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继续给敦煌输入人力。后凉敦煌太守孟敏又在州城西南主持修建了长二十里的水渠人称“孟授渠”[14]对当地农业开发起了促进作用。

400年李暠在敦煌自称凉王建立了独立于武威后凉政权的割据政权——西凉。这是敦煌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独立政权的都城据《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记载李暠在敦煌城内修建恭德殿、靖恭堂、嘉纳堂、谦德堂议朝政阅武事又为其父立先王庙还设立泮宫增设高门学生五百人[15]而于阗、鄯善等西域王国也来遣使朝贡[16]敦煌俨然有都城规

模。然而沮渠蒙逊灭后凉建立北凉401—439后对西凉构成巨大威胁。李暠为对付北凉的侵逼于建初元年405迁都酒泉并随之带走了两万三千人户使敦煌的实力大为削弱。嘉兴四年420北凉打败酒泉的西凉王李歆西凉灭亡歆弟恂等曾据敦煌抵抗。421年沮渠蒙逊亲率二万大军攻敦煌以水灌城恂派壮士潜出城外掘堤均被擒获。李恂最后兵败自杀蒙逊“屠其城”[17]。敦煌丁壮被杀人口减少更加衰落下去。

由于敦煌的衰微而北凉的主要对手是立都平城山西大同的北魏鲜卑人所以北凉时期的敦煌没有特别的事迹。北魏太延五年439太武帝拓跋焘率军攻占北凉首都姑臧武威凉王沮渠牧犍降魏北凉实际灭亡但凉王诸弟仍在河西西部进行抵抗。在北魏军队的强大压力下441年据守敦煌的牧犍弟无讳派遣弟安周率五千人西击鄯善鄯善王比龙拒之安周不能克。442年无讳见河西大势已去自率万余家撤离敦煌西渡流沙尚未至鄯善而比龙已西奔且末其世子投降安周无讳兄弟占据鄯善。同年八月无讳留从子丰周守鄯善率众经焉耆进军高昌。九月击败高昌太守阚爽入主高昌城仍号“河西王”。443年无讳改元“承平”建立号称“大凉”的高昌地方割据政权。444年无讳死安周即位。由于北凉王族带入高昌的人口过多引起饥荒“死者无限”[18]这说明北凉王族带走了大批敦煌户口而且这些人正是因为北魏从东向西的进攻而聚集在敦煌的河西精英。可以说在北凉灭西凉和北魏灭北凉的过程中敦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就在沮渠无讳撤离敦煌的442年西凉李暠的孙子李宝乘机占据敦煌并派其弟李怀达为使入魏归降。北魏封李宝为沙州牧、敦煌公。但北魏很快就在444年把李宝召到平城[19]直接控制了敦煌并建立了敦煌镇[20]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和抗击北方柔然汗国的前沿阵地。太平真君六年445北魏太武帝派成国公万度归发凉州以西兵出敦煌西击鄯善。九年448万度归继续西进击破焉耆和龟兹大获驼马而归[21]。与此同时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的柔然帮助高昌的沮渠安周在450年攻灭交河的车师国统一了吐鲁番盆地车师王车伊洛率残众经焉耆最后入魏[22]。接着柔然在460年灭掉沮渠安周的大凉政权立阚伯周为高昌王[23]。柔然不仅控制了敦煌以西的西域地区而且直接控制了与敦煌最为接近的吐鲁番盆地。延兴二年至四年472—474柔然连年进攻或骚扰敦煌多者兵力达到三万骑。在敦煌镇将尉多侯、乐洛生的率领下敦煌军民击败了来犯的敌军保住了敦煌[24]。但严峻的形势使得不少政府官员建议放弃敦煌把北魏

边界后撤到凉州。给事中韩秀认为如果放弃敦煌不仅凉州不能保恐怕关中也不得安宁[25]。孝文帝坚决支持韩秀的看法升敦煌镇将为都大将以加强敦煌的守备力量。太和九年485以前任敦煌镇都大将的穆亮“政尚宽简赈恤穷乏”[26]使敦煌得到恢复。同时叛离柔然的高车族在高昌西北立国487年击败柔然。488年柔然所属的伊吾戍主高羔子投降北魏。492年北魏出十万大军击败柔然使敦煌由此得到安宁。但长年的征战和人口的流失很难在短期内恢复。神龟年间518—520凉州刺史袁翻说敦煌、酒泉“空虚尤甚”[27]所以建议加强河西的屯田说明了敦煌当时衰落的情形。

正光五年524北魏的北方边镇爆发“六镇起义”。八月孝明帝下诏“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28]敦煌因盛产美瓜而取名“瓜州”一度易名“义州”领敦煌、酒泉、玉门、常乐、会稽五郡治敦煌[29]。六镇起义也引起河西动荡为加强河西西部的统治孝昌元年525北魏以明元帝四世孙元荣出任瓜州刺史。永安二年529又封元荣为东阳王。瓜州偏处边陲没有受到北魏末年中原动乱的太大影响。534、535年东、西魏分立河西属于西魏的版图元荣又作为西魏的瓜州刺史一直到大统十年544。在元荣统治敦煌的近二十年中他团结敦煌豪右使境内保持安定。元荣曾出资写经十余部有数百卷之多图2又在莫高窟开凿大型石窟这些行事反映了敦煌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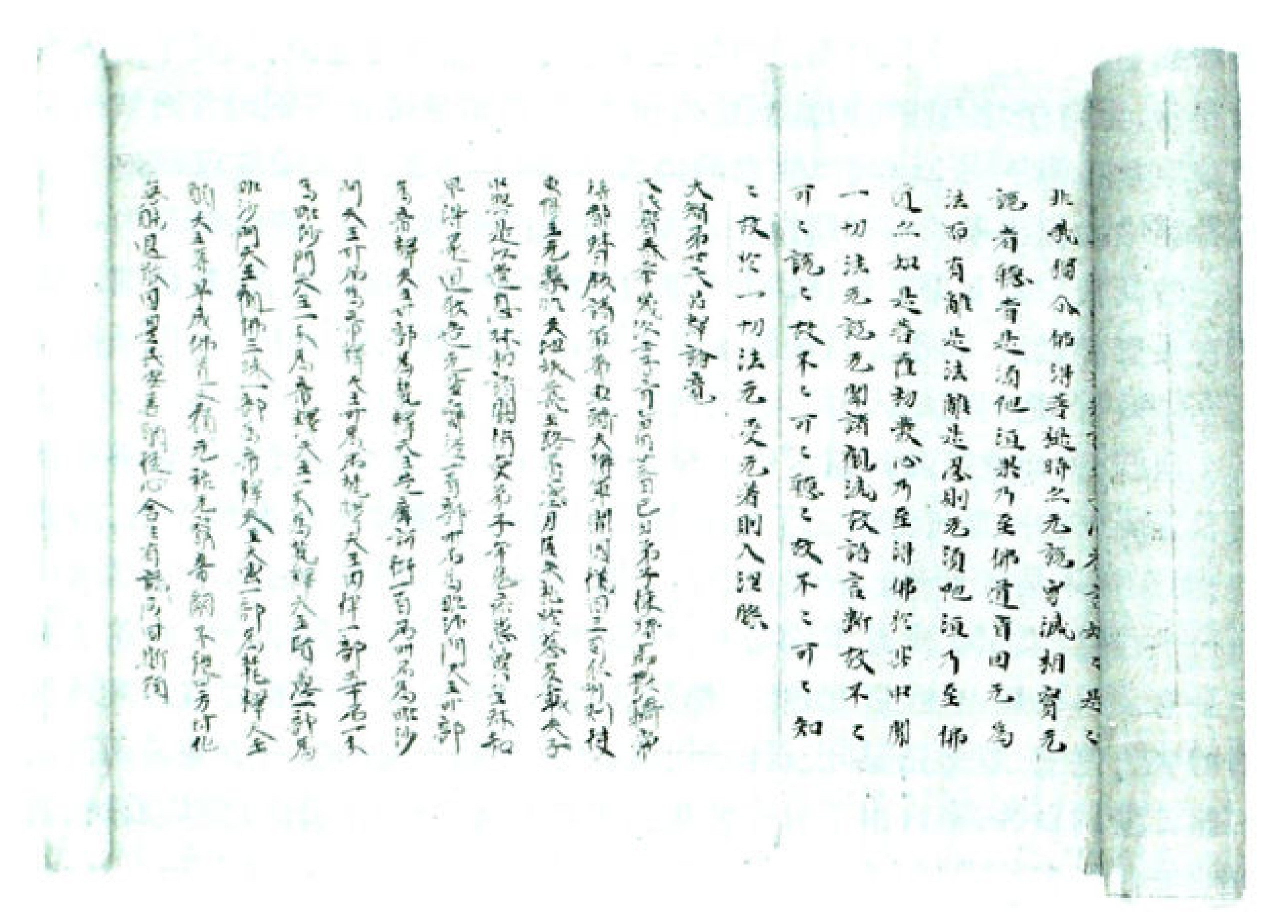


图2　P.2143东阳王写经

元荣卒其子元康继任瓜州刺史但元荣的女婿邓彦又作季彦杀康自立为刺史西魏不得已而承认[31]。大统十一年545西魏河西大使申徽至敦煌在大族令狐整等人的协助下擒获邓彦送京师治罪。546年申徽被任命为瓜州刺史。申徽为政勤俭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557年宇文觉废西魏立北周与550年高洋废东魏所立的北齐对垒。大约565—576年任瓜州刺史的建平公于义继续元荣在敦煌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敦煌碑记中因称“建平、东阳弘其迹”[32]。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曾下诏灭佛但对瓜州的影响似乎不大。

三　隋唐时期的敦煌

577年北周灭北齐581年杨坚废周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为敦煌的兴盛打下了基础。仁寿元年601隋文帝令天下各州建舍利塔供养佛舍利瓜州也在莫高窟的崇教寺起塔供养[33]。敦煌出土

过一些隋朝皇室成员的写经[34]表明隋朝对敦煌的控制和影响已经日渐增强。但由于南北朝时期敦煌的衰落虽经北朝末年东阳王、建平公等人的经营至隋朝尚不能与河西其他州相比所以隋炀帝让裴矩经营西域的主要基地是在张掖[35]。然而敦煌的进步可以从隋朝时期莫高窟建造了大批石窟中反映出来。可惜隋炀帝的暴政引起全国的反抗使隋朝成为一个短命的朝代。大业十三年617李轨在武威举兵自称凉王控制河西。李唐在长安立足后利用凉州粟特安氏的势力于武德二年619从内部搞垮了李轨政权把河西纳入自己的版图。

唐初敦煌地区并不稳定。武德三年620瓜州刺史贺拔行威举兵反唐。五年622瓜州土豪王干斩贺拔行威降唐。唐改瓜州为西沙州治敦煌而在常乐县置瓜州。六年623当地人张护、李通叛唐拥立别驾窦伏明为主被唐瓜州长史赵孝伦击败窦伏明降唐。至此敦煌地区的动乱基本平息。但敦煌以西、以北地区都是取代柔然而控制漠北和西域的突厥汗国的势力范围以南则是吐谷浑的地盘所以武德末、贞观初唐朝关闭西北关津"禁约百姓不许出蕃"玄奘在贞观元年627西行求法是从瓜州、敦煌间偷渡出去的[36]。

贞观四年630唐朝出兵漠北消灭了东突厥汗国东突厥所控制的伊吾也在首领石万年的率领下归降唐朝立为伊州。九年635唐朝又出兵青海击败吐谷浑使河西走廊不再受外部的干扰步入稳步发展的轨道。贞观七年去"西"字敦煌正式名为沙州。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以吐鲁番的高昌王国阻隔丝路北道经焉耆、高昌到敦煌的道路为由出兵高昌灭掉持续存在了一百三十九年的麴氏高昌王国在高昌设西州在天山北的今新疆吉木萨尔一带设庭州行政建置均与内地州县相同又在西州交河县设安西都护府以控制西域。这是唐朝进军西域的重要一步据记载唐灭高昌的《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纪功碑》率领骁雄鼓行而前的诸将领中第一位就是"沙州刺史上柱国望都县开国侯刘德敏"而碑文的作者则是"瓜州司法参军河内司马太真"[37]表明敦煌、常乐的文武官员和士兵参加了这次重要的战役敦煌又一次成为中原王朝进军西域的物资和兵员供应基地。贞观十八年644唐朝出兵讨焉耆。二十二年648进击龟兹。但由于唐太宗的去世高宗永徽二年651正月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举兵反叛唐朝进军西域的步伐暂时受阻。经过反复争夺唐朝最终在显庆二年657打败阿史那贺鲁西域的宗主权从西突厥的手中转移到唐朝手中。显庆三年658五月唐朝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并设立龟兹、于阗、焉耆、

疏勒四镇镇守西域广大地区[38]。自龙朔二年662始青藏高原吐蕃王国的军队进入西域与西突厥余部联合和唐朝争夺西域的控制权。咸亨元年670吐蕃攻占西域十八州唐朝一度罢安西四镇。不久唐朝陆续收复失地到上元二年675四镇基本恢复。为了加强西域的镇防能力特别是针对南面吐蕃的威胁唐朝在上元二、三年675—676把丝路南道上的两个重镇——典合城和且末城改称石城镇和播仙镇并划归沙州直接管辖。这样做的目的是加强南道的军事镇守能力同时也标志着敦煌实力的上升以及敦煌在唐朝经营西域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编订于此后不久的《沙州图经》卷五有关于石城镇和播仙镇的详细记录反映了沙州对两镇的控制实况[39]。上元以后唐朝和吐蕃在西域的争夺仍持续不断。仪凤年间676—679吐蕃再次攻占安西四镇。调露元年679裴行俭收复西域失地重立四镇以碎叶代焉耆切断吐蕃与西突厥余部的联合。武周初东突厥复兴侵扰唐朝。吐蕃乘机进攻安西四镇唐朝不支于垂拱二年686放弃四镇。长寿元年692王孝杰率军收复四镇[40]并发汉兵三万人镇守大大增强了唐朝在西域的战斗力。从此以后直到8世纪末的一百年间安西四镇的建制没有再动摇西域基本在唐朝统治之下。在唐朝用兵西域和镇守西域的过程中不少沙州将士奔赴前线。《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张芝墨池”条图3记有开元二年714任“游击将军、守右玉钤卫西州蒲昌府折冲都尉、摄本卫中郎将、充于阗录镇守使、敦煌郡开国公”的张怀福[41]就是任职西州蒲昌府而镇守于阗镇的敦煌人。据敦煌写本P.2625《敦煌名族志》任职西域的敦煌人还有“游击将军上柱国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张端”、“正议大夫北庭副大都护瀚海军使兼营田支度等使上柱国”阴嗣监、“昭武校尉庭州咸水镇将上柱国”阴嗣宗、“壮武将军行西州岸头府折冲兼充豆卢军副使”阴守忠等[42]。沙州和西州同属唐朝经营西域的基地两地之间的官员迁转十分频繁与上述敦煌人任职西州相反也有一些高昌人任职沙州如阿斯塔那239号墓所出《唐西州高昌县成默仁诵经功德疏》记“西州高昌县安西乡成默仁前任别敕授焉耆都督府录事。去景龙四年710二月廿七日制改授沙州寿昌县令。”[43]正是因为两地官员的任职关系所以我们在敦煌文书中常常发现有原本是吐鲁番的文书而吐鲁番墓葬中也出土有不少敦煌文书。随着唐朝的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化武周时在沙州设立了豆卢军。景云二年711唐朝分陇右道设河西道并置河西节度使治凉州统辖河西地区的军政。天宝元年742

河西节度使有兵7.3万人战马1.94万匹兵力居全国第三而战马则为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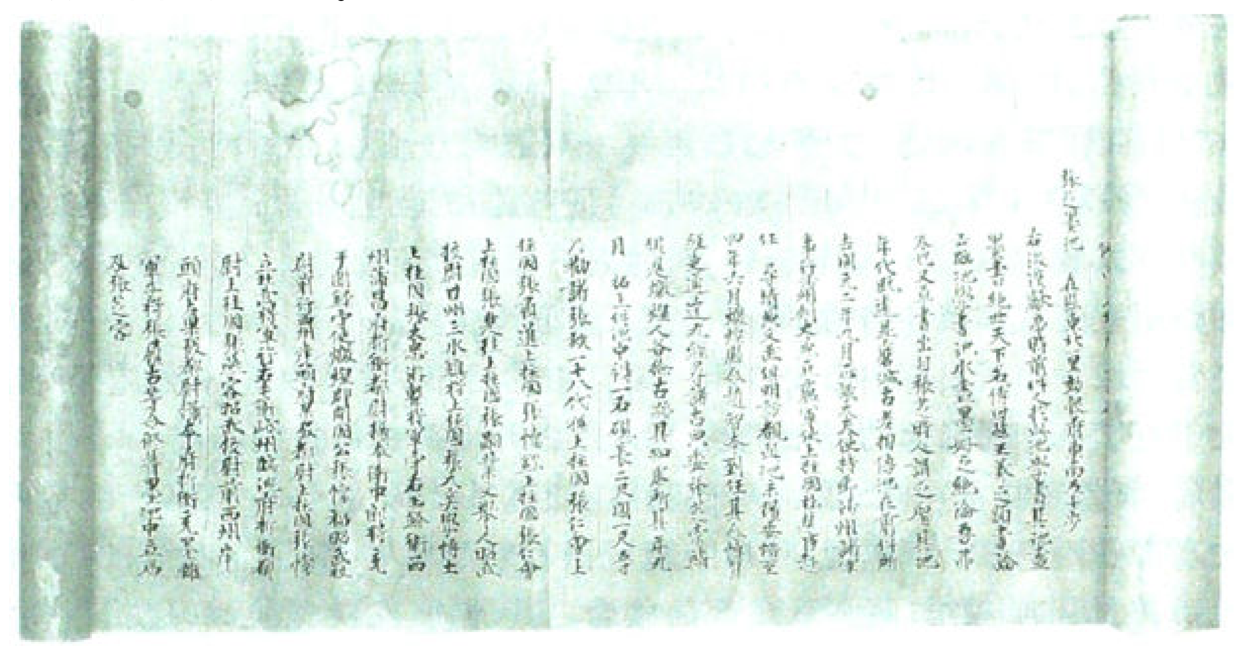


图3　P.2005《沙州图经》卷三

唐朝前期的敦煌在全国统一、国力蒸蒸日上的大环境下也得到了充分发展。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二县寿昌有时废置共十三乡唐朝的均田、籍帐制度贯彻到每个乡里在严格的律令制管理体制下敦煌井然有序生产得以稳步发展。水渠灌溉系统比以前更加完善围绕敦煌城四周就有五支水系、84条干渠、支渠、子渠构成的水利网络。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从西魏大统十三年547计帐所见的狭乡变成唐朝敦煌户籍所见的宽乡。粮食产量不断增长商品经济也走向繁荣。在敦煌的市场上有中原来的丝绸、瓷器有西域的玉石、珍宝有北方的驼马、毛织品也有当地出产的五谷。《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说天宝年间“自〔长安〕开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里的陇右是包括敦煌在内的。天宝时742—755沙州有户6395口32234〔45〕达到了前秦以来的又一个高峰。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叛乱爆发驻守河西的唐军劲旅都前往中原靖难吐蕃乘机从青海北上进攻唐朝领地先是占领了陇右切断了河西与唐朝的联系继而在代宗广德二年764攻占凉州河西节度使杨志烈被迫西奔甘州。永泰二年766吐蕃进而攻陷甘州、肃州继任河西节度使杨休明退守沙州。大历十一年776吐蕃攻陷瓜州进围沙州。敦煌军民在阎朝的率

领下艰苦抵抗经过十年的奋战到贞元二年786时[46]已经弹尽粮绝在吐蕃答应“勿徙他境”的条件下“寻盟而降”。敦煌从此进入吐蕃统治的时代。

四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

从755年到796年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统治时期也是吐蕃王朝有史以来国势最强的时代。敦煌本《吐蕃王朝大事记》称颂道“韦·赞热多禄dBa's bTsan bzher mDo lod等率军至凉州以上西攻占八座州城后编组降人使之成为〔赞普〕臣民。〔吐蕃〕国威远震陇山地区以上西尽入手中。而后设立五个通颊mThong khyab万户部落新生一个德论bDe blon所辖之大区。”[47]这是吐蕃史官所记载的攻占唐朝领地的情形所谓凉州以西八州即上述凉、甘、肃、瓜、沙、伊781年占领、西791、庭790八州德论辖境可以考订在陇山以西且末以东吐蕃新占领的河、陇地区。

据藏文史籍《智者喜宴》记载吐蕃本部的军政组织是分成翼ru“如”和千户部落stong sde“东岱”总共有五翼六十一千户部落而若干个千户所属的民众立一个万户长Khri dpon管辖。随着吐蕃势力的向外扩张又把新占领和吸收的部族民众编成新的部落如唐蕃交界处的通颊和吐谷浑分别被编成九个和六个千户部落。这些部落随着吐蕃王国的扩张而伸向新的领域因此通颊、退浑吐谷浑部落的名字也都见于吐蕃新占领的陇山以西地区[48]。

为了镇守新的占领区吐蕃王朝在其东北到西北的边境上设立了一系列军镇Khrom从东到西计有黄河上游河曲附近的玛曲军镇位于青海湖东部或东北的野猫川军镇河西走廊的凉州军镇、瓜州军镇罗布泊地区的萨毗军镇和田的于阗军镇吉尔吉特的小勃律军镇。敦煌从军镇体制上属于瓜州军镇在吐蕃时仍称作沙州但只是一个城其首脑叫“节儿”即城主的意思并不是汉文“节度使”的另一种说法[49]。吐蕃占领敦煌后于790年按照其本身的制度把沙州百姓按职业编成若干部落现在知道的有“丝绵部落”、“行人部落”、“僧尼部落”、“道门亲表部落”。820年前后增置军事系统的阿骨萨曷骨萨或纥骨萨、悉董萨思董萨或丝董萨部落上、下部落。824年又增置通颊军部落[50]。部落有部落使下设将将有将头。吐蕃改变了敦煌的军政管辖体制虽然继续计口授田但这种部落编制显然不利于生产。僧尼的大量增加也减少了劳动人口。按地亩征收的地子和按户征收的突税使百姓负担大大超过了唐朝时期。吐蕃收

缴民间铁器影响了农业生产。唐朝的货币被废除交易退回到以物易物。瓜沙大族的社会基础虽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但汉人的社会地位要低于吐蕃人甚至低于吐谷浑和通颊人。在吐蕃统治初期曾爆发了玉关驿户起义还发生过氾国忠等于深夜杀入沙州子城、吐蕃节儿投火自焚等事件[51]。

吐蕃占领敦煌的时期也正是大力弘扬佛教的时代。吐蕃把敦煌看做是一个佛教的中心极力加以保护对这里佛教的发展也极力予以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沙州的佛教迅速膨胀。在吐蕃统治敦煌初期沙州有僧寺九所尼寺四所僧尼三百一十人。到吐蕃统治末期寺院增加到十七所僧尼猛增到数千人而沙州的总人口只有两万五千人左右[52]。吐蕃对敦煌的统治一直延续到848年所以和中原地区相比敦煌避过了唐朝的“会昌灭法”844—845对佛教的破坏使佛教教团和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五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

在吐蕃王朝内部一直存在着佛教和吐蕃人信奉的原始宗教——本教Bon的斗争。吐蕃赞普朗达玛gLang dar ma即位后在一些大臣的怂恿下灭佛842年被僧人刺杀随之吐蕃国内大乱河陇地区的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与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相攻不已吐蕃势衰其在河西和西域的统治秩序迅速崩溃。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沙州土豪张议潮率众起义赶走吐蕃守将节儿夺取沙、瓜二州并迅速向东西方向扩展又遣使分几路往唐朝长安告捷。五年851敦煌使者抵达长安唐朝设立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兼沙、瓜、甘、肃、伊、西、鄯、河、兰、岷、廓等十一州观察使[53]敦煌从此开始了延续近二百年的归义军时期。归义军前期晚唐只是唐朝的一个军镇但独立性十分强而归义军后期五代、宋初实际已是一个地方王国《宋史》入《外国传》表明其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

9世纪中叶正是西北地区各种势力兴衰起伏的时期。吐蕃王国崩溃漠北回鹘西迁840各种地方势力随之兴起如吐谷浑、龙家、嗢末、萨毗、仲云、南山等都想在河西走廊或塔里木盆地争得一块地盘。张议潮以敦煌为中心以汉族为主力团结境内各民族建立并巩固了归义军政

权。归义军政权存续了近二百年其意义非同一般。根据史籍特别是敦煌文书我们目前大体可以描述出归义军政治史的基本脉络如下[54]。

张议潮在占领瓜、沙等州后恢复唐制重建州县乡里和户籍土地制度且耕且战在大中三四年849—850攻占甘、肃、伊州。又整顿清理寺院财产立河西都僧统司以管理境内僧尼大众。在讨平伊州等地回鹘的骚扰后于大中十二年858率蕃汉兵东征经三年苦战于咸通二年861攻占凉州图4归义军辖境东抵灵武宁夏西达伊吾新疆东部势力达到最盛期。面对张议潮势力的扩张唐朝君臣颇为踌躇一方面为张议潮打败唐朝多年无法打败的吐蕃而欢呼另一方面又怕张议潮成为下一个“吐蕃”——与唐朝对抗的西部势力。所以在咸通四年863唐朝设凉州节度使希望削弱张议潮势力但从敦煌文书中可知凉州的实际控制权仍在张议潮手中。咸通七年866北庭回鹘仆固俊攻占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创建西州回鹘政权但与归义军保持友善的关系。咸通八年867张议潮的势力影响到陇右和西州而先身入朝为质的张议潮兄议潭卒于长安。张议潮奉诏入京一去不返最后在咸通十三年872卒于长安。其侄张淮深代掌归义军政权但唐朝并不给予淮深节度使旌节。张淮深得不到唐朝的支持而西迁回鹘已深入到甘、肃等地甚至侵扰瓜州。张淮深虽然击败回鹘散众的袭扰但乾符三年876西州回鹘攻占伊州使归义军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城镇。张淮深虽然三番五次地遣使唐朝求授旌节但均未能如愿。中和二年882他的部下在沙州立《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为张淮深颂德。但实际上甘州、凉州已渐渐不为归义军所守。光启二三年886—887张淮深分遣三批使者入唐朝求授旌节唐朝不予引起瓜沙内部对张淮深的不满。文德元年888十月唐朝终于授予张淮深归义军节度使旌节但归义军内部矛盾已不可收拾。大顺元年890张淮深及夫人、六子同时被杀大概是其叔伯兄弟的张淮鼎继任节度使。大顺三年892张淮鼎卒托孤子张承奉于索勋。索勋乃自立为归义军节度使掌握实权并得到唐朝的认可沙州百姓为他立《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乾宁元年894张议潮女、敦煌大族李明振妻张氏率诸子灭掉索勋由李氏诸子掌握归义军实权。瓜沙大族对这种暗中窃取张氏政权的作法显然不满乾宁三年896张承奉依靠大族势力夺回实权。因为归义军内乱东面的肃州西面的鄯善都陆续脱离归义军的统治归义军的辖境缩小到瓜、沙范围。张承奉建立二州六镇防戍体系主要是为了抵御来自东面的甘州回鹘政权的侵逼所以军镇主要在东部沿边地带。光化三年900

八月唐朝正式授予张承奉节度使旌节唐朝使臣于翌年到达沙州西面独立的于阗国的使臣也在同年首次来访沙州表明归义军在外交上的成功。但不久敦煌受到甘州回鹘的侵扰莫高窟窟阁曾被焚烧。



图4　张议潮领军出行图

天复七年907朱全忠废唐昭宣帝自立建立大梁政权。十年910秋张承奉知唐朝已亡自称白衣帝建号金山国。金山国新立锐意恢复归义军旧地曾派国相率军讨鄯善的璨微部落北征伊吾均无功而还。而甘州回鹘数次进攻沙州金山国先胜后败最后在辛未年911七月与回鹘订立城下之盟回鹘可汗是父金山天子是子。

甲戌年914曹议金名仁贵取代张承奉废金山国去王号仍称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改善与周边民族的关系遣使甘州并娶回鹘可汗女为妻确定和亲关系。贞明四年918曹议金在回鹘可汗、凉州仆射、灵州相公的帮助下遣使后梁受到后梁王朝给予的归义军节度使的封赠。曹议金于莫高窟建大窟一所98窟以庆贺中朝授节降恩。曹议金在通使伊州、西州回鹘稳固后方以后于同光三年925乘甘州回鹘汗位交替之机亲率兵征讨甘州回鹘经苦战使之屈服。新立的回鹘可汗娶曹议金女为妻成为曹议金子婿。曹议金妥善处理对外对内的关系使归义军实力有所增强。长兴二年931曹议金号称“令公”、“拓西大王”归义军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王国图5。曹议金又积极发展与于阗的关系双方使者频繁往来最后在934年曹议金女下嫁于阗国王李圣天。



图5　P.3805曹议金签发的归义军节度使授官牒

清泰二年935曹议金卒其子曹元德即位。沙州入朝中原的使臣在甘州被劫归义军与甘州回鹘关系破裂。天福四年939曹元德卒弟曹元深即位曹议金妻、回鹘夫人掌握实权号称“国母”。沙州利用后晋册封于阗王李圣天的使臣回朝的机会遣使后晋并与甘州修好。

天福九年944曹元深卒弟曹元忠即位。曹元忠统治期是归义军后期文化比较昌盛的时代。曹元忠发展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友好往来并与中原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政权保持联系给瓜沙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时机。开宝三年970于阗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相攻战于阗王尉迟输罗曾写信向其舅曹元忠求援。开宝七年974曹元忠卒侄曹延恭即位。九年976曹延恭卒弟曹延禄即位。



敦煌莫高窟第156窟

曹元忠以后的归义军政权开始走下坡路。东西方两支回鹘势力不断侵凌敦煌瓜沙境内也产生内部矛盾。咸平五年1002瓜沙军民不满曹延禄的统治围攻军府曹延禄及弟延瑞自杀族子曹宗寿即位并得到宋朝的承认。与此同时归义军也和辽朝开始通使。大中祥符七年1014曹宗寿卒子曹贤顺即位。1036年西夏占领沙州归义军政权基本结束。

六　西夏元明清时期的敦煌

唐朝后期活动在今陕、甘、宁的党项族北宋初年在首领李继迁的率领下与宋朝对抗。1002年李继迁攻下灵州称西平府迁都于此。1004年李继迁卒子德明即位与宋议和并把目标转向河西走廊。1028年攻占甘州灭甘州回鹘政权。1030年瓜州王以千骑降[55]。1036年西夏攻占沙州[56]。但开始时党项对沙州的统治较弱据《宋会要》瓜沙二州条记载归义军仍入宋朝贡了七次最晚一次是皇祐四年1052十月[57]莫高窟第444窟也有“庆历六年1046”的北宋年号题记[58]说明敦煌归义军政权或许还在西夏的控制下继续存在。

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大夏国史称西夏。大概在1052年以后西夏加强了对所占领的瓜沙二州的直接控制。莫高窟最早的西夏纪年是在1070年天赐礼盛国庆元年也是写在第444窟的题记[59]。同是在1070年所写的西夏文《瓜州审判案》表明西夏对当地的统治情况[60]。为了和北宋争战西夏曾迁徙敦煌民众向东使敦煌受到削弱。

蒙古兴起后出征西夏。1205年曾侵扰瓜沙地区。1224年蒙古骑兵围攻沙州半年敦煌势蹙。到1227年3月敦煌终于为蒙古汗国占领。同年6月西夏被蒙古灭亡。蒙古占领敦煌后将其划入八都大王的封地[61]。

1271年元朝建立后不久马可波罗曾经过沙州。元朝于1277年重设沙州隶肃州归元朝中央政府管辖授当地百姓田种、农具。1280年沙州升格为路设总管府统瓜、沙二州[62]。同年又遣汉军屯田沙州。敦煌成为元朝与西北藩王斗争的重要基地。但蒙古汗国的中心在和林元朝则立都北京其西向的交通干道已不通过敦煌使敦煌失去了重要的地理上的优势。1291—1292年元朝移瓜、沙州居民入肃州[63]敦煌的地位更不如前。

1368年明朝建立。1372年明将冯胜经略河西取得初步胜利但敦煌仍为元朝残部所守。为防蒙古东进冯胜在肃州西七十里处建嘉峪关成

为明朝西部的边关敦煌被弃置关外。1391年明朝进兵哈密沙州蒙古王子归顺明朝。1404年明朝设沙州卫仍以蒙古后裔统辖。1446年沙州内乱明将任礼率军入沙州把沙州卫属下二百余户一千二百三十余人迁入关内沙州仍由蒙古后裔占据。以后吐鲁番势力强大于1115年进攻沙州蒙古1528年沙州为吐鲁番占领。明朝在1524年闭嘉峪关又在1529年放弃哈密。敦煌从明朝初年开始已成为牧区至此尤甚。

1644年明亡清兵入关定都北京。康熙时平定新疆。1723年在敦煌设沙州所。1725年升格为卫并迁2400余户来此屯田。沙州旧城为水冲毁在东面筑新城即今城址。1760年改沙州卫为敦煌县隶安肃道。敦煌在清朝时略有恢复但没有太大起色。道光十一年1831所刊《敦煌县志》[64]描述了清代敦煌的面貌。

注释

〔1〕《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2〕《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3〕《史记索隐》引《西河旧事》标点本《史记》2909页。

〔4〕关于敦煌郡的设置年代此据《汉书·武帝本纪》同书《地理志》则说是后元年前88—87。此外还有一些介乎两者之间的说法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意见。

〔5〕《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6〕《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颜师古注。

〔7〕《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8〕大量士兵的到来可以从陆续出土的汉简的记录得到印证。

〔9〕关于《裴岑碑》参看吴其昌《汉敦煌太守裴岑破北匈奴纪功碑跋尾》《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335—360页王炳华《裴岑纪功碑》《新疆日报》1981年5月3日。

〔10〕《三国志》卷一六《魏书·仓慈传》。

〔11〕《三国志》卷一六《魏书·仓慈传》注引《魏略》。

〔12〕《魏书》卷九九《张骏传》。

〔13〕此据最新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录文见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16—17、50—55页。

〔14〕《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16、49—50页。

〔15〕同上书19、26—28页。

〔16〕《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17〕《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参看《沙州都督府图经》“一所故堤”条见《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18—19页。

〔18〕关于北凉王族自敦煌败走鄯善到高昌立足的过程参看荣新江《且渠安周碑与高昌大凉政权》《燕京学报》新5期1998年75—79页。

〔19〕《魏书》卷四《世祖纪》下卷三九《李宝传》。

〔20〕《元和郡县图志》卷四○陇右道沙州。

［21］《魏书》卷四《世祖纪》下《北史》卷九七《西域传》。

［22］《魏书》卷三○《车伊洛传》、《北史》卷九七《西域传》。

［23］从北凉灭亡到麴氏高昌建立501年高昌地区的政权转移详见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第四、五章文物出版社1998年。

［24］《魏书》卷七《高祖纪》上卷二六《尉古真传》附《尉多侯传》。

［25］《魏书》卷四二《韩秀传》。

［26］《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穆亮传》。

［27］《魏书》卷六九《袁翻传》。

［28］《魏书》卷九《肃宗纪》。

［29］《元和郡县图志》卷四○陇右道沙州。

［30］参看宿白《东阳王与建平公二稿》原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收入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244—259页。

［31］参看上引宿白文。

［32］参看上引宿白文。

［33］《广弘明集》所收王邵《舍利感应记》。

［34］参看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所收敦煌隋代写经题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

［35］《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36］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12—17页。

［37］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拓本汇编》第11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86页。

［38］关于安西都护府初迁龟兹的年代参看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域史事二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1990年339—354页。

［39］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4年91—97页。

［40］有关唐朝与吐蕃在西域的争夺参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41］见《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30页。

［42］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100—102页。

［43］《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文物出版社524页。图录本叁567页。

［44］《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条。

［45］《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典》敦煌郡条。

［46］关于敦煌的陷蕃时间过去有782和787年说现在基本上一致认为在786年参看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1—7页。

［47］译文据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33辑1990年124页有关《大事记》的其他研究参见该文注释。

［48］参看荣新江《通颊考》的有关论述。

［49］乌瑞G. Uray《军镇公元7至9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Khrom: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7th-9th Centuries《纪念黎吉生藏学研究论集》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威敏斯特1979年310—318页荣新江译载《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106—113页。

〔50〕参看山口瑞凤《吐蕃支配期的敦煌》《讲座敦煌》第2卷《敦煌的历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195—232页。

〔51〕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辑157—170页。

〔52〕参看藤枝晃《敦煌的僧尼籍》《东方学报》京都第29册1959年。

〔53〕《唐会要》卷七一。

〔54〕参看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相关章节特别是第一章《归义军大事纪年》有关史事的出处已见该书以下不一一注出。

〔55〕《宋史》卷四九○《夏国传》。

〔5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条。

〔57〕《宋会要辑稿·蕃夷》五。

〔58〕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169页。

〔59〕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60〕见《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刊》1932年。

〔61〕《元史》卷一二二《昔里钤部传》卷六○《地理志》。

〔62〕《元史》卷六○《地理志》。

〔63〕同上。

〔64〕苏履吉修、曾诚纂《敦煌县志》台北学生书局影印本1966年。

第二讲　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正好在古代中原王朝的西北边境陆上丝绸之路干道经过这里东往西去使得敦煌在古代中西文化交往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　张骞西行与丝路开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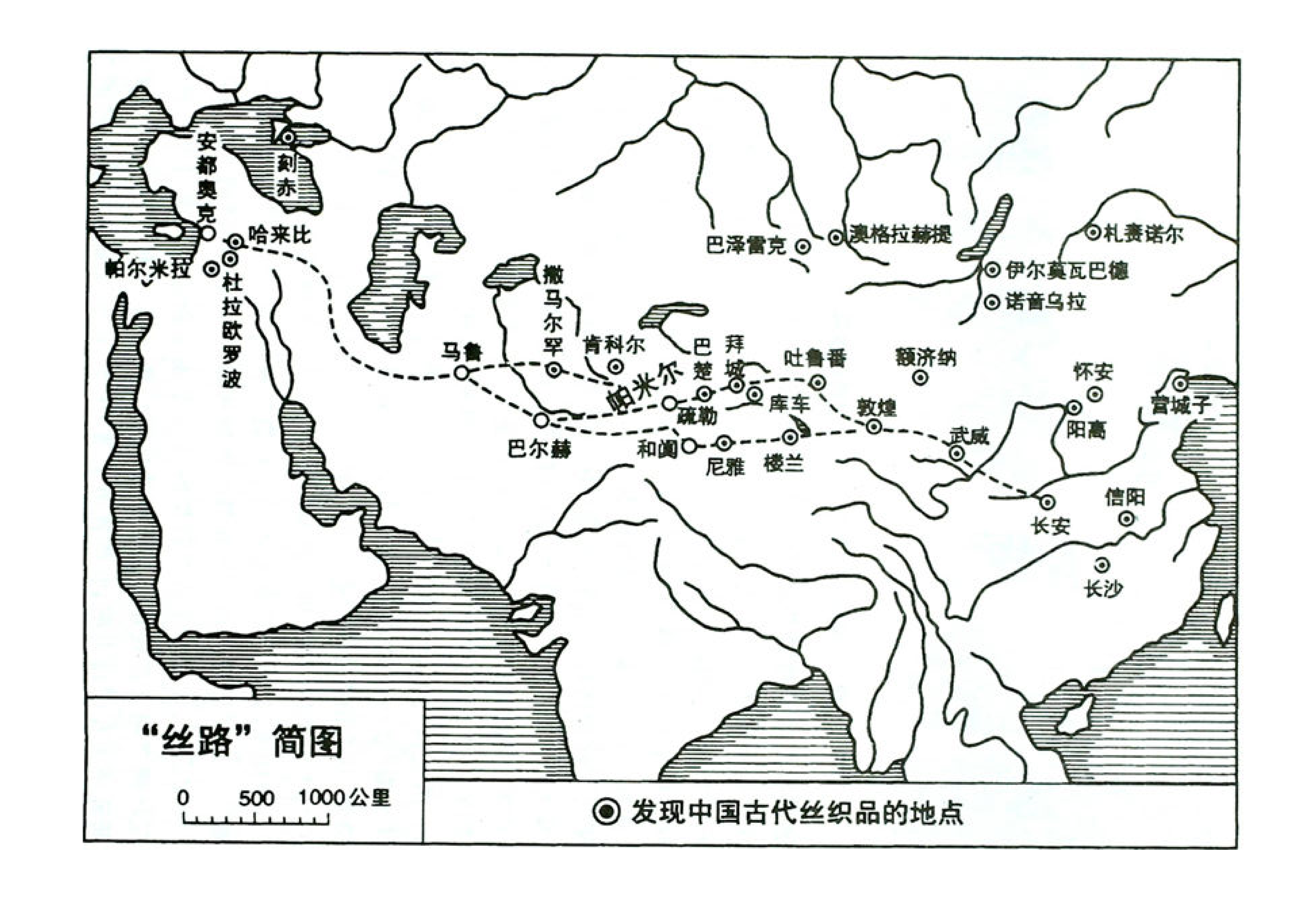
欧亚大陆出土的考古资料揭示了先秦时期东西方交往的存在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1]俄罗斯阿尔泰山西麓巴泽雷克Pazyryk大墓发现的公元前4、5世纪的中国铜镜和丝织品[2]都是考古学上的印证。在先秦的典籍中把西方运来的玉称之为“禺氏边山之玉”“禺氏”即月氏表明在中原与西域直接沟通以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游牧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扮演着向中原转输玉石的角色[3]。大概正是因为于阗的玉源源不断地经过敦煌运到内地所以当汉武帝在敦煌西北设立第一座关城时就把它叫做“玉门关”了。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派兵正面进攻匈奴的同时还作出一个伟大的战略决断派人到西方去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打跑的月氏人请他们返回原来的居住地以切断匈奴的“右臂”。公元前138年汉中人张骞应征前往图1历经千难万险经匈奴、大宛、康居等国来到阿姆河北岸大月氏的住地。张骞虽然没有得到大月氏的许诺却全面了解了西域各国的政制、兵力、道里、物产等情况探知了匈奴西部的虚实。张骞带回来的情报为将军霍去病夺取河西走廊打下了基础[4]。更为重要的是张骞西行的壮举在历史上首次打通了联系中原与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开启了中西文化交往的新纪元。因此史书上把张骞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称之为“凿空”意思是说张骞开辟了通往西方新天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从敦煌延续出去的。



图1　张骞辞别汉武帝图·敦煌莫高窟第323窟

汉代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是东面始于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咸阳一条路沿泾河而上经固原、景泰进入河西走廊另一条路沿渭水西行经陇西、金城今兰州进入走廊。沿河西走廊西行经武威、张掖、酒泉到敦煌。由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焉耆、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大月氏在今阿富汗、康居、奄蔡、安息今伊朗最远可达大秦罗马帝国的犁靬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5]。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上述这条道路。我们可以看出敦煌在丝绸之路上是处在多么重要的地理位置上的。197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居延发掘到《传置道里簿》木简记长安到张掖郡氐池的20个置置是西汉时对邮驿的称呼间的里程1990年又在敦煌悬泉置发掘到《传置道里簿》木牍记武威郡仓松到敦煌郡渊泉间12个置间的里程两相结合正可以复原从长安到敦煌西汉时期的传置驿道[6]。



"丝路"简图
0 500 1000公里
发现中国古代丝织品的地点
安都奥克
刻赤
哈来比
帕尔米拉
杜拉欧罗波
马鲁
撒马尔罕
肯科尔
巴楚
拜城
帕米尔
疏勒
巴尔赫
和阗
尼雅
楼兰
库车
吐鲁番
敦煌
额济纳
武威
巴泽雷克
澳格拉赫提
伊尔莫瓦巴德
诺音乌拉
札赉诺尔
怀安
阳高
营城子
长安
信阳
长沙

地图3　丝绸之路

沿着张骞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的基本干线中国的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成为罗马帝国时髦的服装原料。同时西方各国的珍禽异物、宗教思想也陆陆续续流入中原。位于丝路干线上的敦煌很快就成为东西方的贸易中心和商品中转站。

西汉末年王莽专权用传统儒家贬斥四夷的做法处理民族关系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一度中断。东汉初汉明帝派班超经营西域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以后汉朝与西域的联系时断时续河西东部也时有动乱西域各国入朝的王子都逗留在敦煌大批商胡也随之而来。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不断有一些新的道路被开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变化甚至废弃。比如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中原王朝在东汉初年打败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迁并牢固地占领了伊吾今哈密以后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7]。从伊吾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到龟兹可以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的状态而北方的东部与西部也时分时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与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长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龙涸今松潘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都城西经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合或更向西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与丝路南道合这条道被称做“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天人们也叫它做“青海道”[8]。还有一条路从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进入中亚地区。这条道路后来也被称做“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最为兴盛。

二　文化昌盛与莫高窟的开凿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秩序混乱。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没有太守当地豪强大姓雄张兼并土地使小民无立锥之地前来贸易的西域商胡也备受欺诈。227—233年间仓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强的兼并和勒索为西域商人前往内地买卖提供种种方便[9]使得敦煌成为汉族与西域各族民众密切交往贸易的一个国际都会。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天下大乱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纷纷迁居河西以避战乱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先后建立的五凉王朝也集中了大批人才。前凉、西凉和北凉的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尊重、保护知识人为他们教授生徒和著书立说提供良好的条件。如敦煌效谷人宋纤就有受业弟子三千余人[10]。当时敦煌的汉文化水平并不亚于中原北方甚至东晋南朝这里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宋纤、郭瑀、刘昞、阚骃、宋繇、张湛等他们的某些著作曾传写到南朝有些人则由北凉入北魏为魏、周乃至隋、唐制度与文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11]。

中原世家大族的到来也把内地流行的道教传到敦煌。上面提到的前凉和前秦时的郭瑀就是一位“虽居元佐而口咏黄老”的道教信徒[12]。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曾发现一枚早期天师道的符箓[13]。S.6825《老子想尔注》写本如果不是后代才传入的北朝抄本那就更证明敦煌天师道的流行[14]。从敦煌佛爷庙、新店、祁家湾等地出土的镇墓文也可以看到民间的方仙道的影响[15]。

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为本地区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知识的基础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提供了方便。两汉之际佛教已经从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经敦煌等地区传入中原很快就和中国传统的神仙方术一起在东汉都城洛阳和东南沿海一带流传开来。相反从敦煌北面长城沿线出土的大批简牍文书来看两汉之际的敦煌主要是一个贫民、士兵、遣犯屯戍的兵站没有传播佛教的文化基础。汉末魏晋时期随着中原士族的到来和当地文化水平的提高佛教很快就在这里传播开来。五凉的动乱和北魏与柔然的战争等一连串动荡的岁月给佛教在敦煌的流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西晋时有世居敦煌的月氏高僧竺法护率领一批弟子在这里译经布道人们称之为“敦煌菩萨”[16]。他的弟子竺法乘也在这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17]。前凉时又有高僧单道开、竺昙猷等人在敦煌修习禅法。

据武周圣历元年698立于莫高窟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18]有个叫乐僔的沙门杖锡来到敦煌城东南鸣沙山东麓忽然眼前一亮金光灿烂好像有千佛在金光中显现图2。于是他就在鸣沙山东面的悬崖上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所佛窟。不久以后又有一位从东方来的法良禅师在乐僔的窟旁边又营造了一个洞窟[19]。从此开启了近千年的敦煌石窟艺术创造史。从前凉到北凉在高僧的感召下在统治者的

支持下在当地大族的资助下敦煌的佛教得到迅猛的发展到北魏平定北凉之前这里已是“村坞相属多有塔寺”了[20]。至今乐僔、法良开凿的洞窟已经很难追寻[21]但有一些属于北凉时期的洞窟和小佛塔保存下来[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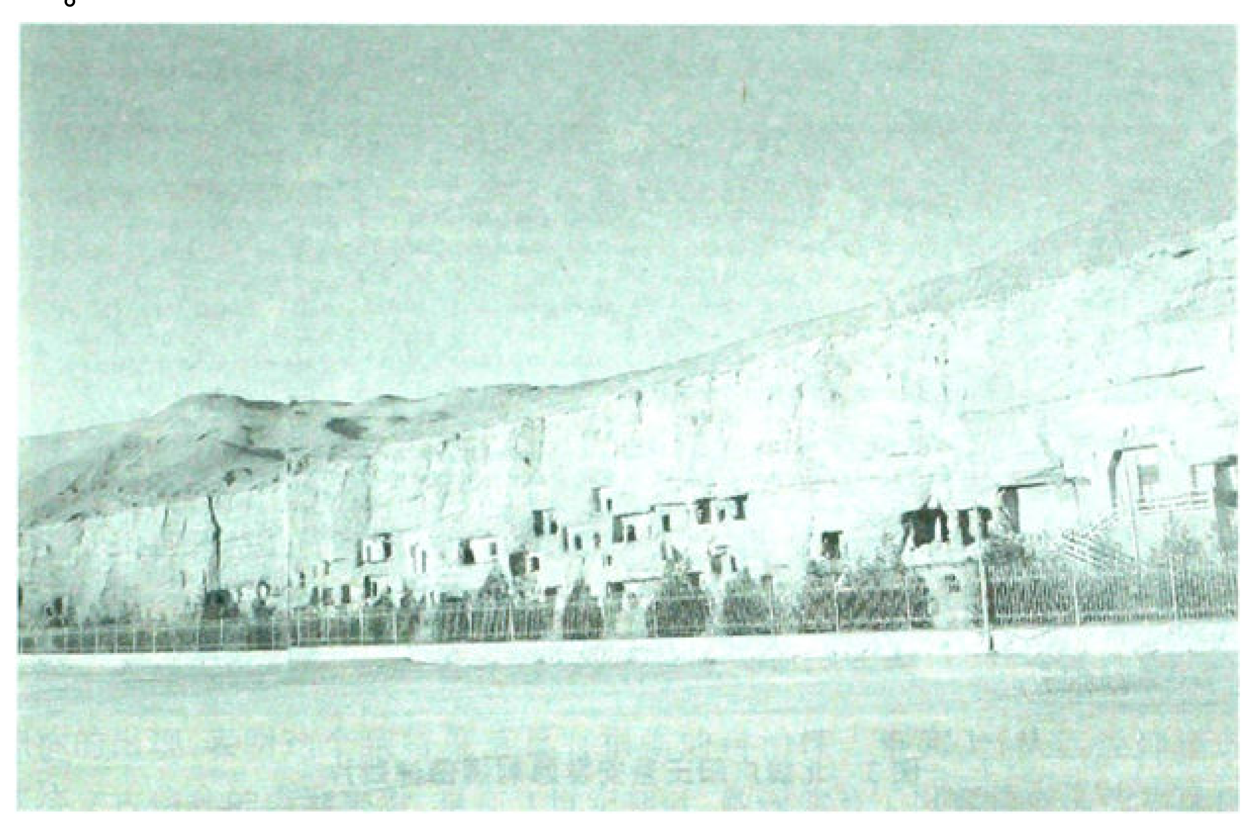


图2　夕阳映照下的鸣沙山

北魏虽然统一了包括敦煌在内的北方但由于柔然的不断南侵敦煌在5世纪后半叶社会仍然动荡不安佛教却沿着五凉王朝以来的发展势头进一步扩大其影响。特别是北魏王朝对敦煌的直接统治为敦煌地区带来了中原的佛教文化这是北魏吸收了凉州佛教以后经过平城到洛阳的发展而形成的更高水平的文化。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北魏迁都洛阳前的太和三年479驸马都尉冯熙在洛州写的《杂阿毗昙心经》卷第六[23]莫高窟还发现过北魏广阳王慧安发愿刺绣的佛像残片图3那是从都城平城带到敦煌的[24]。孝昌元年525以后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使北魏王室和敦煌佛教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东阳王在敦煌做了大量功德抄写了一大批佛教经典也在莫高窟开凿了一个大窟。北周时建平公于义任瓜州刺史也在莫高窟开凿了一个大窟[25]。这些王公贵族的做法给当地各阶层的民众作了榜样上行下效不久就在莫高窟掀起了一个造窟热潮。



图3　北魏广阳王慧安发愿刺绣佛像残片

而且不论是西晋十六国还是后来的南北朝都不断有东往西去的求法僧和译经僧途经敦煌给敦煌的佛教不断注入活力。比如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等经敦煌西行取经。404年智猛等一行十五人出阳关西行取经。518年北魏派敦煌人宋云与惠生自洛阳出发西行取经之所以选宋云出使应当和他是敦煌人而熟悉西域情形有关。敦煌既是东来僧人步入河西走廊的最初落脚点也是西去僧侣和使臣告别故国的地方莫高窟作为西行者祈求道途平安的处所香火不断。

除了印度佛教之外伊朗文化系统的祆教也在此时流入敦煌。

1907年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Aurel Stein在敦煌西北的一座长城烽燧下发现了一组用中亚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写的粟特文信件学界称之为“粟特文古信札”Sogdian Ancient Letters图4。这是在凉州武威和敦煌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干Samarkand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贵人的书信不知什么原因埋藏在敦煌长城脚下。信中谈到这些以凉州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活动范围东到洛阳西到敦煌他们长途贩卖经营的商品有金、麝香、胡椒、樟脑、麻织物、粮食当然还有中国丝绸[26]。这组书信写于西晋末年312年前后[27]它们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动。尽管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译文发表但粟特文专家提供的一些专名和大意的解说有助于我们理解4世纪初叶敦煌粟特人的状况。据考

这些信札有两封是从敦煌寄出的说明敦煌和另一个发信地点姑臧武威都是粟特商人的聚居地。现编为第二号的信札说到某地有撒马尔干来的贵人自由民一百人可惜地名有残是否就是恒宁所读的“敦煌”尚难以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粟特人是由萨宝s' rtp' w统领的即他们有自己的“队商首领”“萨宝”一词的本意。而且琐罗亚斯德教中国称“祆教”的神职人员βγnpt祠主的存在表明自那时起敦煌就有由粟特人建立的祆祠。古信札表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早在4世纪初叶就由粟特商人传入敦煌[28]。此外'yps' r和β' nkr' m两个职称的出现表明这个粟特聚落具有很强的自治性。事实上从已经确定的粟特文古信札的内容来看早在4世纪初叶敦煌就有了以粟特商人为主体的自治聚落而且伴随有祆教祠舍。这些粟特商胡东到洛阳西到家乡正与仓慈治理敦煌时商胡的活动范围大体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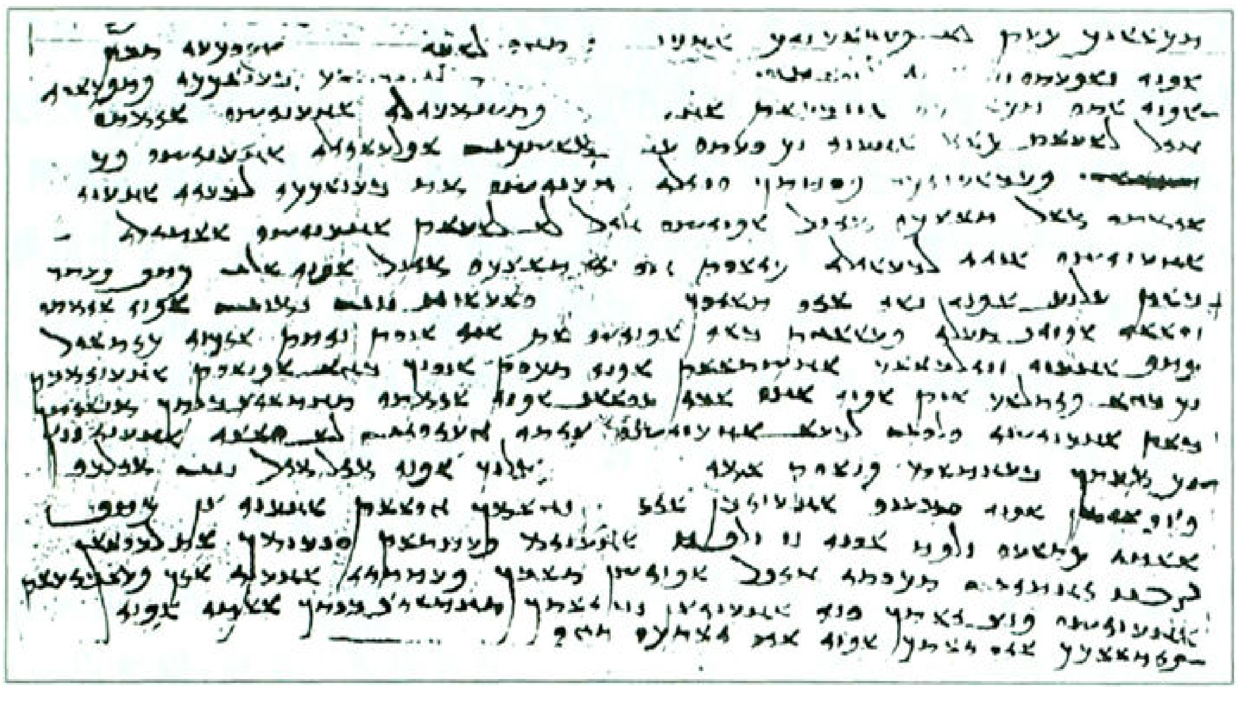


图4　粟特文古信札局部

魏晋以来敦煌汉文化的发展为各种外来文化的传播打下了基础丝绸之路的开通则为敦煌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外来文明。

三　隋唐盛世与国际都会

隋朝统一南北中国又开始走向两汉以来的全盛时期。不论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都十分佞佛。在统治阶级崇佛浪潮推动下敦煌各阶层民众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仅在莫高窟一处就开凿了七八十个洞窟掀起了一个兴建石窟的高潮。

隋炀帝时让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张掖、敦煌之间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隋书·裴矩传》仅存的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序》记载了当时的丝绸之路走向从敦煌出发直到西海地中海有三条路。北道从伊吾哈密越过天山沿草原之路西行经过铁勒、突厥等游牧民族地区一直到达东罗马中道从高昌吐鲁番西行经焉耆、龟兹、疏勒翻过葱岭经瓦罕山谷进入粟特地区再到波斯最后到达地中海沿岸南道从鄯善到于阗、朱俱波叶城、喝槃陀塔什库尔干逾过葱岭经瓦罕山谷过吐火罗地区阿富汗进入印度。三条道路分别以伊吾、高昌、鄯善为门户但“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29]。这使我们了解到当时丝绸之路通向东罗马、波斯、印度的情况也清楚地说明了敦煌在隋唐时期中西文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进入唐代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广阔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唐王朝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着、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袄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正式传入中国内地。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城市如凉州、敦煌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传入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经济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丰富了敦煌文化的内容。沙州城内有州、县两级学校教授唐朝规定的儒家经典。大量的宫廷写经从长安输送过来给这座佛教圣城进一步灌注了汉地佛教的影响。武周、中宗到玄宗时敕建的大云寺、龙兴寺、开元寺并立于敦煌。因为李唐王室奉老子为先祖唐玄宗更是大力弘扬道教敦煌也建立了供奉老子的紫

极宫和神泉观等道观教授弟子传写经书。经过唐朝一百多年的统治经营这种汉文化更加根深蒂固。

唐代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一个典型的国际文化都会汇聚了各种不同系统的宗教、文化、艺术招徕了不同血统的民众在此定居图5。唐代前期敦煌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在粟特聚落的基础上建立的其位置恰好就在敦煌城东一里处的祆舍所在地这里又称安城也是粟特民众的精神信仰中心[30]。沙州所辖的石城镇和播仙镇唐朝初年分别是由来自中亚的康国人康艳典和何国人何伏帝延任首领的。武周天授二年691石城镇将粟特人康拂耽延弟地舍拨状称附近的蒲昌海变成五色作为沙州一系列祥瑞之一由刺史李无亏上报朝廷为武则天登基制造舆论[31]。这些号称是“陆上腓尼基人”的粟特商人除了从事国际间的转手贸易外还是传播文化的友好使者。他们大多数信奉波斯、粟特地区正统的祆教但也有的皈依了曾经受到禁止的摩尼教。敦煌保存了开元十九年731摩尼教大德拂多诞奉唐玄宗诏编译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似乎透露出摩尼教在敦煌流行的影子。有的粟特人大概较长时期生活在敦煌深受汉地佛教的影响渐渐接受了汉化佛教。敦煌发现了大批译自汉文的粟特语佛典不仅有正统的佛经也有汉人编纂的伪经和禅籍。由于粟特人的商业和移动性格他们的宗教信仰必然也随着他们的四处迁徙而传播到四面八方。据《金石萃编》卷八八所收《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立于天宝八载749安禄山的郡望是瓜州常乐。唐长孺先生在讨论这条材料时说南北朝隋唐时人称某郡某人往往指这一姓族的郡望而非本贯即其祖先之来历与郡望没有关系。但他又从安禄山不依附武威安氏而称常乐一点怀疑安禄山的先人或许是世居瓜、沙的胡人[32]。安禄山不仅是使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政治人物他也是一个自称为天神化身的祆教信徒并充分利用了宗教的号召力来发动叛乱[33]。



图5　胡商遇盗图中的外来商人·敦煌莫高窟第45窟盛唐壁画

在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的形势下敦煌莫高窟也在持续不断地修建一些大家族争先恐后地开凿“家窟”如翟氏、李氏、阴氏其中翟家窟第220窟是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凿成的这正是唐平高昌之后第三年国威远扬西土的时候。敦煌当地的文武官员仍然是敦煌石窟的重要供养人如沙州刺史李光庭就曾在莫高窟开窟造像并立有《莫高窟灵岩佛窟之碑》[34]。到极力崇佛的武则天执政时期莫高窟已经是号称有一千多所窟龛的雄伟石窟了而且建立了模仿武则天形象的弥勒像第96窟北大像图6。《武周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称颂道“升其栏槛疑绝累于人间窥其宫阙似神游乎天上。岂异夫龙王散馥化作金台梵王飞花变成云盖。”[35]真仿佛是佛国仙境。

在唐朝敦煌不仅留下了精神文化交流的遗迹也同样有技术和物质



图6　第96窟北大像

在唐朝敦煌不仅留下了精神文化交流的遗迹也同样有技术和物质文化交流的佳例。唐太宗曾派人到摩揭陀国学习印度的熬糖法[36]。敦煌写本P.3303是关于五天竺制糖法抄本虽然文字不多但却涉及有关制糖

法的许多方面[37]表明敦煌人对技术的追求。敦煌既是商人东西往来的通路因此大量西方的舶来品和中原的特产也都经此地运输也一定会有不少精美的物质文化产品留在敦煌其中不少作为供养品进入佛教寺庙和石窟当中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唐朝时期的寺院财产账但吐蕃和归义军时期寺院账目中登记有许多西方来的物品如高档织物、金银器、宝石、香料、珍稀药材等其中有些东西应当是从唐朝时期传承下来的它们反映了丝绸之路带给敦煌异彩纷呈的物质文化。

四　佛教独尊与吐蕃、归义军的贡献

大历十一年776吐蕃进围沙州但迟到十年以后的贞元二年786才最后以“勿徙他境”的条件迫使敦煌百姓“寻盟而降”。按照吐蕃当年所向披靡的实力要拿下一个敦煌城应当不难但为何围而不攻呢在敦煌军民已经弹尽粮绝、没有抵抗力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与敦煌百姓立盟后受降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吐蕃正在大力弘扬佛教而敦煌正是他们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38]。的确吐蕃占领敦煌以后吐蕃赞普马上敦请从武威退避敦煌的高僧昙旷入藏讲道昙旷辞以年老多病所以用文字的形式作答写成《大乘二十二问》有P.2287等多件抄本[39]。一度风行吐蕃的汉地禅法很可能就是汉僧摩诃衍在沙州降蕃后奉赞普诏命而入藏传播的[40]。这些正好是敦煌佛教对吐蕃的意义所在。

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从吐蕃王朝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吐蕃每攻占一地往往把当地的官僚和高僧等具有社会号召力的人士迁往别处。如吐蕃占领西州后就曾做了这种迁徙工作。敦煌文书P.3918《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题记所记唐伊西庭节度留后使判官朝散大夫试太仆卿赵彦宾、僧广林阇梨P.2132《金刚般若经宣演》题记中的僧义琳和P.2732《绝观论》题记中的“西州落蕃僧怀生”[41]就是从西州迁出的官人或僧侣。世家大族、官吏、高僧是汉文化以及汉化佛教的传承者他们的离去使得西州汉文化的根基被抽空。相对而言敦煌却因为在降蕃以前与吐蕃订立了“勿徙他境”的盟誓所以得以保存更多的汉文化。而“勿徙他境”的另一成果是为敦煌保存了人力物力使敦煌不像北凉灭亡后的情形那样人口大量流失。

在吐蕃王朝崇佛的强大压力下敦煌教授儒家经典的学校不见了读书的儿童转到寺院接受童蒙教育虽然有“道门亲表部落”的建制但道观

也在文献中消失摩尼教是吐蕃公开禁止的宗教除了景教在敦煌文书中可以见到两个十字架和一段占卜文之外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文化几乎是佛教一枝独秀。沙州的僧尼寺院从13所增加到17所僧尼从310人猛增到数千人。而且敦煌在吐蕃的庇护下躲过了“会昌法难”佛教教团和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敦煌教法方面不论是早期出身西明寺的学僧昙旷还是后期出身藏族的“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42]都给敦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民间百姓的抄经、念佛、开窟、造像更是始终不绝。

张议潮在848年赶走了吐蕃的统治者节儿却留下了自己少年时从学的老师法成让这位藏族大法师在沙州继续讲经教授弟子。归义军成立后极力恢复唐朝各项制度强化汉文化教育并不断吸收中原文化的营养成分使得汉文化在敦煌乃至整个河西地区部分地巩固下来。总体上讲归义军时期的文化较吐蕃时期更加开放佛教向民俗化方向发展其他宗教文化也表现出各自的活力并且与民间文化渐渐合流。

吐蕃崇佛的政策造就了强大的敦煌佛教教团汉族高门出身的洪䛒俗姓吴领导的敦煌僧尼大众参加了张议潮领导的起义。吐蕃的崇佛政策深深地影响了归义军佛教在归义军时期继续盛行莫高窟在归义军张氏时期迎来了一个新的造窟高潮有人称之为“敦煌千佛洞的中兴”[43]。曹氏归义军继续这一作法在莫高、榆林两地修建或改造了许多洞窟几乎历任归义军节度使都建造了自己的功德窟。敦煌重新发挥了她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即转输商品传播文化。归义军官府安排协助了许多西行取经的和尚前往印度敦煌的寺院也接待了不少东来的梵僧前往中原[44]图7。经行敦煌的当然不只是僧侣还有一批批使者、商人和其他宗教的传教士们。归义军政权与西面的佛教王国于阗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与沙州联姻的于阗王室对敦煌石窟作出过很多贡献他们的供养人像也都绘画在莫高窟和榆林窟中[45]。西州回鹘在复兴佛法时也得到了敦煌的帮助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就曾让人抄写《大佛名经》送到西州两地的讲唱文学作品也互有交流[46]。



图7　敦煌藏经洞发现行脚胡僧形象MG.17683

在中国其他地区基本已经绝迹的祆教又频繁出现在归义军官府的入破历收支账目上此时是以“赛祆”这种民间信仰的形式重新活跃起来但赛神的地点仍然在原本立有祆舍的城东一里的甘泉水边[47]。

敦煌写本《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的题记表明这篇赞文和后面书写的《尊经》很可能是五代曹氏归义军时期写成的如果是归义军当地所用的文本则说明了景教教堂的存在[48]。敦煌发现的从外地吐鲁番寄来的一封粟特文信函表明这里的景教徒与西州回鹘的基督教牧师保持着通信交往[49]。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莫高窟北区发现了叙利亚文的《圣经·诗篇》为景教在敦煌的存在提供了更重要的证据[50]。

敦煌发现的三种摩尼教经典其中一件是五代后唐时从内地带到敦煌的似乎它们早已没有人信奉但却相对完好地保存在佛教寺院的藏书

中。

封存于归义军后期的莫高窟藏经洞原本应当是三界寺的藏书这座不大的寺庙却保存了如此丰富的宝藏汇聚了各种文化因素的典籍[51]这可以说是敦煌国际都会面貌的完整展现。

敦煌在9、10世纪的中西文化交往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是归义军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也是敦煌藏经洞宝藏的文化面貌之所以如此丰富的原因。相反原本较敦煌更具规模的国际大都会凉州武威就是在这两百年间衰落下去的战乱频仍不复昔日之盛。

五　丝路改道与敦煌的衰落

公元10世纪中叶以后宋王朝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处于敌对的状态中影响了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西夏占领瓜沙后征发百姓去进攻宋朝使敦煌日趋衰落。特别是南宋建都于东南的杭州加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盛起来渐渐取代陆上丝路原有的作用敦煌逐渐失去了在中西文化交往上的重要地位。

蒙元时期北方草原之路联接了大都北京、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遗址和中亚敦煌被弃置一旁。虽然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陆上丝绸之路也被利用如马可波罗来华就走的是传统的陆路经过敦煌但相对来讲来往者要比以前少得多了。

明朝划嘉峪关为界敦煌成了边外的荒凉之地从嘉峪关通哈密的路成为中原与中亚往来的干道敦煌彻底失去了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理位置无法发挥她在中西文化交往上的原有作用。

从西夏到元朝敦煌还不断有小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但艺术上已经越来越没有生命力了。明朝时期位于关外的敦煌更无任何造作敦煌一带甚至成为从吐鲁番地区来的维吾尔族人放牧的场所。敦煌城东南鸣沙山麓的莫高窟也渐渐为人们遗忘成为牧羊人憩息的地方数百座石窟中精美的壁画和雕塑也任凭夜以继日的风沙吹拂。

敦煌不论从地理范围还是从州县等级来说都不能算是很大的地方但她位于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自汉代以来就是“华戎所交一都会也”[52]。这里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商品中转站又是中国文化西传的基地和西方文化东来的最初浸染地。自汉至唐敦煌这个国际都会的兴

衰是与这一地区是和平还是战争紧密相关的。唐朝所创造的和平环境为敦煌多姿多彩的文化繁荣提供了保障。在经过吐蕃征服和统治后归义军政权维持了敦煌地区近二百年的社会稳定短命的金山国除外使当地的文化得以保存、发展。在东西方文化交往的历史上敦煌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1〕　关于妇好墓的玉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又《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张培善《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玉器宝石的鉴定》《考古》1982年第2期。

〔2〕　参看本克尔E. C. Bunker、恰特温C. B. Chatwen、法尔卡斯A. R. Farkas《从东到西的兽形意匠纹艺术》"Animal Style" Art from East to West纽约1970年。

〔3〕　榎一雄《禺氏边山之玉》《东洋学报》第66卷第1—4号1985年109—132页又《榎一雄著作集》第1卷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265—285页。

〔4〕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5〕　关于汉代丝路走向见《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卷九六《西域传》。

〔6〕　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候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考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30期1998年62—69页。

〔7〕　嶋崎昌《西域交通史上的新道与伊吾路》《东方学》第12辑1956年收入《隋唐时代的东突厥斯坦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467—493页。

〔8〕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周伟洲《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

〔9〕　《三国志》卷一六《魏书·仓慈传》。

〔10〕　《晋书》卷九四《宋纤传》。

〔11〕　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关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2〕　《晋书》卷九四《郭瑀传》。

〔13〕　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有正书局1932年劳干《汉晋西陲木简新考》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85年48—59页。

〔14〕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5〕　参看姜伯勤《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氏撰《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266—283页。

〔16〕　《高僧传》卷一《晋长安竺昙摩罗刹传》。

〔17〕　《高僧传》卷七《晋敦煌竺法乘传》。

〔18〕　关于莫高窟创建的年代敦煌文书中有两种说法比较多的是以上述《圣历碑》为代表的建元二年366说。另外一种说法是敦煌文书P.2691《沙州城土境》中的“永和八年癸丑岁创建窟”据干支“八年”为“九年”之误应为公元353年更在建元二年之前十三年。近年王素先后撰《敦煌出土前凉文献所见“建元”年号的归属——兼谈敦煌莫高窟的创建时间》《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1997年和《敦煌莫高窟创建时间补说》《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敦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两文认为366年时敦煌在前凉治下

不应用前秦年号但前凉曾奉东晋年号所以此建元二年当是东晋建元二年即344年。此说尚未得到学界认可若然则莫高窟创建年代更早于通常的说法二十二年。

〔19〕 宿白《武周圣历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中国石窟寺研究》262—269页。

〔20〕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21〕 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提出267窟和272窟很可能即乐僔、法良所开凿。这一说法没有坚实的根据敦煌研究院的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目前保存最早的洞窟是北凉时期的宿白先生则认为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是北魏时期的见所著《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270—278页。

〔22〕 关于北凉佛塔参看殷光明《敦煌市博物馆藏三件北凉石塔》《文物》1992年第11期76—83页64页又《美国克林富兰艺术博物馆所藏北凉石塔及有关问题》《文物》1997年第4期42—45页又《北凉石塔研究》台北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0年。

〔23〕 饶宗颐《北魏冯熙与敦煌写经》《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481—490页。

〔24〕 敦煌文物研究所《新发现的北魏刺绣》《文物》1972年第2期54—59页。

〔25〕 赵万里《魏宗室东阳王荣与敦煌写经》《中德学志》第5卷第3期1943年宿白《东阳王与建平公二稿》与《建平公于义续考》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244—261页。

〔26〕 恒宁W. B. Henning《粟特文古信札年代考》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BSOAS第12卷1948年602—605页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中国和印度的粟特商人》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卡多那A. Cadonna与蓝其奥狄L. Lanciotti编《中国与伊朗——从亚历山大到唐朝研究论集》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佛罗伦萨1996年47—48页。

〔27〕 关于粟特文古信札的年代有公元2世纪末和4世纪初两种说法笔者采用后一种说法有关的争论和笔者的看法详见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第3卷1995年339—340页。

〔28〕 参看上两注引恒宁、辛姆斯-威廉姆斯、荣新江文以及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期1999年38—39页。

〔29〕 《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30〕 池田温《8世纪中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ラシア文化研究》第1号1956年49—92页。

〔31〕 见《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见《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35页。

〔32〕 唐长孺《跋唐天宝七载封北岳恒山安天王铭》《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273—292页。

〔33〕 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7年231—241页。

〔34〕 S.1523上海博物馆藏40号缀合写本见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80—85页。

〔35〕 宿白《武周圣历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中国石窟寺研究》265—266页。

〔36〕 季羡林《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问题》《文献》1988年第2、3期。

〔37〕 季羡林《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38〕 山口瑞凤《吐蕃支配期的敦煌》《讲座敦煌》第2卷《敦煌的历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227—228页。

〔39〕　上山大峻《西明寺学僧昙旷と敦煌の佛教学》收入上山的《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90年。

〔40〕　参看戴密微P. Demiéville《拉萨宗教会议》Le concile de Lhasa巴黎1952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第一、二章。

〔41〕　西州落蕃人的写经题记见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315—316、311、308页参看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中国学术》第1辑2000年167—170页。

〔42〕　上山大峻《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之研究》收入《敦煌佛教の研究》。

〔43〕　藤枝晃《敦煌千佛洞の中兴》《东方学报》京都第35册1964年。

〔44〕　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55—968页。

〔45〕　参看张广达与荣新江《于阗史丛考》相关部分上海书店1993年32—70、98—139页同作者《10世纪于阗国的天寿年号及其相关问题》余太山编《欧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181—192页。

〔46〕　荣新江《公元10世纪沙州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文化交往》《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1年583—603页又《归义军史研究》346—385页。

〔47〕　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格瑞内F. Grenet和张广达合撰《粟特宗教的最后避难地——9、10世纪的敦煌》《亚洲研究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第10卷1996年。

〔48〕　林悟殊《敦煌景教写本P.3847之再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2001年59—77页。

〔49〕　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165—214页。

〔50〕　段晴《敦煌新出土叙利亚文书释读报告》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270—278页同上《续篇》《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120—126页。

〔51〕　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3—48页。

〔52〕　《续汉书·地理志》刘昭注引《耆旧记》。

第三讲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文物的早期流散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但却是由一个不懂学术的道士偶然发现的这就决定了敦煌宝藏的悲惨命运。

一　王道士其人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和王道士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么敦煌佛教圣地莫高窟为什么住上了一个道士而藏经洞又是怎样被他发现的呢

王道士是湖北麻城县人大约出生于清朝道光三十年1850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农历四月十八日活了八十多岁。大概出身农家小的时候读过几年书。以后家乡连年闹灾荒据《麻城县志》记载如咸丰六年1856因为夏天没有雨水使“禾麦尽槁斗米千钱人有菜色野有饥莩”。王道士大概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因为家乡的灾荒而“逃之四方”。从今天所见到的照片图1看王道士个头矮小与青少年时期的营养不良是有关系的。



图1　王道士

有关王道士逃难的过程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据他的弟子为他立的《墓碑》说他曾“历尽魔劫恢心名利”。最后他在甘肃西部的肃州今酒泉的巡防军中当了一名士兵。退伍以后在酒泉出家当了道士师傅名叫盛道。以后他离开师傅云游到敦煌莫高窟住了下来时间大概在光绪二十四年1899或稍前一些年龄在五十左右[1]。《墓碑》说王道士名圆箓法号法真[2]。但“圆箓”这个名字仍然像个道教的法名而不是他的本名大概他从来没有向敦煌人讲过自己的真名所以人们也就不知道他的本名是什么。其实他的本名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隐没本名的目的无疑是从一开始就想在敦煌人面前树立一个神圣的道士形象。

二　藏经洞的发现

位于甘肃省最西端的敦煌在中国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繁荣的国际都会之一。从汉代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由于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比较频繁敦煌曾经汇聚了东西方的多种

文化这就是我们在藏经洞中不仅看到有汉文文献还有藏文、回鹘维吾尔文、于阗和田文、粟特中亚古代民族文、梵文等文献材料又有儒家经典、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的典籍和有关拜火教的记载的原因。然而从北宋王朝开始因为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渐渐取代陆上丝路而繁荣起来特别是明朝把敦煌弃置于嘉峪关之外经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道路也改从嘉峪关到哈密敦煌地区日益荒凉下来甚至成为放牧的场所。敦煌城东南鸣沙山麓的莫高窟也渐渐为人们遗忘。

一百年前的中国正处在日渐衰落的清朝末叶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敦煌石窟根本没有受到中国政府和学者的注意偌大一个莫高窟佛教艺术宝库就由一个云游而来的道士看管起来。然而此时充满进取心的各种类型的西方探险家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敦煌莫高窟在1900年以前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N. M. Przheval' skii、匈牙利的洛克济Lajos Loczy、法国的邦宁Charles Eudes Bonin等人都曾走访过敦煌千佛洞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地理探查也还没有特别留意于莫高窟的艺术价值[3]。敦煌石窟的广为人知是以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为嚆矢的。

王道士来到敦煌莫高窟时窟前有三所寺庙即上、中、下寺。上、中两寺为西藏的喇嘛占据于是王道士就在莫高窟南区北部的下寺住了下来。当地百姓以汉族为主体他们诚实而愚昧敬畏神祇分不清什么是佛教和道教有神则信。而王道士比讲藏文的喇嘛更容易和敦煌的老百姓接触所以很快立住脚跟并四处化缘努力想把莫高窟的佛殿改造成道教的灵宫。他把一些佛像改塑成俗不可耐的道教灵官又因为窟前的栈道多已崩毁他就把一些洞窟间的隔墙打通以便往来。其实他的这些做法对敦煌石窟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害。现在那些王道士供奉的道教灵官早已经从洞窟中移走但我们可以从斯坦因和伯希和留下的照片中看到一些它们的形象与敦煌石窟原有的塑像相比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而他凿通的墙壁现在也已经都被封堵起来但我们参观莫高窟时常常可以看到洞窟角落里那没有壁画了的光秃泥巴不禁为一幅幅完整的壁画被人为地破坏而痛心。

开凿在鸣沙山东崖上的莫高窟窟室大体上分为上中下三层由于西北风的长年吹拂沙子从窟顶蔓延下来把底层一些洞窟的洞口埋了起来。王道士居住的下寺对面的大窟现编为第16窟是他改建灵宫的主要处所但洞口甬道堆满了沙土整个洞门都被封了起来。现在留在甬道两

壁的一道道沙痕直抵洞口的顶部表明当年积沙之多。王道士雇了几个伙计帮忙清扫长年堆积在窟前的沙子。请记住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日子——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二十六日16窟甬道的沙土已经渐次清理完毕一位姓杨的伙计发现甬道北壁的壁画后面可能有洞。于是“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4]这段出自1942—1943年逗留敦煌的画家谢稚柳先生的记载虽然来自敦煌民间的传说但比较真实准确地描写了藏经洞现编为第17窟图2发现时的情形。关于藏经洞门是如何发现的还有其他一些更传奇的说法但可以想象的是只要塞满洞口的积沙被挖走以后掩盖藏经洞门部分的壁画失去承重的力量很可能会有裂痕出现所以一旦积沙移走藏经洞的发现就是必然的结果。敦煌藏经洞是在一个纯偶然的时间和环境下被王道士等人发现的。应当说没有王道士雇人清理16窟甬道的积沙藏经洞还是会在那壁画的背后沉睡不知多长时间。从这一点上来讲不论怎样评价王道士以后的作为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还是要归功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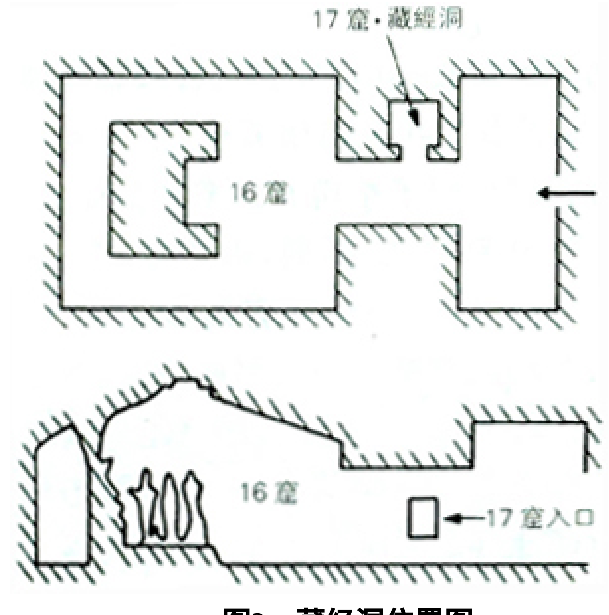


图2　藏经洞位置图

一座给20世纪的学术研究带来丰富素材的文化宝库就这样被发现了一个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难得的惊人发现就这样被一个完全不懂得考古为何物的道士发现了。可惜的是号称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四大发现之一的敦煌文献不是像甲骨文和明清档案那样首先被中国学者所认识也

不像敦煌西域汉晋简牍那样由外国考古学者所掘得而是落入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王道士手中。

三　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早期流散

王道士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面对这么多古代的经本和画卷当然也知道它们的“价值”。他不断拿出一些书法精美的佛经写卷和漂亮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过往的官僚士大夫们以换取一些功德钱。但这些人都不识货也没有人去追问这些古老的经卷和绘画是从哪里来的。

由于材料的缺乏和零散我们目前还无法厘清藏经洞文物流散的早期历史以下是从零碎的资料中辑出的有关藏经洞文物早期斯坦因到来以前流散的情况。

1廷栋旧藏

据说王道士最早赠送的对象是驻扎酒泉的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因为他可能是王道士原来在肃州当兵时的上司。《敦煌石室记》有如下记载

> 王道士颇机诈思借之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嘉峪关税务司比国人某将回国来谒廷栋。临行廷栋出数卷赠之。此比国人行过新疆复谒长庚将军亦满人及道台潘某相与道敦煌事复以经卷分赠长庚与潘道台[5]。

这段可能是得自敦煌当地传闻的记载似乎不是无稽之谈因为斯坦因在他的考察游记《沙埋契丹废址记》和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中都提到王道士曾经通过“肃州道台”把一些经卷报送“甘肃藩台”却没有得到重视[6]。廷栋这位自负的满族官僚只是觉得这些古代写经的书法还不如自己写得好而没有对它们表示特别的兴趣也没有采取任何保护的措施。

廷栋留下的卷子哪里去了据上引《敦煌石室记》其中有数卷作为礼物送给了一个比利时的税务官后者在新疆转送给长庚和潘道台。而更多的卷子应当仍然存在廷栋的家中。这批卷子的去向仍然有迹可寻。水梓《张广建督甘时期的见闻》记

1917年民国六年12月肃州驻军哗变经分统领周炳南戡定后办理善后。安肃道尹杨炳荣涎前道尹廷栋财富密与周炳南商诬廷栋是宗社党兵变是由宗社党鼓动。周炳南突入廷栋家杀廷栋及其二子抄出廷栋财物六十大箱内藏有价值文物不少将其中敦煌经卷、流沙坠简之类择优贡给〔张〕广建其余财物道、县、分统剖股表分。旋被廷栋在京之子向中央控诉广建派司法人员许家拭、张庆瑜等往查乃与杨炳荣分赃作弊分得唐人写经首尾完备的不少后来许家拭的父亲许承尧所存此项经卷有六百卷之多大部皆从此案得来一味袒护。廷栋之子控诉不已后任道尹杨思到任后派秘书兼酒泉县长蔡镇西彻查才和盘托出报京了案[7]。

由此可知廷栋的藏品主要落入张广建、许承尧、杨炳荣、周炳南等人手中。

张广建1867—字勋伯安徽合肥人。1916年7月任甘肃省督军兼省长。1917年支持张勋复辟被任命为甘肃巡抚。1920年12月去职以后寓居天津。他攫取到敦煌写经数百卷其中一些精品曾在1924年秋北京举办的“江西赈灾书画古物展览会”上展出[8]。至迟在1929年以前张氏藏品经白坚1883—的转手出售给日本三井家族。1985年三井文库接受三井家包括北三井、新町三井、南三井三家捐赠的敦煌写经。1989—1991年间经施萍婷先生的努力这批写经由施先生与三井文库的同行重新登记整理编目见施先生《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一——三井文库所藏敦煌遗书》一文收有《日本三井文库珍藏敦煌遗书目录》共著录112件写经[9]。三井文库藏卷主要是佛经而且有不少经卷首尾完整说明王道士拿出来送给廷栋的卷子应当是检取他认为比较好的因此大多数是写经而且品第较佳。

许承尧1874—1964字际唐号疑庵安徽歙县人。1911年后任甘凉今甘肃张掖道尹后辞官归乡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收集整理。由于兴趣的转移许氏藏卷后分次售出叶恭绰、龚钊等人购得七八十卷其余零售现分藏于安徽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台北“中央”图书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等处。从已经发表的北大、上图、上博、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卷和笔者经眼的台北“中央”图书馆、天理图书馆、弗利尔的许氏旧藏卷看其中不乏精品[10]。还没有经过敦煌学者仔细调查的安徽省博物馆藏卷从《中国古代书画图录》发表的《本际经》和《书信》卷子来看[11]也是早期流散出来的重要典籍和文书。水梓上引文中提到的许承尧之子许家拭也藏有敦煌文书此即最近《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所刊《敦煌石室捃佚七种》有许家拭识语[12]。

杨炳荣分得的卷子下落不明。周炳南字静山甘肃狄道人。保定陆军学堂毕业曾任肃州巡防各部帮统兼带第四营人称“周统领”。他作为一介武夫也分得一些经卷不过品次要比张广建、许承尧所得差得多。现敦煌研究院收藏有他旧藏的若干写经已经装裱成两册题“敦煌石室遗墨”[13]其中多为残经不知是否是当时分得。周炳南在敦煌一带任职很长时间当然有机会从其他途径获得文书如他旧藏的《元延祐三年1316奴婢买卖红契》[14]就应当是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元代文书。此外他还是1925年阻止华尔纳考古队剥取敦煌壁画的主要人物之一。

总之王道士送给廷栋敦煌卷子的事并非虚言有关记载中特别提到书法好坏而没有提到绘画这和张广建、许承尧所藏主要是佛经写本正好相符从这些佛经写本可以大略看出藏经洞最初流散出来的经卷情况因为这毕竟是有案可查的第一批王道士从藏经洞拿出来的文物这批卷子的详细情况有待据原卷加以仔细考察。

2叶昌炽旧藏

光绪二十八年1902农历正月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1849—1917出任甘肃学政。他五月份在兰州接印任职一直到1906年废科举、停学政时止四年中他周游甘肃各地按试诸生考核教官。他在《缘督庐日记》中对所见所闻做了详细的记载也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藏经洞的最早记录。叶氏的这部日记曾在1931年由他的学生王季烈等人从原稿辑出十分之四的内容出版了《缘督庐日记钞》。1990年11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把苏州图书馆所藏《日记》原稿本影印出版计48册六函提供给我们有关敦煌藏经洞最早记录的原始资料。现把《缘督庐日记》中有关获得敦煌经卷绘画的记载转录于下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903.12.30记

汪栗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片。……又旧佛像一幅所绘系水陆道场图。绢色黯黕丹黄陊剥惟笔墨出于俗工尚不甚古极早为明人之笔。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槃经》笔法遒古确为唐经生派纸色界画与日本估舶者无毫厘之异乃知唐人经卷中东同一流传特以震旦重遭劫火消磨殆尽。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刹宜其尚有孑遗。闻此经出千佛洞石室中室门熔铁灌之终古不开前数年始发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恒介眉都统、张又履、张篠珊所得皆不少。《大中碑》亦自洞中开出此经疑即为大中写本也。

汪栗庵即1902年出任敦煌县长的湖北通山县人汪宗翰他是王道士的同乡所以王道士把一些很好的经卷和绢画送给了他。他为求上司的好感必然是把最精美的绘画和卷子送给了叶昌炽。

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日1904.9.29又记

汪栗庵来公私两牍。……又宋画绢本《水月观音像》下有绘观音菩萨功德记行书右行后题"于时乾德六年岁次戊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题纪。"又大字一行云"节度行军司马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延清供养。"又三行云"女小娘子宗花一心供养慈母娘子李氏一心供养小娘子阴氏一心供养。"其帧仅以薄纸拓而千余年不坏谓非佛力所护持邪又写经三十一叶密行小字每半叶八行行三十三至三十五字不等旁有紫色笔如斜风细雨字小于蝇皆梵文。以上经象栗庵皆得自千佛洞者也。

同年九月初五日1904.10.13记

敦煌王广文宗海以同谱之谊馈塞外土宜拒未收收唐写经两卷、画像一帧皆莫高窟中物也。写经一为《大般若经》之第百一卷一为《开益经》残帙。画像视栗庵所贻一帧笔法较古佛像上有贝多罗树其右上首一行题"南无地藏菩萨"下侧书"忌日画施"四字次一行题"五道将军"有一人兜牟持兵而立者即其象。左一行题"道明和尚"有僧像在下其下方有妇人拈花象旁题一行云"故大朝于阗金玉国天公主李氏供养"。元初碑版多称"大朝"然不当姓李氏。此仍为唐时物耳公主当是宗室女何朝厘降考新旧《唐书》外夷传或可得。

王宗海是敦煌当地文人也是最早的敦煌藏经洞出土物的收藏者看他送给叶氏的经卷绘画其收藏的品第并不比县长汪宗翰差。

总计叶昌炽所得经卷画像共有佛像一幅、宋乾德六年曹延清供养《水月观音像》、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像》等三幅绢画《大般涅槃经》四卷、《大般若经》卷一百一、《开益经》残帙、梵文写经三十一叶等经卷。

1906年叶昌炽拜见其师汪鸣銮1839—1907字柳门号郎亭《日记》中记载"〔丙午〕七月初四日1906.8.23五点钟始赴郎亭师之招导登万宜楼藏书之所也。……携陇上所得写经卷请郎师鉴定频许可请留置文房。"根据这条记载叶昌炽所得的经卷大概在1906年就送给了汪鸣銮但是不是全部是否包括梵文经卷我们仍不得而知。

至于三幅绢画叶氏带回苏州老家保存情况不佳。《日记》辛亥年八月三十日1911.10.21条记"旧藏书画以次抖晾。敦煌石室乾德画像内夹油纸经蒸经后胶黏牢固手自揭开已损四五字罪过罪过。"表明那幅《水月观音像》已经破损文字有缺。叶昌炽没有子嗣1914年已将所藏

碑拓出售为刘承干的嘉业堂和刘世珩的聚学轩所得。大概所藏敦煌绢画较为珍贵所以到1915年还在手中。乙卯年二月二十四日1915.4.8的《日记》中记载“聪生、印若翁绶祺先后来谈极久出所藏敦煌莫高窟宋画佛像两轴示之。绢质已破烂。印若允代付装池。”这里只提到两幅绢画恐怕那幅佛像已经不在叶氏手中了。由于苏州潮湿所以绢画保存情况欠佳已经破烂。这两幅绢画大概在1917年叶氏去世后流出先归福州梁氏。1919年出版的英文本《著名艺术鉴赏家福州梁章钜名画藏品图录》上曾刊出其中的《地藏菩萨像》[15]。因为梁章钜1775—1849的生存年代在藏经洞开启半个世纪以前因此有人怀疑这幅画可能是赝品。实际上伯希和早就指出这本《目录》虽然声称是1837年梁氏自己编写的但这无疑是不可靠的[16]。从这幅画的出现也可以断言《目录》的年代不应早于1915年。以后这两幅画归浙江吴兴蒋汝藻的传书堂所有。1919年王国维受聘为传书堂编藏书志在蒋家看到这两幅绢画先在同年9月10日和16日给罗振玉的信中简单考释[17]以后又写成两篇跋文刊于《观堂集林》卷二十。据王氏跋文乾德六年画像的题记已有残缺因此王氏所录不如叶氏《日记》齐全。1925年蒋汝藻因兴办的实业亏损开始典卖图书所藏大多数辗转为北京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所得。两幅敦煌绢画后来流入上海书肆1930年被一日本人从上海中国书店主人金颂清处买走[18]。这两幅画后来分别于1930年和1935年由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从纽约买到经过装裱后一直妥善保藏在该馆库房中尤其是《地藏菩萨像》一幅如同新绘的一样。其中《水月观音像》曾多次发表[19]而《地藏菩萨像》因为色彩过新以致让研究者迟疑不定而长期没有正式发表。1997年2月笔者有机会走访弗利尔美术馆见到这幅寻觅已久的于阗公主供养的《地藏菩萨像》图3向馆方提供了这两幅绢画在入藏该馆前的流传情况和相关记载得到馆方许可予以发表以便学人探讨[20]。



南无地藏菩薩
五道将軍
道明和尚

图3　叶昌炽旧藏于阗公主供养的《地藏菩萨像》

叶昌炽旧藏经卷现在不知何在。收藏在弗利尔美术馆的两幅绢画一幅原有“乾德六年968”的题记一幅虽然没有题记但有“故大朝于阗金玉国天公主李氏供养”供养人于阗天公主李氏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976—1002年在位的夫人其绘制的年代更晚〔21〕。这两幅10世纪后半绘制的精美绢画是属于最早移出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在叶昌炽收到时保存良好估计它们原本是放在藏经洞书堆的上部或者是靠近门口的地方而不是像斯坦因入洞后翻到底层才得到的被压在底层而折断的那些大幅绢画这些都表明了藏经洞发现时某些绢画和经卷的位置。

顺带提示一下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首次记录了藏经洞发现的确切年份光绪三十年九月初七日条但他当时误信了汪宗翰所说的石室所出只有“藏经数百卷”“各人分取”已经分光所以也就没有把这事太当真。而过去学术界传说叶昌炽曾建议甘肃藩台把所有藏经洞古物运到省垣兰州保存但因运费无着落没有成功。细检《日记》全本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从叶昌炽当时不知有数万写本被发现的情形来推测这个传说大概是难以成立的。据斯坦因的记载王道士刚一发现藏经洞就通过肃州道台转送给甘肃藩台敦煌经卷但因运费无着甘肃藩台命令王道士看管〔22〕。又有一种说法是汪宗翰曾经到敦煌藏经洞考察并建议兰州的藩台衙门妥善保护这批文物但因为种种原因藩台只是在1904年命令汪宗翰把经卷画像检点封存于原地仍交王道士保管〔23〕。无论哪一种说法目前都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史料证明。

3端方旧藏

端方1861—1911字午桥一字悟樵号匋斋、陶斋谥忠愍是满洲正白旗人。1882年举人历任陕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湖北总督摄湖广总督。1905年赴日、英、德等国考察政治。1906年任两江总督。同年端方转任直隶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1911年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保路运动中在资州被起义军所杀。端方身居要职喜收藏古物书画因藏有《华山碑》拓本故名其书斋为宝华庵他的幕府中也云集了一批金石书画名家〔24〕。不少官员把收集到的金石书画送给端方敦煌绘画和经卷也不例外。

在斯坦因1907年3月到达敦煌之前一件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绢画就已经寄达南京的端方幕府。这幅画是北宋开宝八年975绘制的敦煌灵修寺尼戒净供养的《观音菩萨像》其照片刊布在1929年8月11日出版的《艺林旬刊》第59期上。图画的右侧题记为"宋灵修寺开宝八年观音画像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敦煌千佛洞严金清自兰州寄赠。"左侧题记为"匋斋尚书永充供养光绪三十三年1907元旦清信士王瓘敬书。"两侧题记都出自著名篆书家王瓘字孝玉之手他当时正参端方幕府。严金清1837—1907字紫卿曾随魏光焘镇压甘肃回民起义任职兰州因此有机会得到敦煌新出绢画。这幅绢画至迟在光绪三十二年底就从兰州寄出所谓"光绪二十五年出敦煌千佛洞"的说法应当是传自兰州的严金清。根据有关藏经洞发现年份的其他记载这一说法应当是兰州地方的误传。罗振玉子罗福苌编《沙州文录补》曾录有《敦煌灵修寺尼戒净画观音菩萨像记》题"丰润端氏宝华庵藏"对比《艺林旬刊》图版所示题记就是这件绢画的题记。《艺林旬刊》还有编者的跋语

此观音变相宝像绢本笔法遒紧仪容俨然赋色深厚犹有唐风。记字经生所书与同出唐经卷体格相类盖一时风行至宋初未改也。

此跋当出自《旬刊》编者周肇祥手笔他应当见到原件所以描述贴切。此画像上为六手观音左右上下有供养人像及榜题。绢本保存完好是10世纪后半绘制的精品。

1936年出版的松本荣一《敦煌画之研究·附图》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四三也发表过这件绢画的图版题作"法华经普门品变相"在正文136页称此画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25]。

目前所知的另一件端方旧藏品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唐高宗咸亨四年673三月十一日长安弘文馆写经题记是严整的唐朝宫廷写经。此卷现存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据说是一个德国人在1900年前后从天津买到的其背面有"光绪贰拾伍年敦煌千佛洞塌出唐时写经"的题记[26]。这件写经即罗振玉《唐馆本金刚经跋》中研究的卷子罗振玉说他是"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借自匋斋藏书[27]说明此写本原属端方1909年时还在端方手中所谓德国人1900年就从天津购买到手的说法是不足为据的而题记所谓"光绪二十五年敦煌千佛洞塌出"的说法与严金清寄赠绢画上的说法一致或许这件写经也是兰州的严

金清所赠。罗振玉跋语没有提到写卷背面的这则题记所以也不排除是后来人写上去的。

我们目前所见端方旧藏卷不多但一件975年的精美绢画一件673年宫廷写经都是藏经洞中的精品。从研究藏经洞早期文物的角度看它们与叶昌炽所得有着许多相同的性格。

4苏子培旧藏

彰明人苏子培任敦煌典史曾获得《庄子·知北游品》和佛经、道科等六个卷子。关于苏子培藏卷的来历龚煦春在《庄子·知北游品》写本现藏书道博物馆后的跋语中有详细的说明

此卷乃光绪三十一二年间1905—1906彰明苏子培任敦煌典史时所得以寄其弟季培者书法醇厚颇似初唐人所书。然篇首题目称“南华真经”则玄宗以后人所书矣。……末有净土寺藏经图记。……子培寄其弟之卷凡六中有佛经一卷系武德四年长安令李某监造字体类钟绍京。又佛经三卷汉中田承伯、康星甫暨余各得其一字皆方整谛审乃晚唐人笔。又道科一卷亦在余处字甚拙劣知此经虽同藏石窟其由来非一时所聚也。……唐末距今已千年等而上之已千二三百年矣。此卷尚首尾全具纸墨如新非有神灵呵藏之名山更千余年乃发见于世则后之人又何从得见唐代手写书卷程式乎。……余素不识季培绵竹冯春翘以余留心古迹乃为余介绍以归于余春翘亦可谓善成人之美者矣。季培绵竹杨叔桥之婿长安令造经一卷归叔桥长嗣思永附记于此。辛亥1911十月成都乱起余携此卷归井研藏之古美堂。明年壬子1912正月六日独坐山窗反复展玩因记此卷发见原始及购得之缘于此俾后有考焉。

写卷上有满汉文对照“敦煌县印”[28]。

苏子培所得共有《南华真经》一卷、道科一卷、佛经四卷其中一件为武德四年621所写。这些卷子辗转收藏于私家除《南华真经》目前在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外其他不知所在。但这些卷子一般都是品相较好书法亦佳者表明了王道士取以送人的选材标准也注定了早期流散的敦煌文献的类型多是佛经道典。

5陆季良旧藏

1909年伯希和携敦煌经卷到北京时曹元忠曾往伯氏寓所抄录敦煌文书成《沙州石室文字记》一文其序言开头处记

光绪戊申1908年同年陆季良示余甘肃敦煌县令汪宗翰所遗后唐天成四年己丑岁五月廿九日樊宜信造《药师琉璃光如来象》绢本长三尺许笔意古拙彩色鲜明。其题记文字皆右行盖千佛

岩莫高窟物也[29]。

这是汪宗翰送给陆季良的天成四年929绢本《药师琉璃光如来像》彩色鲜明。

王惠民先生《日本白鹤美术馆藏两件敦煌绢画》一文所介绍的第一件《药师说法图》[30]应当就是这件陆季良旧藏绢画。据说这幅画是1932年前后被大阪古董商浅野梅吉1877—1960从中国买去后由白鹤美术馆创立者嘉纳治兵卫1862—1951购得于1936年入藏白鹤美术馆[31]。

6其他散出的文献

此外1907年斯坦因在遇见王道士之前在千佛洞的藏族小喇嘛手里初次见到一卷敦煌写经[32]。1908年伯希和在乌鲁木齐清朝官员载澜处看到两件敦煌唐人写经[33]。这几件写经打动了斯坦因和伯希和其品相一定不差。

以上是笔者所知1900年敦煌藏经洞开启以后到1907年3月斯坦因进洞以前流散出来的敦煌绢画和经卷。这些已知的文物虽然不是这一阶段中流散出来的全部但如果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可以看出藏经洞文物初期流传的一些情况并由此看出一些问题的线索。

第一这些文物应当都是经过王道士之手送出来的因为从汪宗翰告诉叶昌炽的藏经洞只有数百卷的情形来看王道士其实对当地的官府和文人耍了个花招并没有把真相告诉他们而这些官员和文人也没有追根问底地去追询这些绢画和经卷的来历。敦煌的官员和文人如果知道洞中还有如此多的像他们送给叶昌炽那样的宝贝他们不会傻到如此地步而从不到莫高窟去瞧一眼。其中大多数是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的写本和绢画这说明王道士颇有一些鉴赏能力。从这一点来看王道士是个十分狡猾的人。

第二王道士送出来的这些写本和绢画对比今天接近全部公布的藏经洞文物它们仍然是属于藏经洞文物和文献的精品。这说明王道士并不是像人们过去想象的那么笨他从绢画和经卷的外观和书法来判断选择的文物大多数是属于藏经洞中的精品。也正是由于王道士的鉴赏能力只有外观和书法两个方面所以他送出去的文物是以书法精美的写经和色彩鲜艳的绢画为主。以后王道士把书法较佳但文献价值不高的汉文写经留给自己而把书法不佳的世俗文书、非汉语文献和绢纸绘画等

学术价值最高的材料出让给斯坦因、伯希和这种做法也可以反衬出他早期送人时的选择标准。

第三早期流出的绢画大多数是10世纪后半绘制的经卷也是一些比较完整的写经卷子。由此或许可以推知藏经洞书堆上层放置的材料可能是这些10世纪后半的绢画和一些佛经卷子。根据斯坦因的记录在他到来之前藏经洞上层的原貌已经打乱但从斯坦因对整个藏经洞书堆的描述和他摄制的藏经洞经卷刚搬出来的照片看藏经洞原本的包裹堆基本保持原状王道士是否把这样的一堆材料通通翻个底朝天目前还无法得出一个结论。

第四这些早期的文物一经确认其对于研究敦煌卷子的价值是很大的因为散藏的敦煌写经中有不少伪卷如果可以证明它们是1907年以前流散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它们的可靠性并且可以把它们作为判别伪品的标本。可惜的是我们对于早期流散的全部文物情况并不清楚即便是上述有记载的流散写经绢画有些今天也不知所在希望以后能够在陆续公布的敦煌小收集品中重新看到这些珍本秘籍的原貌。

四　敦煌宝藏的命运和王道士的下场

中国学者与敦煌宝藏失之交臂不到几年在中国新疆已经盗掘了大量古物并运回伦敦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来到敦煌这位受过严格的考古学和东方语文训练的学者由此成为当时来中亚考古的一批西方探险家中最有收获的一个也是由此在西方世界获得最高“荣誉”的一个。

1907年3月斯坦因根据他的同乡洛克济的建议到敦煌莫高窟考察。当他得知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写本和绘画以后就一面到敦煌西北长城沿线做考古发掘获得大批汉简一面耐心地等待外出化缘的王道士回来。5月间王道士回到莫高窟不懂中文的斯坦因通过他的中文秘书湖南人蒋孝琬与王道士周旋编造花言巧语说斯坦因是从印度来的取经僧要把唐僧取经带到中国的经卷取回印度骗得了对《西游记》中唐僧取经故事很熟悉的王道士的信任。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斯坦因被允许进入藏经洞。然而当时的藏经洞中塞满了写卷、绢纸绘画的包裹只能容下两个人站在里面所以斯坦因就在16窟中搭了个帐篷由蒋孝琬和王道士夜间把包裹运到帐篷中展示给他。在包裹搬出大半后图4他进洞清理把藏经洞中的文献和文物翻了个底朝天最后露出里层的壁画和镶在墙里的石碑洪䛒告身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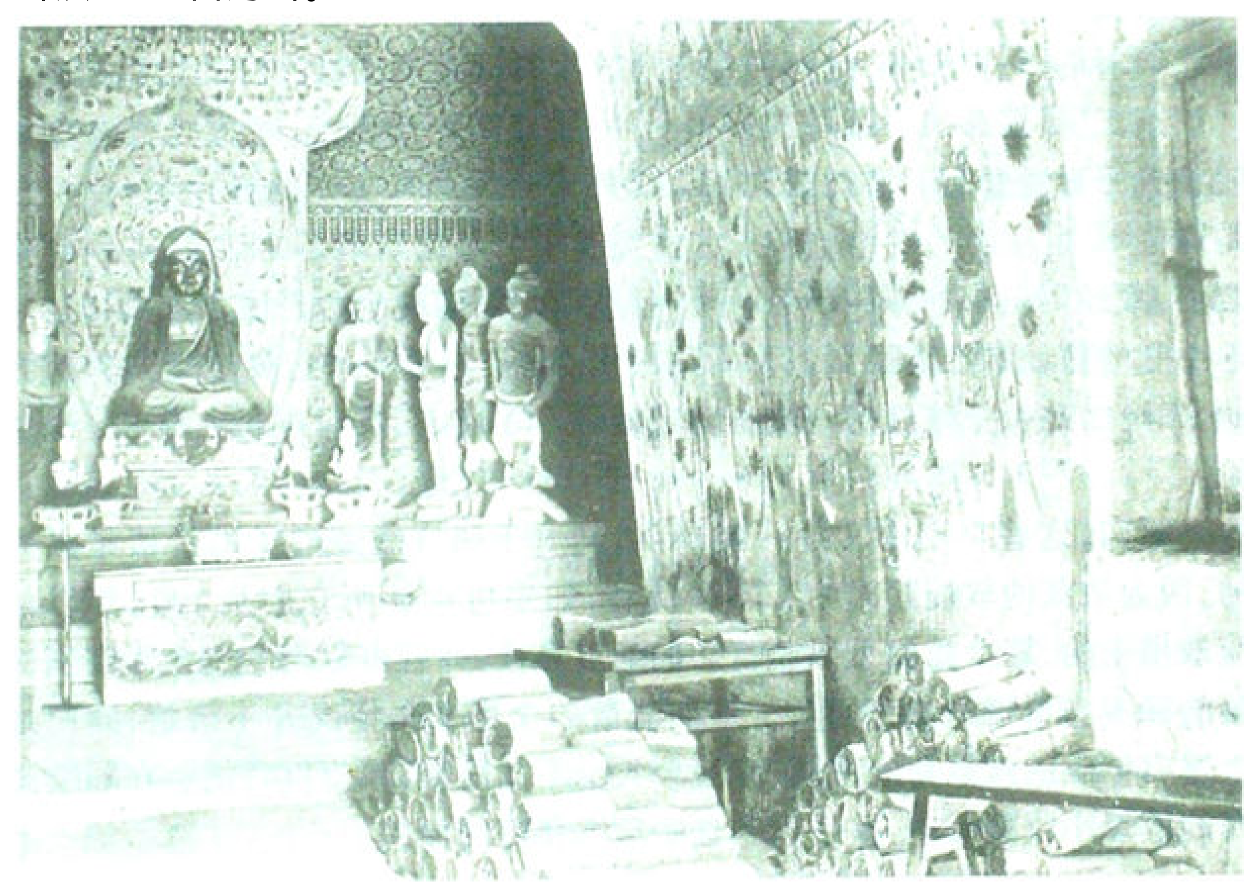


图4　斯坦因从藏经洞搬出经卷的情形

根据斯坦因的统计洞中所有的材料原来分包在两种包裹中一类是所谓“正规的图书包裹”总共有1050个装汉文卷子的包裹还有80个装藏

文卷子的包裹另一类是所谓“杂包裹”包着梵文、于阗文、藏文的贝叶形写本和回鹘文、粟特文卷轴以及绢纸绘画、丝织品、修补佛经或佛画的文书、废纸、木棍等等。王道士当然也不懂这些文献的学术价值当斯坦因以四个马蹄银相当于200两银子跟他达成交易时他留下的是那些他看上去书法精美的普通佛经而斯坦因除了获得270个装有汉、藏文写卷的“正规包裹”外更多的是得到了装有美术品和非汉文文献的“杂包裹”也就是说斯坦因装走的29箱材料从学术研究而不是从欣赏的角度来说是敦煌宝藏中更有价值的部分[34]。

斯坦因走后不到一年即1908年2月沿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沿进行考古的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在乌鲁木齐休整时见到两件敦煌写经立刻赶往敦煌。由于他可以讲流利的汉语很快被王道士允许进入藏经洞内拣选写卷图5。伯希和知道自己无法获得所有洞内的资料因此为自己订立了几个选择标准即选取背面有非汉文的卷子、带有写经题记的卷子、估计未入佛藏的卷子和非佛教的典籍与文书。伯希和以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藏经洞宝藏的精华[35]。



图5　伯希和在藏经洞中选取文物

1909年8—9月间伯希和已经把大批敦煌收集品运送回国又从他供职的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北上到北京购书。在北京期间他邀请罗振玉等中国著名学者看了他随身携带的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一些珍本文献使中国学者首次清楚地认识到藏经洞宝藏的价值。当罗振玉从伯希和那里获知敦煌藏经洞还有剩余写卷时于是提请学部收集。1910年清学部电令甘督何彦升把所余经卷悉数购买运到北京收藏。学部为此拨款共银6000两合敦煌市平银6918.4两比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总和要多得多。但这笔钱主要被敦煌官府用作改修孔庙剩余的用作修补城墙只给了王道士300两作香火费[36]为此王道士对官府颇为不满。

其实负责收购经卷的官员并没有十分用心虽然运到北京的残卷超过一万个编号但留在当地的写本和残片也不在少数。地方官府对经费的截留使王道士所得到的官府经费还不如斯坦因和伯希和给的多于是他把一些书法整严的写经偷偷地藏了起来。1911—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买到数百写卷。1914—1915年俄国奥登堡S. F. Oldenburg考察队到敦煌又从王道士那里获得300多个卷子。1914年斯坦因再次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了570个卷子花了500两银子。这些卷子都是很普通的写经而且副本很多学术价值不大比如大谷探险队所得的200多个卷子多是重复抄写的藏文《大乘无量寿经》[37]。

当藏经洞的经卷大体上瓜分完毕以后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的身影也就逐渐在历史记载中黯淡下来。1923—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华尔纳Langdon Warner来到敦煌但那时藏经洞的文物已经搬空王道士手中也没有了存货。华尔纳的主要目标是揭取壁画他说他曾送给过王道士礼物所以在他把壁画和一尊塑像搬走时王道士毫无惋惜之情[38]。1925年陈万里随华尔纳等第二次赴敦煌“考古”王道士避而不见人称已经因为受到当地百姓的谴责而得了精神病但也有人说他是装疯卖傻[39]。晚年的王道士过得不会很舒服他受到当地民众道义上的强烈责难。所以当他在1931年去世时他的弟子是得到当地绅士们的允许才敢为他们的师傅立了一块泥制的墓碑[40]。

作为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的名字可以说是无人不晓的了。长期以来他作为敦煌藏经洞宝藏流失的责任者被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普通人骂他是“卖国贼”文人指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学者也斥责他

的“无知”和“愚昧”。近年来人们的眼界渐宽看到的资料也多了起来有的人开始为王道士“平反昭雪”或则把更多的不满发泄在斯坦因、伯希和等身上〔41〕。

历史是复杂的有关王道士的历史除了真伪并存的民间传说外都来自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探险家的记录就连王道士本人的照片我们也是不断地翻拍着同一张斯坦因书中的图版。从上述敦煌藏经洞宝藏的发现和流散的经过我们不难看出王道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一个敦煌学者我们应当说王道士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这是不必否认的事实然而我们也应当肯定地说王道士是盗卖敦煌宝藏的历史罪人他的墓碑——道士塔图6——不应是人们所要凭吊的对象而应是永远树立在敦煌莫高窟前的历史耻辱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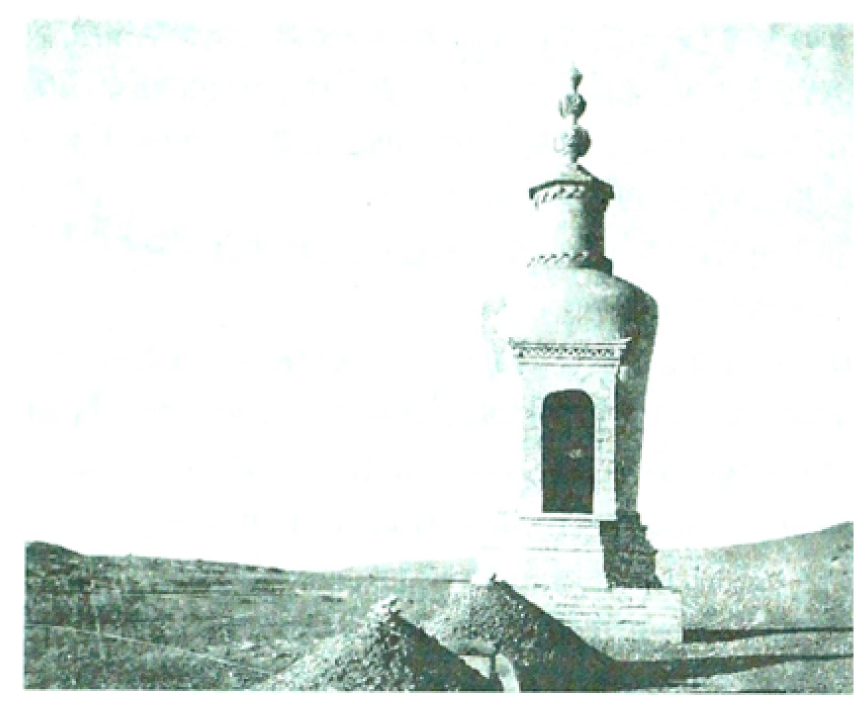


图6　王道士塔

注释

〔1〕参看金荣华《王道士》《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86年收入作者《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99—141页。

〔2〕赵明玉《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见卫聚贤《敦煌石室》附录九《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6年35—36页。

〔3〕榎一雄《外国人の记录に见ぇる敦煌》《讲座敦煌》第1卷《敦煌の自然と现状》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303—354页。

〔4〕谢稚柳《敦煌石室记》1949年3页。

［5］谢稚柳《敦煌石室记》3页。

［6］A.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Ⅱ, London, 1912, 166; idem., Serindia, Ⅱ, Oxford 1921,802,803—804.

［7］《甘肃文史资料》第2辑兰州1963年30—31页。又参看同一辑《甘肃文史资料》所刊韩定山《张广建督甘七年》一文对同一事件的更详细记载特别是20—21页。

［8］展品有晋人写经卷、魏延昌写经卷、北周保定写经卷、北朝写经卷、隋大业写经卷、唐人草书经卷、唐景龙写经卷、唐人泥金写经卷等见《甲子年江西赈灾书画古物展览目录》《收藏家》第2期1993年61页。这些经卷即《昭和法宝总目录》1929年编成著录三井源右卫门所藏经卷前面所列各经为张氏原藏卷子的精品。

［9］《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74—91页。

［10］已经散入《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8年。在嘉德公司1995年春季拍卖会上有一件许承尧旧藏卷前后裱纸上有乙丑年1925许氏题记后归张伯驹1897—1982收藏见《中国嘉德’95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图录北京1995年5月No.413。

［11］《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12册文物出版社1992年177页。

［12］《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4册。

［13］笔者1994年调查敦煌研究院藏卷时曾仔细翻捡这两册写经。

［14］施萍亭《延祐三年奴婢买卖文书跋》《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61—64页。

［15］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Famous Paintings from the Great Collection of the Celebrated Connoisseur of Art, Liang Chang-chu of Foochow, 1919, pl. 3A.

［16］《通报》T' oung Pao第21卷1922年329页。

［17］《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293—294页。

［18］吴琦幸《叶昌炽与敦煌研究》《兰州学刊》1985年第4期72页。

［19］Dietrich Seckel, Buddhistische Kunst ostasiens, Stuttgart, 1957, fig. 111; Thomas Lawton, Chinese Figure Painting, Washington, D. C. 1973, No. 16;《海外遗珍》第一卷台北故宫1985年图版33。

［20］荣新江《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Ye Changchi. Pioneer of Dunhuang Studies《国际敦煌学项目通讯》IDP MEWSNo. 7, Spring 1997, 5页。

［21］参看张广达与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86—187页又同作者《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38—39页。

［22］Stein, Serindia, Ⅱ, 802,803—804.

［23］参看卫聚贤《敦煌石室》《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6年24页。

［24］参看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65—169页。

［25］其清晰的图版曾印入日本国立西洋美术馆编《ボストン美术馆展》日本美术出版计划中心1978年马德先生曾据以介绍并重录题记文载《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172—173页。

［26］W. Fuchs, "Eine buddhistische Tunhuang-Rolle v. J. 673", Asiatica. Festschrift Friedrich Weller, Leipzig 1954, 155—160 + 1 pl.

［27］罗振玉《永丰乡人甲稿》北京1920年此据《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一册44—46页。

［28］影本见寺冈龙含《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研究总论》福井汉文学会1966年294—299页。

〔29〕《沙州石室文字记》收入罗振玉编《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诵芬室刊本。

〔30〕《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176—177页。

〔31〕松本荣一《敦煌画拾遗》一《佛教艺术》第28号1956年。图版见《竹石山房中国金石陶瓷图鉴》中国金石陶瓷图鉴刊行会1961年、《白鹤英华》白鹤美术馆1978年等详参上引王惠民文。

〔32〕Serindia, Ⅱ, 802.

〔33〕参看秋山光和《伯希和调查团的中亚旅程及其考古学的成果》《佛教艺术》第20号1953年64页。

〔34〕Stein, Serindia, Ⅱ, pp.807—830.

〔35〕P. Pelliot, "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 Bulletin de l' É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 Orient, 8, 1908, pp.509—529陆翔译《敦煌石室访书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5期1935年6—27页。

〔36〕金荣华上引文117—118页。

〔37〕参看尚林、方广锠、荣新江合撰《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特别以敦煌写经为中心》京都龙谷大学西域文化研究会1991年。

〔38〕华尔纳L. Warner《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纽约1926年136—145页。

〔39〕陈万里《西行日记》北京朴社1926年81、96页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致斯坦因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转引自王冀青《华尔纳与中国文物》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中译本附录三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待刊。

〔40〕见《王圆箓墓志》。

〔41〕不同观点的比较集中的阐述见金荣华《王道士》余秋雨《道士塔》作者《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3年1—7页雒青之《百年敦煌》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21—47页陈作义《敦煌失宝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1—132页李正宇、赵和平《王道士》《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887—888页。

第四讲　敦煌藏经洞的原状及其封闭原因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写本和美术品。是什么原因把这么丰富的宝藏封存在这个小耳洞中它们封闭的年代又在何时这些问题关系着我们对藏经洞出土资料的正确理解和总体认识也离不开我们对大约11—13世纪宋元时代西北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全面了解然而对此迄今还没有十分令人满意的解说。

一　藏经洞的原状

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封闭争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封存的原因一是封存的年代二者又是相互关联的。迄今为止学者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这两点提出种种解说归纳起来影响最大的说法仍然是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斯坦因和伯希和。

斯坦因根据他在洞中所藏一些包裹中发现的一批相当数量的汉文碎纸块、带有木轴的残经尾、木轴、丝带、包裹布、丝织品做的还愿物、绢画残片、画幡木网架等等认为这些东西是从敦煌各寺院中收集来的“神圣废弃物”藏经洞就是堆放它们的处所。他还根据所见写本和绢画题记最晚者为10世纪末的情况推测洞窟的封闭是在11世纪初叶[1]。其观点可以作为“废弃说”的代表。伯希和根据洞中无西夏文书而藏汉文本及绢画、壁衣、佛像、石碑杂沓堆置因而认为是1035年西夏入侵敦煌时为避外寇而仓皇封闭的[2]。有人称之为“避难说”。此后藤枝晃教授采用“废弃说”他认为废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印本佛典取代了卷轴装佛典图书馆书架的重新布置导致原来的卷轴佛典的废弃时间在1002年以后不久[3]。方广锠博士也主张“废弃说”他提出的假设是在曹氏政权的某一年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寺院藏书大清点结果将一大批残破无用的经卷、过时的文书、废纸、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等统统集中封存在藏经洞中[4]。通过对藏经洞发现史和藏经洞发现文书的研究我对这两种看法都难以苟同。

斯坦因是第一位留下详尽记载的考古学家他根据洞中包裹的放置情形认为在他到来之前藏经洞上层的原貌已被打乱有许多包裹中的分类也已混淆[5]。但是从斯坦因描述的情况来看斯坦因所见到的藏经洞情形仍然大体上保存了原本的一些状态。因此我认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所记录的情形应当是讨论藏经洞封闭原因的出发点。

《西域考古图记》第二十二章集中记载了斯坦因在蒋孝琬帮助下考察藏经洞的详细过程。斯坦因的报告大体上是按照时间先后加以叙述的但他又做了某些归类。这里只能非常简要地按原书顺序概述一下他的报告的主要内容。第一节《藏经洞的首次开启》记斯坦因先是看到一捆蒋孝琬偷偷拿到他帐篷中的汉文佛经包裹然后是他见到的藏经洞情形写本包裹塞满了洞窟只能容下两个人站在里面。因此不可能在洞中检寻这些包裹所以在藏经洞外的大窟16窟中进行。最初见到的包裹中的汉文经卷保存得十分完好由于数量太多斯坦因放弃了让蒋孝琬编目的计划。接着记藏文卷子、于阗文写本、杂纸包裹、大的幡画包裹等等。第二节《多种语言藏书室中的发现物》叙述斯坦因接着看到的包有他认为是废物的一些包裹、梵文和于阗文的贝叶写本包裹、藏文贝叶写本包裹、回鹘文和粟特文写卷以及这类杂包裹中发现的如尼突厥文摩尼教忏悔词其中许多是完本。第三节《写本和艺术品的获得》记他翻捡藏经洞最里层的汉藏文卷子包裹的过程并描写了挡在写本绢画包裹后面的壁画和洪䛒碑的原来位置。最后是他与王道士谈判而攫取宝藏的经过。第四节《对藏经洞的进一步考察》主要是讲述伯希和的收获以及他所听说的运送北京时的情况[6]。

根据斯坦因的记载藏经洞中的几乎所有的材料原来都是分类包在两种包裹中的一类是所谓“杂包裹”mixed bundles或miscellaneous bundles梵文、于阗文、藏文的贝叶形写本、回鹘文或粟特文写本卷轴及绢纸绘画、丝织品和上面提到过的各种斯坦因认为是废弃物的东西都装在这类包裹中另一类是所谓“正规的图书包裹”regular library bundles总共有1050个装汉文卷子的包裹每包平均装卷子12个左右还有80个包裹装藏文卷子此外还有11个较大的藏文贝叶夹本包。斯坦因是在对藏经洞做完彻底的翻捡以后做出上述统计的反映了他所见到的藏经洞的实貌。但斯坦因开始时是靠王道士和蒋孝琬夜间偷运来一步步接触藏经

洞材料的而且他的分类叙述也有碍于我们精确了解藏经洞的原貌。幸运的是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插图200和他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旅行记《沙埋契丹废址记》插图194有一张汉文写卷刚刚移出藏经洞的照片图1可以让人们一眼就看出这些汉文卷子是整齐地一捆捆包着的其中一个包裹布上还可以看见“摩诃般若海”五个字这正是依《开元录·入藏录》所写的经名和帙号这个包裹所包的应当就是“海”字号的佛典四十卷本《摩诃般若经》第二帙[7]。这张照片说明这些所谓“正规的图书包裹”正是分帙存放的佛经。



图1 刚刚移出藏经洞的汉文写卷

然而斯坦因当时不懂得汉文佛典在中古时代的图书馆中是分帙存放的也未详究为什么许多保存完好的文献或绘画都包好了放置在一起如他所列举的69叶的梵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Ch.0079.a、44叶的于阗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Ch.00275、长1108行的于阗文佛典合集Ch.c.001、十五英尺长的回鹘文摩尼教赞美诗Ch.0015等精品[8]他在讨论藏经洞封闭时片面地强调了藏经洞中的一些残品而忽视了他本人所看到和介绍给读者的大量完整的资料从而得出废弃说的看法。斯坦因作为一个不懂汉文的西方考古学家他当然不懂得中国古代的经帙制度因而影响到他的结论的可靠性。但他以严谨的考古学方法将他所获得

的材料都用Ch.“千佛洞”的缩写为字头作原始编号他还用小罗马数字作为“正规包裹”的编号可以使人得知藏品的原貌[9]。由于王道士对汉文写卷的兴趣较非汉文写卷及美术品要大所以斯坦因尽可能多地取走了“杂包裹”而只获得了270个装有汉藏文卷子的“正规包裹”[10]这样就使得原本由1130个包裹所构成的正规藏书分散开来。遗憾的是斯坦因为了尽快攫取藏经洞宝藏放弃了让蒋孝琬随地编制汉文写本目录的计划在《西域考古图记》中有厚达150页的“千佛洞所获绘画、木刻品、丝织品及其他各种古物登记目录”和粟特文、回鹘文、于阗文、梵文、龟兹文的登记目录唯独没有所获汉文写本目录。而且当斯坦因敦煌收集品送达伦敦后由于资助他此次探险的是印度政府和英国博物馆所以收集品又分散入藏英国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新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Central Asian Antiquities Museum。更为不幸的是入藏英博的美术品和入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非汉文文献仍保留了Ch.起首的原始编号而原本可以反映经帙情况的汉文卷子包裹的原始编号却被英博在编目整理时废弃了代之以S.编号[11]。今天在伦敦汉文佛经写卷作为图书资料保存在英国图书馆而包裹这些经卷的经帙由于大都用丝锦制成则被作为美术品收藏在英国博物馆使帙与经卷进一步分离目前想恢复藏经洞汉文佛典经帙合一的状态已经不可能了。

斯坦因记录的藏经洞情形基本上反映了藏经洞的大体面貌。汉藏文佛典是分帙整齐地存放的其他文字材料和绘画也都分类包在一起。这些主体内容很难被看做是废弃物如完整地包在帙中的经卷写于10世纪末叶首尾完整的一大批于阗文佛典983年绘制的精美观音像Ch.lvii.004一大批完整的菩萨画幡Ch.0025等[12]若笼统地被当作是废弃物是很难理解的。

藏经洞经过斯坦因的一番折腾在伯希和到来时已非原貌。伯希和说他所见到的情况是“洞中所弃至为凌乱”实是斯坦因等人翻捡的结果而伯希和却以此为藏经洞原状因而得出是西夏来侵时僧人仓皇出逃时的样子。从这一点来看伯希和提出的藏经洞封闭原因和年代是不足信的。伯希和的文字记录远较斯坦因简略[13]他似乎也不懂中国古代经帙制度。从他的摄影师留下的一张他在洞中翻捡卷子时的照片可以看出他身后堆积的写本还包在帙中而经他翻捡后放置在一边的部分则已经没有次序可言。最遗憾的是伯希和将全部藏品翻捡一遍时明知不可能

将所有藏品带走故订立了几条选择标准即只取背面有非汉语的卷子和带有题记的卷子而一般他估计已入藏的普通汉藏文写经则弃置未收。从大多数研究者的角度来讲伯希和的捡选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巴黎所存敦煌文书的确在许多方面优于伦敦藏卷。但是正是这些普通的佛典才能反映藏经洞原本的经帙合一的情形经过伯希和这遍全面无遗漏的捡选藏经洞中的主体藏书佛典部分就再也不能恢复原貌了。

伯希和确是个行家他不仅拿走了藏经洞留给今天研究者的文献精华而且把斯坦因所遗的几乎所有美术品和普通藏文佛典之外的非汉语文献都带回到巴黎其中包括他在最初的报告中就已提到的一件竹制经帙[14]。伯希和收集品和斯坦因收集品的收藏有些类似即六千余件写本全归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收藏而绘画、木雕、绢幡、经帙以及各类丝织品先是入藏罗浮宫最后在1947年全部美术品都入藏集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15]。因此经帙与经卷分离研究文献的人很少注意收藏在集美的原本与文献混为一体的经帙或其他美术品以致上面提到的那件竹制经帙里面裱糊的一件唐代告身文书迄今似仍不为研究唐代官文书者所知。

据宣统二年1910十月二十三日敦煌县档案记载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王道士已将一些经卷装成两个木桶封订坚固中立木柱安于佛殿名曰转经桶。1910年清朝学部电令甘督将所余经卷悉数运到北京收藏。但敦煌县政府虽称“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但敦煌县官府草率从事经桶原封未动而且大量藏文卷子和夹板贝叶写经也不在取限。此次官府收取未尽大量写本流散于当地民众手中[16]。而所谓转经桶不过是王道士欺骗官府的把戏我们可以想见他一定还窝藏了不少写经和绢画以至于后来的大谷探险队、斯坦因都从王道士手中买到数百件敦煌写卷和一些绢画[17]。1914—1915年的奥登堡也从当地收集了大量残卷[18]。因此真正入藏北京图书馆的藏经洞材料主要是些汉文写经它们本是斯坦因、伯希和、王道士的“劫余”之物。而且运送到北京的写卷又经人截取菁华把普通佛典断为数段充数[19]造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图书馆藏卷往往一件写经断为十五六截的残状[20]。这种人为造成的残损不完的情形不是藏经洞藏卷的原貌也不能作为所谓“废弃说”的根据。

从斯坦因最原始的考察报告中可以确认藏经洞原本是分帙封藏着大批佛典同时也精心保存着许多信士供养的佛画还有一些残纸和丝织

品残片等。斯坦因以后藏经洞原貌已乱藏品经过多次分割形成今天我们在各个收藏单位见到的敦煌残卷的样子。然而这种今天的保存状态不是藏经洞的原貌据此声称藏经洞中的材料都是废弃物是难以使人信服的。

二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藏经状况

我们在批评持“废弃说”者忽视藏经洞内较为完整的经卷和美术品的同时也不否认其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佛典残片和丝织品残块等今人看来应当废弃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是废弃物关系到我们对五代宋初敦煌地区各寺院的收藏情形的认识。斯坦因提出“废弃说”的时候对唐宋时代敦煌佛教寺院的情况可以说所知甚少因为那时大多数汉文文书尚未作过研究。今天经过学者们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们可以大致窥知当时寺院藏经以及其他供养具的收藏情况从而可以对藏经洞中的这些残件作出比较圆满的解说。

归义军时期敦煌佛寺大约有十七八座。其中以龙兴寺最大它是唐朝以来敦煌的官寺位于沙州子城内临近州衙。设立于莫高窟前的三界寺远离州城是五代时期敦煌十七寺中较小的一个它的创立远较龙兴、开元、灵图等大寺为晚其藏经和其他供养具也无法与大寺相比。但无论是敦煌的大寺还是小寺佛藏和供养佛像的残缺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我们举大寺龙兴寺为例。P.3432是《吐蕃时期敦煌龙兴寺供养佛像佛经等历》其中登录了龙兴寺所藏的佛像、佛经、衣物和法器等包括一部大藏经是按《大唐内典录·入藏录》的顺序排列的依《内典录》可知这部藏经有些帙不具足。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所藏佛像画幡和经巾有的已经“不堪受用”[21]但仍然保存而不被废弃从现存敦煌绢画、经帙的古人修裱情形可知它们等待的是修复而不是废弃。

据S.2142《佛典目录》题记云“大唐宋乾德二年964岁次甲子四月二十三日经司僧政惠晏、法律会慈等点检《大般若经》两部欠数较多未得成就。同日法律海诠请藏《大佛顶略咒本》一卷法律会慈请藏细字《最胜王经》两卷计一部。”此时敦煌佛教教团所属的经司都无法配全藏经更不用说一些一般的寺院了。从吐蕃时期到五代宋初敦煌各寺佛典的缺欠是普遍的现象在敦煌文书中有许多这一时期的欠经目录、缺

帙录、补写佛经目录、向中原乞经状等等[22]说明了这种情况的持续存在。

相比而言较小的三界寺所藏佛典和幡画的情况更差。敦煌研究院藏0345号《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经目录》有如下题记“长兴五年岁次甲午934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应有藏内经论见为目录。”图2据施萍亭先生研究此卷是道真清理三界寺藏经目录北京图书馆新0329号《见一切入藏经目录》则是收集修补佛经后的登录其中也有同上题记只是最后一句改为“应有所得经论见为目录”而S.3624是该目录的缮清本惜仅存24行[23]。从记载较全的新0329所登录的藏经来看补充后的三界寺经藏仍然是部帙不全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道真修补的这部不全的藏经中有一些正统佛藏排斥的三阶教经典、疑伪经和禅籍如《大乘无尽藏法》、《阎罗王受记》、《八阳神咒经》、《父母恩重经》、《无量大慈教经》、《善恶因果经》、《历代法宝记》等。这个目录有助于我们理解藏经洞所含佛典的情况即部帙不全真伪混杂如果按《开元录》组织的唐五代寺院中完整规范的藏经来要求藏经洞藏品当然就会认为它们是废弃物但当年的三界寺藏经本来就是如此地残缺不全和真伪混乱。我们不能用唐代长安、洛阳一些皇家官藏的情形来要求处于穷乡僻壤的敦煌三界寺藏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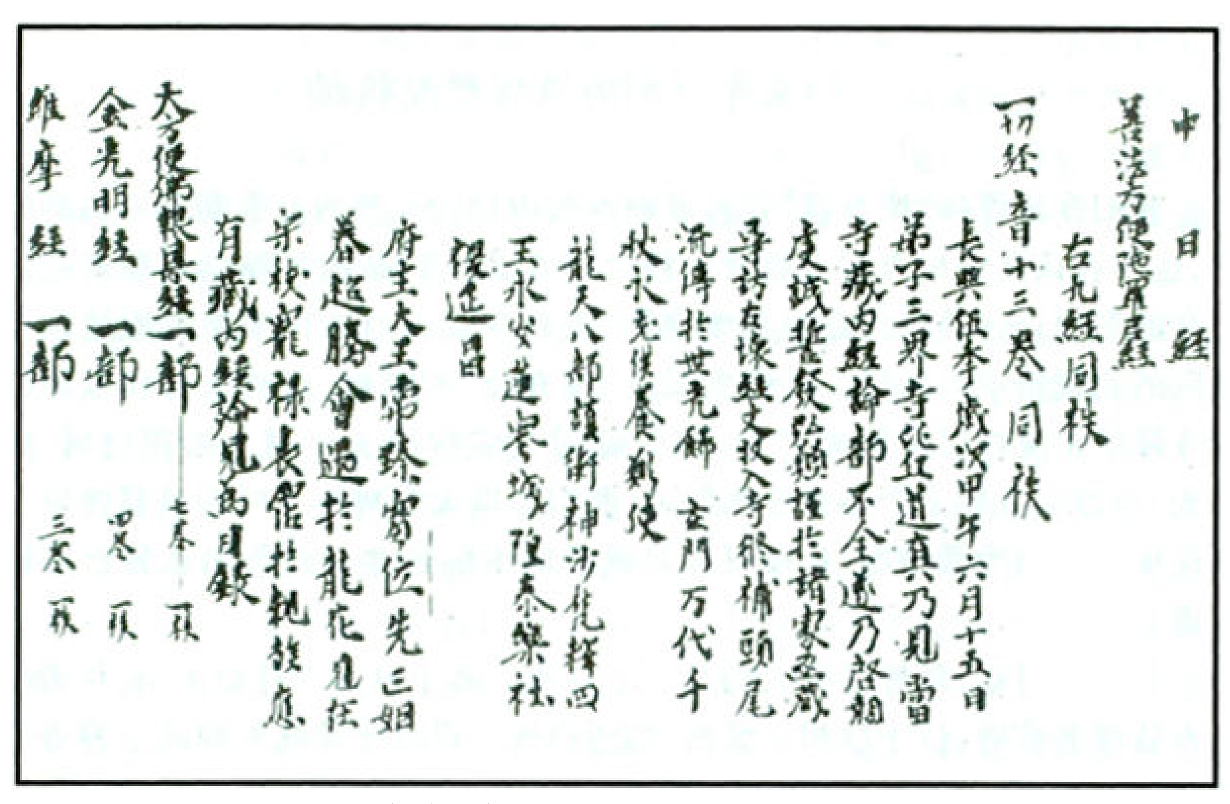

中日經
善法方便陀羅尼經
右九經同帙
一切經音十三卷 同帙
長興伍年歲次甲午六月十五日
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見當
寺藏內經論部不全遂乃啟顙
虔誠誓發弘願謹於諸家函藏
尋訪古壞經文收入寺中修補頭尾
流傳於世光飾 玄門 萬代千
秋永充供養 願使
龍天八部護衛神沙梵釋四
王永安蓮塞城隍泰樂社
稷延昌
府主大王常臻寶位 先亡姻
眷超勝會遇於龍花慈氏
宗枝寵祿長霑於親族應
有藏內經論見為目錄
大方便佛報恩經一部 七卷 一帙
金光明經 一部 四卷 一帙
維摩經 一部 三卷 一帙

图2　敦煌研究院藏《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经目录》题记

道真的修补佛典一直持续不断。S.6225一面写“三界寺比丘道真诸方求觅诸经随得杂经录记”另一面也是道真手迹写“集《大般若经》一部六百卷具全又集《大般若经》一部未全《大涅槃经》三部《大悲经》三卷具全《经录》一本”这是道真收集佛经的简单随记意思是说他集成了一部完整的《大般若经》还有一部不全的《大般若经》及《大般涅槃经》三部《大悲经》三卷等。又S.6191也是道真所写“杂《大般若经》或有施主及官家缺帙号处取添帙内计十卷。”[24]这是说他续得的十卷《大般若经》已是多余的本子如其他施主或官家藏经有缺可以此补充。这些成果应是934年以后陆续取得的说明了道真收集佛经的成绩也告诉我们他这样集合的佛典必然会有大量的副本。三界寺是个小寺无法雇用大量写经生来抄写佛典所以道真采用从各寺收集古旧佛典抄本修补集成的做法藏经洞出土的一些非三界寺的写卷应当就是这样从各处收罗来的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敦煌佛经写本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出自不同时代、不同抄书手、有不同寺院的藏书印其原因就是它们原本是集成的。另外因为莫高窟是敦煌民众供养佛像和佛经的主要场所之一所以在三界寺中应当有相当数量的供养经和画。而且我认为道真从各寺收罗来的古坏经文也作为有待修补的材料保存在三界寺并

最终进入藏经洞。斯坦因所见藏经洞中的残经废纸、木轴引首、经帙残片及丝带等是作为修补佛经、经帙、绢画的材料而保存在那里的它们对于敦煌的一些大寺可以说是废物但对于三界寺来说却不能说是废品。

在伦敦和巴黎所藏的敦煌写本中还有相当一批残片实际上是揭自一些绢纸绘画和经帙经卷的。在伦敦馆方把这些残片放在总编号的后面顺序给号使得伦敦残卷的数量不断增加而巴黎国立图书馆则将这些残片放在所揭自的卷子后面编作bis或piece 1,2,3……这些残片本是古代僧人修复绢纸绘画和经帙经卷的在藏经洞开启时并不独立存在它们是一些完整文物的组成部分[25]。遗憾的是揭出的这些材料越来越多给人以藏经洞文献十分零乱残碎的印象甚至成为“废弃说”的证据。

三　构成藏经洞内涵的各种材料

据道真以沙州释门僧政的身份签发的《辛亥年951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俄藏敦煌文书Dx.1400 + Dx.2148 + Dx.6069《于阗天寿二年964九月弱婢祐定等牒》记宕泉造窟和三界寺供养事以及P.2130题记“三界寺道真经不出寺门就此灵窟记”等材料可以证明道真所在的三界寺位于莫高窟前。除了上面提到的藏经洞文献和文物与三界寺藏经和供养具之间的种种联系外敦煌写经中带有寺院标记包括藏书印、寺名缩写等等的写本无疑以三界寺最多。

藏经洞原本是归义军初期的河西都僧统洪䛒的影窟[26]大概是因为距三界寺寺址较近故此在10世纪中叶渐渐成为道真收罗古坏经卷修补佛典的储藏所放置佛典残卷和一些供养具。其中既有完整的藏经也有绢画、法器乃至残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由道真管理的。

佛典和佛画无疑是藏经洞所存文献和文物的主体它们原本是属于三界寺的财产。这里有5世纪初叶以来写的各种佛教典籍有些虽然残缺但在10世纪的道真眼里它们无疑是珍贵的文献就像今天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宋版书一样虽然大都残缺不完但却被精心地保存着。而许多10世纪末期所写的佛典和所绘的绢画则更难说是废弃物了。这些文献和文物全都包好一起整齐地存放在洞中的情形也不能使我们认为是一堆废弃物。如果说印刷术的发明带来的书籍形制的变化导致了写卷的废弃

则无法解释绢画和刻本本身的存在。况且虽然有北宋颁给沙州刻本藏经的可能[27]但即使这部藏经运到了沙州也不会入藏三界寺。俄藏F.32A记有"施主敦煌王曹宗寿与济北郡夫人氾氏同发信心命当府匠人编造帙子及添写卷轴入报恩寺藏讫维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五月十五日记。"[28]说明迟至1002年沙州官府仍在抄写卷轴式佛经所以藤枝晃教授的废弃说理由也是不充分的。

人们常常根据现在在各国图书馆中所见到的敦煌文书的现状笼统地说敦煌写本多为残卷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在伦敦藏品中有许多长达十米以上的佛经写卷不少是首尾完整的[29]。当然从当时三界寺的藏经情况看要想奢望根据藏经洞出土写卷复原一部完整的《开元录》大藏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开元录》是当时三界寺藏经的主要依据所以按《开元录》来点勘藏经洞写卷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敦煌大藏经》编辑委员会编纂的《敦煌大藏经》是这种点勘藏经洞写经的一项成果[30]使我们多少能够看出当年三界寺藏经的一些情况。

由于大多数经帙图3被当作美术品放在博物馆中已经发表的一些精品都是为研究花纹图案、经纬线等方面问题而公布的[31]所以我们尚难了解经帙的全貌。保存在英国图书馆的一些纸质或麻布经帙为了揭出粘在上面的文书材料大都已经拆开只保留了几件作为标本。这些经帙的存在证明了藏经洞所藏写经是按帙存放的。但这些经帙到底有多少尚有待我们去做系统的整理[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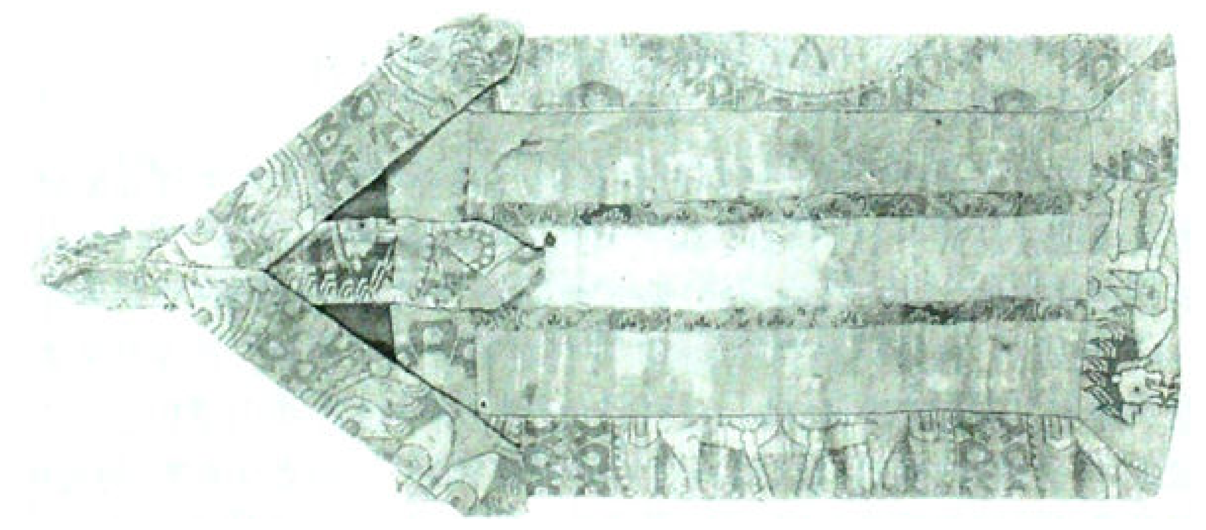


图3　敦煌经帙·集美博物馆藏

大多数研究藏经洞封闭的学者往往忽视了大量绢纸绘画和丝织、刺绣等美术品的存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在这些美术品中不乏精美完整

之作图4今人看了都爱惜不已当年敦煌的信士僧人怎么会将其废弃据美术史家的考察这些绘画品的年代大都为9、10世纪的作品有些是接近10世纪末才完成的它们作为三界寺的供养具尚未到“不勘受用”的时期。今天我们很容易地从印制精美的《西域美术》彩色图录中看到斯坦因和伯希和收集品中的精美绘画[33]这是持“废弃说”者不应回避的藏经洞文物。依我的看法如果没有反佛的外力的促使这些绢画是不会封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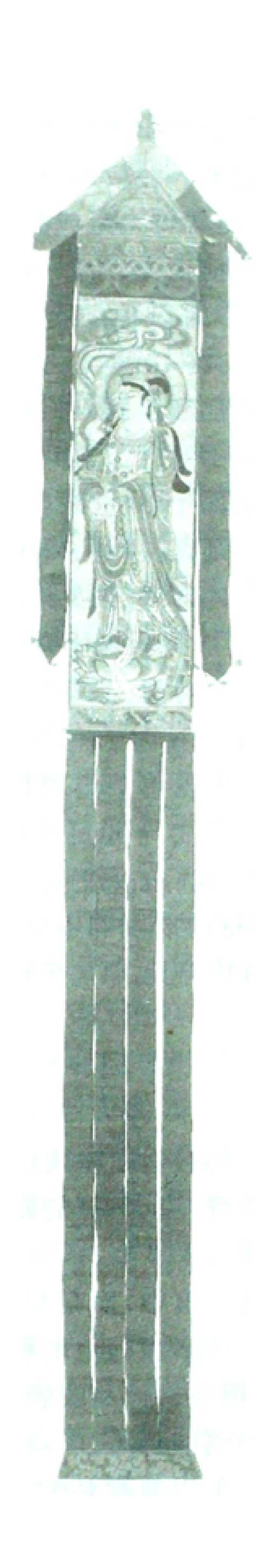


图4　完整的敦煌幡画

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非汉语文献。一般认为藏经洞中的藏文写本一定是废物因为藏人对敦煌的统治早在848年就结束了。但是吐蕃对敦煌的长期统治对敦煌佛教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像吐蕃高僧法成在吐蕃统治结束时并未随吐蕃势力退走而是听从曾跟从他念经的弟子张议潮的劝请留在敦煌讲经法成所使用的藏文经典没有马上就被废掉〔34〕。上述《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经目录》即著录有"番本《大般若经》"表明藏文经典在10世纪仍未废弃。而且乌瑞G. Uray和武内绍人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表明直到10世纪末藏文仍然是河西地区的通用语言之一〔35〕。考虑到大量吐蕃、退浑、通颊等部落在敦煌的存在似不能说在藏经洞封闭时这些藏文文献都已成为废弃物了。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城市其他语言在这里流行的情况与藏文相似。在敦煌8世纪时曾有一个人数颇多的粟特人聚落吐蕃统治以后由粟特人组成的从化乡已不复存在但粟特人还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才可能消失所以藏经洞里出有10世纪的粟特语文献是不足为奇的。回鹘、于阗文献的保存更容易理解因为曹氏与甘州回鹘和于阗王国有着姻亲关系终10世纪敦煌与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和于阗王国间的往来不断许多回鹘和于阗人长时期留在敦煌许多回鹘、于阗文佛典或文书就出自这些人的手笔〔36〕。同时归义军的僧俗民众也不乏懂得回鹘、于阗文者我们举几条属于10世纪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材料。S.5448《浑子盈邈真赞》云"明闲礼则传戎音得顺君情美舌甜唇译蕃语羌浑叹美。"浑子盈死于925年。P.2991《张灵俊邈真赞》云"杏坛流训梵汉翻传。"灵俊卒于936年前后〔37〕。又敦煌研究院藏001号+董希文旧藏+P.2629《归义军官府酒破历》964中记有"孔目官修西州文字""案司修甘州文字""供修甘州文字孔目官""案司修西川州文字""供修于阗文字孔目官"等〔38〕沙州案司孔目官所修西州或甘州文字即指回鹘文无疑于阗文字则指于阗语。

总之不论是汉文佛典还是藏文文书也不论是绢纸绘画还是回鹘、于阗文献我们如果把它们放在公元10世纪而不是今天已被局限的目光里我想藏经洞的主体材料不应是废弃物。根据以上的论说我认为藏经洞的主体文献佛典和供养具原是三界寺的藏经和资产。

四　封闭原因

佛教教团将残经破像废弃掩藏起来的确是佛教的传统做法。我们难以接受“废弃说”的原因之一是藏经洞作为这样一种废弃方法的掩埋处所似乎太大了些因为如果自5世纪以来的写经早已是废物的话不应一总放在这个窟中而是早就放在佛像中或其他什么地方。1965年在莫高窟第125—126窟前地坍和第130窟底层壁画下岩洞等处发现的北魏、唐代残刺绣、绢绘佛像和雕版捺印佛像等[39]属于这种废弃方式的废弃物。而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应当另有原因。

上引俄藏F.32号1002年的施入记是目前所知最晚的一件藏经洞出土文书此前的纪年写本大体上持续不断而此后有年代的写本迄今尚未发现。从现存写本年代的累计可知藏经洞的封闭应在1002年以后不久不应晚到伯希和提出的1035年西夏的到来[40]。伯希和时代人们对西北历史的了解还比较有限因此找了一些较晚的历史事件来解释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和年代。在经过多年来对唐宋时期西北历史的探讨之后我以为最有可能促成藏经洞封闭的事件是1006年于阗王国灭于黑韩王朝一事。

从1002年往后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首先就是1006年于阗佛教王国灭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41]。因为于阗与沙州的姻亲关系970年于阗国王曾致函其舅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请求发兵援助抵抗黑韩王朝[42]。当于阗陷没后大批于阗人东逃沙州甚至远到青海[43]。在藏经洞中有一批相当完整的于阗文佛典许多是于阗王尉迟输罗Visa Sura966—977年在位和尉迟达磨Visa Dharma978年以后在位时写成的如Ch.00274《佛本生赞》、Ch.i.0021b《金刚乘文献》等他们或许是写后不久就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下带到敦煌保存起来的也可能就是逃难的于阗佛教僧人带来的[44]。于阗僧人所带来的伊斯兰东进的消息要比信佛的西夏人到来的消息可怕得多因为黑韩王朝是经过近四十年的血战才攻下于阗的他们对于阗佛教毁灭性的打击[45]应当是促使三界寺将所得经卷、绢画等神圣的物品封存洞中的直接原因。而由于黑韩王朝并未马上东进所以封存活动是主动而有秩序地进行的并且在封好的门前用壁画做了必要的掩饰[46]以致当事者离开人世后被人们长期遗忘。

在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的研究中时常有人提出一些材料来说明藏经洞的封闭要晚于伯希和提出的1035年。通观这些材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西藏、回鹘、西夏相关的材料如罗斯提到的元至正十年1350

所写回鹘文佛典[47]韩廷顿举出的西藏风格的绢画[48]。这些材料应当出自莫高窟北区的第464窟伯希和编号181窟。斯坦因、伯希和已经指出在他们到来之前王道士曾将别处发现的晚期材料放入藏经洞伯希和还特别指出他在洞中见到的清光绪年间刊印的小本道经它们不能作为藏经洞封闭年代的证据[49]。虽然这一事实累经罗斯、罗那塔斯、韦陀等人强调[50]但仍有人时而忘掉这一点。

另一类则是确为出自藏经洞的汉文文书。谭真先生认为P.3810《养生神仙粥食方》中有“山药”一名应是避宋英宗1064年即位讳而改“薯蓣”为山药[51]。毕素娟先生认为P.2159背辽僧诠明著《妙法莲华经玄赞科文》是1006—1020年间传入敦煌的[52]。陈祚龙先生以为S.4358《李相公叹真身》系抄自宋仁宗1031年所撰的《佛牙赞》《佛祖统记》卷四五[53]李正宇先生持同样看法[54]。相对于数万件属于1002年以前的藏经洞文献这几条证据显得十分孤单而且我们也可以作另一种解释。关于P.3810中的“山药”虽然说者查阅了大量文献认定即“薯蓣”的讳改但宋以前的医书许多已残缺不全不能肯定山药不是“薯蓣”之外的另一种药材[55]。把辽僧诠明著作的传入敦煌放在1006—1020年间的根据仅仅是因为史料记载统和开泰年间辽与沙州之间往来不绝并无实证。据考诠明此书完成于965—1002年间995年经敦煌往西天取经的僧道猷曾把北京石壁沙门傳奥的《梵纲经记》带到敦煌[56]也不排除他把诠明著作于此时一并携来的可能性。宋仁宗的《佛牙赞》与《李相公叹真身》文字基本相同当出一源但《佛牙赞》的文字似更典雅我以为其传抄关系正相反即先有《李相公叹真身》辗转又由佛教徒安在了宋仁宗身上了如果先有宋仁宗《佛牙赞》则敦煌抄本必然标明为宋仁宗诗这样更具影响力称《李相公叹真身》反映了它来自民间而且早于所谓宋仁宗《佛牙赞》的蛛丝马迹[57]。

此外还应指出的是俄藏敦煌写本目录中著录了两件《景德传灯录》[58]此书是1004年编成敦煌学界也常有人以此为藏经洞最晚的写本之一。按这两件写本一件编号F.229bM.897确为《景德传灯录》。这件写本的正背内容和行款格式都与马伯乐著录的斯坦因在黑城哈拉浩特所获KK.Ⅱ.0238K号写本相同[59]根据英国图书馆提供的照片我发现英俄分藏的两件写本实为同一写本所撕裂的散叶[60]。故此件可排除于敦煌写本之外。另一件编号Dx.1728M.2686残存一纸下半十行文字俄藏目录在《景德传灯录》一名后加了问号[61]。1991年访圣彼得堡时我也曾见

到此件原物确为敦煌文书然审其内容实为唐开元间成书的早期灯史《楞伽师资记》净觉序的残文与《景德传灯录》毫无关涉[62]。因此某些被认为是藏经洞出土的晚于1002年的材料大多可以指出它们的其他来源或误解之处。

藏经洞的封闭问题涉及到历史、宗教、美术、语言、文学、考古等各个方面我在此尽可能全面考虑藏经洞内部的各种资料和外部的相关历史事件对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和年代提出一种较为合理的解说但决不敢说这一问题已经解决。相反问题的提出目的是希望相关学科的专家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自己所熟悉的材料作出具体的分析以期通过藏经洞问题的研究加深我们对藏经洞宝藏的认识。

注释

〔1〕斯坦因A. Stein《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二牛津1921年820页。按Serindia《西域考古图记》是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正式考古报告有关斯坦因获取敦煌藏经洞宝藏的记录以此书最详。此外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的个人旅行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两卷本伦敦1912年出版也有内容大致一样的记录。国内学者过去主要利用向达先生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其所据原本为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 North-Western China1933年伦敦出版。这是斯坦因在美国所作关于他三次中亚探险的概要讲演稿有关藏经洞的记载较上述两书要简单得多。以下主要利用斯坦因的正式报告Serindia辅以Ruins of Desert Cathay。

〔2〕伯希和P. Pelliot《敦煌石室访书记》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506页陆翔译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5期1935年7—8页。持伯希和说者有翟林奈L. Giles《敦煌6世纪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的汉文写本简记》Six centuries at Tun-huang, a short account of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伦敦1944年5页苏莹辉《跋黑城所出西夏时写本佛教偈名卷子》《敦煌论集续编》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231—240页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及其封闭》《文物》1980年第6期61—62页。

〔3〕藤枝晃Akira Fujieda《敦煌写本》The Tun-huang Manuscripts《中文史料论集》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堪培拉1973年128页又《敦煌“藏经洞”的一次复原》Une reconstruction de la 'bibliothèque' de Touen-houang《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第269卷1981年65—68页魏英邦译载《敦煌学研究》《西北师范学院学报》增刊1984年96一97页。

〔4〕方广锠《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213—223页。

〔5〕《西域考古图记》二813页。

〔6〕同上书807—830页。

〔7〕方广锠《8—10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51页据《敦煌吐鲁番文物》香港中文大学博物馆1987年一书转载的这幅照片正确地指出了“图面上是一帙帙包卷着的经卷”并确定了“照片上的那帙是《摩诃般若经》第二帙”。遗憾的是他把这幅照片当作是

伯希和所摄见所撰《敦煌经帙》1992年敦煌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房山第4页从而忽视了它在研究敦煌藏经洞封闭问题上的价值。

〔8〕后来各种语言专家对这些文献的解读进一步肯定了斯坦因从外观所确认的价值。Ch.0079.a见E. Conze, "Preliminary Note on a Prajñāpāramitā Manuscrip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50, pp.32—36; Ch.00275见S. Konow, "The Vajracchedikā in the old Khotanese version of Eastern Turkestan",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vol. Ⅰ, ed. by A. F. R. Hoernle (Oxford 1916), pp.214—288, pls. Ⅴ-ⅩⅣ; Ch.c.001是由六种文献组成的密教经典集见田久保周誉《敦煌出土于阗语秘密经典集之研究》东京1975年及R. Emmerick,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 (Tokyo 1992), pp.21—22; Ch.0015见A. von Le Coq, "Dr. Stein's Turkish Khuastuanift from Tunhua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1, pp.277—314李经纬《古代维吾尔文献摩尼教忏悔词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3期57—78页。

〔9〕《西域考古图记》二814页注2836页注13。

〔10〕同上书824—825页。

〔11〕《西域考古图记》二814页注2。

〔12〕这些精美的绘画大部分发表在《西域考古图记》四图版LVI-XCIX斯坦因《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古代佛教绘画》The Thousand Buddhas: ancient Buddhist paintings from the cave-temples of Tun-huang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China伦敦1921韦陀R. Whitfield《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The Art of Central Asia: 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东京1982—1984年。

〔13〕伯希和《敦煌石室访书记》509—529页陆翔译本6—27页。

〔14〕《敦煌石室访书记》译本26页。1909年伯希和曾带着这件经帙和其他一些文献精品来到北京出示给中国的士大夫们。罗振玉等人不仅抄录了大量文献材料也记下了这件经帙见罗振玉《敦煌石室秘录》《考古学零简》商务印书馆1923年40页。王仁俊曾将背面贴的告身录入他编的《敦煌石室真迹录》1909年刊。

〔15〕参看L. Fergere《伯希和在敦煌收集的文物》The Pelliot Collection from Dunhuang《东方》Orientations1989年3月号41—42页杨汉璋汉译文载《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46页图版29—30。

〔16〕见卫聚贤《敦煌石室》一文及其所附敦煌县档案载《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6年24—2537—39页。当时那些藏文写本已被移到另一个洞窟迟到1919年才作出妥善保管见上文40页所附敦煌县档案这些藏文本后来主要归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敦煌研究院收藏见敦煌县博物馆荣恩奇整理编《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1986年541—542页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59—63页。

〔17〕吉川小一郎《支那旅行》《新西域记》下卷所收的有关记载已摘入井之口泰淳《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大谷探险队搜集敦煌古写经》《佛教学研究》第39、40号1984年181—183页贺小平汉译文载《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58—60页。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二830页。

〔18〕斯卡奇科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1992年109—117页孟列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资料研究》同上杂志119—128页。

〔19〕斯坦因记载了在路上遗失的情形见《西域考古图记》二829—830页进京后的情况见饶宗颐《京都藤井氏有邻馆藏敦煌残卷纪略》《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1000—1001页。

〔20〕中田笃郎编《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京都朋友书店1989年53—155页有缀合文书一览又《敦煌大藏经》编辑委员会编纂的《敦煌大藏经》台北1989—1991年各卷的校勘记也有一些写本的缀合记录可以看出北图藏卷被撕裂的情形。

〔21〕全卷录文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1979年514—516页。方广锠研究了此卷所记佛经部分见所著《8—10世纪佛教大藏经史》96—106、309—310页。侯锦郎研究了此卷所记佛像部分他注意到了这些不堪使用的佛像并且提醒人们这份寺院财产账与藏经洞中的文物的相似性见所撰《敦煌龙兴寺的器物历》Trésors du monastère Long-hing à Touen-houang《敦煌学新探》Norvelles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巴黎1981年149—168页耿升汉译载《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77—95页。

〔22〕土肥义和编《斯坦因敦煌文献及研究文献中业经引用介绍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Ⅱ东洋文库1966年33—55页著录了当时见到的这类文书。梅应运《唐代敦煌寺院藏经之情形及其管理》《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12期1970年173—179页、冈部和雄《敦煌藏经目录》《敦煌与中国佛教》《讲座敦煌》第7卷1984年297—317页、京户慈光J. Kyoto《敦煌佛教写本研究——分类与方法》A Study of the Buddhist Manuscripts of Dunhuang: classification and method《壬生台舜博士颂寿记念佛教的历史与思想论集》东京1985年17—70页、方广锠《8—10世纪佛教大藏经史》等对此类文书都有引用、论说可以参看。

〔23〕施萍亭《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185—187页。敦煌研究院藏卷的部分图版刊布于敦煌研究院编《敦煌》江苏美术出版社与甘肃人民出版社合刊1991年新0329号写本原为大谷探险队收集品其全卷照片载井之口泰淳等编《旅顺博物馆旧藏大谷探险队搜集敦煌古写经目录》图版编龙谷大学西域出土佛典研究班1989年刊图56—76录文并研究见小田义久《敦煌三界寺的见一切入藏经目录考》《龙谷大学论集》第434.435合并号1989年555—579页。

〔24〕这两件文书之属于道真系据施萍亭《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195页。

〔25〕关于这一点参看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前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

〔26〕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文物》1978年第12期21—33页。

〔27〕按史籍只记有写本藏经赐给沙州见《宋会要》蕃夷五瓜沙二州条景德四年闰五月“诏益州写金银字经一藏赐之。”尚未见颁赐刻本的记载。

〔28〕见《俄藏敦煌文献》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21—322页。

〔29〕翟林奈L. Giles的目录《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伦敦1957年著录了写本的长度和首尾完整情况可惜常常被人们忽略。

〔30〕《敦煌大藏经》共63册前60册是汉文部分台北前景出版社1989—1991年出版。

〔31〕英国所藏已经发表的经帙见韦陀《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第3卷东京1984年图版6—7286—288页Ch.xlviii.001, Ch.xx.006法国所藏见里博K. Riboud与维亚G. Vial《集美博物馆和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纺织品》Tissu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es au Musée Guimet et a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Mission Paul Pelliot ⅩⅢ巴黎1970年图版134123039434587pp.3—2669—71145—155201—207221—228231—235369—370 编号为EO.1200EO1208EO1209/1EO3664EO.1199EO.1207EO.3663MG.23082MG.23083。

〔32〕1994年8月笔者借参加敦煌学国际研讨会的机会得以浏览一些敦煌研究院所藏文献和文物其中包括两件麻布经帙。一件长宽为50×50cm一角题“宝女所问经等帙殷”一件为48×49cm一角题“正法念处经第三帙美”。据《开元录释教录略出》《宝女所问经》正是千字文

编号“殷”字号的第一部经而“美”字号应是《正法念处经》第四帙或系佛僧误写“四”为“三”。这两件经帙因为没有什么艺术价值而被斯坦因和伯希和所弃辗转流传而最后为敦煌研究院收藏。我们也可以由此想到一些被认为是无用的麻布经帙或许早已不存在了。

〔33〕韦陀《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贾里觉、秋山光和编《西域美术——集美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Les Arts l' Asie Centrale: Pelliot collection au Musée Nationale des Asiatique-Guimet2卷东京讲谈社1994年。

〔34〕方广锠《关于敦煌遗书北新八七六号》《九州学刊》第6卷第4期1995年敦煌专号。

〔35〕G. Uray, "L' emploi du tibé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É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à la domination tibétaine", Journal Asiatique, ⅪⅩ, 1981, pp.81—90; idem, "New Contributions to Tibetan Documents from the post-Tibetan Tun-huang",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4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Schlosse Hohenkammer-Munich 1985, München 1988, pp.515—528; T. Takeuchi, "A Group of old Tibetan Letters Written under Kuei-i-chun: a preliminary study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old Tibetan letters", Acta Orientalia (Hung.), XⅣ, 1990, pp.175—190.

〔36〕拙稿《公元10世纪沙州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文化交往》《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583—603页又《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60—72页又《于阗王国与瓜沙曹氏》《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111—119页张广达、荣新江《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284—306页。

〔37〕以上邈真赞文见饶宗颐编《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

〔38〕施萍亭《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142—155页。

〔39〕敦煌文物研究所《新发现的北魏刺绣》《文物》1972年第2期54—59页又《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它》《文物》1972年第12期55—67页。

〔40〕斯坦因在写《西域考古图记》时更强调公元11世纪初叶封存说见《西域考古图记》二820页827页。在封闭年代问题上藤枝晃《敦煌“藏经洞”的一次复原》、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10页、方广锠《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之我见》第34届亚非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香港1993年8月也都主张11世纪初叶说。白滨《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一文对伯希和的说法反驳最有力。

〔41〕参看华涛《喀喇汗朝王室族属问题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期1989年107—116页又《萨图克布格拉汗与天山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10—23页。

〔42〕贝利H. W. Bailey《尉迟输罗与大王》Srī Visa Sūra and the Ta-Uang《泰东》Asia Major新辑New series第11卷第2期1964年17—26页。

〔43〕北宋元丰元祐间的青唐羌首领阿里骨原本是于阗人见《宋史》卷四九二《外国传》。推测也是属于东逃的于阗人后裔。参看铃木隆一《青唐阿里古政权的成立与契丹公主》《史滴》第4号1983年35—50页。

〔44〕参看拙稿《于阗王国与瓜沙曹氏》《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118页。

〔45〕关于这场残酷的战争对于阗的毁灭参看殷晴《关于大宝于阗国的若干问题》《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241—258页。

〔46〕藏经洞门所在的第16窟甬道北壁壁画的年代有宋初和西夏早期的不同说法。原画见《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118。贺世哲《从一条新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83—86页考订为1002—1014年所绘与本文结论略合。同时请参

看西夏说的代表性观点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294—295页。我倾向于前者的看法。根据一般的看法西夏早期壁画与宋代曹氏晚期壁画有许多相似点参看刘玉权上引文294页。

〔47〕罗斯E. D. Ross《关于西部摩尼教与吐鲁番发现的注记》Note to Legge, "Western Manichaeism and the Turfan Discoveries"《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3年号81页。

〔48〕韩廷顿J. C. Huntington《关于敦煌藏经洞或洪䛒影窟的问题》Note on Dunhuang Cave 17, 'The Library,' or Hong Bian's Reliquary Chamber《东方艺术》Ars Orientalis第16卷1986年93—101页。

〔49〕《西域考古图记》第二828—829页P. Pelliot, "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506、529页陆翔译《敦煌石室访书记》8、27页白滨《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351—353页刘永增《回鹘文写本与莫高窟第二藏经洞》《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40—44页。最近出版的耿升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380—390页详细记载了伯希和在这所元代窟及相邻的伯编182窟中进一步发现的元代文书。

〔50〕罗斯E. D. Ross《千佛洞》The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3年号434—436页罗纳-塔斯A. Rona-Tas《关于敦煌收集品年代的简要注记》A Brief Note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Tun-huang Collections《匈牙利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 Hung.第21卷1968年313—316页韦陀《西域美术》第2卷183、347页。

〔51〕谭真《从一份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36—39页。

〔52〕毕素娟《辽代名僧诠明著作在敦煌藏经洞出现及有关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8—19期1992年133—139页。

〔53〕陈祚龙《敦煌学园零拾》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65—68页又《敦煌学林札记》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247—248页。

〔54〕李正宇《敦煌遗书宋人诗辑校》《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47页。

〔55〕《敦煌汉文写本目录》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第4卷巴黎1991年297页于此件年代未作考订。郑阿财《敦煌写本□呼吸静功妙诀□试论》《敦煌学》第19辑1992年111页云此件抄写年代“恐怕为晚唐五代甚至晚到北宋初期。”

〔56〕北京图书馆藏收字4号写本正面为北京石壁沙门傳奥述《梵纲经记》背面为《至道元年995道猷状》参看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61—962页。

〔57〕按佛牙也不等于真身参看荣新江《法门寺与敦煌》《’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66—75页。

〔58〕孟列夫等编《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一卷353—354页第二卷409—410页。前者原卷图版载《俄藏敦煌文献》第四册299—305页。

〔59〕马伯乐H. Maspero《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伦敦1953年230页。

〔60〕荣新江《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论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250—253页图版XVIII-XIX。

〔61〕戴密微P. Demiéville对此卷比定已表示怀疑但他未见原件文字故不知为何书断片见《敦煌学近作》Récents travaux su Touen-houang《通报》T'oung Pao第56卷1970年2页注1耿升译载《敦煌译丛》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2页注①。

〔62〕荣新江《敦煌本禅宗灯史残卷拾遗》《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232—235页。

第五讲　敦煌宝藏的收藏与整理

敦煌藏经洞的宝藏因为没有及时被学术界发现而整体收藏造成了流散世界各地的悲惨命运主要的收集品集中在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和北京还有大大小小的收藏分散在中国、日本、欧洲、美国公私收藏者手中给研究者造成极大的不便。

以下简要介绍比较重要的敦煌文献的收集品和整理情况。

一　斯坦因收集品

斯坦因收集的敦煌文献和文物主要收藏在伦敦的英国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英国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

英国博物馆又译作大英博物馆、大不列颠博物馆、不列颠博物馆是英国的国家博物馆也是全世界收藏东西方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其所藏大量的中国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等地出土的文献和文物主要来自于“斯坦因收集品”Stein Collection。

“斯坦因收集品”是指1900—1916年由匈牙利裔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M. A. Stein1862—1943在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收集的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文献和文物其中包括敦煌文献和文物[1]。

斯坦因所获得的庞大收集品陆续运到英国后按照资助他中亚之行的印度政府和英国博物馆、印度事务部之间签署的分配方案文献部分凡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材料归英国博物馆保存凡于阗文、龟兹文、藏文材料归印度事务部保存梵文写本用佉卢文书写者归前者用婆罗谜文书写者归后者。其他文物材料如绢画、刺绣、木板画、陶器、木雕、钱币等等在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和英国博物馆之间平分。于是斯坦因收集品的考古文物材料入藏于英国博物馆的东方古物部Department of Oriental Antiquities文献材料入藏于东方印本与写本部。1973年英国图书馆独立后文献材料转归英图参考部入藏于英国图

书馆东方写本与印本部Department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英博所藏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绢纸绘画是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精华之一。早在1921年斯坦因本人就选取其中的精美绢画四十八幅用彩色和黑白照片影印辑成《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一书在伦敦出版[2]。在1918年英国博物馆和印度中亚古物博物馆瓜分这批美术品之前任职英国博物馆的魏礼Arthur Waley1889—1968编成《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1931年伦敦出版[3]。该书编成时这批绘画品的分配方案已经出笼所以该目录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英国博物馆藏品目录第二部分为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藏品目录总共著录绢纸绘画、板画、刺绣等五百余件对每一件绘画品的内容作详细描述抄录上面的汉文题记并译成英文还简记其颜色、质地、大小以及研究文献。在很长时间里魏礼的这本目录是我们研究敦煌绘画时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此后留存英国博物馆的部分美术品由韦陀Roderick Whitfield做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编成《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共三卷1982—1984年由英国博物馆和日本讲谈社联合在东京出版[4]。这部巨著选印了现在主要藏于英国博物馆和少量藏于英国图书馆的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所得绘画品、染织品及其他考古遗物的精品。第一卷为敦煌绢画按佛传图、菩萨像、金刚力士像、天王像的顺序排列第二卷为敦煌10世纪的大幅绢绘以及纸画和木板画第三卷为染织品、雕塑、壁画等除敦煌发现者外也有新疆各地的收集品。每卷有导言、彩色图版和附有黑白照片的文字解说印刷极为精美是斯坦因收集品的重要资料集。由于使用了先进的照相仪器所以本书的图版甚至较原物清晰这是我1985年带着这部书在英国图书馆的敦煌绢画库房中对比时得到的印象。

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等材料编为Or.8210—8212三个总号。在将三次考察所获文献编号时似乎按照语言和出土地点大体上作过一些归类。

Or.8210主要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汉文写本和印本此后又用缩写S.Stein number“斯坦因编号”中文作“斯”1—13677号和P.Printed books印本1—20号具体标示每一件文献。S.编号虽说著录的主要是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从敦煌藏经洞取得的汉文写本和印本但也有一些斯坦因第一、三次考察得自新疆和田和吐鲁番等地的文书混入其中如S.5862—

58726964—69729437946411585l1606—1160912597号等甚至还混入霍恩雷的中亚收集品如S.9222—9225号。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就容易误用史料。另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从王道士手中又获得的570件写本也编入其中。

其实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翻捡藏经洞文献时没有时间现地编目只是用Ch.Ch.系Ch' ien-fo-tung“千佛洞”的缩写下的一个小罗马数字如i,ii,iii,iv...表示包裹经卷等材料的包袱号。遗憾的是这些整包整包的收集品入藏英国博物馆以后由负责编目的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又译作翟理斯或小翟理斯重新编在S.号下而废掉原有的Ch.号。此外在大约1920年前后翟林奈曾经把原编的S.号重编了一遍以至于在此之前抄录的一些文书的编号与今天所用者不同。如矢吹庆辉提供给《大正新修大藏经》的许多S.编号写本的号码就是用的旧编号不注意这一点常常会将一件文书看成两件。另外S.编号的写本原来只有八千余件1953—1954年英国博物馆制作缩微胶卷时编号只到S.6980还有未编目的两千余件没有包括在内。近年来英国图书馆修复部又陆续从敦煌绢画、写经、经帙等已编号文物或文献上揭出许多残片在总编号后顺序增加截止到1991年8月我离开伦敦时已编到13677号。一般来讲S.编号的写本不论长短一纸一号但揭自经帙或绢画的写本残片往往较多于是在一个号下各残片又细分为A,B,C,...如S.6998AS.6998B等。相对而言S.6980以前的写本较为完整有不少长达十米以上而S.6981以后的写本较残大多数为一两尺长还有许多只有巴掌大小最后百余件实际只有一个或半个字。有些学者总想确切统计出敦煌写本到底有多少件或者想比较哪一处藏家藏品最多我以为这都是无法做到的从斯坦因编号文书来看有的一件长卷比一百件碎片的分量还要大它们是无法用编号多少来比较的。

S.编号的敦煌藏经洞出土汉文文献内容丰富很早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在公布S.1—6980的缩微胶卷之前能够大量使用这部分材料的学者很少。从1919年就开始负责这些写本整理工作的翟林奈得天独厚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在这部分写本的编目和研究上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1957他所编的《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图1方才由英国博物馆董事会出版[5]。

(N. 1177; K. XXI. 3; T. 1602)

4294. 顯揚聖敎論 *Hsien yang shêng chiao lun*, ch. 15 (begin.). See 2898 (2).

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śāstra

(N. 1178; K. XXI. 4. b; T. 1605)

4295. 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 **Ta shêng a p'i ta mo tsa chi lun*, ch. 13. Begin. slightly mtd. Good MS. of 7th cent. Pale yellow paper. 22¼ ft.
S. 3346.

Mādhyamika-śāstra

(N. 1179; K. XXI. 4. b; T. 1564)

4296. 中論 *Chung lun*,* [ch. 1,] p'in 1, 2. Fairly good, slightly cursive MS. 18 numbered strips of thick buff paper, pierced for string. 30·5 × 8·5 cm.
S. 5607.

4297. [*—*] ch. 1, p'in 2 (end only), 3. Mediocre MS. of 5th cent. *Verso*: [提婆菩薩傳 **T'i p'o p'u sa chuan**.] Life of Deva-bodhisattva (N. 1462 with some omissions and variations.) Handwriting of 5th cent., careless to good. Good buff paper, ruled on both sides. 3 ft. S. 3286.

4298.*—*ch. 2 [= 3], p'in 15 (end only)-ch. 4, p'in 26. 57 loose strips, 30·5 × 8·5 cm., pierced for string. With separate foliation for each ch. Colophon at end of ch. 2: 己亥年七月十五日寫畢三界寺律大德沙門惠海誦集[? for 訖]乙未年正月十五日三界寺修大般若經兼內道場課念沙門道眞兼

图1 《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书影

翟林奈的目录著录了斯坦因敦煌收集品中的S.1—6980和Or.8212/1—195中的少量敦煌汉文写本以及P.1—19号印本按翟氏的分类统编为G.1—8102号。其分类是先把全部资料分为佛教文献、道教典籍、摩尼教经、世俗文书和印本五类。佛经部分先按南条文雄《大明三藏圣教目录》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排列然后分十四项收藏外文献。道教典籍分作十项著录《道德经》、《列子》、《庄子》、道经及《道藏》外文献和医药、占卜、日历

等。世俗文书分为二十二项1儒家典籍2史籍3地志4诗歌杂曲5故事与传记6各体文章7诏敕榜文8奏疏牒状9书翰、书仪及官府报告10契约、法律文书11社条与社司转帖12入破历、账簿13算书14语汇、辞书、字书15僧俗名簿、氏族谱16户籍17寺院什物历18藏经目录19杂器物历20习字21绘画、图表22双语写本。对每号写本或印本著录其新编号、汉文名称及威妥玛式转写、卷数与品第、汉文题记并英译以及书法、纸色纸质、长度最后是斯坦因编号。附录有专名索引及S.编号与翟氏新编号对照表。这本目录采用分类编目的方法对佛典的比定和归类成绩很大但对世俗文书的分类则欠妥当。由于编者长年据原卷编目所记写本外观及一些朱笔或红印在缩微胶卷上不易看出所以尤堪注意。

与翟目的出版几乎同时S.1—6980的缩微胶卷也陆续运到中国和日本。刘铭恕根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新收到的胶卷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编成《斯坦因劫经录》收入《敦煌遗书总目索引》[6]。刘目按S.顺序号著录到6980号未及印本。除题名外还抄录了题记和一些编者以为重要的文书在说明一项中提示一些研究心得。与翟目相比刘目的项目要少由于时间仓促佛典道经的比定工作不如翟目但在四部古籍和一些世俗文书的考订上颇多贡献。

日本学者在接到胶卷后以东洋文库为中心成立了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负责编印敦煌文献的分类目录先后油印了四本。

1池田温、菊池英夫编《斯坦因敦煌文献及研究文献中业经引用介绍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Ⅰ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Ⅰ1964年11月东洋文库印行。此目是对斯坦因敦煌文献中官文书所编的分类目录附以当时从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到的其他资料内容共八类①诏敕类写本②律令格式③告身④度牒⑤公验、过所⑥有关中原的表文⑦有关敦煌的表文⑧诸官府文书。其中第⑧项内容最丰富包括中央尚书省各部文书、地方各级官府文书如牒、状、账簿、诉状、判辞、户籍、计帐、有关田制、税役制、军制的文书等等每条除著录编号、名称、首尾存欠、行数等情况外还著录有关这件文书的研究论著索引有些还抄有文书内容。附录有研究文献目录和文书编号索引。

2土肥义和编《斯坦因敦煌文献及研究文献中业经引用介绍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Ⅱ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Ⅱ1967年3月印行。此目是对斯坦因敦煌文献中寺院文书的分类著录内容分寺院行政和寺院经济两类。前者包括告身、任职书、度牒、戒牒、寺院行政文

书、僧尼籍、写经勘经历、付经转经历、经藏点勘及补充目录、追福疏等后者包括什物历、诸色入破历、贷便契约、出便历等。每条著录编号、名称、行数、年代、内容提要、参考文献等后附9世纪写经校勘人一览表、参考文献目录、文书编号索引。

3吉冈义丰编《斯坦因所获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目录——道教之部》1969年3月印行。此目按三洞、四辅、《道藏》未收古佚、其他经名不详四部分来编排敦煌道教文献每条著录斯坦因和翟林奈编号、名称、首尾形态、行数、与《道藏》对应及异同情况、题记、研究论著等后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四件道教写本目录。

4金冈照光编《敦煌出土汉文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1971年3月印行。由于敦煌文学作品的发表较早而且研究也较深入本目录除斯坦因本外也收录大量的伯希和本。全书分目录和解说两部分目录分为1讲唱体收讲经文和变文两类2散文体收俗文、对话体、小说三类3韵文体分长歌、短篇歌咏、押座文、赞文佛曲、曲子词、定格联章、通俗诗、杂诗赋、诗文等九类每件作品著录其编号、名称、外观、年代、题记、正背其他内容及作品内容、形式、出典、字体、可与之缀合的文献、研究文献等附有编号索引。解说部分主要是对分类问题加以说明阐述敦煌文学文献的文学形态和分类方法。

以上四种东洋文库目录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由于所编都是佛典之外极富研究旨趣的社会经济文书和道教、文学典籍而且分类编排附有详备的每件文献的参考文献所以很受学界好评。现在看来有些部分已经过时如道教一册其主要内容已为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1978所取代但其他几册仍有参考价值。

英藏敦煌文献的编目整理是个漫长的过程。1986年黄永武编《敦煌遗书最新目录》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黄氏为了编辑《敦煌宝藏》大型图录对敦煌写本的编目下了不少功夫先是发表了一系列补正前人编目缺失的单篇文章以后汇总在《敦煌宝藏》各册的标目和这本与《宝藏》配套的《最新目录》中。黄目只有标题而没有提要或其他内容应当说它主要是一部配合《敦煌宝藏》使用的工具书而不是一本完整的目录。对斯坦因部分按编号顺序著录了S.1—7599和碎片1—197及印本P.1—19号。其中S.6981—7599号是黄氏据缩微胶卷新编的目录曾以《六百号敦煌无名断片的新标目》为题发表在《汉学研究》第1卷第1期1983上而所谓197件碎片实系Or.8212编号下的文书多为斯坦因

第三次中亚考察在吐鲁番、和田、黑城子等地所得而非敦煌文献本不应阑入。黄目在世俗文书的标目上一仍《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其进步在于佛典和部分四部书的比定上。但对于他的比定也需要做核实工作。

另一本新编的目录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敦煌学研究小组编《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共三册[7]。此书是在翟目、刘目、黄目的基础上对S.1—7599所做的分类目录。全书依四库分类法排列唯宗教典籍另外分类不入子部。写本最多的佛典按《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次序编排经律论后为三藏外其他佛典、纂集、杂抄、杂咒、不知名佛典、三阶教文献佛典后为道教、摩尼教文献最后附图像、残杂和其他材料。对每一件写本著录其书名、作者、斯坦因编号、卷子长度、纸色、全文完缺情况及起讫句有题记者则照录全文后为说明记录同卷其他情况或对写本年代、内容略加考订。书后附人名、年号、寺名、地名、俗字、缺笔字、武后新字索引和斯坦因编号与本书编号对照表。本书晚出在四部古籍的考订上有所贡献且分类编排便于研讨但通观全书并未能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

如上所述斯坦因编号的文书已到S.13677号。1991年2—8月英国图书馆邀请方广锠和我去做S.6981—13677号的编目工作方广锠负责佛教文献我负责非佛教文献。我所编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一书1994年7月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此目除标题外包括对外观、内容、专有名词、题记、朱笔、印鉴、杂写、年代及与其他写本关联情况的提要凡能找到的有关该号写本研究的文献和图版均予著录。目录按编号顺序排列后附分类索引。《前言》概述了残卷来源和写本的价值。此目实为继续翟目的成果之一。然如前所述这一部分的残片大多没有首尾和题名而且所存文字极少比定工作十分艰难图2拙编目录只能说是一个初步的整理结果为学界提供这些残卷的一些线索某些古籍的比定和研究尚有待方家。2000年我已经把自己和其他学者对这些残片的陆续比定结果和改订意见汇总发表是使用拙编目录者所必须参考的[8]。佛教文献部分数量较多比定不易直到最近方广锠编著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方才出版[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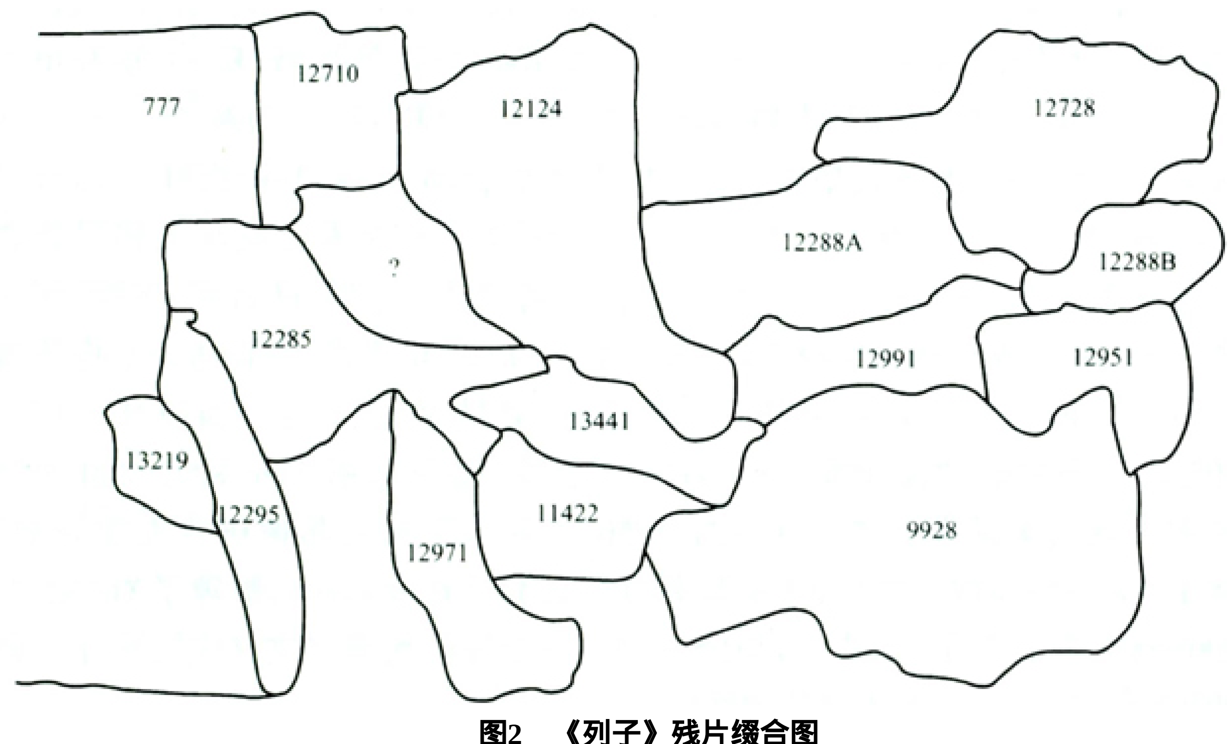


图2 《列子》残片缀合图

S.1—6980号的缩微胶卷自50年代末公布以后为学界广泛使用。黄永武编《敦煌宝藏》140册1981—1986年由新文丰出版其第1—55册收载S.1—7599及上述断片和19件印本。此书系据缩微胶卷翻拍制成图版所以图版质地不够清楚有时需要核对胶片。自1990年开始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15卷本《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刊布S.1—13677号中的所有汉文佛经以外的文献[10]。此书图版系根据从原卷拍照的底片制成较为清晰但定价颇昂流布不广书中的题名反映了历年来学术界对英藏敦煌文献的研究成果但仍有不少问题[11]。

Or.8211/1—3326号主要是斯坦因第一次考察所得但也有第二次考察所获敦煌汉简和其他遗址出土的各种语言文献。在利用这组文献时除了Or.8211/1—3326这种博物馆编号外还应标明斯坦因的原始编号以便了解其来历如T.编号指敦煌烽燧出土汉简N.表示尼雅出土佉卢文书M.T.或M.Tagh.表示和田麻札塔格出土文献。L.A.或L.B.指楼兰遗址等等。其中Or.8211/1—991主要是斯坦因第一、二次中亚考察所得汉晋时代的木简或木牍由沙畹整理发表于《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中[12]。

Or.8212/1—1946的情形与Or.8211类似主要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献但也有不少第一和第二次所获文书。这一部分标示的主要

出土地点的原编号Ast.指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Bal.指和田巴拉瓦斯特遗址Ch.指敦煌藏经洞Domoko指策勒达玛沟Kao.指高昌故城Khad.指和田卡达利克遗址K.K.指喀喇浩特古城LA.LB.LC.LE.LF.LL.LM.等指楼兰一带遗址M.Tagh指麻札塔格古堡T.指敦煌长城烽燧Toy.指吐峪沟石窟寺Yar.指交河古城等等。Or.8212/1—195号是民族语言或汉文和民族语言文字混在一起的写本文字有梵、佉卢、藏、粟特、于阗、吐火罗、突厥、回鹘和汉文出土地点有敦煌藏经洞、敦煌长城烽燧、吐鲁番、和田等地许多极具研究价值的文书都在其中如著名的“粟特文古信札”Or.8212/92—101。以下Or.8212/196—199为预留空号迄今未用。Or.8212/200—855是木简或纸本汉文文书。Or.8212/856以下是汉文或其他语言文字资料。除了Or.8212/417—477号木简碎片外马伯乐H. Maspero整理了Or.8212/200—855汉文文书编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得汉文文书》由于二战的原因迟到1953年才由英国博物馆出版[13]。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创建于1801年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保存该公司和其他人士所获得的东方书籍和写本而设立的后归英国印度事务部管理。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后该馆又归联邦对外关系部所属同时成为对公众开放的专业图书馆。1982年该馆转归英国图书馆参考部管理。1991年与英国图书馆东方部合并为东方与印度事务收集品部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但藏品仍独立收藏在不同的部门而且研究成果也与原英图藏品有别所以仍独立介绍于此。

敦煌藏经洞和新疆米兰、麻札塔格三处出土的古藏文写本是最具研究价值的藏品之一。早在1914年斯坦因就邀请比利时佛学家瓦雷·普散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 1869—1937为敦煌藏文写卷编目。普散生前编好了765号藏文佛典的目录但迟到1962年他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才出版[14]。编者将这批写本分作十类一、律二、经及注疏可考梵文名称者三、经译自汉文或可考藏文名称者四、经及注疏未比定者五、怛特罗文献可考梵文名称者六、怛特罗文献比定而无梵文名称者七、怛特罗文献未比定者八、论可考名称者九、论未比定者十、藏人著述。对每件写本均转写其首尾一行并给出相应的刊本及研究文献出处。书后附榎一雄所编汉文写本目录著录了136件写在藏文或于阗文背面的汉文文献共分八类一、佛经名称可考者二、佛经未比定者三、佛教文献和文书四、道教文献五、世俗文书六、杂文七、

藏文或婆罗谜文音译汉文文献八、藏、汉文字音译梵文经典。编者给出每件写本的斯坦因原编号、普散目录的编号、写本外观描述、汉文文书行数在内容上给出写本名称有的佛经附有梵文名称佛典则注明南条文雄目录的编号和《大正藏》的号、卷、页、行世俗文书则尽量抄录全文。

瓦雷·普散的目录只著录了敦煌藏文佛典非佛教文书则由1903—1927年任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长的托玛斯Frederick William Thomas 1867—1956负责整理工作。在该馆所藏手稿中有托玛斯编写的《斯坦因第三次考察所获藏文文书目录草稿》但始终没有正式的目录出版。托玛斯将他的整理研究成果发表在一系列文章中后辑为《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一书。其第一卷1935年伦敦出版主要是从藏文大藏经中辑录并翻译的有关于阗的史料其中《于阗国阿罗汉授记》一种参照了两件敦煌藏文写本附录是伯希和所获敦煌藏文写本P.t.960《于阗国教法史》的译注。第二卷1951年出版分七类刊布敦煌、新疆出土的藏文世俗文书即一、阿豺即吐谷浑二、沙州地区三、罗布泊地区四、于阗地区五、突厥六、政府与社会状况七、吐蕃军队包括转写和译注这虽然不是斯坦因所获藏文世俗文书的全部但精华部分集中于此。由于敦煌古藏文的研究进步很快作者的第三卷是对前两卷的订正和补充后附藏文词汇索引和编号表还有少量图版1955年出版。作者去世后由孔兹E. Conze所编的主题、梵文、藏文专有名词三种索引作为本书第四卷于1963年出版[15]。此外托玛斯还出版了《东北藏区的古代民间文学》[16]、《南语——汉藏边境地区的一种古语言》[17]也是他整理敦煌古藏文非佛教文献的结果所刊多为重要的文学、占卜和语言资料。

六十年代初榎一雄就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大部分藏文文书的缩微胶卷购回日本收藏在东洋文库。自七十年代中叶开始由藏学家山口瑞凤领导的东洋文库西藏研究委员会以东洋文库所藏缩微胶卷为基础编纂新的目录并陆续派人到伦敦补充东洋文库所没有的材料。1977—1988年东洋文库出版了《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第1—12分册[18]。其中第1—8分册是按瓦雷·普散《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的顺序将该书著录的765件佛典重新编目每件写本著录东洋文库缩微胶卷号、斯坦因编号、该文献的藏文题目用藏文印刷体抄录、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编号及卷页行、对应的汉译本题目、《大正藏》所收汉文本的编号及卷页行、对应的梵文题目用拉丁字母转写、

写本开头和末尾字句的原文抄录、与该文献有关的斯坦因、伯希和藏文写本及研究文献目录若某项缺考则留出余白如第九项全为空白以备读者使用时随时填写。自第9册开始新编顺序号从1001开始著录普散目录未收的藏文写本至第12册止共著录到1518号。而第12册的主要篇幅是据原卷的调查结果对前11册的补正后附《斯坦因搜集敦煌藏语文献各种番号对照表》、《本分册所收文献番号一览表》和《藏汉文书所在一览表》。这部目录有助于人们了解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西域藏文文书的全貌但事实上仍不完全。

在此应当说明一下该馆敦煌写本的编号问题。敦煌藏文写本入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馆方将一部分尺幅较短的写本装裱在报纸大小的硬纸上然后装订成73册每册称为一卷指英文的Volume缩写为Vol.。但不知何因现缺两卷其中的Vol.41最初即不存在而Vol.10则是后来佚失的。每一卷内叶数多少不等每一叶英文folio缩写为fol.分正背两面用a,b表示所以引用这部分文书时一般写作Vol.50fol.25a或Vol.50fol.25b等。实际上大多数写本上都有Ch.标示的原编号也有人引用时只用Ch.编号Vol.与Ch.编号的对照表见《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第12分册。另外瓦雷·普散目录是藏学界长期使用的工具书它所著录的765件藏文佛典有的是Ch.原编号有的是Vol.+fol.编号使用起来不便所以人们引用时常常即用目录的顺序号但顺序号码之前的缩写词则有各种不同的写法有的用I.O.系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缩写有的用VP.,即瓦雷·普散Vallee Poussin名字的缩写有的用S.系斯坦因编号的缩写但这容易与Or.8210号下的S.编号汉文写本混淆现在许多学者用S.t.表示斯坦因所获藏文写本这与伯希和所获藏文写本编号P.t.相类似应较其他缩写更好。至于榎一雄编目部分的汉文文书一般就用榎氏所使用的C.1—136号。

二　伯希和收集品

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的东方写本部La Section Orientale du Departement de Manuscrits收藏着丰富的敦煌西域文献它们主要是伯希和Paul Pelliot中亚考察队的收集品。

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材料全部用伯希和的名字Pelliot标号简作P.中文简称“伯”。各种文字资料又按语种大致作了分类的编号Pelliot chinois指汉文材料Pelliot tibétain指藏文材料Pelliot ouigour指回鹘文材料

Pelliot sogdien指粟特文材料Pelliot sanskrit指梵文材料Pelliot Si-hia指西夏文材料在敦煌藏经洞等处出土的几种主要语言文献中只有于阗文材料没有单列。

Pelliot tibétain伯希和藏文写本简称P.t.。伯希和最初为敦煌写本编号时在汉文写本的前面为藏文写本预留了2000个号码交巴考Jacques Bacot 1890—1967作具体的编号和编目工作。后来这项繁重的任务由拉露Marcelle Lalou 1890—1969完成。拉露分别在1939、1950和1961年陆续刊出三卷本的《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19]按编号顺序著录藏文写本。计第一卷收P.t.1—849号第二册收P.t.850—1282号第三册收P.t.1283—2216号已经超出当年伯希和预留的2000号。此外还有大量的《无量寿宗要经》和《十万颂般若经》写本拉露认为重复太多而没有编目计自P.t.2217—2224和P.t.3500—4450号[20]。拉露的《注记目录》对每件写本的外观和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记述佛典之外的文献或文书用拉丁字母转写出每项内容的起止词句如有研究成果发表也加以著录前有主题索引便于学者按类查找写本。八十年代初中国获得法藏敦煌藏文文书的缩微胶卷后王尧组织一些藏学研究者以拉露目录为基础参考原卷和后人研究成果编成《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著录较拉露目录为详且有后人研究论著索引附于每号写本之下极便学人[21]。

1978—1979年埃·麦克唐纳和今枝由郎合作编辑了两卷本的《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书选刊》[22]。第一卷从P.t.1—990中选择佛教文献中的发愿文、藏外文献如《罗摩衍那》、《于阗国教法史》等研究价值较高的文献精制成图版影印第二卷从P.t.996—2220中选择世俗文书、史籍、占卜书等非佛教文献如《吐蕃王朝编年史》、《大事记》、吐蕃统治时期及以后的各种官私文书影印出版更富研究价值。法国在七十年代末公布了全部敦煌藏卷的缩微胶卷但我国所得胶卷的藏文部分有许多缺号因此有些重要的文书我们仍要仰仗于这两卷《选刊》况且其图版的质量远胜于胶卷。

Pelliot chinois伯希和汉文写本简称作P.ch.或P.编号为2001—40994500—50435522—6038前面和中间的缺号是留给藏文或其他民族文字材料的有的后来没有使用成为空号即P.4100—44995044—5521号。即使是在属于汉文写本编号当中也有一些缺号情况有些是因为同卷有其他文字而后来又归入其他编号类中有些则是因为缀合的原因而放在

其他号下了。还应说明的是国立图书馆把原来贴在写本上的残片揭下后不是像英国图书馆那样放在整个编号后面而是附在所揭写本之后编作某号的“bis”如P.2675 bis如残片较多则在该号下另编piece 1、piece 2……或piece a、piece b……等。有些卷号原本就由多件纸本组成如P.2222、4514、4518则编号后附有ABCD……。

伯希和汉文写本最早由伯希和本人编目他完成了P.2001—3511号的法文原稿但没有刊布。伯希和以后1932—1933年留学巴黎的那波利贞1934—1939年作为交换学者到巴黎国立图书馆工作的王重民和1951走访巴黎的杨联陞都陆续为敦煌写本的编目作了贡献。二战后在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的推动下法国科研中心组成专门的敦煌研究小组从事敦煌写本的编目和研究。1970年谢和耐J. Gernet和吴其昱Wu Chiyu主编的《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一卷由国立图书馆出版图3这是在上述编目成果以及左景权等人编目草稿的基础上完成的收P.2001—2500号1983、1991、1995年分别出版了苏远鸣Michel Soymié主编的第三、四、五卷分别收P.3001—3500、P.3501—4000、P.4001—6040[23]最近出版的第六卷是著录藏文卷子背面的汉文写本[24]。与已刊敦煌写本目录相比法目著录最详每号内各项内容均一一分别著录。一般是先列标题凡文献类先列汉文原文再作法文转写题目已残者大都考证补出并指出通行印本如《大正藏》、《道藏》、《四部丛刊》中的出处及同类写本编号凡文书类则用法文拟题并有简要提要提示文中的专有名词有题记者译为法文还详记有关该写本的研究文献出处最后是写本尺幅长短、纸质、颜色等物质性描述后附两个索引一是按拉丁字母顺序排列的专有名词索引一是主题分类索引后者分佛教文献、道教文献、诸种古籍和特殊项目四大类前三类又细分为若干小类每小类下列属于此类的写本编号这样就弥补了按编号顺序编目在分类上的缺陷最后一类列出有题记、年代、年号、绘画、其他民族文字、印鉴等专门内容的写本编号第四卷又增加了见于本册目录注记中的其他敦煌写本和洞窟题记的编号索引。本目录无疑是迄今为止已出版的敦煌汉文写本目录中最佳的一种其优点在于著录详尽可以让看不到原卷的人尽可能了解原卷的外观特别是一些缩微胶卷或照片上看不到的红字和朱印其每项内容附有研究文献出处与东洋文库目录相仿虽然不够完备但极便学者使用目录按伯希和编号排列便于检索又用主题分类索引的方式统一作了安排这是目前处理敦煌写本编目的可取方法。

2352

[*Tong hiuan ling pao tch'ang ye tche fou kieou yeou yu kouei ming tchen k'o* 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眞科.]

Déb. et fin manquent; lacune de 33 col. entre les ff. 7 et 8. Quelques var. par rapport à *Tao* 1400, fasc. 1052, 亦 六, f°s 6 a^8-28 b^6.

Titre donné en cours de copie (col. 160) : *Kieou yeou yu kouei tsouei fou yuan touei pa tou chang p'in* 九幽玉匱罪福緣對拔度上品. Pour un texte plus complet du déb., cf. n° 2730, col. 1 à 52.

Cf. *TKDM*, p. 4.

Excellente écr. 22 col. par f., 17 car. par col. Marges sup. 2,5 à 2,7 cm, inf. 2,7 à 2,9 cm. Régl.

Exercices d'écriture sur les car. *t'ie* 鐵, *t'ien* 天 et *sien* 仙 (f. 9, col. 7 et f. 10, col. 12 et 19).

Verso :

[*Fo fa tong lieou tchouan* 佛法東流傳.]

En 1 k., déb. et fin manquent. Comporte 5 *p'in* :
1. *Ming ti mong k'ieou fa* 明帝夢求法 (col. 4 à 17).
2. *Wen fo cheng mie* 問仏生滅 (col. 17 à 33).
3. *Yu tao che pi kiao tou t'o* 與道士比校度脫 (col. 33 à 185).
4. *Ming ti ta tch'en teng tch'eng yang* 明帝大臣等稱揚 (col. 185 à 209).
5. *Kouang t'ong lieou pou* 廣通流布 (col. 210 à 353).

Pour le déb. de ce texte, cf. n°s 3446 R° et 3376 R°. Pour les passages mutilés du *p'in* 1, cf. n° 3446 R°, col. 24 à 42; pour ceux des *p'in* 2 et 3, cf. n° 2626 R°.

Cf. *TKDM*, p. 110.

Au rev. des ff. 18 à 1, 353 col. en tout.
Écr. rapide, car. de taille variable. Rares additions et corrections. 18 à 27 col. par f., 16 à 26 car. par col. Quelques notes en petits car. sur col. dédoublées. Régl. au rev. des ff. 17 à 13, 7 et 6.

图3 《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一卷书影

相对而言伯希和汉文写本中富有研究旨趣的材料较多。遗憾的是七十年代末出售的缩微胶卷质量很不理想许多原卷十分清楚的写本不知为何在胶卷上模糊不清《敦煌宝藏》中的影本更差编者黄永武不得不加放大照片但有时也无济于事。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法国国立图书馆合作出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已经出版13卷[25]影印P.2001—2432号。这部书提供给人们更为清晰的照片。

Pelliot sogdien伯希和粟特文写本共30个号码其中一部分系移自Pelliot chinois 3511—3521号。1940年邦旺尼斯特编成《粟特文献选刊——国立图书馆所藏写本伯希和文库》一书影印刊布了除Pelliot sogdien 4《佛说善恶因果经》之外几乎所有法藏粟特文写卷[26]此书为

粟特文献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同年邦氏还出版了《粟特语文献》一书也是除了《善恶因果经》把法藏粟特文写本一一作了外观概述、拉丁转写、法文译注附有词汇索引[27]。

Pelliot ouigour伯希和回鹘文写本共16个号码有的也是移自汉文写本部分如Pelliot ouigour 12即移自Pelliot chinois 4637有的移自粟特文写本部分如Pelliot ouigour 11即Pelliot sogdien28等等。哈密顿重新整理刊布其中长卷在《敦煌回鹘文写本善恶二王子的佛教故事》一书中1971年巴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出版[28]。哈密顿又把其他各类回鹘文写本一一整理于1986年出版了两卷本的《敦煌9—10世纪回鹘文写本汇编》。该书收集了伯希和与斯坦因所获敦煌回鹘文写本38件缀合成36种文献或文书做了精心的转写、翻译、注释并编制词汇索引影印了全部图版[29]。至于一些较难解读的突厥化粟特文文书则由辛姆斯-威廉姆斯和哈密顿合作整理为《敦煌9—10世纪的突厥化粟特语文书集》一书[30]。

集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一译作吉美博物馆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古物收藏单位。1909年11月当伯希和收集品运回巴黎后计有220多幅绘画品、21件木雕、丝织品残片和画幡、经帙等美术品的主体于1910年入藏罗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其后不久15幅绘画品转存于集美博物馆。1922年又有40幅绢画转入集美。1947年集美博物馆改组为法国国家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Departement des Arts Asiatiques des Musées Nationaux收藏于罗浮宫的所有伯希和所获美术品全部归集美博物馆收藏这里建成三个大展室放置敦煌和新疆发现的画卷和画幡[31]。伯希和收集的绘画精品大都放在展室中公开展览至今人们到该馆参观仍可以方便地饱览这些艺术珍品。

二战后由韩百诗组织一批学者对这些美术品进行系统地分类整理工作其成果编为《伯希和考察队考古资料丛刊》Mission Paul Pelliot. Documents archeologiques。1978年韩百诗去世后这项工作仍由法兰西学院下属的中亚与高地亚洲研究中心负责继续进行。截止到目前已刊的《伯希和考察队考古丛刊》中有关敦煌资料情况如下按卷次先后

第十一卷《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六册旺迪埃-尼古拉和玛雅尔合编[32]。这是伯希和1908年在敦煌时抄录的洞窟笔记图4也是第一份敦煌石窟文字的录文历史文献价值极高现分述各册具体所收伯希和编号洞窟如下第一册1—30窟1980年出版第二册31—72窟1981年第三册73—111a窟1983年第四册112a—120n窟1985年第五册120n—146窟1986年第

六册146a—182窟1992年。伯希和笔记所录的一些文字后来毁掉他的录文成为“孤本”已出版的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一书[33]收入了《伯希和笔记》前三本的录文因此迄今尚没有新的合校本出版。另外此书每一册的后面刊载了所收编号洞窟的照片即1920—1924年伯希和本人刊布过的六册《敦煌石窟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的重印图文对照可省翻捡之劳但个别图版不如二十年代的图版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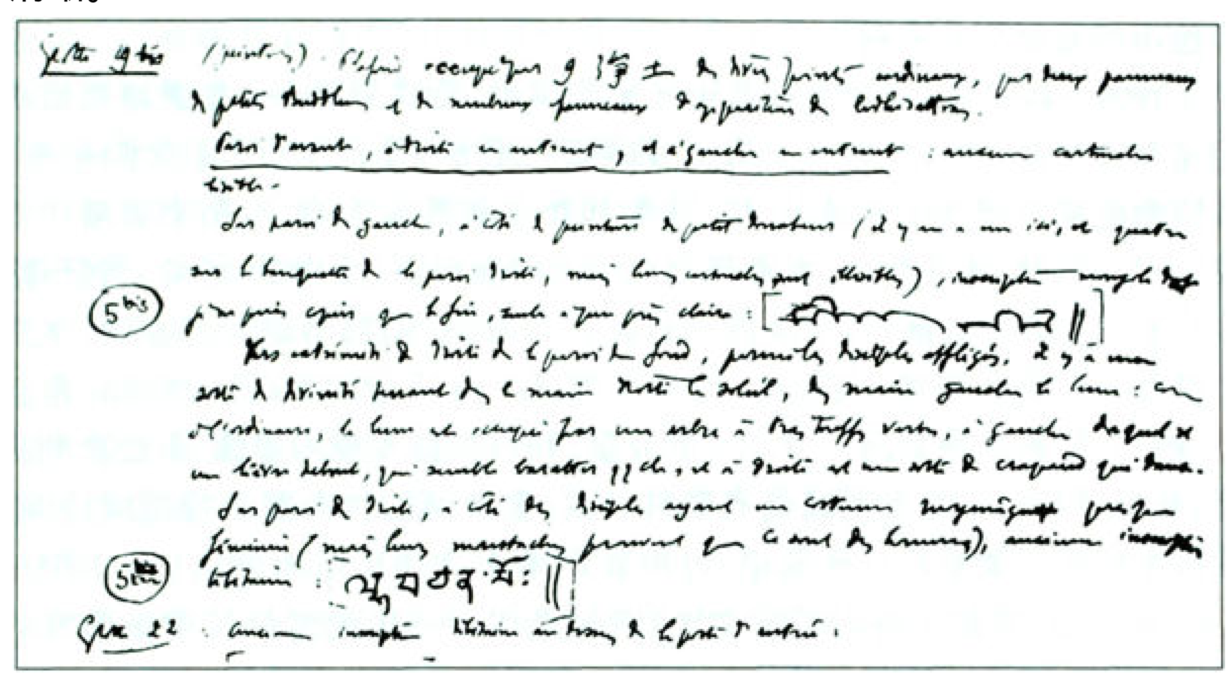


图4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第十三卷《集美博物馆和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丝织品》里博K. Riboud与维亚G. Vial合编[34]。本书主要是研究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丝织品的材料和织法导言之后是丝织品目录共著录了99件对每件物品注记其质地、大小、保存状态、装饰、组织结构和制作情形等项内容。从文献的角度看其所刊布的有些丝织品原件原为藏经洞出土的经帙对于藏经洞文献的整体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第十四卷《集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绢幡绘画》解说尼古拉-旺迪埃编[35]。本书系整理伯希和敦煌所获绢幡绘画的结果之一共著录216号总220幅作品。绘画品分佛像、菩萨像、天王力士像、高僧像和其他形像五类加以记录注记的内容包括原编号、名称、质地、长宽、时代、内容概述、保存状态、有关注记和参考文献目录。画上的汉藏文题记做了部分录文和翻译。

第十五卷《集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绢幡绘画》图版韩百诗编[36]。本书与前一卷图版相配合刊布230幅敦煌绢幡绘画照片其中包括一些彩色图版。其排列顺序与解说卷相同两书对照使用是长期以来人们研究敦煌绘画的重要原始资料。

1994—1995年贾里觉和秋山光和合编的《西域美术——集美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两卷本由东京讲谈社出版。此书与韦陀编《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一样分类刊布法藏敦煌绘画全用彩版精印而成。第一卷共99件作品主要是面积较大的佛传图、变相图、佛像、菩萨像。第二卷发表敦煌绘画作品89件也选印一些国立图书馆藏写经插图主要是篇幅较小的菩萨像、天王像、行脚僧图等。然后是约30件丝织品包括幡、幡头、经帙。最后约三分之一的分量刊布新疆发现的塑像、彩绘舍利容器、壁画、陶器、木器等西域美术资料。在《集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绢幡绘画》图版卷中看不清楚的一些题记可以在本书中找到更清晰的图版。1995—1996年法国学者也出版了法文本《西域美术——集美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两卷[37]图版基本相同而所附文章不同。两书应当同样重视可惜都是极为昂贵的图录所以一般的单位只存有一部。

三　奥登堡收集品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是世界上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主要收藏地之一。其前身是1818年建立的亚洲博物馆1930年改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50年该所迁往莫斯科时在列宁格勒设立分所一度称亚洲民族研究所现在称之为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俄国和苏联从我国西北地区收集的文献材料都收藏在该所的图书馆里其总数达几万件之多而且相比于其他几大敦煌吐鲁番文献收藏单位这里收藏的文献大多公布较迟因此许多情形以前不甚明了。

由俄国奥登堡S. F. Oldenburg 1863—1934考察队所获敦煌汉文文献首先由亚洲博物馆写本特藏部保管员弗路格K. K. Flug 1893—1942从事整理工作。在1942年饿死被围的列宁格勒城之前他完成了Φ编号的307件和Дх编号的2000件写本的目录并发表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藏汉文写本非佛教部分概况》和《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佛经古写本简目》[38]。

俄藏敦煌汉文写本的编号Ф.共366个号码是经弗路格Флук整理的较完整写卷因此用其姓的字头表示。Дх.是俄文“敦煌”的缩写大多数写本都以此为馆藏编号。Ф.和Дх.分别可以用拉丁字母F.和Dx.或Dh.表示。已被编目的写本其目录的顺序号有时被冠以“L”、“列”表示其为列宁格勒藏卷或冠以“M”、“孟”则表示其为孟列夫L. N. Men' sikov主编《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所著录的藏卷。

从1957年开始在弗路格工作的基础上由孟列夫领导的研究小组重新开始汉文写本的编目工作其成果是于1963年和1967年分别出版了《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一、二册[39]。第一册著录新编号简称“M”、“L”或“孟”、“列”1—1707号第二册著录1708—2954号。目录分类编排首为佛教经、律、论、未入藏佛典及汉文著述。然后是儒道著述、地志、史籍、律令、各种文学作品、辞书、韵书、字书、艺术品、医药文献、星历、占卜、习字、各种杂文书最后是非汉文文献。对于每件写本注录颇详有旧编号、名称、作者、年代、外观描述、内容提要、起讫字句如有题记则抄录有的注记参考文献。附录有新旧编号对照表等。第二册附有孟列夫撰《论敦煌写本的断代》一文。因为过去学术界对苏联所藏敦煌写本情况不甚了然因此本目录的出版使人们得以略窥俄藏写本的部分内容。但本目对世俗文书的分类尚不完善而且第三册以下迄今还没有出版。此书原本国内收藏不多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敦煌丛刊初集》第11—12册有影印本。黄永武博士将本目录的题名部分译出收入其所编《敦煌遗书最新目录》。

最值得敦煌学研究者庆贺的是自1992年开始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国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大型图录影印俄藏18000余件全部资料迄今已出版15卷刊布了F.1—366号和Dx.1—11900[40]以下尚有三卷此项工程的完成将给学术界提供大量新材料可谓功德无量。

与此同时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和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合作刊布俄藏敦煌艺术品现已出版《俄藏敦煌艺术品》四册[41]前两册是俄国所藏敦煌壁画、藏经洞出土绢纸绘画、刺绣和丝织品等后两册是奥登堡考察队拍摄的敦煌莫高窟照片和伯希和的照片一样对于敦煌石窟

的研究极富参考价值。以下未刊的两册将继续发表俄国考察队测绘的洞窟图和考察日记我们相信同样可以增进我们对敦煌艺术的认识。

四　中国收集品

中国所藏敦煌写本以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所藏最多其他各地所藏多少不等但都有可以重视的资料。以下介绍重点在未刊资料已有图录发表者则提示而已。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敦煌文献的最大收藏者其收藏品分作四部分即1《敦煌劫余录》著录的8679号[42]现实际只有8653号2《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稿本著录的1192号这是1929年《劫余录》编定后陆续整理出来的31990年善本部搬迁后发现的残片约近4000号41949年以后调拨、购买、受赠的敦煌写卷编作“新”字号约1600余号还有“简”字若干号。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辑《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拟发表该馆所藏全部敦煌文献目前已经出版第一期五册第1—2册是《劫余录》部分第5册是《详目续编》部分第3—4册是新字号部分[43]。这样的安排是接受学术界同仁的建议的结果即在重印《劫余录》部分的同时发表未刊的《详目续编》和“新”字号部分。虽然这五册的内容都是佛典而且距离全部出版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我们可望在不久以后就可以看到后两个序列中的唐代文书资料如《详目续编》中的“周”、“殷”字号中的文书。

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历博所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44]是从书法的角度选材的尽管我们对比了罗振玉的《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和黄文弼的《吐鲁番考古记》后得知罗振玉旧藏和黄文弼所得基本都收入书中但我们从其他途径所知道的历博藏卷有的没有见于此书不知是否仍有遗漏。该书已经出版的资料中有不少重要的唐代史料如《法书大观》No.37《唐定远道行军大总管牒》是研究开元初年西域形势和碛西节度使的重要史料[45]。又如No.42《唐天山县南平乡户籍》与《艺林旬刊》第29期1928年10月11日所刊《唐天山县户籍残本》图版完全相同这件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唐开元二十五年户籍》可以缀合的残本现完好收藏在历史博物馆[46]。

甘肃省也是收藏敦煌写卷的大户由敦煌研究院施萍婷主持的《甘肃藏敦煌文献》囊括了几乎全省各个单位收藏的敦煌文献计有敦煌研究院383件、甘肃省博物馆138件、敦煌市博物馆81件、甘肃省图书馆31件、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件、酒泉市博物馆18件、定西县博物馆10件、永登县博物馆8件、高台县博物馆6件、甘肃中医学院3件、张掖市博物馆1件附录有吐鲁番文书和日本古写经[47]。其中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西北师大历史系等单位的藏卷发表过目录[48]重要的文书已有图版、录文或研究论著发表[49]。这次新刊布的各馆藏卷大多数是佛经但也有一些唐代文书富有研究旨趣。

没有收入《甘肃藏敦煌文献》的一组敦煌文书材料是近年莫高窟北区洞窟发掘所得的文书材料。我曾在1999年5—7月间三次赴敦煌考察翻阅了其中的大部分材料有佛典有文书写本印本汉语胡语内容十分丰富。这批资料作为考古资料的一部分全部由敦煌研究院编彭金章、王建军所著三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发表。其中第一卷收B1—94窟的材料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50]第二卷收B95—173窟含原编号462—465窟材料第三卷收B174—243窟含461窟材料[51]后两卷预定2002年上半年出版。在已出版的第一卷中包含有不少唐朝官私文书如告身、户籍、兵健名籍、宴设司捉钱账、贷钱折粮账等还有刻本《资治通鉴》、叙利亚文《圣经·诗篇》等重要文献资料。

除了上面提到的图录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的中国所藏敦煌吐鲁番资料的大型图录有

《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8年。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天津文物公司藏敦煌写经》天津文物公司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

《浙藏敦煌文献》1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从中我们可以全面了解上海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天津文物公司、浙江省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灵隐寺的藏卷情况。当然这些合集所刊

布的唐代文书材料需要对其真伪加以判断像《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No.060《咸亨二年沙州胡萨坊口户牒》从文书的字体和形式都不合唐人体制表明是今人拙劣的伪迹[52]。

此外数量不大的敦煌小收集品还有不少藏家目前已经发表过目录的有

杨铭《重庆市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目录》《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121—124页。著录13号均为佛经。

徐忆农《南京图书馆藏敦煌卷子考》《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77—80页方广锠、徐忆农《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134—143页。著录32号基本都是佛经。

郑阿财《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卷子题记》《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355—402页。

王倚平、唐刚卯《湖北省博物馆藏敦煌经卷概述》附目录《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269—276页。著录31号均为佛经。

还有一些收藏单位尚未对馆藏敦煌文献或绘画进行系统的整理其中比较重要的藏家有故宫博物院、安徽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其余的藏品不会太多。

五　日本收集品

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有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写卷原放在大谷光瑞在神户郊外六甲的别墅二乐庄。1914年8月曾在二乐庄举办“中亚发掘物之展览”当时因辛亥革命而亡命日本的罗振玉前往参观从橘瑞超处抄得其所编《敦煌将来藏经目录》发表在《国学丛刊》卷九上题《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著录汉文写本430件并称吉川小一郎也获得敦煌写经百余件唯尚未编目[53]。罗氏所刊目录虽然不全但却是大谷收集品中敦煌写本的第一个目录是橘氏所获敦煌写本未流散之前的原始记录。以后这些写本转存于旅顺博物馆。战后一部分运回日本藏龙谷大学图书馆一部分留在旅顺主体后归北京图书馆。

龙谷大学所藏敦煌写本早在1958年京都法藏馆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会编《西域文化研究》第一卷《敦煌佛教资料》中就刊布了其中对于佛教学研究有价值的文献的录文和研究并发表了《龙谷大学所藏敦

煌古经现存目录》著录了大谷收集品中的37件和他人捐赠的27件[54]。1984年井之口泰淳和臼田淳三发表《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大谷探险队搜集敦煌古写经目录》对旧目有所订正仅著录大谷收集品的37件并增加了橘文书中的6件[55]。除写经外其中的陶弘景《本草集注》最为重要1997年龙谷大学以原大影印出版[56]。

东京国立博物馆有被日本政府定为重要文化财的敦煌本《刘子》残卷原为罗振玉所藏。此外还有一些绢画则来自与法国集美博物馆的馆际交换原为伯希和携自敦煌的真品[57]。该馆更重要的收藏是原大谷探险队所得的中亚考古资料。

1961年时任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的塚本善隆邀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敦煌写本研究班的成员对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守屋孝藏1876—1953收集品中的敦煌写经进行整理考订编成《守屋孝藏氏搜集古经图录》[58]。但敦煌写本研究专家藤枝晃认为72件敦煌写经中只有上元二年675写的《妙法莲华经》一件是真品。

东京书道博物馆有中村不折的收集品来历复杂有来自敦煌的也有吐鲁番的由于没有系统的出版图录所以详细情况不清。目前书道博物馆已从私家转归台东区政府管理相信这将有助于学者的研究利用。

京都有邻馆是藤井善助氏于1926年10月设立的私家博物馆其历年收购的文献材料中也有部分敦煌写经、文书及绘画作品等。饶宗颐于1954年走访有邻馆饱览该馆藏品并撰《京都藤井氏有邻馆藏敦煌残卷纪略》一文详记所见残卷内容并附有《藤井氏所藏敦煌残卷简目》分类著录书札5件、牒状23件、宗教文献7件、歌赞4件、杂类2件[59]。1956年《墨美》第60号刊出长行马文书专号收藤枝晃先生长文《长行马》系统地整理了有邻馆所藏长行马文书。近年陈国灿发表《东访吐鲁番文书纪要一》[60]施萍婷发表《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二》[61]详细报告了各自的考察成果并且据所见照片及部分原件分别编成简目极便学人查找有关文书。

此外宁乐美术馆、天理图书馆、大谷大学图书馆、三井文库、唐招提寺、国立国会图书馆、九州大学文学部图5以及一些私人手中也都有一些敦煌文书有些还是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资料。这些资料只是零散地发表而没有像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那样出版大型图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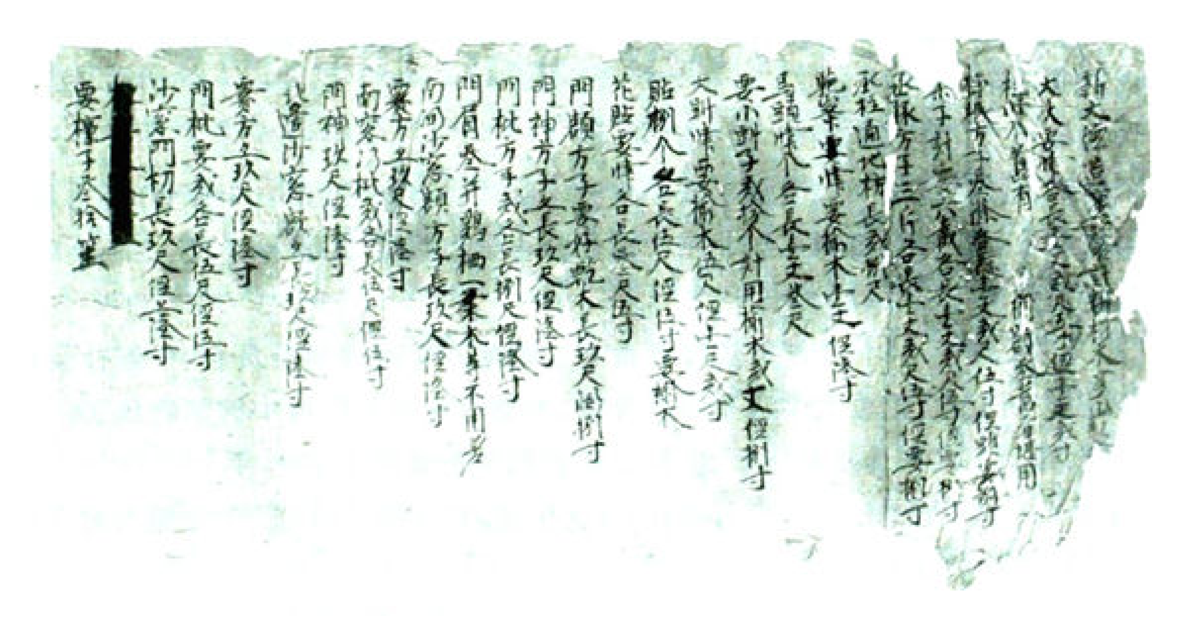


图5　九州大学藏敦煌造窟用料文书

六　其　他

除了上述收集品外印度国立博物馆National Museum、丹麦皇家图书馆The Royal Library、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Gest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华盛顿史密斯学会弗利尔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等收藏单位也存有少量有价值的敦煌写本或绘画。

注释

〔1〕　关于斯坦因中亚探险还可参看米尔斯基Jeannet Mirsky《考古探险家斯坦因爵士传》Sir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7田卫疆等译《斯坦因考古与探险》1992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　A. Stein, The Thousand Buddhas: Ancient Buddhist paintings from the cave-temples of Tun-huang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China, London 1921.

〔3〕　魏礼Arthur Waley《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by Sir Aurel Stein伦敦1931年。

〔4〕　韦陀Roderick Whitfield《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The art of Central Asia, 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三卷东京1982—1984年。

〔5〕　翟林奈Lionel Giles《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伦敦1957年。

〔6〕 商务印书馆1962年。

〔7〕 台北福记文化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

〔8〕 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补正》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379—387页。

〔9〕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 此书由英国图书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主要的标目工作由中国学者负责。本书虽然题为1990—1995年出版实际上的出版年份要晚于1995年。

〔11〕 荣新江《英藏敦煌文献定名商补》《文史》2000年第3辑总第5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115—129页。

〔12〕 Ed.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牛津1913年。

〔13〕 H. 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伦敦1953年。

〔14〕 L. de la Vallee Poussin,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

〔15〕 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4卷伦敦1935—1963年。

〔16〕 F. W. Thomas, 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柏林1957年。

〔17〕 F. W. Thomas, Nam, an Ancient Language of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伦敦1948年。

〔18〕 英文书名为A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collected by Sir Aurel Stein。

〔19〕 M. Lalou,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a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3卷巴黎1939、1950、1961年。

〔20〕 西冈祖秀《伯希和搜集藏文无量寿宗要经的写经生·校勘者一览》《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33卷第1期1984年。

〔21〕 王尧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

〔22〕 A. Macdonald/A. Spanien et Y. Imaeda,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es conservés a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omplete par quelques manuscrits de l' India Office et du British Museum巴黎国立图书馆1978—1979年。

〔23〕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第Ⅰ卷J. Gernet与Wu Chiyu编巴黎1970年第Ⅲ卷M. Soymié编巴黎1983年第Ⅳ卷M. Soymié编巴黎1991年第Ⅴ卷巴黎1995年。

〔24〕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Ⅵ. Fragments chinois du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F. Wang-Toutain编巴黎2001年。

〔25〕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0年。

〔26〕 E. Benveniste, Codices Sogdiani. Manuscrit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ission Pelliot)哥本哈根1940年。

〔27〕 E. Benveniste, Textes sogdiens. Edites, traduits et commentes巴黎1940年。

〔28〕 J. Hamilton, 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igoure. Manuscrits ouigours de Touen-houang巴黎1971年。

〔29〕 J. Hamilton, Manuscrits ouigour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Ⅰ-Ⅱ巴黎Fondation Singer-polignac1986年。

〔30〕 N. Sims-Williams et J. Hamilton, 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伦敦1990年。

〔31〕 L. Feugère, "The Pelliot Collection from Dunhuang", Orientations, 20.3,198941—52页杨汉璋译载《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38—46页。

〔32〕 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 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e, Ⅰ-ⅥN. Vandier-Nicolas与M. Maillard合编巴黎1980—1992年。

〔33〕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刊。

〔34〕 Tissu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au Musée Guimet et a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K. Riboud与G. Vial合编巴黎1970年。

〔35〕 Bannières et peinture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es au Musée GuimetNicolas-Vandier编巴黎1974年。

〔36〕 Bannières et peinture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es au Musée Guimet (Planches)L. Hambis编巴黎1976年。

〔37〕 J. Gies et al., Les arts de l' Asie centrale: la collection Paul Pelliot du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2卷巴黎1995—1996年。

〔38〕 Bibliografija Vostoka, Ⅶ1934年87—92页Bibliografija Vostoka, Ⅷ-Ⅸ1935年99—115页。

〔39〕 孟列夫L. N. Men' sikov等《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Opisanie Kitaiskikh rukopisei Dun' khuanskogo fonda Instituta Narodov AziiⅠ-Ⅱ1963—1967年汉译本《俄藏敦煌汉文写本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40〕 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国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敦煌文献》1—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0年。

〔41〕 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敦煌艺术品》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00年。

〔42〕 陈垣《敦煌劫余录》北京1931年。

〔43〕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5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44〕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东京柳原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合刊第十一卷《晋唐写经·晋唐文书》杨文和编1999年第十二卷《战国秦汉唐宋元墨迹》吕长生编1994年。参看荣新江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2001年332—337页。

〔45〕 《大观》Nos.49—50两件文书残片大概也是同组文书。

〔46〕 参看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33—43页。这件户籍残片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新布置的"中国通史"陈列中展出笔者曾经观察原件纸质、墨色等外观与北大藏卷无异。

〔47〕 《甘肃藏敦煌文献》1—6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48〕 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文物资料丛刊》第1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54—67页秦明智《关于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之浅考和目录》《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459—499页荣恩奇《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541—584页曹怀玉《西北师院历史系文物室藏敦煌经卷录》《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44—46页苏裕民、谭蝉雪《永登县博物馆藏古写经》《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81—84页。

〔49〕　如敦煌研究院编《敦煌》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所刊唐代告身、过所等《中国文物》第1期1979年所刊唐地志残卷、星图、占云气书等。

〔50〕　文物出版社2000年。荣新江书评载《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178—180页。

〔51〕　关于北区洞窟的编号见王建军、胡祯《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新编窟号说明》《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114—121页。

〔52〕　池田温《正仓院文书と敦煌·吐鲁番文书》《正仓院文书研究》第5号东京吉川弘文馆1997年136—137页蒋维崧等《叙录》《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第7册1998年8页。

〔53〕　后收入《雪堂丛刻》。

〔54〕　西域文化研究会编《西域文化研究》第一卷京都法藏馆1958年。

〔55〕　载《佛教学研究》39.40号1984年188—208页贺小平译载《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58—66页。

〔56〕　《敦煌写本本草集注序录·比丘含注戒本》京都法藏馆1997年。

〔57〕　《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图录。

〔58〕　京都国立博物馆1964年印行。

〔59〕　原载《金匮论古综合刊》第1期后收入《选堂集林　史林》下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998—1010页。

〔60〕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2期1993年40—45页。

〔61〕　《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90—100页。

第六讲　于阗、龟兹、楼兰、高昌宝藏的争夺

清末民初敦煌宝藏的流散并非偶然它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西域古物争夺战的继续也是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中国宝藏的必然结局清朝连皇家园林圆明园都不能保有更何谈远在西陲的古物和敦煌藏经洞宝藏了。

一　“西域古物争夺战”的序幕

根据文献记载汉唐时期的西域主要指塔里木盆地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个绿洲王国它们分分合合渐渐形成几个主要的文明中心如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龟兹今库车、焉耆、楼兰今若羌、高昌今吐鲁番等。这些绿洲王国都位于丝绸之路的干道上都是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转运站所以每个城镇都呈现出丝路城市特有的多元文化特征。同时由于西域地区人种和民族成分复杂各地区宗教、文化的面貌又具有各自的特色。

然而由于公元10世纪以后西域地区的人种渐渐突厥化宗教也渐渐伊斯兰化加上弥漫的尘沙和松软的土质等自然力的作用使往日西域多元文化的面貌逐渐消失或湮没于沙海之中或弃置于荒山野岭。法显、玄奘记载的壮丽寺宇不复存在鸠摩罗什、实叉难陀修学讲经的道场亦无从凭吊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端。

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的炮舰轰开了中国沿海的大门曾经出现“康乾盛世”的清帝国这时已经衰败不堪一步步腐朽没落下去。到19世纪末叶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长江南北瓜分领土新疆也成为占领印度的英国和侵占大片中亚土地的沙皇俄国所觊觎的对象。为了争夺新疆和扩大在新疆的势力范围英、俄两国纷纷派出探险队进入新疆攫取各种军事情报特别是山川形势、道路交通、城镇分布以及地方政情等等为将来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在一系列的探险队中1870年和1973年的英国福赛斯T. D. Forsyth使团1887年英国的荣赫鹏F. E. Younghusband探险

队1870—1885年间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N. M. Przheval' skii组织的四次中亚探险虽然注意到了新疆的古物但因为主要目的在于地理和军事方面所以他们对于古代文物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

在1890年前后有三件事引发了西域古物收集的热潮接着而来的是西域的考古时代。

一1889年一些挖宝人在库车附近的某个古代遗址中发现了一批写在桦树皮上的梵文经典。1890年英军中尉鲍威尔Hamilton Bower在库车买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并且送到时任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洲学会总干事的德裔英籍梵文专家霍恩雷August Friedrich Rudolf Hoernle, 1841—1918手中。霍恩雷经过仔细的研究后发现这是现存最早的梵文写本他又听说其余的大部分已被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N. F. Petrovsky获得。于是在1893年霍恩雷向英属印度政府内务部长查尔斯·里奥爵士Sir C. Lyall写信建议英国政府出面组织收集新疆出土文献收集品将归英国博物馆所有。1893年8月22日英属印度政府下令给特命克什米尔驻扎官巴尔D. W. R. Barr并由他转令英国驻吉尔吉特、喀什、列城等地的官员收集新疆等地出土文献。从1893年到1899年总共有31批收集品送到霍恩雷手中其中18批由英国克什米尔驻扎官并负责中国事务的特别代表即后来的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提供12批由先后任英国驻列城、拉达克、吉尔吉特的政治代表戈德福雷Stuart H. Godfrey上尉提供1批由英国驻克什米尔政治代表塔尔博特爵士Sir Adeblert C. Talbot提供。这些后来被称作“霍恩雷收集品”Hoernle Collection的文献和文物大多是通过商人购自库车、和田两地的挖宝人之手。霍恩雷收集品除了一些文物外文献类材料当时就判别出来的是梵文和汉文文献还有许多残卷当时被称作“不知名语言A”和“不知名语言B”经后人考订为于阗文Khotanese和龟兹文Kuchean, Tocharian B文献。还有一种不知名的“语言”霍恩雷也花费了大量劳动加以解读但始终不得其解其实是和田地区的古物伪造者所制作的赝品以蒙蔽极想获取西域宝藏的西方猎宝者[1]。

霍恩雷在收到这些资料后在一系列文章中做了报导和研究。正式的研究报告是以下三篇1《中亚写本的第三批收集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第66卷第1期1897年213—260页24幅图版2《英国中亚古物收集品报告一》《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第68卷第1期增刊一1899年3《英国中亚古物收集品报告二》《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第70卷第1

期增刊一1901年[2]。这些文献后入藏于英国博物馆的东方印本与写本部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ed Books and Manuscripts以后大部分梵文、于阗文和龟兹文材料转交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收藏。留在英国博物馆的汉文写本共13件也在1973年转归英国图书馆收藏。

二1890年法国人杜特雷依·德·兰斯J. L. Dutreuil de Rhins 1846—1894率中亚考察队前往新疆和西藏做地理考察。考察队在和田逗留时曾买到一批写在桦树皮上的佉卢文写本。1894年德·兰斯在入藏途中被杀考察队成员之一格伦纳Fernald Grenard死里逃生。回到法国后出版了《亚洲高地科学考察报告1890—1895年》[3]。他们获得的佉卢文写本《法句经》图1后经英国学者布腊夫John Brough的整理与俄国彼得罗夫斯基所获同一写本缀合全部刊布在《犍陀罗语法句经》一书中[4]成为研究早期西域佛教的重要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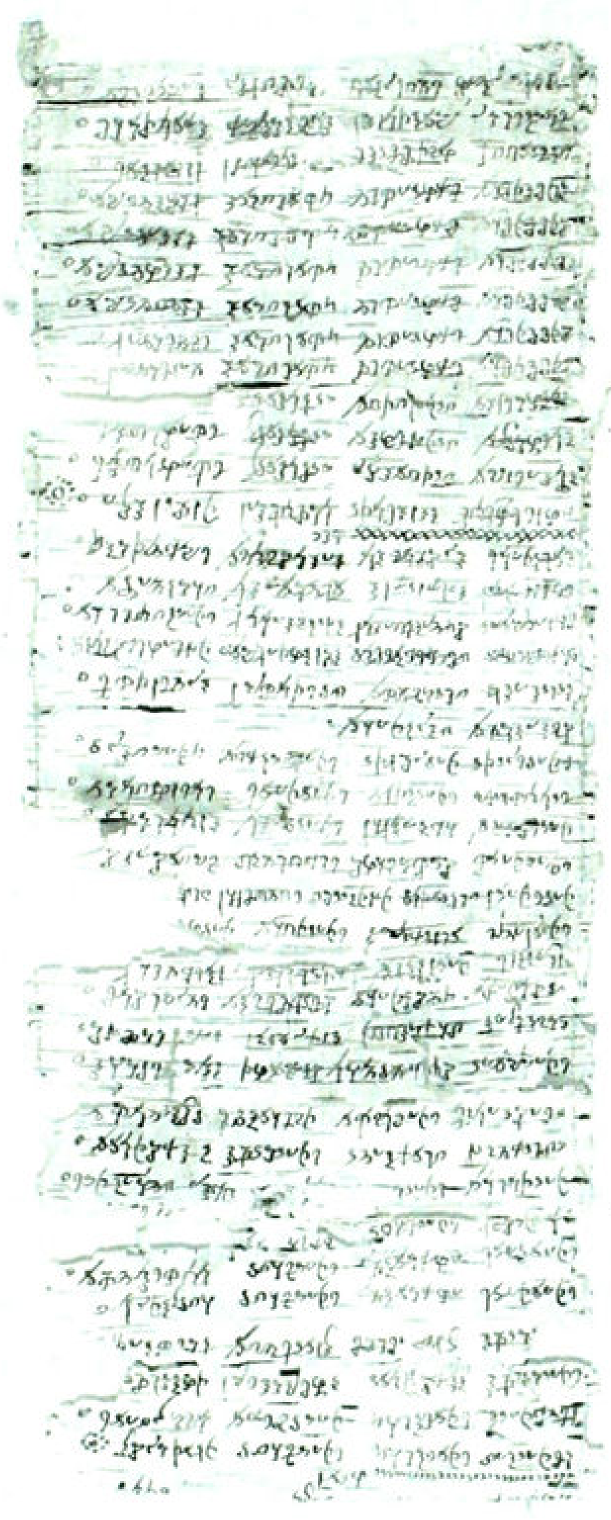


图1　佉卢文写本《法句经》

三事实上早在19世纪八十年代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N. F. Petrovsky 1837—1908已经开始收集中亚文物和文献并将他从喀什居

民手中所获的一件贝叶型写本送给亚洲博物馆由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S. F. Oldenburg加以研究确定为梵文之外的一种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中亚古语后来方知为于阗语。1891年奥登堡提请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敦促俄国驻喀什领事收集中亚古物并尽早派遣考察队前往中亚做考古调查。此后俄国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892—1893年的秋冬彼得罗夫斯基寄送给奥登堡一百余件得自库车、库尔勒、阿克苏居民的写本残片。1893—1903年奥登堡在《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纪要》ZVORAO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用婆罗谜文所写的佛教文献。1897年他出版《有关一件佉卢文字体所写佛教文献的初步研究》发表了一叶写在桦树皮上的犍陀罗语《法句经》表明彼得罗夫斯基也获得了与法国德·兰斯考察队所获同样的抄本后来的研究表明两者是同一抄本。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计有251件梵文写本23件梵文木板文书其中2件佉卢文木牍1件婆罗谜文和佉卢文混写的文献297件于阗文献其中59件佛教文献238件世俗文书3件龟兹文残卷4件藏文写本4件未比定文书总共582件。

此后俄国外交官仍不断收集古物。如1898—1918年间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克罗特科夫N. N. Krotkov 1869—1919陆续寄赠给俄国科学院几批中亚写本其中包括一些草体或半草体的回鹘文残卷26件梵文残卷11件龟兹文残卷3批藏文残卷31件粟特文摩尼教文献一件叙利亚文残卷和10件未比定文书。另外他还收罗了不少考古艺术品。他的收集品大多应当来自吐鲁番。1904—1909年科洛科洛维S. A. Kolokolov继彼得罗夫斯基出任喀什总领事也继续收集中亚古文献。1905年他寄赠给亚洲博物馆三组梵文写本和一组后来判定出的赝品。同一年拉维洛夫M. I. Lavrov寄赠俄国中亚及远东研究委员会八组梵文写本。1908年俄国驻库尔勒领事吉雅科夫A. A. Dyakov收集到一批据说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文书共29项多为回鹘文和汉文写本和印本其中包括一件回鹘文摩尼教发愿文写本和一件回鹘文《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写卷。

新疆出土古代文献的学术价值经霍恩雷的鉴定而为欧洲学术界所知。杜特雷依·德·兰斯获得的佉戶文写本《法句经》更加刺激了欧洲日益兴盛的东方学研究。1899年在罗马召开的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在俄国学者拉德洛夫W. Radloff倡议下成立了“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人种考察国际协会”本部设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并在各国设立分会以推动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此后各国纷纷派出考察

队进入中国的新、甘、蒙、藏去猎取沙漠废墟、古城遗址和佛寺洞窟中的古代文物。

二　20世纪初叶的西域考古调查

1斯文赫定的踏查

从1893年至1935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先后四次到中亚考察其活动范围之广大概是同时代的其他探险家所不能比拟的他几乎踏遍了甘、新、蒙、藏。而且他富有冒险精神虽历尽艰险但走出了许多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因此他填补了不少欧洲有关中亚地理知识的空白。同时他也是第一个走访新疆一些古代遗址如丹丹乌里克、楼兰的西方探险家。赫定的考察成果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当属地理勘查考古非其所长但他也获得了不少资料。

赫定的四次中亚考察有着极其丰富多彩的内容也有许多种著作记录其行迹。这里仅提示一下他获得古代文献和文物的情形。

在第一次中亚考察过程中赫定于1896年初在经过一场噩梦般的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旅行后重整行装从喀什来到和田准备再次进入沙漠之中考察。在和田的集市上他买到许多泥塑小雕像和古钱并得到沙漠中掩埋着古城的信息。1月24日他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在和田东北于田县和策勒县交界处找到了一座名为“塔克拉玛干古城”的遗址收集并匆匆掘得一些文书、佛雕像和其他物品。这座“塔克拉玛干古城”就是后来斯坦因称之为丹丹乌里克并取得重大收获的遗址而且在此前后这里出土的文书残卷也大量流入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的手中。赫定考察队离开“塔克拉玛干古城”后继续东北行2月2日又找到了当地人称作“喀拉墩”的遗址也收集了一些古物。他此次中亚探险的旅行记为《穿越亚洲》于1898年出版[5]。翌年他又完成正式的考察报告题为《1893—1897年中亚旅行的地理科学成果》[6]。

1899年开始的赫定第二次中亚考察前期主要是漂流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1900年3月在罗布泊地区考察过程中赫定考察队偶然发现了举世闻名的楼兰古城但未及发掘即离去。在完成藏北考察后赫定等于1901年3月又来到楼兰古城遗址图2做进一步的发掘工作。他们在那里逗留了七天发掘到汉文文书和佉卢文木简确证此地为楼兰另外还得到

古钱币、木雕佛像、陶器、丝毛织品等等。此行赫定还特别考察了罗布泊提出罗布泊是游移湖的著名论断。此后赫定又用了一年的时间考察西藏于1902年6月回国。1903年他出版了此行的旅行记《亚洲——一千英里的未知道路》[7]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其英译本改名为《中亚与西藏》于同年出版[8]较瑞典文原著更有名。1904—1907年间他又编写了八卷本的《1899—1902年中亚旅行的科学成果》计文字六卷地图两卷其第一至第四卷由赫定本人撰写第五、六卷则由各科专家撰写[9]。其中第二卷《罗布泊》中有发现楼兰古城的记录[10]。而第六卷中的考古学分册由于出土文书的解读者希姆来Karl Himly中途病故没有按期出版。此项工作由孔好古August Conrady继续其成果《斯文赫定楼兰所获汉文文书和零星文物》直到1920年方才出版[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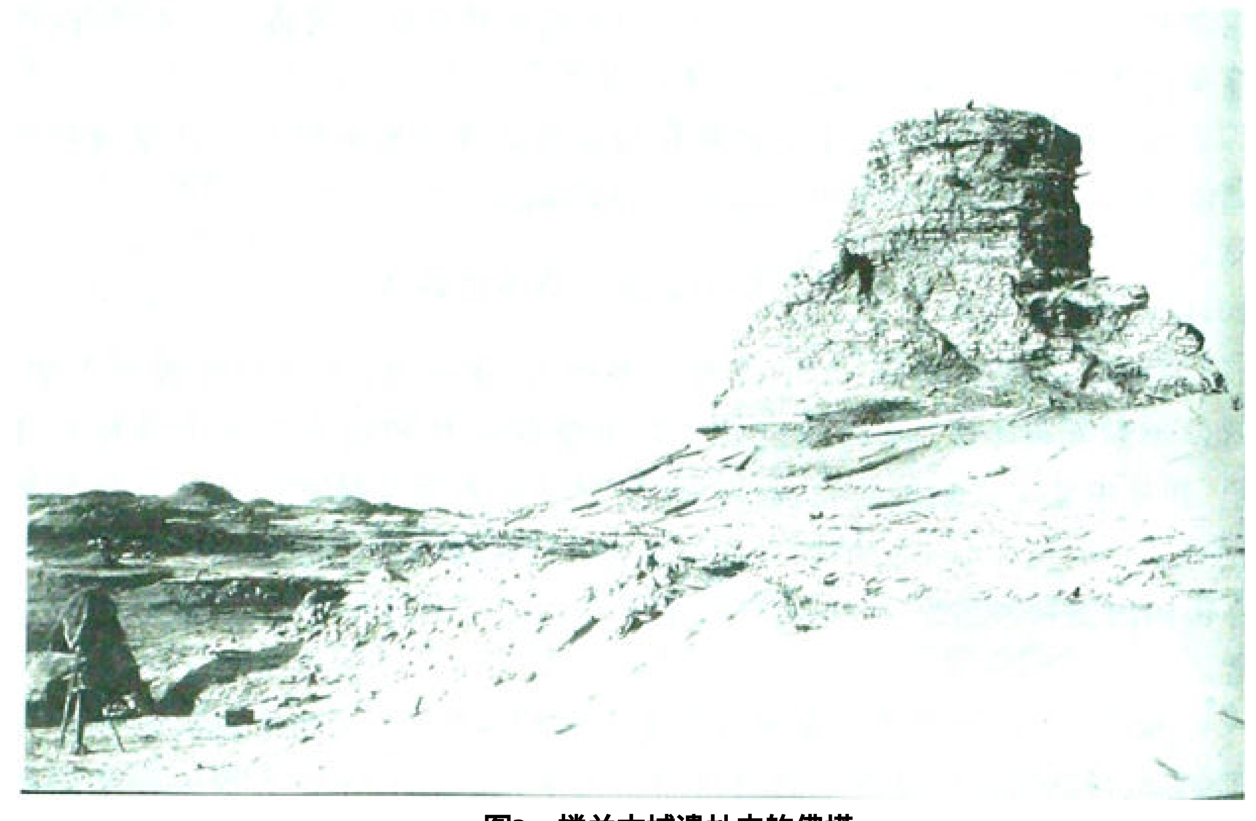


图2　楼兰古城遗址中的佛塔

1905—1908年赫定的第三次中亚探险主要是考察西藏。从古代文献的获得上着眼他的第四次中亚之行即1927—1935年间他所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次中国和瑞典共同组织的西北综合考察团中有各个方面的专家他们有的单独行动有的结伴而行赫定本人负责考察团的全面领导工作他的旅行范围虽广但是除了

罗布泊地区外他所做的野外考察并不多古物的获得也很有限。但考察团中的其他成员却多少不等地有所发现。赫定记录此行的主要著作是《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1944年出版[12]。

在这次考察中考古学者贝格曼Folke Bergman和其中国同行一起在额济那河沿线发掘到一万余枚汉简即所谓居延汉简。贝格曼本人撰有《新疆考古研究》一书记录他的考古工作成果[13]。

斯文赫定的收集品主要收藏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国立人种学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graphy in Sweden。

2斯坦因的三次中亚考古调查

斯坦因Aurel Stein早年曾游学维也纳、莱比锡、牛津和伦敦各大学1887年到英属印度先后任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和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并从事梵文文献的研究曾翻译梵文《克什米尔王统记》一书并在当地收集过不少梵文写本。他在英属印度政府、英国博物馆和英国印度事务部等机构的支持和赞助下先后进行了三次范围广阔的中亚考察收获极为丰富。

1900—1901年的第一次中亚考察主要发掘了和田和尼雅两地的古代遗址包括斯坦因考证为于阗旧都的约特干Yotkan、挖宝人尚未挖干净的旦旦乌里克Dandan-oiliq、安得悦寺址Endere、喀拉墩Kara-dong遗址、和田北部的阿克斯比尔Aksipil城址、热瓦克Rawak寺址和尼雅Niya一带的大片古代居住遗址等出土了大量的梵文、于阗文、佉卢文和少量的汉文材料以及大批文物图3。斯坦因此行的个人旅行记为《沙埋和阗废址记》[14]其正式的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副题为《新疆考古调查详细报告》[15]。



图3　斯坦因在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发掘的祆教图像木板画

1906—1908年的第二次中亚考察除了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斯坦因还沿塔里木盆地南沿发掘了楼兰Lou-lan和米兰Miran遗址。然后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的长城沿线的烽燧下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看管洞窟的王道士的无知廉价买走藏经洞出土文献二十四箱、绢画和其他丝织品等文物五箱。此后他用较短的时间走访了安西榆林窟、吐鲁番Turfan盆地古代遗址沿塔里木盆地北缘经焉耆Karashar、库车Kucha横断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经喀拉墩再到和田发掘老达玛沟Old Domoko一带遗址并沿和田北上发掘麻札塔格Mazar Tagh古堡经阿克苏、巴楚西行出国。斯坦因此行的个人旅行记为《沙埋契丹废址记》[16]其正式的考古报告是《西域考古图记》一译《塞林提亚》副题为《在中亚和中国西陲考察的详细报告》[17]。

1913—1915年的第三次中亚考察仍然是沿塔里木盆地南沿东行发掘和田、尼雅、楼兰等地的古代遗址在麻札塔格、巴拉瓦斯特Balawaste、瓦石峡Vash-shahri等处有新的收获。接着进入甘肃发掘敦煌酒泉间的长城烽燧再到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又获得570件敦煌藏经洞写本。随后深入居延发掘了黑城哈拉浩特Kara-khoto西夏古城然后到吐鲁番发掘阿斯塔那Astana古墓揭取伯孜克里克Bezklik石窟壁画在吐峪沟Toyuk等处也有许多收获。最后又调查发掘了部分库车遗址然后出中国国境往东部伊朗考察。斯坦因此行没有写他的个人旅行记1928年牛津出版了他的正式考古报告《亚洲腹地考古记》副题为《在中亚、甘肃和东部伊朗考察的详细报告》[18]。

斯坦因三次西域考察特别是对西域南道的发掘获得了大批佉卢文、梵文、于阗文、吐火罗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汉文文书分别由各方面的专家解读研究成为研究西域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3俄国考察队

1898年俄国科学院派克莱门兹D. A. Klementz 1848—1914率队考察吐鲁番他们考察了高昌故城发掘阿斯塔那墓地测绘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在那里他们发现许多带有中亚婆罗谜文和回鹘文题记的壁画还带回了几件梵文和回鹘文的印本佛典与后来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获相同都是小乘佛典的早期刻本。克莱门兹用德文撰写了此行的考察报告题曰《1898年圣彼得堡俄国科学院吐鲁番考察报告》[19]。

1906—1907年科卡诺夫斯基A. I. Kokhanovsky率考察队再访吐鲁番共得到二十项文献资料其中有一件纸本梵文写本九件汉文写本二件藏文写本和印本一件蒙文印本三件回鹘文写本二件回鹘文汉文双语文书以及几件粟特文摩尼教文书。这些材料先是交给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而后转归亚洲博物馆收藏由奥登堡编成《科卡诺夫斯基博士自吐鲁番所收集的古物简明目录》[20]。

与此同时1906—1907年别列佐夫斯基M. M. Berezovsky则率考察队到库车地区考察他们走访了库木吐拉、克孜尔等石窟发现品共有31项其中包括24件梵文写本一件汉文印本二件回鹘文汉文双语文书一件回鹘文婆罗谜文双语文书一件婆罗谜文所写汉语文书。此外他还发现少量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龟兹文写本。

1907—1909年科兹洛夫P. K. Kozlov率考察队发掘了西夏古城哈拉浩特Khara-khoto黑城获得大约八千件西夏、汉、藏、蒙文等文字材料和约3500件文物材料这些文献和文物以其完整性而有别于俄国其他收集品因而其实质上的数量相当庞大。科兹洛夫此行的考察报告《蒙古、安多、哈拉浩特死城》于1923年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出版[21]。

1909—1910年奥登堡亲自率领俄国第一次中亚考察队赴新疆考察。他主要的目的地是吐鲁番盆地在那里他走访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阿斯塔那、伯孜克里克、胜金口等遗址做了部分发掘。此外奥登堡还到过焉耆的七格星和库车的苏巴什、森姆塞姆、克孜尔尕哈、库木吐拉、克孜尔等遗址。他此行的收获极多但回国后只写了一篇题为

《1909—1910年俄国突厥斯坦考察》的简报语焉不详。他至少获得了17组梵文写本残卷和一些回鹘文文书后者由马洛夫S. Ye. Malov 1880—1957发表在《奥登堡考察队所获回鹘文写本文书》一书中。

与英国的斯坦因相对俄国探险队的成果主要是在西域北道所获同样丰富。在更东的甘肃、宁夏斯坦因攫取了敦煌藏经洞而科兹洛夫则获取了黑城宝藏。

4德国吐鲁番探险队

俄国克莱门兹在吐鲁番的惊人发现和英国斯坦因在和田的巨大收获促使当时任职于柏林民俗学博物馆Museum für Volkerkunde的印度艺术史专家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决心前往中亚考察目标就选择了吐鲁番。1902年8月由格伦威德尔和胡特Georg Huth 1867—1906、巴图斯Theodor Bartus三人组成的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从柏林出发经俄属突厥斯坦于11月底到达吐鲁番盆地。从1902年12月初到1903年4月初考察队在高昌故城Khocho、胜金口Sengim、木头沟Murtuk进行发掘共获得44箱古物包括写本、刻本、壁画、雕像等写本中有梵文、突厥文、回鹘文、汉文、藏文、蒙文文献。格伦威德尔这次考察的报告《1902—1903年亦都护城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1906年在慕尼黑出版[22]。

考察队的收集品震惊了德国东方学界“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民俗考察国际协会”德国分会负责人皮歇尔Richard Pischel 1849—1908和吕德斯Heinrich Luders 1869—1943建议尽早再派新的考察队前往新疆。他们的建议得到德国皇帝的赞同新的考察队从皇室和教育文化部得到充足的资金赞助。由于格伦威德尔健康不佳民俗学博物馆的另一位东方考古学者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被委任为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队长。勒柯克和巴图斯组成的考察队于1904年11月到达吐鲁番继续发掘高昌故城并绘制测量图在此他发现了据说有二十四种文字拼写的十七种语言的文献而后他前往胜金口、伯孜克里克Bezeklil、木头沟、吐峪沟Toyok等地考察用切割的方法剥取了大量的石窟壁画。1905年8月勒柯克一行又往哈密进行考察但收获甚微。当接到柏林方面让他们前往喀什与格伦威德尔会合的电报后即启程西行。关于此次考察勒柯克用英文写有《普鲁士皇家第一次即德国第二次新疆

吐鲁番考察队的缘起、行程和收获》发表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9年号上[23]。1913年勒柯克编印了大型图录《高昌——普鲁士王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重大发现品图录》[24]其中刊布的伯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因为原物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轰炸柏林时被毁所以现在只能依赖此书而一睹伯孜克里克昔日的光彩。另外勒柯克还有第二、三两次考察的个人旅行记《新疆古希腊化遗迹考察记——德国第二、三次吐鲁番考察报告》[25]由巴威尔A. Barwell译成英文题《新疆地下埋藏的宝藏》[26]。

1905年12月当格伦威德尔到达喀什后即与勒柯克一起东行开始了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的活动。他们在图木舒克Tumshuk做了短暂逗留后即往库车西面的库木吐拉Kumtura和克孜尔Kizil石窟考察图4剥取壁画并获得大批梵文、吐火罗文、回鹘文等文献材料。1906年5月考察队继续东行到焉耆附近的硕尔楚克Shorchuk同样割取了大批佛教壁画和雕像。而后勒柯克由于身体不适而先期回国考察队由格伦威德尔率领继续东行到吐鲁番在高昌故城和哈密一带一直工作到1907年4月止。此行时间较上两次吐鲁番考察为长而且范围也超出吐鲁番扩大到几乎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全线。回国后格伦威德尔陆续整理出版了两部正式的考古报告《新疆古代佛教圣地——1906—1907年在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绿洲的考古工作》[27]和《古代龟兹》[28]。



图4　德国考察队在克孜尔石窟发掘的菩萨头像

在库车的精美艺术品的鼓舞下病愈的勒柯克于1912年准备再次前往新疆考察但由于满清王朝的灭亡新疆处于混乱之中。1913年5月末勒柯克和巴图斯不顾德国外交部的警告离开柏林奔赴喀什。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库车他们除考察了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所访问过的石窟寺外还考察了阿及里克Achik-ilek、苏巴什Subashi、克日西Kirish、森木塞姆Simsim等古代佛寺或石窟寺。然后东行发掘库木吐拉。11月西返到图木舒克一直工作到1914年1月中旬。此行的收集品装满了40大箱运回柏林。勒柯克的报告书是《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德国第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探险报告》〔29〕。

德国探险队的收获并不仅限于探险队的名称所示——“吐鲁番”实际上德国收集品中包含了库车、焉耆、巴楚精美的古代艺术品和文献材料。

5大谷探险队

在西方列强当中惟一的以个人财力支持的西域探险队是日本的大谷探险队。

1902年8月大谷光瑞率领随行人员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自伦敦出发经布哈拉、萨马尔干越帕米尔到达喀什噶尔。大谷光瑞率本多、井上二人由此南下印度得到父亲光尊逝去的讣告急忙回国继任为本愿寺第22代宗主镜如上人。渡边、堀二人则由此往叶城、和田1903年北上阿克苏东行库车对其周边克孜尔、库木吐拉千佛洞和通古斯巴什、苏巴什等古遗址做了约四个月的考古调查。然后到吐鲁番发掘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最后二人经乌鲁木齐、哈密、兰州、西安于1904年5月携带收集品回国。此即大谷探险队第一次中亚探险1902—1904年。

1908年大谷光瑞派遣橘瑞超、野村荣三郎二人再次前往中亚。他们从北京出发出张家口北越戈壁入外蒙古考查了鄂尔浑河畔突厥、回鹘、蒙古等游牧民族的遗迹然后西进南下越阿尔泰山到达天山北麓的唐朝北庭都护府遗址在此调查完毕之后经乌鲁木齐同年11月到达吐鲁番。他们对吐鲁番盆地的古代遗址如交河古城、木头沟、伯孜克里克、吐峪沟千佛洞、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等都进行了调查发掘图5。1909年2月二人在库尔勒分手橘瑞超南下罗布泊考查楼兰古城然后沿南道西行。野村则沿北道经库车、阿克苏于7月到达喀什噶尔与橘会合然后奉命回国。此即第二次中亚探险1908—19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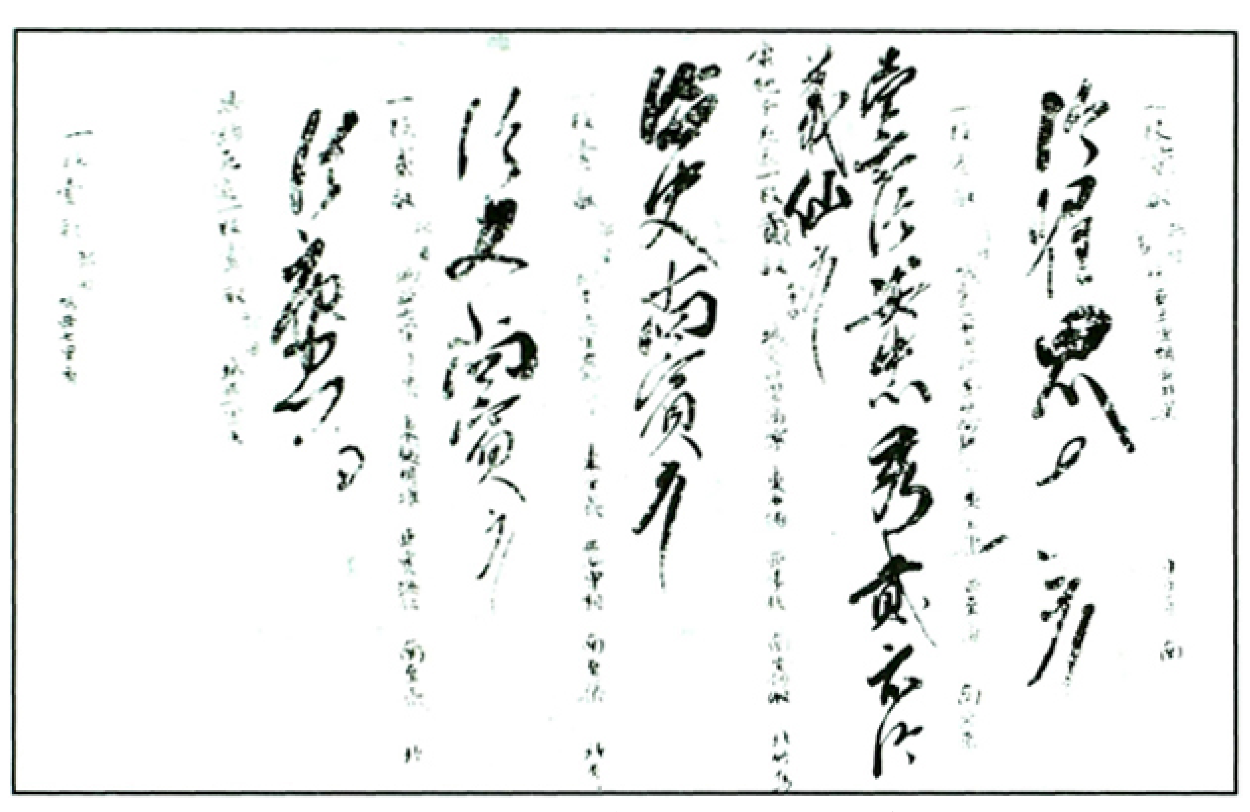


图5　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古墓发掘的唐朝给田文书

1910年8月橘瑞超从伦敦出发经西伯利亚进入新疆。首先到吐鲁番做了一个月的发掘然后南下楼兰剥取米兰遗址壁画。1911年2月从且末北进横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至喀什。3月东南到和田发掘古物。由于较长时间得不到橘瑞超的消息大谷光瑞于同年初派遣吉川小一郎前往联络。吉川由兰州到敦煌拍摄了敦煌莫高窟的部分洞窟。1912年1月26日吉川与沿南道东来的橘瑞超在敦煌巧遇。在敦煌期间两人分别购得一些敦煌写卷。此后二人一起到吐鲁番发掘古物然后橘瑞超经西伯利亚铁路回国。吉川小一郎则留在吐鲁番继续工作。1913年2月吉川由此往西经焉耆到库车调查库木吐拉、苏巴什等遗址然后西进喀什南下和田又北上横断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经阿克苏、札木台到伊犁而后东返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敦煌、肃州等地1914年5月回到北京。此即第三次中亚探险1910—1914〔30〕。

大谷探险队的成员一般没有受过考古学的训练所以所掘资料比较零碎后来又因为财政问题使收集品分散给研究者造成更进一步的困难。

6法国伯希和探险队

1905年伯希和由“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民俗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塞纳Emile Senart委任为法国中亚考察队队长。1906—1908年伯希和与测量师瓦扬Louis Vaillant和摄影师努瓦特Charles Nouette一起赴中亚考察。伯希和考察队由俄属中亚进入新疆先调查了喀什三仙洞Outchmah-ravan佛教石窟然后沿丝路北道先到巴楚发掘了图木舒克地区的托古孜萨来佛寺遗址Toqquuez-Sarai发现大量包括精美的佛像在内的美术品图6文献资料所获不多主要是一些用婆罗谜字体书写的龟兹语文献和一件中古伊朗语文献后者即所谓的图木舒克语佛教文献。在库车范围内伯希和考察了克孜尔Kizil和库木吐拉Koum-toura石窟而重点发掘了库木吐拉石窟南面渭干河口西侧的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Douldour-aqour这里推测是玄奘所记的阿奢理贰伽蓝和贾耽所说的拓厥关所以除了佛教美术品外伯希和在此发现了一批梵文佛典、吐火罗文B即龟兹文木简文书、大约二百余件汉文佛典和文书残片。而后伯希和考察队又发掘了苏巴什Soubachi东西寺址同样获得了许多美术品和梵文、吐火罗文B和少量回鹘文文书[31]。



图6　伯希和在托古孜萨来佛寺遗址发掘的菩萨头像

伯希和在新疆的主要收获是巴楚和库车的发掘其考察记录由后人整理为《伯希和考察队考古资料丛刊》Mission Paul Pelliot. Documents archeologiques第一卷是《图木舒克》图版韩百诗编主要是托古孜萨来发掘所得的佛教雕像[32]。第二卷《图木舒克》解说韩百诗编是对喀什和图木舒克两地遗址的描述并分类解说雕像、绘画和其他各种发现品[33]。第三卷《库车遗址都勒都尔阿护尔和苏巴什》图版韩百诗编发表两处遗址出土物的照片并有遗址图和一些线描图[34]。第四卷《库车遗址寺院建筑都勒都尔阿护尔和苏巴什》解说专门研究库车佛教遗址的建筑[35]。第八卷《库车地区诸遗址·龟兹语铭文》晁华山、戈里埃S. Gaulier、玛雅尔M. Maillard、皮诺合编是对库车克孜尔尕哈Qyzyl-Gargha等遗址的描述和出土遗目的注记目录分量最大的是皮诺所考释的龟兹语铭文部分附有全部图版[36]。

除了这些收获丰富的考察队之外还有不少地理考察队、传教士、旅行者也都有零星的收获在此不赘。

三　西域考古的学术收获

各国的西域考察为揭示新疆古代的西域文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有考古艺术的也有文献的。一百多年来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可能在此一一罗列以下仅举最重要的学术成绩如下

1于　阗

于阗是丝路南道的大国在大乘佛教的东传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1斯坦因对和田周边佛教遗迹的系统发掘揭示了于阗佛教的基本面貌和在佛教艺术上的成就。

2和田出土的大量梵文、佉卢文写本佛教文献为研究西域佛教提供了重要素材也为中国佛教典籍的来源提供了探索的根源如犍陀罗语《法句经》、梵本《法华经》等。

3古代于阗人所使用的于阗语东伊朗语系统文字材料首次发现不仅有大量佛教文献还有许多世俗文书记录了于阗本民族的历史。唯目前

发现的材料7世纪以前主要是佛典只有几个木函文书属于非佛教文献材料其他世俗文书都集中在8世纪特别是8世纪后半叶。

4与8世纪后半于阗语文书同时的大批汉文文书、佛典的发现记录了唐朝安西四镇中于阗镇的情况反映了当地胡汉双重管理体制和汉文化的流行状况。

2龟兹、焉耆

汉唐间龟兹和它西面的姑墨、东面的焉耆都是丝路北道的大国但在文化上基本属于“吐火罗语”流行范围的文化圈。

1这一地区除了与和田相同的佛寺遗址外还保存了大量的石窟寺留存了许多佛教壁画是今天研究北道佛教艺术的重要参考材料。

2大量属于小乘佛教的梵文经典被发现表明这里与南道的于阗有着不同的佛教传播背景。

3属于西支印欧语言之一的吐火罗语文献的发现为印欧语言和印欧人种的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其中龟兹流行的吐火罗语B方言既有佛典也有世俗文书为研究7世纪前后的龟兹王国提供丰富的材料。而焉耆流行的吐火罗语A方言主要是佛典其中如《弥勒会见记》剧本是回鹘文同名剧本的原本表明焉耆、龟兹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4巴楚的图木舒克发现过十几件属于东伊朗语的所谓“图木舒克语”文献我以为应当用历史的名称叫做“据史德语”[37]宗教和世俗文书都有世俗文书的汉字签署证明了唐朝时期的羁縻州统治形态。

5库车西拓厥关遗址Douldour-aqour的汉文文书是唐朝安西都护府经营西域和龟兹羁縻州生活实态的写照。

3楼兰、尼雅

斯坦因发掘的尼雅遗址原本是汉代精绝国所在有新发现的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木简为证。东汉以后精绝国归属东部的鄯善王国。到南北朝初期的4世纪时由于缺水等原因尼雅成为废墟。

1尼雅出土了大批佉卢文木简文书语言属于梵文俗语犍陀罗语因此其文化归属有很大的争议。1988年以来中日尼雅考古队在这一地区持

续工作获得大量文物和木简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等希望对尼雅遗址所揭示的精绝、鄯善文化给予更有利的说明。

2楼兰是西域东部的重要王国以后国都南移改称鄯善统有精绝以东的西域南道。楼兰不仅出土了鄯善国的官方文字佉卢文的木简也出土了不少魏晋时期的汉文简牍和纸本文书是西域长史府留下的经营西域的历史文献。

4高　昌

高昌所在的吐鲁番盆地历史上曾经是车师王国、高昌郡、高昌王国、唐西州和西州回鹘的所在地是最接近敦煌的丝路城市但出土文献比敦煌更加丰富多彩。

1车师王国的遗迹最近在交河沟北发现给吐鲁番早期历史带来光明。

2高昌、交河出上大量汉文文书使我们对从高昌郡经高昌国到唐朝、西州回鹘的历史与文化的了解大大超越古代文献记录的内容。

3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发现大量摩尼教伊朗语文书表明摩尼教的流传特别是在高昌回鹘时期盛行的情况。这些也为近年的考古调查所见到的摩尼教佛教二重窟所印证。

4早期粟特语文书的发现表明其民众的到来和在高昌地区经营商业的情况。

5石窟寺从高昌王国到回鹘时代与文献相结合可以使我们描绘佛教在吐鲁番的流传和特征。

附西北考古年表

1893—1897年瑞典斯文·赫定第一次中亚探险探查和田地区。

1898年俄国克莱门兹考察吐鲁番。

1899—1902年瑞典斯文·赫定第二次中亚探险发现楼兰考察西藏。

1900—1901年英国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发掘和田、尼雅。

1902—1903年德国格伦威德尔率第一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发掘吐鲁番。

1902—1904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第一次中亚探险发掘和田、库车、吐鲁番。

1904—1905年德国勒柯克率第二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发掘吐鲁番。
1905—1907年德国格伦威德尔率德国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发掘巴楚、库车、焉耆、吐鲁番。
1905—1908年瑞典斯文·赫定第三次中亚探险主要考察西藏。
1906—1907年俄国科卡诺夫斯基率考察队再访吐鲁番。
1906—1907年俄国别列佐夫斯基考察库车地区。
1906—1908年英国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发掘和田、楼兰考察敦煌。
1906—1908年法国伯希和中亚考察队发掘巴楚、库车考察敦煌。
1906—1908年芬兰曼涅尔海姆考察队考察吐鲁番、敦煌。
1907—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考察发掘西夏古城哈拉浩特黑城。
1908—1909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第二次中亚探险发掘吐鲁番、楼兰、库车。
1909—1910年俄国奥登堡率领俄国第一次中亚考察队赴新疆考察。
1909—1911年俄国马洛夫率领考察队考查新疆和甘肃。
1910—1914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第三次中亚探险发掘吐鲁番、米兰、库车考察敦煌。
1913—1914年德国勒柯克率第四次吐鲁番考察队发掘库车、巴楚。
1913—1914年俄国马洛夫率领考察队考查新疆和甘肃。
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发掘和田、黑城、吐鲁番、库车。
1914—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俄国第二次中亚考察队考察敦煌。
1927—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甘肃、新疆等地。

注释

〔1〕 参看王冀青《库车文书的发现与英国大规模搜集中亚文物的开始》《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2期64—73页。

〔2〕 “Three further collcetions of ancien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JASB第66卷第1期1897年213—260页24图版同作者“A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 Ⅰ”同上杂志第68卷第1期增刊11899年同作者“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 Ⅱ”同上杂志第70卷第1期增刊11901年。

〔3〕 J. L. Dutreuil de Rhins et F. Grenard, 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3卷巴黎1897—1898年。参看杨镰《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队遭际考实》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59—79页。

〔4〕 J.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

〔5〕 S. Hedin, En fard genom Asien 1893—18972卷斯德哥尔摩1898年英译本Through Asia2卷1898年。

〔6〕 S. Hedin, "Die geographisch-wissenschaftlichen Ergebnisse meiner Reisen in Zentralasien 1894—1897", Erganzungsheft Nr. 131. zu Petermanns Mitteilungen, Perthes, Gotha 1900300页。

〔7〕 S. Hedin, Asien, Tusen mil pa okanda vagar2卷斯德哥尔摩1903年。

〔8〕 Central Asia and Tibet. Toward the holy city of Lassa2卷伦敦1903年。

〔9〕 S. Hedin (ed.), 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8卷斯德哥尔摩1904—1907年。

〔10〕 S. Hedin, Lop-nor王安洪、崔延虎汉译本题《罗布泊探秘》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11〕 A. Conrady, 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斯德哥尔摩1920年。

〔12〕 S.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Publication XXⅢ-XXV)3卷斯德哥尔摩1943—1944年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汉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 F.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Publication Ⅶ)斯德哥尔摩1939年。王安洪汉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 A. Stein,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伦敦1903年。

〔15〕 A.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2卷牛津1907年。

〔16〕 A.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2卷伦敦1912年。

〔17〕 A.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most China5卷牛津1921年。法国学者郭鲁柏V. Goloubew将这部考古报告缩写为《西域考古记举要》发表于《法国远东学院学报》BEFEO第25卷1925年冯承钧译为中文195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8〕 A. Stein,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4卷牛津1928年。

〔19〕 Nachrichten uber die vo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St. Petersburg in Jahre 1898 ausgerustete Expedition nach Turfan圣彼得堡1899年。

〔20〕 S. F. Oldenburg, "Kratkaya opis sostavlennogo d-rom Kokhanovskim sobraniya drevnostey iz Turfana"《亚洲论丛》Melange asiatique第13辑1907—1908年127—140页。

〔21〕 P. K. Kozlov, Mongolia i Amdo i myortvy gorod Khora-Khoto: kspeditsiya Rus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v nagornoy Azii P. K. Kozlova, pochotnogo chlena Rus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1907—1909 gg莫斯科与圣彼得堡1923年。

〔22〕 A. Grünwedel, Bericht uber archa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慕尼黑1906年。

〔23〕 A. von Le Coq, "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 journey, and results of the first Royal Pressian (Second German) expedition to Turfan in Chinese Turkistan", JRAS1909年号299—322页。

〔24〕 A. von Le Coq, Chotscho: 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v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o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柏林1913年。

〔25〕 A. von Le Coq,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Ⅱ. und Ⅱ. deutschen Turfan Expeditionem莱比锡1926年。

〔26〕 A.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A. Barwell译伦敦1928年。有郑宝

善中文译本题为《新疆之文化宝库》1934年南京蒙藏委员会出版。又陈海涛译本题《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27〕 A. Grünwedel, Altbuddhistische kultstatten in Chinesisch-Türkistan, bericht uber archa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Kuca, Qaras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柏林1912年。

〔28〕 A. Grünwedel, Alt-Kutscha柏林1920年。

〔29〕 A. von Le Coq,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ü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4.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莱比锡1928年。

〔30〕 大谷探险队成员的原始记录主要刊布在上原芳太郎编《新西域记》上下卷中有光社1937年出版。橘瑞超的第三次探险记录《中亚探险》东京博文馆1912年出版现收入中公文库1989年东京中央公论社出版柳洪亮汉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崛贤雄的《西域旅行日记》发现较晚分三篇发表在《西域文化研究》第二、四、五卷1959、1961、1962年京都法藏馆出版1987年由东京白水社出版了单行本。以上记录中的重要部分亦收入长泽和俊编《大谷探险队シルクロド探险》1978年白水社出版。有关大谷探险队活动比较详细的叙述见片山章雄《大谷探险队とその将来品》1—4《小さな蕾》Nos.228—2311987年7—10月出版并参看片山氏的《大谷探险队关系记录拾遗》I-V《季刊东西交涉》15—18、20号1985—1986年出版。又白须净真著有《忘れられた明治の探险家渡边哲信》东京中央公论社1992年。

〔31〕 伯希和没有像样的考古报告只发表过两次讲演一次题为《高地亚洲三年》Trois ans dans la Haute Asie载《法国亚洲委员会通讯》Bulletin du Comite de l' Asie française1910年1月号16页一次为《伯希和考察队中国突厥斯坦考察报告》Rapport de M. Paul Pelliot sur sa Mission au Turkestan chinois (1906—1909)《法国金石铭文学院学报》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910年号58—68页。

〔32〕 Toumchouq (Planches)L. Hambis编巴黎1961年。

〔33〕 Toumchouq (texte)L. Hambis编巴黎1964年。

〔34〕 Site de Koutcha: Douldour-aqour et Soubachi (Planches)L. Hambis编巴黎1967年。

〔35〕 Koutcha, Temples construits: Douldour-aqour et Soubachi (Texte)巴黎1982年。

〔36〕 Sites divers de la region de Koutcha-Epigraphie koutcheenne, Chao Huashan, S. GaulierM. Maillard与G. Pinault合编巴黎1987年。

〔37〕 荣新江《所谓图木舒克语中的“gyazdi-”》日本《内陆亚细亚语言研究》Ⅶ1992年1—12页。

第七讲　敦煌学对欧美东方学的贡献

因为敦煌学的内容十分庞杂很难理清一个学术史的头绪中国已经出版的有关“敦煌学史”的论著往往重点在叙述中国学者的成就而忽略了外国同行的贡献。1995年法国的戴仁教授为《欧洲研究中国》一书撰写了《欧洲的敦煌研究》一文从汉学的角度简明扼要地概述了欧美的敦煌学成果特别是法国学者的成就并附有一个论著目录[1]。在此基础上我想从中国学术界的视角来审视一下欧美学者利用敦煌西域出土资料对东方学的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资料对汉学研究的贡献以及研究中暴露出来的一些缺陷以期理清一个线索为全面整理近百年敦煌学的学术史作准备。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从中国西北地区古代遗址中掠走了大量的文物和文献资料其中尤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和吐鲁番盆地中墓葬、洞窟、城址所得到的古代文献最为重要各国探险队所得各不相同因此决定了各国此后东方学研究也各具特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欧美东方学特别是汉学的格局。以下所述以敦煌资料研究为主但也包括相关的其他地区出土的各种文献材料。

一　俄　国

俄国是最早在塔里木盆地收集古物的国家所得当然主要是梵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胡语资料。奥登堡是最后一个到敦煌藏经洞攫取宝藏的人所得数量却不是最少的。俄藏敦煌收集品总共有一万八千多号其中多为佛经的残片与英、法所藏无法同日而语。因此俄苏学者对敦煌写本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直到六十年代才有孟列夫L. N. Mens' ikov教授主编了两本《汉文写本注记目录》[2]著录不到三千号写本。孟氏又出版了一系列敦煌通俗文学作品的研究如《双恩记》、《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等[3]使人得窥一些俄藏长卷的真相。《目录》编纂工作得到了陆续访问苏联的中国学者郑振铎、梁希彦等先生的帮助。以后俄国的敦煌汉文写本研究加入一位中国出生的丘古耶夫斯基L.

I. Cuguevskii先生他主要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在1983年出版了籍帐、赋役、寺院经济文书为主的《敦煌汉文文书》第一卷[4]其中如《寿昌县户籍》长卷图1为其他藏品中所未见过的材料然迄今没有出版第二卷。好在从1992年开始俄中双方合作编辑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大型图录现已出版了15卷按编号首次刊布了俄藏敦煌文献其中如《王梵志诗集》、《历代法宝记》、《斋琬文》、《文选》、《瑶池新咏》、《唐人诗集》非白居易新乐府等均极富研究旨趣。有些被当作敦煌出土的文献一旦真相毕露可以去伪存真如一些西夏和元朝纪年的写本和刻本实系黑城出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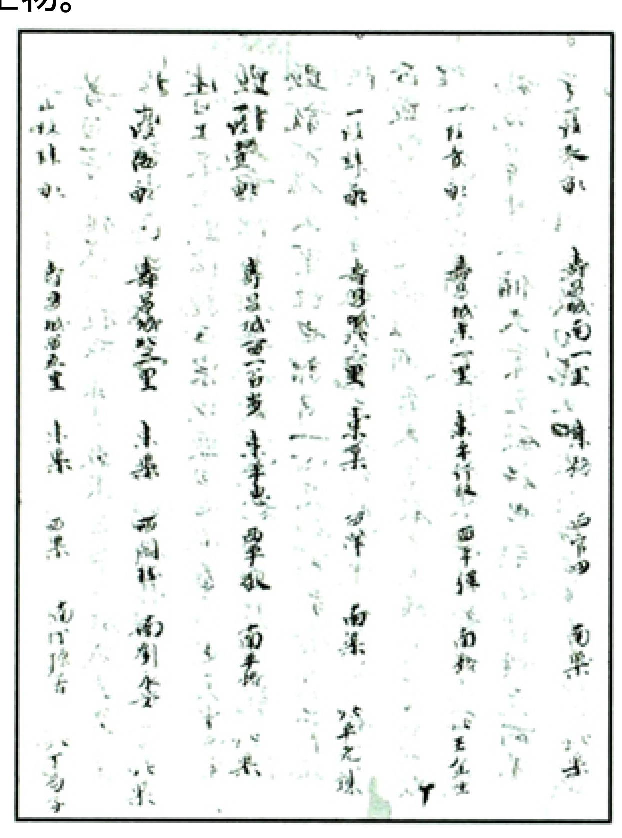


图1　丘古耶夫斯基刊《寿昌县户籍》

科兹洛夫考察队在哈拉浩特黑城子发掘到大量文献资料主要是宋、西夏时期的汉文和西夏文材料。这部分汉文文献较之俄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研究更不充分除了《刘知远诸宫调》外大多数文献的情形外界无从知晓。孟列夫在整理敦煌文献的同时也着手整理黑城汉文文献。1984年他出版了《黑城出土的汉文收集品注记目录》[5]共著录488件印本、写本、文书、纸币全面揭示了这组文献的内容除佛经外如《吕观文进庄子义》、《汉书》、《新唐书》、《新雕文酒清话》、

《孙真人千金方》都是富有研究旨趣的文献。另外还有三组文书一是1118—1131年间宋夏边界的陕西鄜延路的官府文书二是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西夏军政文书三是1304—1364年间元朝末年的军事文书是研究宋、西夏、女真、蒙元各个政权在西北地区活动的珍贵档案。1996年开始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与俄方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编全部六册。

对于西夏人用本民族语言所写的西夏文文献的研究是俄苏学者在世界东方学研究中最值得骄傲一个方面。圣彼得堡所藏黑城出土的文献资料有八千多件其主体是西夏文文献。早在1909年伊凤阁A. Ivanov等就报导过黑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以后数十年来代有人出陆续整理出一大批西夏文典籍有佛典有汉文典籍的翻译有汉西夏文字典还有法令和法律文书等等。1963年戈尔巴切娃Z. I. Gorbachove与克恰诺夫E. I. Kychanov合编出版了《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一书著录了西夏文典籍405种其中345种是佛典均译自汉文、藏文和梵文。非佛教文献有60种有译自汉文或据汉文编译的《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六韬》、《孙子兵法》、《类林》、《黄石公三略》等有西夏人自撰的律令、官品文书还有字典、占卜、文学作品等[6]。其中一些重要的文献已经整理刊布如《西夏文译汉文经典》[7]、《文海》[8]、《类林》[9]、《天盛1149-1169改定新律》[10]还有一些社会经济和军事类文书[11]。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国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合作编辑《俄藏黑水城文献》大型图录的西夏文部分。

在俄国西域收集品中有不少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书。俄国突厥学家拉德洛夫曾把俄、德两国所获吐鲁番回鹘文文书整理成一部资料集其去世后由马洛夫最终完成题为《回鹘鹘文文献合集》于1928年出版[12]共转写翻译了128个编号的回鹘文世俗文书和佛教、摩尼教、景教文献残卷。此外拉德洛夫还刊布了马洛夫考察队从甘肃、新疆带回的一些回鹘文佛典。此外马洛夫、吐古舍娃等继续回鹘文的研究出版过《回鹘文玄奘传》卷十等。

圣彼得堡还藏有各种中古伊朗语文献残卷其中的粟特文写本大多在1980年由拉果札A. N. Ragoza在《东方学研究所中亚收集品中的粟特语残卷》一书中刊布[13]但错误较多英国的辛姆斯-威廉姆斯有书评文章

《列宁格勒藏粟特语残卷》[14]必须参看。这些粟特语文献是研究中亚宗教和中西文化交往的重要史料。

俄藏于阗文佛典十分丰富仅《赞巴斯塔书》就近二百叶抄本近年恩默瑞克R. E. Emmerick与沃罗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M. I. Vorob' eva-Des-jatovskaja合著《塞语文书集》第七卷《圣彼得堡收集品》和《塞语文书转写翻译卷》第三卷《圣彼得堡收集品》[15]发表俄藏于阗文写本照片和转写翻译仅世俗文书就有263件之多这些文书多出自丹丹乌里克是研究于阗陷蕃以前历史的重要资料。

俄藏中亚梵文写本也是大宗如《妙法莲华经》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就有281叶较完整的抄本和108件残片。由于这批《法华经》写本是马继业送自喀什故此一般称之为"喀什写本"。事实上根据写本最后一页的回向文这个本子应当是于阗人抄写的。自六十年代以来在邦嘎尔-列文G. M. Bongard-Levin教授的领导下发表一系列研究论文1985年开始出版《中亚出土的印度语文献》1990年出版第二卷[16]。这些中亚写本的梵文经典是研究早期佛教通过西域传播到中原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汉译佛典来历的主要史源。

俄国是欧美东方学中的重镇但由于苏联时期的学术体制和俄语的限制俄国收藏的资料对外不够公开外界对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不能充分利用无形中降低了俄国东方学的影响。近年来俄藏中亚文献全面开发欧美、中国学者与之合作大量资料发表出来但整理和研究尚需时日。

二　英　国

英国几乎是和俄国同时开始收集新疆古物的最初所得当然也是梵文、吐火罗文、于阗文的资料由梵文学家霍恩雷A. F. R. Hoernle教授主持整理工作主要成果发表在霍恩雷主编的《新疆出土佛教文献丛残》第一卷中牛津大学出版社1916年出版[17]。

斯坦因的三次中亚探险不仅带回大量西域古代语言所写的文献而且第一个攫取到藏经洞的丰富宝藏其中包括梵文、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和汉文现编为13989号带动了英国东方学许多门类的发展。其中斯坦因在长城烽燧所发现的汉简交法国汉学家沙畹Ed.

Chavannes 1865—1918考释出版[18]沙畹把他的稿本寄给罗振玉罗氏与王国维合作写成《流沙坠简》。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汉文文献斯坦因原本是请伯希和P. Pelliot来整理的但伯希和太忙没有时间投入于1913年表示难以着手。所以自1914年起交英国博物馆的汉籍保管员翟林奈Lionel Giles来整理[19]。翟林奈的工作在没有任何人帮忙的情况下慢慢进行。他自1914年开始陆续发表一些文献的整理翻译成果但他的第一篇文章《□敦煌录□译注》[20]就受到当时留美的胡适的激烈批评[21]。为此当1926年胡适到英国博物馆查找敦煌禅宗文献时反而得到了他的特别关照。但翟林奈没有接受教训三十年代向达、于道泉等先生先后访书英伦都受到翟氏刁难。翟氏在1957年退休时出版了他的《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22]但遗留下许多难以比定的残片。直到1991年才由荣新江和方广锠重新编目[23]。

1913—1930年间供职于英博的魏礼Arthur Waley 1889—1968可以说是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他自学成才有好奇心工作极为努力。魏礼知识面极为广博他在1931年就出版了斯坦因所获敦煌绢纸绘画的目录图2因为这时斯坦因收集品还没有在英博和印度政府间瓜分所以这是一份完整的目录[24]很有参考价值。魏礼以后辞职拒受大学聘约在家翻译著述。1956年魏礼发表《有关敦煌地区伊朗神祠的一些记载》揭示了唐五代敦煌地区祆教的流行情况[25]。1960年魏礼又出版了部分敦煌变文的译注[26]这当然是《敦煌变文集》1957出版的直接后果但把俗文学作品译成英文诚非易事。他在《高本汉纪念文集》中发表过订正《变文集》的书评论文[27]。

base, with steps leading on to a railed platform. The Bodhisattvas are in Indian poses. The drawing is not finished on the left side.

SIZE: 1 ft. 4[illegible] in. by 0 ft. 11 in.

CCCXCI (Ch. 00451). AVALOKITEŚVARA. (Upper part only.) Dated 865 (?)

Similar to XIII. Body inclined to left shoulder. Remains of willow-spray in right hand. Left hand lost. Dhyāni Buddha in tiara. Dress, jewellery and colouring the same as in XIII. But paint upon body (white shaded with pink) has been more thickly applied, and more of it remains. Halo of plain circular rings of dark olive, red and white. Remains of canopy visible above.

Inscription: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一軀奉
爲過往孃父神生淨土征行早達家鄉
見存眷属吉慶清宜法界蒼生
同霑斯福甲申年十一月功德終畢矣
清信佛弟子張忠信一心供養

'Praise to the Great Merciful Great Compassionate Saviour from Pain Avalokiteśvara Bodhisattva. This single image is offered on behalf of (my) departed mohter and father. May their spirits be born in the Paradise (of Amitābha). May (my) journeying soon take me back to my native land and house. May my living friends and relations enjoy prosperity, peace, and comfort. May all living things in the realms of Dharma be equally wetted with (the dew of) this good fortune. In a year (with the cyclical signs) *chia shên*, in the eleventh month, this pious work was completed.

'Dedicated by the Buddhist disciple of pure faith Chang Chung-hsin, with whole heart.'

(The date is A.D. 925; or 865. Perhaps the latter is the more probable.)

COLOURS: Flesh has been pink-white, but this has chipped away. General tone of red-brown.

REPRODUCED: *Thousand Buddhas*, Pl. XLIV.

PAINTING: 2 ft. 5[illegible] in. by 1 ft. 11[illegible] in.

图2　魏礼《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书影

相比于内容丰富甚至使人眼花缭乱的法国汉学研究成果二战以后英国在利用敦煌学材料研究汉学方面日渐衰落。值得特别表彰的是崔维泽D. Twitchett教授他在50—70年代间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唐史的文章充分利用了敦煌官制、法制、经济、氏族等方面的文书如《唐代的寺院经济》[28]、《寺院与中古时期中国的经济》[29]、《敦煌发现的唐代水部式残卷》[30]、《唐代的土地与国家耕作问题》[31]、《7—1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敦煌文书及其包含的意义》[32]、《敦煌出土唐□格□残卷札记》[33]、《晚唐的商人、贸易和政府》[34]、《唐前期的地方财政管理》[35]、《唐朝统治阶级的构成——敦煌文书中的新证据》[36]这些文章成为他撰写《唐代财政制度》和编纂《剑桥中国史》的重要根基[37]。此外他还写了一本名为《中古中国的印刷与出版》的小书[38]。

目前英国活跃的汉学家如麦大维D. L. McMullen、杜德桥G. Dudbridge、巴瑞特T. Barrett等都在研究唐代儒学、礼法、小说、民间宗教、道教时利用敦煌材料但不以敦煌为主要研究对象。现在以英国图书馆魏泓S. Whitfield为主正在进行敦煌写本的电子版工作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部分英藏敦煌文献已经上网可以免费注册浏览[39]。

敦煌藏经洞和新疆米兰、麻札塔格三处出土的古藏文写本是研究吐蕃占领敦煌和西域时期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比利时佛学家瓦雷·普散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 1869—1937为敦煌藏文写卷编了765号的佛典目录名为《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40]。

非佛教文书则由1903—1927年任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长的托玛斯Frederick William Thomas 1867—1956负责整理工作。托玛斯的整理研究成果发表在一系列文章中后辑为《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一书[41]。

和田地区和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于阗文写本主要由剑桥大学的贝利H. W. Bailey整理刊布他把所能找到的于阗语文书全都转写发表在《于阗语文献集》第一、二、三、五集和《于阗语佛教文献集》中[42]是于阗语研究的集大成著作。

由于二战前希特勒的迫害恒宁W. B. Henning等伊朗语言学家的移居英国使英国伊朗语研究成为重镇。恒宁及其继承人博伊丝M. Boyce、麦肯吉D. N. MacKenzie、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成为粟特语文献的重要解读和研究者[43]。

三　法　国

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中有目的的拣选带给法国汉学界丰富的汉学研究素材。伯希和的北京之行也确立了法国汉学界在敦煌文献整理上与中国学者保持联络的态势。

因为伯希和为法国获得如此重要的宝藏法国的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特别设立“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由伯希和主持伯希和由此得以和他的老师——时为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的沙畹并立于法国的最高学坛。伯希和兴趣太广他涉及了敦煌卷子中汉文、于阗文、回鹘文、藏文、粟特文等各个方面无法一一列举[44]他的主要贡献

和兴趣是在西域历史、语言方面除了和日本学者羽田亨联名编印了两本《敦煌遗书》外[45]他自己几乎没有完成任何一本有关敦煌的汉文专著。他编制了P.2001—3511号的汉文写本目录也只是草目性质的东西曾被旅法的中国学者抄出并翻译发表[46]。1920年以后伯希和已经放弃了编目的工作而先后由日本学者那波利贞、中国的王重民、美国的杨联陞陆续完成初稿其中以1934—1939年在巴黎工作的王重民先生贡献最多。

1921年接替沙畹为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的马伯乐H. Maspero 1883—1945才是真正的法国汉学界的代表人物。他自继任汉学讲座教授后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出版《中国历史》第一卷内容为汉代以前的部分现在看来已经落后于考古资料。他受斯坦因之托来整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这是他研究汉唐历史特别是制度史的结果可惜在他去世后才得以面世[47]。马伯乐同时又研究道教和汉语音韵都利用了敦煌文献他找出的南朝道士宋文明的佚书《道教义渊》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1945年伯希和和马伯乐的去世带给法国汉学无尽的损失。

沙畹的另一个弟子葛兰言M. Granet 1884—1940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的神话和历史传说而闻名的。葛氏的弟子石泰安R. A. Stein和康德谟M. Kaltenmark大力推动了法国的道教研究在这方面马伯乐已经开了个头。石泰安在1966年出任法兰西学院中国社会研究讲座教授有不少课程是讲授道教内容的。在他们的影响和教育下法国成长起一批研究道教的专家如施舟人K. Schipper、索安A. Seidel、苏远鸣M. Soymié、劳格文J. Lagerwey、穆瑞明Ch. Mollier等都曾利用敦煌道教典籍来研究道教或道教史的某些方面[48]。另外华裔法国学者吴其昱也刊布了敦煌道教佚经《太玄真一本际经》[49]。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最有成就和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是法国的戴密微P. Demiéville 1894—1979教授图3他继承了他的老师沙畹开创的法国汉学传统在敦煌学的领域或者说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汉学的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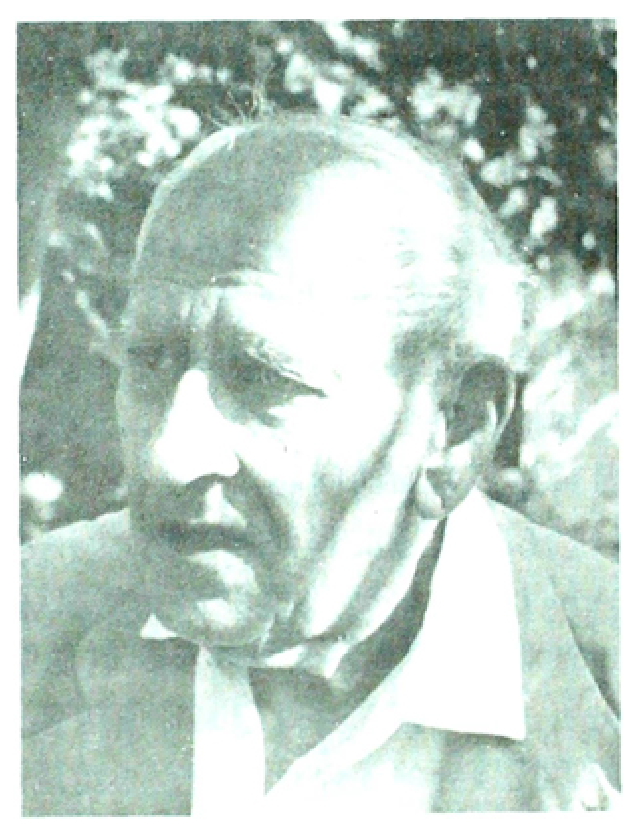


图3　戴密微

戴密微有着深厚的佛学功底早在1933年他就指出粟特文专家所刊布的敦煌粟特文写本《头陀经》Dhuta-sūtra应当是已佚禅宗伪经《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敦煌残本后面缺失部分的翻译。近年在北京图书馆和天津艺术博物馆等处发现了该经的全本完全证实了戴密微的准确判断〔50〕。显然他很早就注意到敦煌文献中禅宗写本的价值。1934—1939年王重民先生逗留巴黎期间戴密微和王重民两人每周聚在一起共同研讨敦煌卷子中有关汉地和印度僧人在吐蕃争论顿渐问题的材料。1946年戴密微继马伯乐之后出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1952年他出版了《拉萨僧诤记》后改名《吐蕃僧诤记》翻译并详细注释了有关禅僧入藏与印度僧人斗法的敦煌文献〔51〕。此书拓展了敦煌禅宗文献研究的范围在汉藏佛教史、汉藏关系史等许多方面都有所贡献。以后戴密微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仍然不断讲授禅宗典籍并不时发表一些论文〔52〕。

敦煌通俗文学作品如变文、曲子词、通俗诗、童蒙读物等是戴密微研究的另一方面的内容。他对这些资料的理解和分析体现在他翻译的饶宗颐《敦煌曲》和他译注的《王梵志诗》与《太公家教》等著作

中[53]他同时也在授课中讲解了这方面的内容并发表了其中一些相关论文[54]。

与典籍类写本相比敦煌世俗文书的研究似乎更为困难一些。戴密微的学生之一谢和耐J. Gernet利用敦煌文书所作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为法国汉学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谢和耐早在1949年就翻译出版了胡适的《神会和尚遗集》并利用巴黎的写本对胡适录文有所订正[55]。1956年他发表了《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一书主要以敦煌写本为论据不是从宗教史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阐述印度戒律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过程并提出佛教的衰落问题[56]。他以后又对敦煌的契约文书作过研究但自从1975年出任法兰西学院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教授以后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探讨明末的社会和思想上去了。

谢和耐开创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后继有人。童丕E. Trombert先生着力于社会经济类文书的研究并于1995年出版了《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57]。现在他正利用敦煌写本来研究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方面的问题。

在戴密微的督促下自五十年代开始法国学者利用伯希和、王重民等人留下的目录草稿重新开始编纂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1955年由谢和耐和吴其昱执笔的第一册已经完稿但迟到1970年才得以出版。除了第二卷由于某种原因还没有出版外第三、四、五卷已经由苏远鸣教授领导的敦煌写本研究小组陆续完成并且出版[58]。第六卷2001年4月刚刚出版是伯希和藏文写卷中混入的汉文文书目录[59]。苏远鸣还主编了三册《敦煌研究论文集》集中发表了法国敦煌研究小组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不少有关道教、民间宗教和占卜文献的研究[60]。2000年法国远东学院法英双语刊物《远东研究纪要》Cahiers de Extrême-Asie第11卷由戴仁任特邀主编作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敦煌学新研”专号出版图4集中发表了八篇文章其中有法国学者苏远鸣、戴仁、穆瑞明、童丕、茅甘C. Morgan等人关于敦煌绘画的供养者、《大随求陀罗尼》和早期印刷术、佛教对道教“厨”观念的吸收和利用、敦煌寺院僧人饮酒问题、西北地区的占卜、藏文史书等方面的论文。



Cahiers d'Extrême-Asie

Revue bilingue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Section de Kyôto

Bilingual Journal of the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Nouvelles études de Dunhuang
Centenaire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Jean-Pierre Drège	À nos lecteurs / To our readers
Kuo Liying	In Memoriam : Rolf Alfred Stein (1911-1999)

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 la grotte aux manuscrits de Dunhuang

Michel Soymié	Les donateurs dans les peintures de Dunhuang
Jean-Pierre Drège	Les premières impressions des *dhāraṇī* de Mahāpratisarā
Christine Mollier	Les cuisines de Laozi et du Buddha
Françoise Wang-Toutain	Pas de boissons alcoolisées, pas de viande : une particularité du bouddhisme chinois vue à travers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Éric Trombert	Bière et Bouddhisme : la consommation de boissons alcoolisées dans les monastères de Dunhuang aux VIIIe-Xe siècles
Carole Morgan	Mayhem o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Cristina Scherrer-Schaub	Prière pour un apostat : fragments d'histoire tibétaine
Rong Xinjiang	The Nature of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Sealing

Études chinoises et japonaises

Antonino Forte	Iranians in China : Buddhism, Zoroastrianism, and Bureaus of Commerce
Catherine Ludvik	La Benzaiten à huit bras : Durgā déesse guerrière sous l'apparence de Sarasvatī

11

1999-2000

图4　《远东研究纪要》敦煌学专号

法国学者的编目工作是在使用原卷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其目录对于写本的外观描述十分详细。也正是由于法国学者有这样的接触原卷的便利条件才会有像戴仁教授这样的书籍考古学家的产生。从七十年代末以来戴仁先后探讨了敦煌写本的物质特征的许多方面如字体、装祯形式、武周新字、纸张、颜色、伪卷等还出版了有关藏书制度和流通情况的专著[61]。

敦煌藏文写本由拉露Marcelle Lalou 1890—1969完成编目工作分别在1939、1950和1961年出版《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62]。巴考Jacques Bacot 1890—1967、拉露、埃里安·麦克唐纳A. Macdonald、石泰安等人在藏文写本研究上也成就卓著[63]。

哈密顿J. Hamilton整理了回鹘文文献于1986年出版了两卷本的《敦煌9—10世纪回鹘文写本汇编》[64]。

伯希和在库车发现不少梵文和龟兹文写本烈维Sylvain Levi做了先驱的研究。近年来皮诺Georges Pinault对世俗文书的转写翻译值得注

意。

四　德　国

勒柯克A. von Le Coq曾在斯坦因去敦煌之前听到敦煌发现写本的消息但他错过了敦煌德国汉学界也因此错过了敦煌。

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在吐鲁番也发掘到不少汉文写本和印本但世俗文书不多而且所发现的资料几乎都是残片。这些土中发掘的残片载负的信息量自然要比敦煌藏经洞完好保存的写本卷子要少得多不可能给德国的汉学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战后东德的梯娄Thomas Thilo发表过德藏吐鲁番文书中户籍、学郎题记、汉文摩尼教文献残卷等[65]并在日本学者的帮助下编辑了两本《汉文佛教文献残卷目录》[66]。德国学者在东方学的其他领域里大显身手唯独在利用新出资料研究汉学上没有什么成就。埃伯哈德W. Eberhard对敦煌人口和居民的研究是少有的例外[67]。

由于吐鲁番出土的梵文、吐火罗文、中古波斯文、粟特文、回鹘文数量极大德国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一直居领先地位而研究者代有其人。梵文方面有吕德斯H. Luders、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等现已陆续编成多卷本《吐鲁番发现梵文写本丛刊》[68]。吐火罗文由西格E. Sieg、西格林W. Siegling、托玛斯W. Thomas整理出版有《吐火罗语残卷》[69]。中古波斯文和粟特文先有恒宁整理战后由宗德曼W. Sundermann整理。回鹘文先后整理者有缪勒F. W. K. Müller、邦格W. Bang、葛玛丽A. von Gabain战后茨默P. Zieme作出的贡献最大。伊朗和回鹘语文献的主要成果收入《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70]。

五　其　他

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曾多次在中亚考察也有一些汉文写本的发现如得自楼兰的《战国策》但数量不多要籍更少[71]瑞典汉学的发展并没有受到这些资料的影响。欧洲其他汉学发达的国家如荷兰因为没有敦煌资料所以走了其他的汉学之路。

美国没有集中的敦煌和新疆出土文献材料因此也没有形成像英、法、德、俄那样的整理研究队伍。从东方学和汉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早

期的研究者如罗弗B. Laufer曾参与敦煌的研究。八十年代以来最有贡献的学者要数梅维恒V. H. Mair教授对敦煌通俗文学的研究。他先是翻译了四种敦煌变文接着出版了两本专著探讨变文这种文学体裁和形式的来源、传播以及它对中国白话小说和戏剧的影响[72]。虽然目前梅维恒主要关心的是新疆古尸和吐火罗人的问题但他不时仍有重要的敦煌文学论文发表如最近他讨论P.4524《劳度叉斗圣变并图》的论文就颇有新意[73]。

在法国和日本汉学研究的影响下美国学者在早期禅宗史、华严宗、密宗的研究上也有所贡献[74]。而太史文S. Teiser教授的《十王经》研究则是用宗教学的理论方法来解析敦煌的疑伪经问题[75]。

道教方面受法国学者的影响也有出色的研究者石泰安的弟子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是把法国道教研究引入美国的重要人物他本人主要研究上清派和茅山宗。

值得提到的还有意大利学者富安敦A. Forte关于《大云经疏》和武周政权关系的研究[76]他目前正在修订他的《7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

近些年来欧美的敦煌研究仍然是汉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中国学者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对敦煌汉文写本研究的热情投入出版了大量的让欧美学者很难驾驭的、真伪混杂的敦煌论著使得他们的研究不得不有所转向。在与敦煌汉文写本密切相关的各种胡语的探讨上欧美学者仍然占有无可超越的优势而这些语言书写的材料的解读考释必将有助于汉文文书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与敦煌相关的吐鲁番文献的研究更趋重要因为那里出土的文献内容较敦煌文献更复杂有待探讨的问题更多一些但汉学的内容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近年出版的两本重要论文集卡多那Cadonna编《吐鲁番与敦煌文献研究论集》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Firenze 1992和恩默瑞克R. E. Emmerick等编《吐鲁番、于阗、敦煌研究文集》Turfan, Khotan und Dunhuang, Berlin 1996都把吐鲁番列在前面这并不是偶然的。耶鲁大学韩森V. Hansen教授在鲁斯基金会支持下组织美中学者进行的“重聚高昌宝藏”研究计划也是这种趋势的反映同时也表明了欧美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研究的意愿。

注释

〔1〕 戴仁J.-P. Drège《欧洲的敦煌研究》Tun-huang Studies in Europe《欧洲研究中国欧洲汉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伦敦寒山堂1995年513—532页。更详细的目录见布索迪Michela Bussotti与戴仁合编《西文敦煌学论著目录初编》Essai de bibliographie des travaux sur Dunhuang en langues occidentales戴仁编《从敦煌到日本——苏远鸣纪念汉学与佛教学论集》De Dunhuang au Japon. Etudes chinoises et bouddhiques offertes à Michel Soymié日内瓦1996年411—454页。《法国学者敦煌学论著目录》《法国汉学》第5辑中华书局2000年298—335页但仍不完全而且有一些篇名的中译文不够确切。

〔2〕 孟列夫编《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莫斯科19631967年。汉译本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上、下册孟列夫等编袁席箴、陈华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3〕 主要有孟列夫《维摩诘经变文与十吉祥变文研究》莫斯科1963年孟列夫《报恩经变文双恩记研究》莫斯科1972年。

〔4〕 丘古耶夫斯基《敦煌汉文文书》第1册莫斯科1983年。

〔5〕 王克孝汉译本《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6〕 Z. I. Gorbachova & E. I. Kychanov, Tangutskiye rukopisi i ksilografii莫斯科1963年。

〔7〕 V. S. Kolokolov & E. I. Kychanov, Kitaiskaya Klassika v Tangutskom Perevode莫斯科1966年。

〔8〕 K. B. Kepping, V. S. Kolokolov, E. I. Kychanov & A. P. Terent' ev-Katanskogo, More Pis' men. Faksimile Tangutskikh Ksilografov2卷莫斯科1969年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9〕 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据柯萍的刊本撰成《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 E. I. Kychanov, Izmenyonny i zanovo utverzhdyonny kodeks deviza tsarstvovaniy Nebesnoe protsvetanie1149-11694卷莫斯科1987-1989年。

〔11〕 见克恰诺夫的一系列论著“Tangutskie istochniki o gosudarstvenno-administrativnom apparate Si-sya”, Kratkie soobscheniya Instituta Narodov Azii AN SSSR, 69, 1965, pp.180-218; "A Tangut document of 1224 from Khara-Khoto", AOH, ⅩⅩⅣ.2, 1971, pp.189-201; "Tangutskii dokument 1170 go prodaze zemli", Pis' mennye Pamjatniki Vostoka, 1971, Moscow 1974, pp. 193-203. E. I. Kychanov & H. Franke, Tangutische und chinesische Quellen zur Militargesetzgebung des 11. bis 13. Jahrhunderts (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 Ab. neue F. H. 104), München 1990.

〔12〕 W. Radloff, Uigurische Sprachdenkmaler. Materialien nach dem Tode des Verffassers mit Erganzungen von S. Malov herausgegeben, Leningrad 1928。

〔13〕 A. N. Ragoza, Sogdiyskie fragmenty Tsentral' noaziatskogo sobraniya Instituta Vostokovedeniya. Moscow 1980。

〔14〕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Fragments of Leningrad", BSOAS, ⅩⅣ, 1981, pp.231-240。

〔15〕 R. E. Emmerick and M. I. Vorob' eva-Desjatovskaja (eds.), Saka Documents Ⅶ: the St. Petersburg collections (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 Part Ⅱ: Inscriptions of the Seleucid and Parthian periods and of Eastern Iran and Central Asia, Vol. Ⅴ: Saka),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3; idem., 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 Ⅲ: the St. Petersburg collections (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 Part Ⅱ: Inscriptions of the Seleucid and Parthian periods and of Eastern Iran and Central Asia, Vol. Ⅴ: Saka),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5.

〔16〕 G. M. Bongard-Levin & M. I. Vorobyeva-Desyatovskaya, Pamyatniki indiiskoi Pismennosti in Tsentralnoi Azii Ⅰ-Ⅱ, Moscow 1985-1990.

〔17〕 A. F. R. Hoernle, Manuscripts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6.

〔18〕 沙畹《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牛津1913年。

〔19〕 吴芳思F. Wood《敦煌两千年》《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中亚古代文书及其保护讨论会纪要》Dunhuang and Turfan魏泓S. Whitfield与吴芳思合编伦敦英国图书馆1996年1—2页。

〔20〕 L. Giles, "Tun Huang Lu: Notes on the district of Tun-huang"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RAS1914年号。

〔21〕 胡适的批评和翟氏的重译均载同上刊物1915年号。

〔22〕 翟林奈《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伦敦1957年。翟氏此前发表的其他重要论著是《敦煌6世纪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的汉文写本简记》Six centuries at Tun-huang, a short account of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44、《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汉文纪年写本》Dated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Ⅰ-Ⅳ, BSOAS, Ⅶ-Ⅺ, 1935—1943。

〔23〕 荣新江的目录《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已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于1994年出版方广锠的佛典目录还没有编完。

〔24〕 魏礼《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by Sir Aurel Stein伦敦1931年。

〔25〕 A. Waley, "Some Reference to Iranian Temples in the Tun-huang Region"《史语所集刊》第28本胡适六十五岁生日纪念文集1956年。

〔26〕 《敦煌的民谣与故事选集》Ballads and stories from Tun-huang: An anthology纽约1960年。

〔27〕 魏礼《关于□敦煌变文集□》On the Tun-huang pien-wen chi《纪念高本汉中国研究论文集》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哥本哈根1959年。

〔28〕 "Monastic Estates in T' ang China", Asia Major, new series, Ⅴ.2,1956.

〔29〕 "The Monasteries and China's Economy in Medieval Time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3,1957.

〔30〕 "The Fragment of the T'ang Ordinances of the Department of Water Ways discovered at Tun-huang", Asia Major, new series, Ⅵ.1,1957.

〔31〕 "Lands and State Cultivation under the T' ang",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Orient, Ⅱ.2-3,1959.

〔32〕 "Chinese Social History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Tenth Centuries: The Tun-huang Documen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Past and Present, 35,1966.

〔33〕 "A Note on the Dunhuang Fragments of the T' ang Regulation ko", BSOAS, 30.2,1967.

〔34〕 "Merchant, Trade and Government in Late T' ang", Asia Major, new series, ⅩⅣ.1,1968.

［35］ "Local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in Early T' ang Times", Asia Major, new series, XV.1,1969.

［36］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 ang Ruling Class: New Evidence from Tunhuang", Perspectives on the T' ang, ed., by A. F. Wright and D. Twitchett, New Haven 1973.

［37］ Fina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 ang Dynasty, London 1963, 2nd ed. 1971;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3.1, Cambridge 1979.

［38］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New York 1983.

［39］ 有关情况可以参看《国际敦煌学项目通讯》IDP News或http://idp.bl.uk。

［40］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41］ 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4 vols., London 1935-1963.

［42］ H. 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Ⅰ-Ⅲ, Ⅴ,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980; Khotanese Buddhist Tex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3］ 麦肯吉D. N. MacKenzie《英国图书馆藏粟特语佛教文献》The Buddhist Sogdian Texts of the British Library莱顿1976年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英国图书馆藏粟特语残卷》The Sogdian Fragments of the British Library《印度伊朗学刊》Indo-Iranian Journal第18卷1976年43—82页。

［44］ 比较重要的有伯希和与邦旺尼斯特E. Benveniste合著《粟特语善恶因果经》Le sūtra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du bien et du mal二卷本巴黎1920、1928年。

［45］ 伯希和与羽田亨合编《敦煌遗书》活字本、影印本各一集京都1926年。

［46］ 伯希和编陆翔译《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P.2001—3511《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6期第8卷第1期。

［47］ 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得汉文文书》伦敦1953年。

［48］ 施舟人《敦煌写本中所见的道教位阶等级》Taoist Ordination Ranks in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东亚宗教与哲学论集》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Ostasien. Festschrift für Hans Steininger维尔茨堡1985年索安《汉代道教对老子的神化》La divinisation de Lao tseu dans le taoïsme des Han巴黎1969年劳格文《无上秘要——6世纪道教概论》Wu-shang pi-yao. Somme taoïste du Ⅵe siècle巴黎1981年穆瑞明《5世纪时的一部道教启示录——洞渊神咒经》Une apocalypse taoïste du Ⅴe siècle. Le Livre des Incantations Divines des Grottes Abyssales巴黎1990年。

［49］ 吴其昱《敦煌发现7世纪道教佚经本际经写本》Pen-tsi king. Le livre du terme originel巴黎1960年。

［50］ 吉田丰《粟特文头陀经及其汉文原本》The Sogdian Dhūta Text and Its Chinese Original《亚洲研究所纪要》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第10卷1996年167—173页。

［51］ 戴密微《拉萨僧诤记》Le concile de Lhasa后改称“吐蕃僧诤记”巴黎1952年。中译本耿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52］ 戴密微的讲课内容在每一年的《法兰西学院年鉴》Annuaire du Collège de France中都有报道。也请参看戴密微《佛学论文选集》Choix d' études bouddhiques莱顿1973年。

［53］ 戴密微译、饶宗颐著《敦煌曲》Airs de Touen-houang巴黎1971年戴密微《王梵志诗与太公家教》L' oeuvre de Wang le Zélateur (Wang Fan-tche), suivie des Instructions de l' aïeul (T' ai-kong Kia-kiao)巴黎1982年。

［54］ 戴密微《汉学论文选集》Choix d' études sinologiques莱顿1973年。

〔55〕 谢和耐《荷泽神会和尚语录》Entretiens du Maître de dhyāna Chen-houei du Ho-tsö (668-760)河内1949年。

〔56〕 谢和耐《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u Ⅴe au Ⅹe siècle巴黎1956年。

〔57〕 童丕《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Le crédit à Dunhuang: vie matérielle et société en Chine médiévale巴黎1995年。

〔58〕 谢和耐、吴其昱、苏远鸣等编《敦煌汉文写本目录》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1、3、4、5册巴黎1970、1983、1991、1995年。

〔59〕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Volume Ⅵ, Fragment chinois du fonds Pelliot tibétain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rédigé par Françoise Wang-Toutain. Paris, 2001.

〔60〕 苏远鸣编《敦煌研究论文集》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巴黎1979、1981、1984年。

〔61〕 戴仁《写本时代10世纪以前的中国藏书》Les bibliothèques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 (jusqu' au Xe siècle)巴黎1991年及其所附参考文献中的戴仁论文目录。

〔62〕 M. Lalou,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es a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3 tomes, Paris 1939, 1950, 1961。

〔63〕 比较重要的论著有J. Bacot, Ch. Toussaint et F. W. Thomas,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 histoire du Tibét, Paris 1940—1946; J. Bacot, "Reconnaissance en Haute Asie septentrionale par cinq envoyes ouïgours au Ⅷ e siècle", JA, 1956, pp.137—153; M. Lalou, "Revendications des fonctionnaires du Grand Tibét au Ⅷe siècle", JA, 243, 1955, pp.171—212; A. Macdonald, "Une lecture des Pelliot tibétain 1286, 1287, 1038, 1047, et 1290", Études tibétaines dediées a la memoire de Marcelle Lalou, Paris 1971, pp.190—391这篇长文由耿昇译出题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R. A. Stein, "Tibetica Antiqua, Ⅰ—Ⅳ", BEFEO, ⅩⅩⅡ—ⅩⅩⅤ, 1983—1986。

〔64〕 J.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Ⅰ-Ⅱ, Paris: Fondation Singer-polignac 1986。

〔65〕 T. Thilo, "Fragmente chinesischer Haushaltsregister aus Dunhuang i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MIO, ⅩⅣ, 1968, pp.303—313又“Fragmente chinesischer Haushaltsregister der Tang-Zeit i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MIO, ⅩⅥ, 1970, pp.84—106又“Ein chinesischer Turfan-text aus der Zeit der Qara-qitay”, Scholia, Wiesbaden 1981, pp.201—205按此卷为学郎题记而非西辽纪年的看法系张广达先生指出又“Einige Bemerkungen zu zwei chinesisch-manichaischen Textfragmente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Agypten Vorderasien Turfan, eds. H. Klengel & W. Sundermann, Berlin 1991, pp.161—170。

〔66〕 Katalog chinesischer buddhistischer Textfragmente, Ⅰ—Ⅱ, Berlin 1975, 1985。

〔67〕 载《汉学》Sinologica第4卷2、3、4期1955—1956年。

〔68〕 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Wiesbaden, 1965—1989。

〔69〕 E. Sieg & W. Siegling, Tocharische Sprachreste, Sprache A, Ⅰ—Ⅱ, Berlin-Leipzig 1921又Tocharische Sprachreste, Sprache B, 1—2, Gottingen, 1949—1953; E. Sieg, W. Siegling & W. Thomas, Tocharische Sprachreste, Sprache B, Gottingen 1983。

〔70〕 Berliner Turfantexte。

〔71〕 孔好古A. Conrady《斯文赫定楼兰所获汉文文书和零星文物》斯德哥尔摩1920年。

［72］ 梅维恒《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Popular Narratives from Tun-huang剑桥1983年梅维恒《绘画与表演——中国看图讲唱及其印度起源》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檀香山1988年中译本由王邦维、荣新江、钱文忠译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梅维恒《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与戏剧兴起的贡献之研究》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A Studies of the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the Rise of Vernacular Fiction and Drama in China哈佛1989年。

［73］ Sariputra Defeats the Six Heterodox Masters: Oral-Visual Aspects of an Illustrated Transformation ScrollP4524载《泰东》Asia Major第3辑第8卷第2期1995年。

［74］ 赖华伦Whalen Lai与兰卡斯L. Lancaster编《汉藏两地的早期禅宗》Early Ch' an in China and Tibet伯克利1983年马克瑞J. R. McRae《北宗与早期禅宗的形成》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 an Buddhism檀香山1986年。

［75］ 太史文《十王经与中世纪中国佛教的炼狱观念之形成》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檀香山1994年。

［76］ 富安敦《7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那波利1976年。

第八讲　中国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

一　中　国

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有四大发现即殷墟的甲骨、西陲的汉晋木简、敦煌的六朝隋唐文书、北京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从时间跨度之长和内涵范围之广以及1900年前后四大发现已有的材料来讲其中无疑以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最高。

由于清朝的腐败敦煌的僻远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没有及时为中国学术界所知。1903年视学甘肃的金石学家叶昌炽虽然接触到敦煌藏经洞出上的经卷绘画但因为误信谣传以为藏经洞所出数百卷文物已瓜分殆尽因而没有亲赴敦煌调查与敦煌文书失之交臂[1]。藏经洞所出文献和艺术品的精华先后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在1907年和1908年攫取到手运送伦敦和巴黎。中国学者对敦煌文献的真正研究起始于1909年伯希和携带所得敦煌文献中的部分精品来到北京出示给中国的士大夫们。从此中国学者对敦煌文献孜孜以求薪火相传不遗余力地加以探研取得了丰硕成果。

1京师大学堂的学者开创了中国的敦煌学

1908年5月伯希和从敦煌出发东行到西安住了一个多月然后经郑州于八月到北京。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戊申1908十月廿五日条记

> 伯希和到图书馆言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板奇闻也[2]。

或许是伯希和此次访京师图书馆时没有把原卷出示给缪荃孙因此缪氏只当做“奇闻”听听而已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伯希和由北京南下到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述职。

1909年5月11日伯希和由河内再度向北京进发目的是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普通汉籍。这次他的行笈中带着经过精心挑选的敦煌四部典

籍、藏外写经、古文书、经帙等他显然对清朝士大夫们的兴趣有深入的了解。6月初伯希和先到南京拜会了即将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两江总督端方并且在端方所获吐鲁番出土《且渠安周造寺碑》拓本上题了字[3]。大概由于端方的介绍这位年仅三十出头的西洋学者受到了京师一批硕学鸿儒的盛情接待。当伯希和携敦煌卷子来京后罗振玉、蒋黼一作斧、王仁俊等前往其寓所抄录敦煌文献而参观者更是络绎不绝如后来与敦煌学有关的王国维、董康、叶恭绰等人都曾往观。9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忞、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兼大学堂毛诗教习江瀚、大学堂尔雅说文教习王仁俊、国子丞徐枋、大学堂音韵教习蒋黼还有董康、吴寅臣等其中主要是京师大学堂的一批学者[4]。而因病未能予会的罗振玉其时是大学堂农科监督。他们抄录文本并做跋语及时刊出如同年九月二十五日罗振玉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5]、年底以前王仁俊辑印的《敦煌石室真迹录》[6]、年底或下一年初罗振玉辑印的《敦煌石室遗书》和蒋斧《沙州文录》及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记》[7]。他们抄录的文献包括《尚书顾命》、《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图经》、《西州图经》、《老子化胡经》、《摩尼教残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经史子部要籍和宗教文献还有关于晚唐五代宋初的归义军官文书及碑铭赞之类写本以及稀见的唐人拓本《温泉铭》、《邕禅师塔铭》、《金刚经》这批录文和研究札记构成了中国敦煌学的初期篇章。如果说京师大学堂的学者们开创了中国的敦煌学当不为过。在招待会上恽毓鼎致词正式提出影印其中精要之本的要求伯希和表示“自可照办”。具体实施者是罗振玉。罗氏又请端方襄助图1敦请伯希和出售所携和已运回国的四部要籍写本照片伯氏如约陆续寄到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1911年初刘师培撰成《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种[8]。1910年罗振玉编成《石室秘宝》[9]为刊行敦煌影本之始。罗氏又陆续编有《佚籍丛残初编》[10]、《鸣沙石室佚书》[11]、《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2]、《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3]、《敦煌零拾》[14]、《敦煌石室遗书三种》[15]、《敦煌石室碎金》[16]等并撰写了大量敦煌写本跋语和校勘记成为贡献最大的敦煌学开拓者之一。此外罗振玉和王国维还据沙畹提供的斯坦因所获敦煌、楼兰汉晋木简编著成《流沙坠简》一书于

1914年出版[17]是早期敦煌学另一方面的代表作。蒋斧撰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是第一篇讨论这个问题的专文[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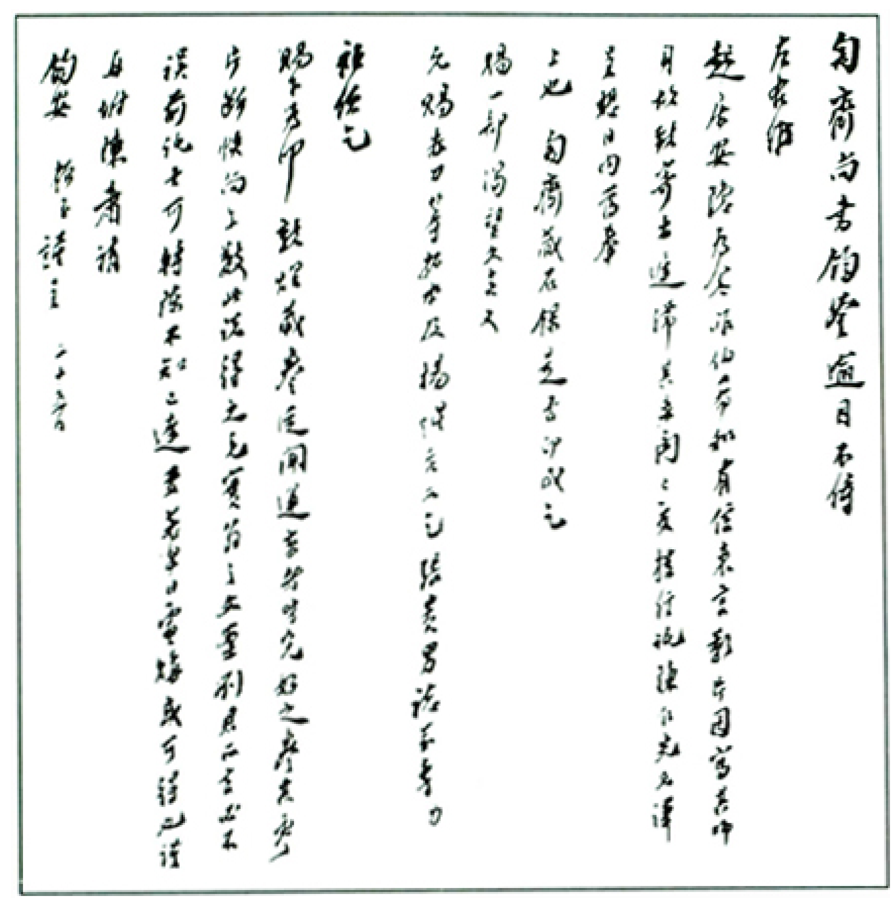


图1　罗振玉为请伯希和拍敦煌照片事致端方信

1909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访伯希和于苏州胡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尚有写卷约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罗振玉立即与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商议提请学部电令陕甘总督将藏经洞所余八千卷购归由大学堂购存后因价格不昂而转归学部。《松翁自序》记其事曰

> 予闻之欣然以语乔茂萱左丞请电护陕甘总督毛实君方伯庆蕃托其购致学部。予并拟电言须款几何请先垫给由部偿还。乔君携电上堂白之则电允照发而将还款语删去。予意甘肃贫瘠若令甘督任此必致为难。乃复提议于大学由大学出金。总监督刘公亦谓大学无此款。予曰若大学无此款由农科节省充之即予俸亦可捐充。刘公始允发电。逾月大学及学部同得复电言已购得八千卷价三千元两电文同。部中初疑价必昂闻仅三千元乃留之学部不归大学。

通过罗振玉等人的努力藏经洞剩余的近万号写本调运到北京归学部所属京师图书馆收藏这就是今存北京图书馆的敦煌经卷的来历。这批写

本后被学部官僚李盛铎、刘廷琛等人盗取精华进一步被掠但北京图书馆仍不失为敦煌文献四大收藏地之一。

中国早期的敦煌学研究由于资料主要得自伯希和的照片重点在于传统的四部古籍的研究其中既有清儒所未见的六朝唐人经籍写本也有一些后世已佚的经疏、史籍、佛典、道书等等为20世纪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2二十至四十年代的贡献

二十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前赴后继或远渡重洋调查抄录敦煌文献或万里西征考察敦煌石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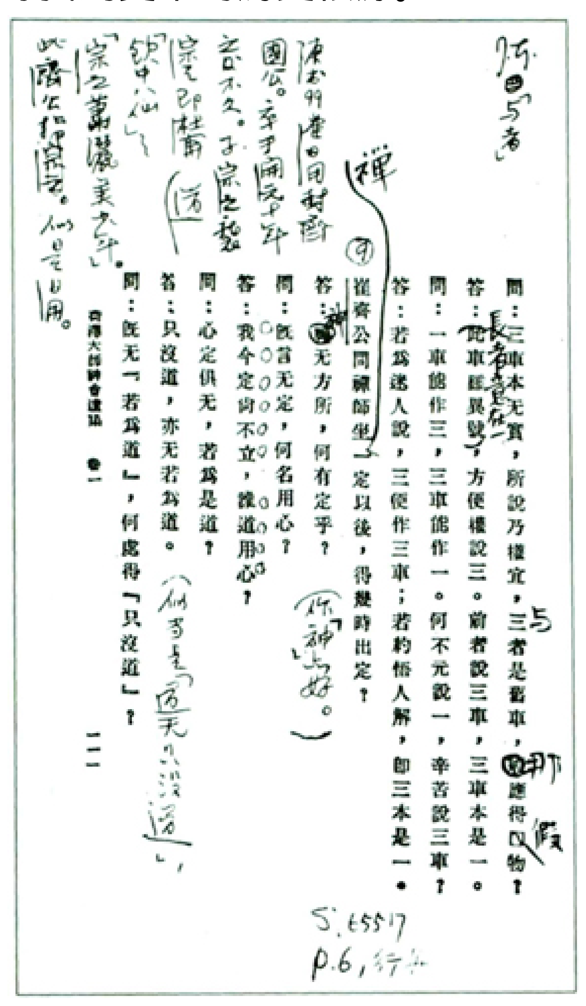
二三十年代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中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各种新思潮、新学问、新方法都充分地展现出来。敦煌资料的主体虽然是“国故”但它是新资料。所谓新不仅仅是指新出土而已还因为它包含有民间文学、公私文书等传统文献所缺的材料。敦煌资料虽然主要是文献材料但它是从敦煌藏经洞新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整理研究的方法必然要将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方法相结合。敦煌资料散在四方重要的写本多在英法而为西方汉学家先予研究发表因此敦煌学者一定要通外文并与国外学者进行合作。

二十年代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大多数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有关。

1920年北大预科教授刘复赴法留学在研究语音学的余暇抄出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有关文学、社会、语言的材料共104种。1925年返国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将所抄文献辑印为《敦煌掇琐》三册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出版蔡元培为之作序[19]。刘复即刘半农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新派学者文学革命的积极份子倡导白话文收集歌谣。这样的学术背景促使他所录的敦煌资料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即关于民间文学、社会情事、语言史的材料。正如蔡元培序中所说这些材料可以见当时社会状况可以得当时通俗文词的标本。由于不是每个人都能往巴黎阅卷刘复的抄本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中国敦煌研究的史源并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选题。

另外蔡元培在1921年访问法国时曾晤伯希和询其新疆所得古物考订出版情况[20]。董康在1922年访法国国立图书馆抄录有关法制史资

料。而收获较多者则是胡适。1926年8—11月间北大教授胡适利用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之便在伯希和和翟林奈L. Giles的帮助下查阅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英国图书馆藏敦煌写卷找到数种神会著作及其他禅宗典籍。他后来根据这些材料编成《荷泽大师神会遗集》图2并撰写《荷泽大师神会传》置于卷首[21]。这是中国禅宗史研究划时代的著作影响至巨。禅宗史的研究后来几成日本学者的专利而日本学者虽然后来居上却十分重视胡适的整理研究成果甚至有《胡适禅学案》的编辑[22]。法国学者谢和耐还把《神会遗集》译成法文题为《荷泽神会禅师语录》1949年由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出版[23]。另外1928年胡适出版《白话文学史》上卷[24]谈到变文和王梵志诗在白话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为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寻找到更早的历史根源。


問：三車本无實，所說乃權宜，三者是舊車，應得[illegible]物？
答：此車既異號，方便權說三。前者說三車，三車本是一。
問：一車能作三，三車能作一。何不元說一，辛苦說三車？
答：若爲迷人說，三便作三車；若約悟人解，即三本是一。
崔齊公問禪師坐定以後，得幾時出定？
答：[illegible]无方所，何有定乎？
問：既言无定，何名用心？
答：我今定尚不立，誰道用心？
問：心定俱无，若爲是道？
答：只沒道，亦无若爲道。
問：既无「若爲道」，何處得「只沒道」？

荷澤大師神會遺集　卷一　二

图2　《荷泽大师神会遗集》胡适自校本

1921年11月交通部总长叶恭绰发起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从事海内外公私所藏敦煌写本之编目整理北大部分学者参与其事并从事整理工作。叶氏虽任职交通部但与北大关系密切。后来在1927年刘哲合并九校为京师大学校时拟撤销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叶氏力阻改为国学研究馆以叶氏为馆长。无论如何叶氏创办敦煌经籍辑存会的某些想法特别是从编目着手与两个月后正式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计划如出一辙。

1922年1月北大成立研究所国学门校长蔡元培兼所长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沈氏《筹划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中所计划的研究项目之一即调查流传国外的敦煌石室之书简古书

此外流传国外者如《永乐大典》、莫利逊文库、敦煌石室之书简古书均应设法调查编次目录分别审定何者须移录何者须照相何者须作模型。……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于以上所述多端逐渐进行[25]。

国学门的机关刊物《国学季刊》成为发表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刊物。1923年1月出版的创刊号即刊出罗福苌译《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加之以后所刊罗氏所译《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都应当是敦煌经籍辑存会和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收集敦煌资料的第一步成果其所据原稿后来由叶恭绰提供给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敦煌考古工作展览》。《国学季刊》以下各卷常刊出敦煌学研究成果如王国维《韦庄的秦妇吟》1923年、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1934年、蒋经邦《敦煌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跋》1934年、孙楷第《唐代俗讲之科范与体裁》1936年、向达《唐代俗讲考》和《西征小记》1950年等都是敦煌研究的重要成果。作为国学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的陈垣还应敦煌经籍辑存会之约在俞泽箴的帮助下编成《敦煌劫余录》著录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8679件分类编排体制极佳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是第一部大型的敦煌写本分类目录。

北大的研究所国学门包含了多种学科的人材而且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它的国际性。其考古组除了已在北大教梵文的俄人钢和泰B. A. W. von Stael-Holstein外还由校长兼所长蔡元培具函请伯希和担任考古学通讯员。这对于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的敦煌学研究来讲是大有益处的。伯希和接受邀请一方面敦促法方以《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

与《国学季刊》交换另一方面还代表北大参加1925年开罗的万国地理学会[26]。

1925年美国哈佛大学华尔纳L. Warner率敦煌考古队来华准备继续上一年的敦煌考古工作。经北洋政府顾问福开森John C. Ferguson介绍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马衡筹划派医学校的陈万里随行。陈氏于1925年2月16日出发7月31日返回著《西行日记》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地调查报告》由朴社于1926年出版有沈兼士、马衡、顾颉刚序。尽管时间很短收获不多陈万里无疑是中国第一位科学考察敦煌千佛洞的学者他此行也是北大国学门的第一次实地调查。陈氏除《日记》外还著有《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万里校碑录》对敦煌莫高窟题记和碑铭作了研究。1925年10月底北大考古学会举办甘肃考古展览展出陈氏为学校所摄照片及购买的敦煌写卷等古物。

1927年4月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北大教务长兼国学门导师徐炳昶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分任双方团长。中方十名团员均为北大师生如地质学者袁复礼、考古学者黄文弼、地质及古生物学者丁道衡等。黄文弼两赴新疆发掘吐鲁番及塔里木周边遗址获得古物文书甚夥。1930年黄氏第一次考查归来代理校长陈大齐在欢迎会上致词说“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国人。”黄氏《高昌砖集》、《吐鲁番考古记》等均为敦煌学必备的参考书。

三十年代北大学者于敦煌学续有贡献如1933年出版之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27]、1935年刘复编《十韵汇编》[28]、1936年陶希圣编《食货·唐户籍簿丛辑》等。

除了北大之外清华学校的“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和陈寅恪也是二三十年代敦煌学研究的重要人物。

王国维1877—1927除了和罗振玉合编《流沙坠简》外还撰写了一系列敦煌文书跋文1919并且在沙畹和伯希和关于摩尼教长文的启发下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29]于前人论说有所补正。更重要的是由这些新史料的启发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成为后人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出土文献的重要法宝。王国维涉猎的问题较多从两汉到元明西域史和敦煌学文史语言诸方面均有[30]。王国维的研究既直接继承了清朝以来西北舆地之学的传统又吸收了西人在新疆、甘肃等地的考古学成绩因此

较徐松为代表的清朝学者更高一筹。他的成果不仅为国人奉为经典而且也受到伯希和这样的海外中亚学者的重视。

陈寅恪1890—1969早年长期游学欧美除通晓西方现代语言外又遍习与中国相关的各种东方语言加上他对中国古籍的深厚功底使他在回国后的1926—1930年一段时间里主要是从佛经翻译文学的角度写了一些敦煌写本的跋文为敦煌学研究做出了贡献。这些文章现在大多数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31]。

北京图书馆不仅是敦煌写本的收藏单位也是重要的研究机构。1929年陈垣《敦煌劫余录》完成后又陆续清理出敦煌残卷于是成立写经组专门整理敦煌写卷由徐森玉、胡鸣盛先后任组长1935年编成《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续编》前者著录《劫余录》所编8679件后者新编1192件惜未出版且稿本不知所在直到1990年北图迁馆才重新发现[32]。写经组成员许国霖编目之余辑录题记和杂文书编为《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33]为学术界提供了佛经以外的许多研究素材。

1934年8月向达、王重民由北平图书馆派往英法系统调查英国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向达编有《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著录约五百卷左右多为佛经以外的重要典籍[34]。相比而言王重民在巴黎的成果更多图3他除编出P.2001—4654号的《敦煌写本书目》外还就所见四部典籍作了大量考释工作先后撰写一批跋语和研究辑成《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两卷[35]。两位先生除了做自己的研究外还为北京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拍照了数万张写本照片成为此后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依据。1938年秋向达先生回国次年转入北大任文科研究所专任导师兼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王重民则经美国于1947回国任教于北大中文系。向、王两先生的英法之行一方面为中国的敦煌学准备了素材另一方面则为北大的敦煌学补充了人才。此后向、王两位先生成为北大乃至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图3　王重民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敦煌书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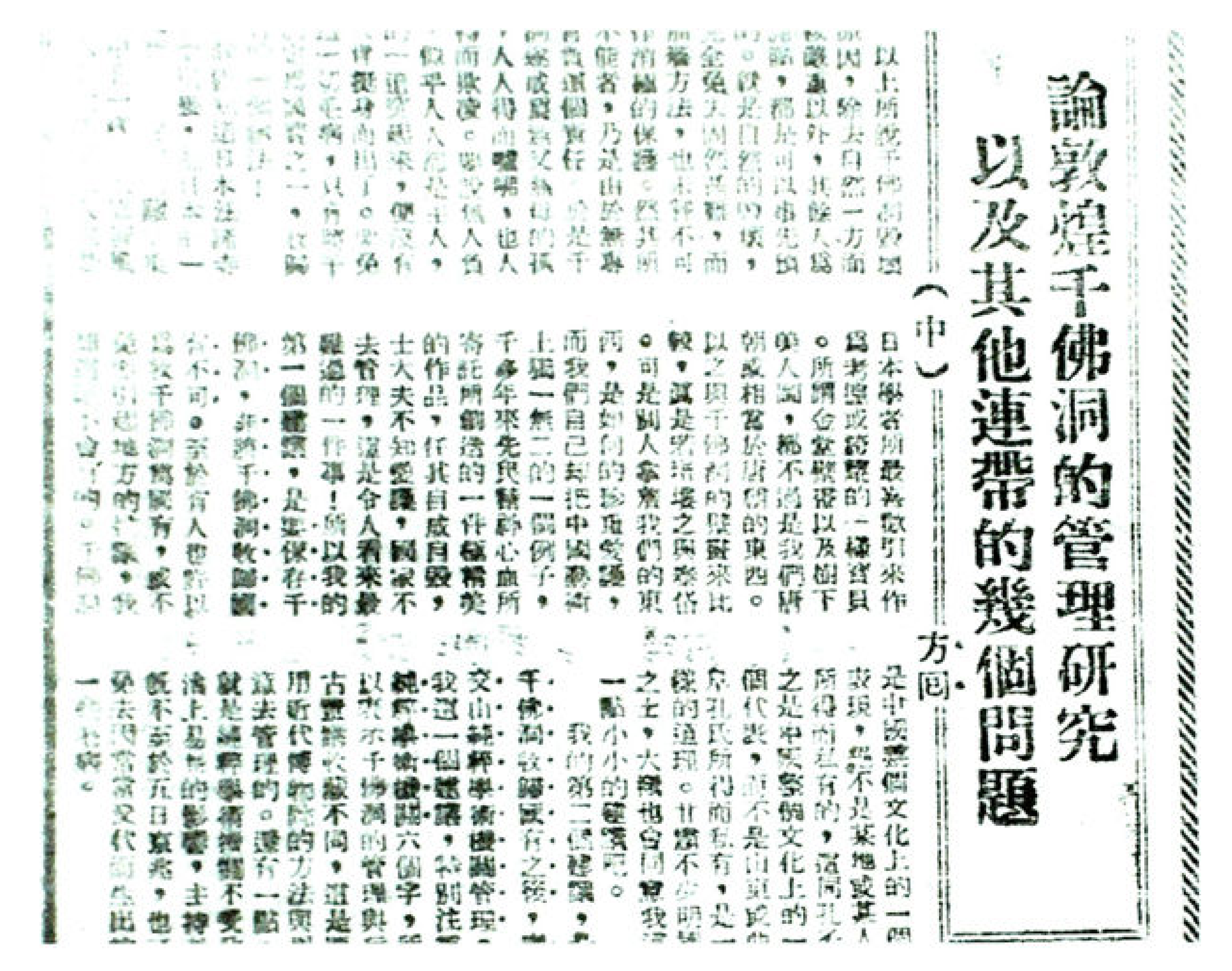
1942年春重庆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代表北大参加任历史组主任率史语所劳干、石璋如等赴敦煌考察莫高、榆林窟测绘拍照兼作敦煌周边古遗址的调查工作。向氏有《西征小记》一文纪行兼考两关、敦煌古城与古墓、西千佛洞莫高窟与榆林窟还记录了在敦煌所见到的敦煌写经[36]。历史组考察莫高窟之主要成果现已由石璋如整理成三卷本《莫高窟形》由台湾史语所出版[37]虽然事隔五十多年这项考察所获资料才得出版但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当年工作之杰出不仅有记录而且有珍贵的各石窟测量图和照片这无疑是今后莫高窟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1944年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向达任历史考古组组长率夏鼐、阎文儒西行敦煌考察敦煌莫高窟并在敦煌南沙山佛爷庙、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获得汉简数十枚及晋唐文物若干。此次敦煌考察同样取得很大收获。向达陆续撰有《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证》、

《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敦煌艺术概论》等夏鼐撰有《新获之敦煌汉简》、《敦煌考古漫记》等阎文儒撰有《莫高窟与敦煌》、《敦煌史地杂考》等[38]。向达两次敦煌之行还录有敦煌当地留存之重要敦煌写本若干种辑成《敦煌余录》包括《六祖坛经》、《南宗定是非论》、《天宝地志》等重要典籍惜未能及时刊出[39]。

向达代表北大的两次敦煌之行规模和成果远远超过1925年陈万里的西行。虽然当时处在抗战时期条件十分艰苦经费也很紧张但却为北大文科研究开拓了新路这在已经发表的一些相关人士的书信日记中略有反映。1940年12月17日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汤用彤等致在美国的胡适的信中谈到文科研究所之充实途径有四项“三在现状之下酌量举办少数之学术事业如……敦煌附近文物之复查等”[40]。1943年1月17日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的《日记》也说“历史考证此后唯敦煌一路。其中未广布、未研究之文献甚多。且其地为国际学术界所注意关涉甚多影响甚大。此后北大文研文科研究所之发展舍此莫由。今觉明开拓于前吾辈正宜追踪迈进[41]。”1943年1月19日汤用彤致胡适信也谈到向达西行事“觉明于交通阻塞之秋万里长征所获已不少。实物例如收得回鹘经文一卷为国内所无。其在敦煌所调查者逾三百余窟比之伯希和记录多约百余。盖觉明精力过人而相关学识之富并为国内首选西北考察如由彼主持实最合宜。又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敦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以于髯为护持张大千为主干西北古迹之能否长存恐为一疑问。以故敦煌文物调查不能再缓。[42]”向达的西行为北大文科研究开出新路而且使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上了真正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正路。

在抗日战争期间敦煌属于后方除了上述学术考察之外许多画家到敦煌临摹一些政要也曾视察敦煌洞窟有关画展、专刊提醒社会各界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加以关心。向达首次考察敦煌时撰写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图4呼吁将敦煌石窟收归国有[43]。在于右任的支持下1942年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以常书鸿为主任。1944年2月1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常书鸿任所长开始组织人力临摹壁画调查洞窟。史岩受研究所之托调查抄录供养人题记编成《敦煌石室画像题识》[44]。



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中）

方回

图4　向达笔名方回呼吁将莫高窟收归国有的文章

1948年12月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之际举办敦煌考古工作展览同时印行《展览概要》由向达、王重民编写对海内外敦煌学学术史做了完整全面的回顾[45]。《展览概要》几乎占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三分之一的篇幅这个展览与善本书展览是当时一系列展览中最为重要者构成《纪念特刊》的主体篇幅。这反映了在当时北大的文科研究中敦煌学的研究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是自向达考察敦煌时已定的文科研究方向而王重民的海外归来并加盟北大也更加强了这方面的阵容。这个展览出陈的材料有向达、王重民自伦敦、巴黎抄录的文书和拍摄的照片有北大、北图及部分私人收藏的原卷汉语、胡语文献均有又有向达自敦煌拓回的碑铭抄录的档案还有中外学者所撰敦煌学论著的稿本、抽印本、原著中西文兼备。《展览概要》详述敦煌古物发现及展览的意义并就每一件陈列品都做了简明扼要的解题实为此前敦煌学研究的一份极佳的总结。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的敦煌研究从单纯的依据书本研究发展到实地考察从依赖于海外邮寄的照片到亲身前往英法等国抄录摄影研究从注意中国传统的四部古籍到关心民间文学、社会情势等诸多方面这是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3五十年代到“文革”的成果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中国的敦煌文献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出版了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46]、《敦煌古籍叙录》[47]任二北《敦煌曲初探》[48]、《敦煌曲校录》[49]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50]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51]王重民、向达等《敦煌变文集》[52]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53]等一系列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重要成果但历史研究方面相对薄弱不过几篇重要文章而已如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54]、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55]等。

新中国建立初的1951年4月在北京天安门内午门城楼上的历史博物馆举办了“敦煌文物展览”与之相配合《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的4、5期作为《敦煌文物展览特刊》出版其中收录了有关敦煌艺术、考古、建筑、历史、地理、佛教、音乐、舞蹈等多方面的论文展示了特别是敦煌考古艺术方面的成果。五十年代还出版了谢稚柳的《敦煌艺术叙录》[56]是全面了解敦煌石窟内涵的重要依据。而以宿白为首的考古学者开始对敦煌乃至全国石窟寺进行科学的考古调查与研究。

值得一提的还有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它是很长时间里惟一的一本敦煌学入门书[57]。

五十年代末斯坦因所获敦煌写本S.1—6981号缩微胶卷的公布预示了对包括历史资料在内的敦煌文献进行综合研究的美好前景。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和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收刘铭恕编《斯坦因劫经录》就是伦敦藏卷公布后所产生的整理结果。在当时的条件下做出这样的成果固然已经很不容易但前者的校录工作的确不太理想受到日本学者池田温的批评[58]。然而更为遗憾的是此后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敦煌研究全面停顿而日本、欧洲和港台地区却在这十多年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敦煌学研究自有特点大陆地区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普遍重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港台学者仍然坚守中国传统学术以及佛教等方面的研究。其中成绩最突出的是潘重规他先后出版《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59]、《唐写本文心雕龙残本合校》[60]、《瀛涯敦煌韵辑新编》[61]、《列宁格勒十日记》[62]、《敦煌云谣集新书》[63]并且在香港创办了第一个专门的敦煌学刊物——《敦煌学》。

另一位重要的研究者是饶宗颐他从五十年代就涉猎敦煌写本和绘画涉及方面包括佛教、道教、历史、文学、绘画、书法等其单篇论文收入《选堂集林·史林》[64]、《文辙》[65]。特别是1965—1966年在法国研究敦煌卷子先后整理出版了《敦煌曲》[66]、《敦煌白画》[67]、《敦煌书法丛刊》[68]补充了前人关于曲子词的论说增补了新的资料还开辟了白画和书法研究的新天地。

4“文革”以后至今的热潮

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敦煌研究重获新生。与此同时包含世俗文献最为丰富的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卷全部公开在全国主要学术研究中心人们可以看到英图、法图、北图三大敦煌写本收集品的缩微胶卷。1981年以后陆续出版的《敦煌宝藏》140册将胶卷变成书本更加方便了研究者。此外解放后在吐鲁番墓葬中发现的大批文书也在这时陆续整理出版为《吐鲁番出土文书》全十册[69]后又修订增补编为图录本四册在定名和录文等方面均优于前者。[70]资料的大量公布是促使这十余年来敦煌研究进步的直接原因。

这二十年来是中国敦煌学的黄金时代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无法一一列举以下只就历史和文献整理方面举例说明之其他重要成果可以参考《敦煌学大辞典》和《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71]。

由于大量原始文献的公布进行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成为可能出现了一批分类辑校敦煌文献的专集。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5辑[72]是辑录历史资料最为全面的一种该书上图下文收录地志、氏族志、传记、邈真赞、籍帐、社文书以及各类官私文书、寺院文书等等共三十四类文献可以说是迄今敦煌研究中收录历史资料最多的一部录文集。但对比其他一些专项录文集此书难免有收集不全和校录不精处[73]。

在分类校录文献方面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74]较日本东洋文库出版的同类合集多出一些吐鲁番文书并有作者的笺释。地理文献有郑炳林的《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75]、王仲荦遗稿《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76]、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77]。郑著在收集敦煌地理文献及相关材料上颇为全面但文字校录工作尚不完善。王著主要是与传世典籍合校发明不多。李著只收有关敦煌地理的文献但通过实地考察所在多能落实。实地考察的成果还见于陈国灿、李并成的著作。郑炳林的另一本录文集《敦煌碑铭赞辑释》[78]是集敦煌写本功德碑、墓志铭、邈真赞类文献之大成而且在详细的注释中用本证的方式辑录考释了许多相关的敦煌文书极便学人。单就邈真赞来讲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中的录文则更为准确[79]。赵和平的《敦煌写本书仪研究》[80]、《敦煌表状笺启类书仪辑校》[81]收录了前人措意不多的敦煌书仪文献的校本。与历史相关的史料集还有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82]、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83]。

在研究方面几乎每个课题都有学者在从事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数散见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1—5辑、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及《二编》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兰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敦煌学研究室编《敦煌学辑刊》、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现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及续集、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中华书局编《文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史研究》、文物出版社编《文物》、季羡林等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等书刊。近年出版的一些著名敦煌研究者的纪念文集如《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84]、《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85]、《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86]、《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87]和1983年以来的历次敦煌学研讨会的论文集中都有大量的研究论文问世在北朝隋唐均田制、赋役制、租佃关系、寺院经济、法制史、氏族、兵制、归义军史、唐五代西北民族、丝绸之路等方面有突出的成绩。有些已经结集出版如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88]、宋家钰《唐代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89]、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90]、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91]、杨际平《均田制新探》[92]、武建国《均田制研究》

[93]、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94]、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95]、周一良与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96]、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97]、李正宇《敦煌史地新论》[98]、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99]、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100]、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101]、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102]、杨际平与郭锋等《5—10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103]、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104]等。

5总　结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中国敦煌学的特征

1开拓与创新敦煌资料为20世纪初叶处在转型中的中国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一贯重视新材料的以北大为中心的一批学人及时抓住了时机开拓了中国敦煌学的新天地。敦煌资料中包含有大量传世文献中不多见的民间文学写本和社会经济文书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整理国故”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敦煌学人一般都学有专攻他们对敦煌学的研究往往被纳入更广阔的研究范畴之中。敦煌学在一些学者眼中并不被看做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主要是一批材料学者们虽然在某一时间里可能专攻敦煌学的某个方面但其学术研究的基点却植根于较广的学术领域从哲学、文学、语言、历史、宗教的某一领域出发来兼统敦煌资料。只有具备较为广阔的学术根基才能抓住新材料开拓新学问。

2兼容并蓄和自由研究敦煌学的研究者所处单位十分分散互不统属可以自由独立地研究自己的课题。但同在一地而声气相合者免不了常相往还相互促进不合者也相互竞争。不论早年的刘师培、胡适还是今天的敦煌学者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很不相同但他们都利用敦煌资料独立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因此敦煌学研究要想把路子拓宽就要兼容并蓄尽量促成敦煌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影响。

3超越国界的学术研究从罗振玉与伯希和的交往到今天的历届敦煌学研讨会这种传统保持不变。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资料多在国外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以敦煌作缘中国敦煌学者与国外同行的联系较多交流较广这对中国学术的进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某些时候如五十年代到文革中国学术封闭在自己的圈子里越走越窄甚至

被窒息。而且敦煌资料不仅限于汉学还有西方学者擅长的各民族语言文字材料乃至印度伊朗等文化遗产更需要交流和合作研究。季羡林教授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说法正是立足中国的优良学术传统所做出的深刻体认。

二 日 本

由于清朝的腐败敦煌发现的大量精美文物和文献首先被劫到英法两国以后又流散到世界各地。半个多世纪以来敦煌学成为国际上经久不衰的热门研究课题其中日本学者在敦煌学的许多领域里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这是因为与中国学者相比他们在本国经济实力的资助下更容易游学欧美、中国调查收集敦煌资料与欧美学者相比他们在阅读汉文文献方面又有历史赋予的优越条件。这里因篇幅有限只能把最主要的研究方面和成果做简要的介绍。

1从初始到四十年代的研究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始于1909年。当时中国的罗振玉致函京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描述了法国伯希和携至北京的一些敦煌写本的情况立刻引起日本东方学界的极大关注。1910年任职北京大学的藤田丰八在北京发表了《慧超传笺释》[105]可以说是日本的第一部整理敦煌文献的专著。1910年敦煌写卷运抵北京后京都大学就派五教授来调查写本内容。两年后狩野直喜就前往英法调查抄录敦煌文献。此后又有不少学者到英法等国访求有关材料带回日本陆续整理出一批珍贵文献并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主要成果可以举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代表。

在佛教文献方面矢吹庆辉1927年出版了《三阶教之研究》[106]1930年和1933年又分别出版了《鸣沙余韵》及《解说》[107]整理研究了大批伦敦收藏的佛典写本特别是在藏外佚经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不久铃木大拙、宇井伯寿等人就利用敦煌新发现的禅宗典籍如《六祖坛经》、《神会和尚语录》、《楞伽师资记》等开始对禅宗作深入的探讨。在中国古籍方面小岛祐马把所收集的子部书汇集为《沙州诸子二十六种》[108]刊布了大批古籍写本的珍贵照片。在历史学方面羽田亨与

伯希和合编了《敦煌遗书》活字本和影印本各一集[109]其中收录的文书虽然不多但都是与历史文化有关的重要资料羽田的简要解题涉及到不少新问题。那波利贞抄录了大量有关社会经济的世俗文书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唐代社会和敦煌寺院经济的文章其中重要的几篇收入后来出版的《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110]。另外仁井田陞对敦煌出土的法制文书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937年出版了《唐宋法律文书之研究》[111]。在绘画方面松本荣一对大量的敦煌千佛洞壁画和藏经洞出土的绢纸绘画进行了分类研究1937年出版了巨著《敦煌画之研究·图像篇》及《附图篇》[112]为敦煌绘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是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刊布这种最基础性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引导了方向并使他们受益无穷。

2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热潮

二战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敦煌学研究处于低潮没有特别重要的论著发表但零散的文章仍未间断。从五十年代开始才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京都西本愿寺找到了长久以来不知去向的大谷探险队收集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另一方面是经山本达郎和榎一雄的努力英国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收藏的斯坦因所获敦煌汉、藏文写本的微缩胶卷运到日本入藏东洋文库、京都大学等处不久又通过交换关系获得了北京图书馆藏卷的缩微胶片加上后来中国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和苏联孟列夫等编《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二册1963、1967的出版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了美不胜收的新材料。于是五十年代初在京都由石滨纯太郎发起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会”集合了一大批各个领域的专家对新找到的大谷文书及各类敦煌文献进行了精细的研究其成果汇为六卷本《西域文化研究》图5即第一《敦煌佛教资料》1958第二、三《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1959、1960第四《中央亚细亚古代语文献》1961第五《中央亚细亚佛教美术》1962第六《历史与美术的诸问题》1963这一成果被誉为是包括敦煌学在内的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与此同时在东京由东洋文库组织了“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以新获得的斯坦因文书胶片为主并网罗其他各种收集品着手编纂《斯坦因敦煌文献及研究文献中业经引用介绍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陆续完成了菊池英夫、池

田温合编的第一卷《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1《公文书》1964土肥义和编第二卷同上类2《寺院文书》1967吉冈义丰编的第三卷《敦煌道教文献目录》和金冈照光编的第四卷《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及解说》1971。这些目录虽然不是正式出版物但它们罗列的各种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图5　《西域文化研究》书影

除了以上两项集体合作完成的项目外这一阶段还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如塚本善隆对敦煌佛教史的概说〔113〕牧田谛亮对中国疑伪经的研究〔114〕柳田圣山对禅宗典籍和初期禅宗历史的深入分析〔115〕等等在佛教领域内继续发扬了日本学者的特长。在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北朝隋唐史方面除了仁井田陞等人对法制文书的进一步整理研究外比较突出的成果是在田制和赋役制的研究上如山本达郎对S.613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的复原和分析填补了北朝均田赋税制的某些空白又如铃木俊、山本达郎、西村元佑、西嶋定生、日野开三郎、堀敏一、池田温等人对唐代均田制的施行以及租田、户税、差科等问题的讨论大大丰富了

唐代经济史的内容其成果除散见于各种杂志外还集中收入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1966、西村元佑《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1968、日野开三郎《唐代租庸调研究》三卷1974—1977、堀敏一《均田制研究》1975、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79等。此外菊池英夫从零散的唐代军事文书中找出了从府兵制到镇军制的兵制转变过程。在历史方面特别是中国传世史料记载比较少的中唐到宋初敦煌本地的历史藤枝晃继早年发表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1941—1943之后又在京都《东方学报》上陆续刊出《敦煌的僧尼籍》1959、《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1961、《敦煌千佛洞的中兴》1964、《敦煌历日谱》1973等长篇论文基本理清了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历史的脉络成为人们研究敦煌历史和写本时需要参考的基本读物。另外上山大峻通过对吐蕃统治时期前后佛教高僧昙旷和法成的详细研究大大丰富了敦煌佛教史的内容〔116〕。而竺沙雅章对敦煌的僧官制、寺户制和结社活动的探讨展示了中晚唐以降敦煌佛教社会的真相〔117〕。在文学方面入矢义高对王梵志诗、敦煌变文俗语词及敦煌曲子词都有比较精辟的研究论说。金冈照光也就敦煌变文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川口久雄则把敦煌文学和日本文学加以比较研究成绩卓著。

3八十年代至今的成果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随着巴黎收藏的伯希和写本缩微胶片的公开出售和世界各国敦煌写本或绘画藏品的陆续出版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朝着专一化研究和集体综合研究两方面进一步发展。

伦敦、北京、巴黎藏卷的全部公开使一些力图在某一种文献上集大成的著作得以产生。1978年和1979年分别出版的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和《图录编》〔118〕就是敦煌道教文献的集大成著作。兜木正亨的《敦煌法华经目录》〔119〕则是专门整理《妙法莲华经》一种文献残卷的结果。在研究方面可以举福井文雅《般若心经的历史学研究》为例作者对已知各收集品中的《般若心经》及各种注疏做了详细的调查、分类、注记并对《心经》的名称和各种写本内容的异同以及该经在中日历史上的变迁过程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120〕。

在专精的研究方面可以把《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文书集》D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丛刊视作典范。该丛刊经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委员会推荐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由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第1卷《法制文书》1978—1980年由山本达郎、池田温、冈野诚合作编成收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唐代律、令、格、式、判的残卷第2卷《籍帐》1984—1985年由山本达郎和土肥义和合编这是在池田温的优秀著作《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的基础上经补充修订而成的籍帐、户口田地簿及差科簿文书的集成第3卷是山本达郎和池田温合编的《券契》1987年收录敦煌、吐鲁番、龟兹、于阗的契约类文书第4卷是土肥义和等编的《社文书》1988—1989年实际出版年代为2000年。收入该丛刊的每一件文书除了精心的录文和清晰的照片外还有详细的英文解说。每一卷前有对这一类文书的总论卷后附有详尽的参考书目。虽然由于敦煌吐鲁番同类文书的继续发现还不能说这就是一类文书的最终结集但至少可以说是对前人的整理研究做了一次很好的总结。

在综合研究方面成果更多如中原汉地禅宗传入吐蕃的历史上山大峻、山口瑞凤、小畠宏允、木村隆德、冲本克己、原田觉等人综合汉、藏两种语言所写文书的内容得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争得了在国际讲坛上的发言权。在这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关西地区的几位年轻敦煌学研究者即所谓“Young Tong”“青年敦煌学者协会”的简称。这是由森安孝夫、熊本裕、高田时雄、武内绍人、吉田丰五人在1983年组成的一个小组他们经过在英、法、美的留学研修分别在回鹘、于阗、汉、藏和粟特文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又结合在一起共同探讨上述各种语言所写文书的格式和一些双语文书、碑铭等问题并打算合作刊布汉、藏、粟特、蒙文本《善恶因果经》。这种集体的综合研究代表了敦煌学的发展方向。

从1980年开始编纂的《讲座敦煌》是一项规模更大的集体合作项目。全书计有第1卷《敦煌的自然与现状》1980、第2卷《敦煌的历史》1980、第3卷《敦煌的社会》1980、第4卷《敦煌与中国道教》1983、第5卷《敦煌汉文文献》1992、第6卷《敦煌胡语文献》1985、第7卷《敦煌与中国佛教》1984、第8卷《敦煌佛典与禅》1980、第9卷《敦煌的文学文献》1990。每一卷由相互关联的一系列个别题目构成分别由研究这个题目的专家执笔写作。虽然有些篇章流于泛泛而谈但大多数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好文章既能增加人们关于敦煌学各方

面的知识又标志着某些方面的研究水平还给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信息。

八九十年代由于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进步日本敦煌学研究在涉及范围上没有中国学者广泛但就某些课题如佛教典籍、道教史、唐史、非汉语文献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日本的唐代史研究会是推动敦煌研究的重要组织。1990年出版的《唐代史研究会报告集》第Ⅶ集《东亚古文书的历史学研究》汇集了有关敦煌吐蕃时期的土地赋税制度、唐律、王梵志诗、均田制、公式令、户等、奴婢、敦煌藏文文书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成果。以后在唐史研究的范围里池田温等编著的《唐令拾遗补》[121]充分利用了新刊敦煌吐鲁番资料崛敏一关于家族和税役制的研究气贺泽保规著《府兵制的研究》[122]妹尾达彦关于都市的研究都充分利用了敦煌吐鲁番的文书中村裕一专攻唐代文书制度先后出版《唐代制敕研究》、《唐代官文书研究》、《唐代公文书研究》[123]这一系列研究还在深入土肥义和和石田勇作主要从事社文书的研究前者近年也探讨莫高窟供养人的问题小田义久则一直在整理大谷文书。

以关尾史郎、荒川正晴、白须净真、片山章雄、町田隆吉组成的“吐鲁番文物研究会”对吐鲁番文书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也涉及到敦煌文书。其中关尾对高昌国和税制的研究荒川对唐代交通体制的研究较为出色。而原来的Young Tong虽然已经基本上停止了集体的讨论会但每个人都有所贡献。森安孝夫著有《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124]又和其他学者一起整理出版了山田信夫的《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125]并做了许多订补工作。熊本裕在翻译注释敦煌出土的于阗语文书最近也在研究圣彼得堡藏于阗语汉语双语文书。高田时雄主要转向耶稣会士来华以后的汉籍整理但仍然从事敦煌语言社会和语言史的研究。武内绍人出版了英文本《中亚古藏文契约研究》[126]又编辑出版《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127]。吉田丰整理大谷探险队和柏林所藏吐鲁番伊朗语文献与百济康义、宗德曼合编《龙谷大学藏伊朗语断片集成》[128]。

2000年日本学术界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之际利用日本东方学会的西文刊物《亚洲学刊》Acta Asiatica第78号作为“敦煌吐鲁番研究”专号出版图6这显然是日本学术界精心展示的他们为百年敦煌所奉献的成果。这本专刊由资深的唐史和敦煌学专家池田温教授主编所收的四篇

论文是百桥明穗对莫高窟早期洞窟的探讨森安孝夫有关沙州回鹘与西回鹘王国关系的新认识高田时雄谈敦煌的多种语言使用问题吉田丰报告日德两国学者合作研究吐鲁番出土伊朗语写本的初步结果即利用对写本汉文一面的比定来帮助缀合考释另一面的粟特文、中古波斯文文献。最后是池田温介绍近年日本敦煌吐鲁番研究的文章附有详细的论著目录表明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远比这里所发表的四篇文章要丰厚得多。而之所以发表这四位学者的文章编者在序言中毫不掩饰地说他们是今天活跃在日本敦煌吐鲁番研究前线上的学者“尽管四篇论文所涉及的范围有限但读者将能看到现在专门从事敦煌吐鲁番研究的日本学者对于敦煌当地的事情甚至比中国本土的学者更富有广博的知识同时他们对相关的西文论著也了如指掌。”我们读过这几篇文章之后感到这句有些刺耳的话并非虚言。

图6　日本《亚洲学刊》敦煌吐鲁番研究专号

2000年5月东京举行的第45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把“敦煌吐鲁番研究分会”列为本年度会议的重点之一这也同样是日本东方学会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的举动这一点在主持这场分会的池田温教授的开场白中说得很清楚。在这个表明日本东方学具有国际性的会议上有日本、土耳其、美国和从中国特邀的一位学者发表研究成果而分组会的主持人和评述者则是日本新一代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的中坚人物——森安孝夫、武内绍人、吉田丰、荒川正晴、白须净真、町田隆吉等。过去中国学术界盛传日本学者藤枝晃在1980年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话不论此话是谁讲的确实刺中了中国学者的痛处。今天日本学术界特邀中国学者到他们的最高学术讲坛上发言固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面对一个个富有实力的日本敦煌学中坚特别是他们在藏文、粟特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时我们仍然不要忘记“敦煌学在日本”这句激励过许多中国学者奋发上进的话语。

注释

〔1〕 荣新江《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Ye Changchi: Pioneer of Dunhuang Studies《国际敦煌研究项目通讯》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No.71997年春季号1—5页。

〔2〕 《艺风老人日记》第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2118页。此条为虞万里先生检示特此致谢。

〔3〕 史树青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5卷碑刻拓本一东京柳原书店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225页。

〔4〕 与会者名单见汪康年《汪穰卿笔记》、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原载《燕尘》第2卷第11号1909年11月此据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参看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118页。他们在京师大学堂中的身份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31—346页。

〔5〕 《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1909年42—67页。

〔6〕 宣统元年1909国粹堂石印本。

〔7〕 后两者均收入《敦煌石室遗书》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诵芬室排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第六册、《敦煌丛刊初集》第六册。

〔8〕 1911年《国粹学报》第7卷1—8期陆续刊出1936年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3册。

〔9〕 1910年罗氏影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六编第十册、《敦煌丛刊初集》第九册。

〔10〕 1911年《国学丛刊》摹抄刊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四编第三册。

〔11〕 罗氏宸翰楼影印本1913年。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四编第五册。此书有1928年东方学会摹抄本不可据。

〔12〕 1917年罗氏印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四编第五册。

〔13〕 1917年上虞罗氏影印刊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第七、八册《敦煌丛刊初集》第八册。

〔14〕 1924年上虞罗氏印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第七册、《敦煌丛刊初集》第八册。

〔15〕 1924年上虞罗氏影印。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十八册。

〔16〕 1925年东方学会排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第六册、《敦煌丛刊初集》第七册。

〔17〕 1914年宸翰楼印行。增订本1934年出版。

〔18〕 收入《敦煌石室遗书》。

〔19〕 刘复《敦煌掇琐》北京1925年。

〔20〕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9年332页。

〔21〕 上海1930年。

〔22〕 柳田圣山编《胡适禅学案》台北正中书局与京都中文出版社1975年。

〔23〕 J. Gernet, Entretiens du maitre de Dhyāna Chen-houei du Ho-tsö河内1949年。

〔24〕 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

〔25〕 《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364页。

〔26〕 参看《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309页伯希和《在开罗万国地理学会演说》《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3期1925年10月。

〔27〕 列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上海中国科学公司印行1933年。

〔28〕 北京大学1935年。

〔29〕 《亚洲学术杂志》111921年。

〔30〕 王氏的主要敦煌学论著均收入《观堂集林》1921年乌程蒋氏印行。以后续有增订通行本为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印单行本。

〔3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2〕 参看方广锠《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勘查初记》《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2期1—12页。

〔33〕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34〕 载《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1卷第4期1939年397—419页。

〔35〕 1936、1941年北平图书馆出版。

〔36〕 载《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1—24页。

〔37〕 《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工作报告》之三台北1996年。

〔38〕 这些文章后收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向达编《敦煌》学习书店1951年以及《文物参考资料》和《考古通讯》等。

〔39〕 稿本曾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上陈列见《展览概要》48页。现由笔者整理此书有待出版。

〔40〕 《胡适往来书信集》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03—504页。

〔41〕 郑天挺《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序》载同书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2页。

〔42〕 《胡适往来书信集》中553—554页。

〔43〕 《大公报》重庆1942年12月27—30日连载。

〔44〕 1947年比较文化研究所、敦煌艺术研究所、华西大学博物馆联合出版。收入《敦煌丛刊初集》第五册。

〔45〕 1948年北京大学印行。
〔46〕 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1956年修订再版。
〔47〕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
〔48〕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
〔49〕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
〔50〕 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
〔51〕 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
〔52〕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53〕 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54〕 《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
〔55〕 《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
〔56〕 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新一版。
〔57〕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参看荣新江《重读􀀀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2日第20版。
〔58〕 《东洋学报》第46卷第1号1963年114—133页。
〔59〕 香港新亚研究所1970年。
〔60〕 香港新亚研究所1970年。
〔61〕 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
〔62〕 台北学海出版社1975年。
〔63〕 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77年。
〔64〕 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
〔65〕 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
〔66〕 巴黎法国国立科研中心1971年。
〔67〕 巴黎法国远东学院1978年。
〔68〕 29册东京二玄社1985年中文本题《法藏敦煌书苑精华》8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参看刘涛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1995年。
〔69〕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990年。
〔70〕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录文本与图录本优劣之比较参见孟宪实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355—363页第4卷581—586页。
〔71〕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郑阿财、朱凤玉主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汉学研究中心2000年。
〔72〕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2—1990年。
〔73〕 参看陈国灿书评载《九州学刊》第5卷第4期。
〔74〕 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75〕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0年。
〔76〕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77〕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参看荣新江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2001年。
〔78〕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
〔79〕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参看张涌泉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1995年。
〔80〕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
〔81〕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82］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参看孟宪实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2001年。

［83］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84］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85］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

［86］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87］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88］　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89］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90］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

［9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92］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

［93］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94］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

［95］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96］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97］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98］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

［99］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100］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

［101］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02］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

［103］　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

［104］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05］　1910年8月北京印行非卖品。

［106］　东京岩波书店1927年。

［107］　东京岩波书店1930、1933年。

［108］　京都弘文堂书房1929年。

［109］　上海东亚考古研究学会1926年。

［110］　东京创文社1974年。

［111］　东京东方文化学院1937年。

［112］　东京东方文化学院1937年。

［113］　《西域文化研究》第一卷京都法藏馆1958年。

［114］　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

［115］　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京都法藏馆1967年柳田圣山编《禅之语录》第一、二、三卷东京筑摩书房1969、1971、1976年。

［116］　收入《敦煌佛教之研究》京都法藏馆1990年。

［117］　其成果已收入作者的《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2年。

［118］　东京福武书店1978—1979年。

［119］　东京灵友会1978年。

［120］　东京春秋社1987年。

［121］　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

［122］　京都同朋舍1999年。

〔123〕　分别由东京汲古书院、京都中文出版社出版1991、1996年。
〔124〕　《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1—32辑1991年。
〔125〕　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
〔126〕　T. Takeuchi,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东京大藏出版社1995年。
〔127〕　T. Takeuchi,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3册东京东洋文库与伦敦英国图书馆合刊1997—1998年。
〔128〕　京都法藏馆1997年。

第九讲　敦煌学与隋唐五代政治、经济史研究

敦煌写本的主体是佛教经典但中古时期的佛教寺院往往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中心因此佛寺同样收藏佛典之外的道书、经史子集四部书和其他典籍以及美术品。同时寺院的僧人为了抄写佛经往往把当地废弃或过时的公私文书都收罗到寺院当中用它们的背面来抄写佛经寺院本身的行政和经济文书在过时以后也往往被用作写经纸。有的文书是用来裱糊经帙有的文书残片用来贴补破碎的经卷和绢画还有的文书没有来得及使用就完整地封存起来。这样藏经洞中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属于书籍的文献材料而且在佛经等书籍的背面、裱纸和备用纸上也留存了数量相当丰富的公私文书为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传世文献材料所没有的原始文书档案当然还有一些是传世文献中已经佚失的典籍断片。

敦煌文献的年代范围大体上是从公元5世纪初到11世纪初。但偶尔留存下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材料较少隋唐以来渐渐增多而以敦煌藏经洞封存之前的9、10世纪吐蕃到归义军时期的文书资料最为丰富。

本讲主要集中介绍与隋唐制度史以及政治、经济史相关的敦煌文书资料以及在隋唐五代史研究上的价值。

一　文书制度

敦煌文书中保存了许多唐朝各级官府文书的原件这对于我们了解唐朝的文书制度极有帮助而且可以使我们透过一些文书制度来理解唐朝的官制、兵制、赋税制等其他制度史中的问题所以我们先谈文书制度。

一般认为以唐《开元二十五年737令》为基础而编成的《唐六典》记载了唐朝最主要的几种上行和下行文书。《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条“凡上之所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注云“天子曰制曰敕。皇太子曰令。亲王、公主曰教。尚书省下

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又云“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辞、牒。”注云“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笺、启于皇太子。然于其长亦为之。非公文所施九品已上公文皆曰牒。庶人曰辞。”“诸司自相质问其义有三曰关、刺、移。”

又《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令条记“凡王言之制有七”即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即奏抄、奏弹、露布、议、表、状。

这些文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区别而且从《唐会要》和其他唐代文献可以知道唐朝对于官府文书的纸张、字体、签署、用印、避讳以及归档、录副、保存、修补、发送、传递、接受等等都有规定。但是唐朝文书的原本现在大都不存在了而唐朝文章总集和一些官人的文集中虽然保存了一些官文书的内容但往往把文书前后格式化的东西甚至年代都统统删掉了使我们无法窥见唐朝官文书的原貌。

敦煌为我们保存了一些官文书的原件而且还保存了一件唐《公式令》残卷P.2819V其中包括《移式》、《关式》、《牒式》、《符式》、《制授告身式》、《奏授告身式》六种官文书的书写格式纸背有“凉州都督府印”说明是经过凉州而发送到沙州的《唐令》写本。

有关唐代文书制度中村裕一先后出版《唐代制敕研究》[1]、《唐代官文书研究》[2]、《唐代公文书研究》[3]虽然录文有可商榷处但汇集了大量史籍和文书中的材料是兼有资料和研究的重要参考书。根据中村裕一的考察敦煌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的公式令规定范围以内的唐五代官文书的情况如下表[4]※表示存有敦煌写本表示有吐鲁番写本。

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唐朝官文书

下行文书	
册书	
制书(诏书)	※　S.446 天宝七载(748)册尊号大赦文(抄件)
	※　P.2696 中和五年(885)车驾还京师大赦文(抄件)
慰劳制书	
发日敕	※　P.4632 金山国皇帝敕(制授告身的敕词部分相当于发日敕)
敕旨	※　S.5257 先天元年(712)敕旨
	+　贞观二十二年(648)安西都护府承敕下交河县符[5]

续表

论事敕书	※	S.11287A 景云二年(711)赐沙州刺史能昌仁敕
敕牒	※	P.2054 天宝元年(742)职官表保存的敕牒
	※	P.4632 咸通十年(869)敕沙州刺史张淮深牒(抄件)
制授告身	※	P.3714V 乾封二年(667)氾文开诏授告身
	+	乾封二年(667)郭毡丑告身[6]
	※	P.3749V 圣历二年(699)氾承俨制授告身
	※	S.3392 天宝十四载(755)秦元□制授告身
奏授告身	※	敦煌研究院藏景云二年(711)张君义告身
令书	+	永淳元年(682)氾德达告身[7]
教		
符	+	贞观二十二年(648)安西都护府承敕下交河县符[8]
过所	※	敦煌研究院藏天宝七载(748)过所
	+	开元二十年(732)石染典过所[9]
上行文书		
奏抄	※	原本敦煌未见,但可以据《奏授告身式》复原奏抄格式
	+	大谷文书仪凤三年(678)度支奏抄
奏弹		
露布		
议		
表	※	P.3827 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上表
	※	S.4276 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
状	※	P.5566 书仪·上中书门下状
	※	S.4398 天福十四年(949)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进贡状
笺	+	
启	+	
牒	※	P.3952 乾元元年(759)罗法光祠部告牒
辞	+	麟德二年(665)牛定相辞[10]
平行文书		
关	+	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仓曹关[11]
刺		
移		

〔5〕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3页。
〔6〕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504页。
〔7〕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221—223页。
〔8〕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5—7页。
〔9〕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40—42页。
〔10〕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92页。
〔11〕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52—53页。

此外敦煌文书还保存了许多唐朝《公式令》规定以外的各种官文书

补任文书	归义军节度使辟召属下的任官文书，一般为牒式，如S.4363等。
公验	契约文书等证明书，如敦煌研究院藏敦煌郡行客王修智买胡奴市券公验
	天理图书馆藏张君义公验
帖	S.8516B广顺二年(952)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帖。
榜	S.8516A+C广顺三年(953)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榜。

通过这些文书的原本和保留了原式的抄件我们可以了解唐朝各级官府文书的起草和传递情况也可以了解各种不同文书的不同格式。如S.11287A《论事敕书》的发现图1使我们明白了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所谓“进画敕”的含义并通过文书保留的中书省签署部分参照其他文书大体上可以把文书的起草、中书覆奏、进画、宣奉行、过门下、行下的一整套过程复原出来〔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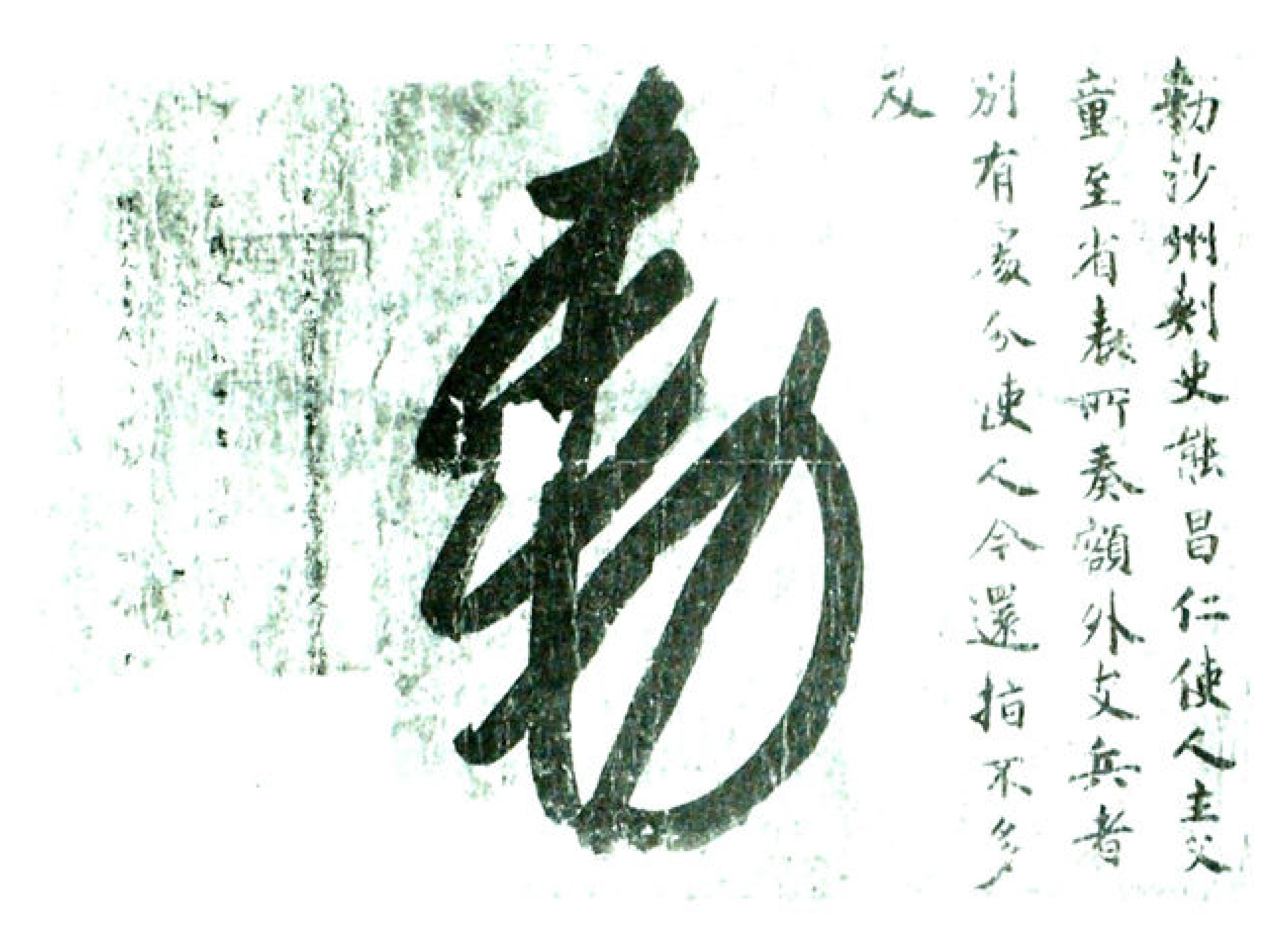

敕沙州刺史能昌仁使人主父
童至省表所奏額外支兵者
別有處分使人今還指不多
及
敕

图1　S.11287A景云二年711赐沙州刺史能昌仁敕

S.11287A反映的是在中央三省中的文书运作情况至于文书向地方上的传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3页以下收录的《唐贞观二十二年安西都护府承敕下交河县符为处分三卫犯私罪纳课违番事》图2则保存了尚书省以符的形式把敕旨下发到安西都护府然后是安西都护府以牒的形式把敕旨和尚书省的符下发给交河县给我们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文书运作全景图也表现了唐朝较高的行政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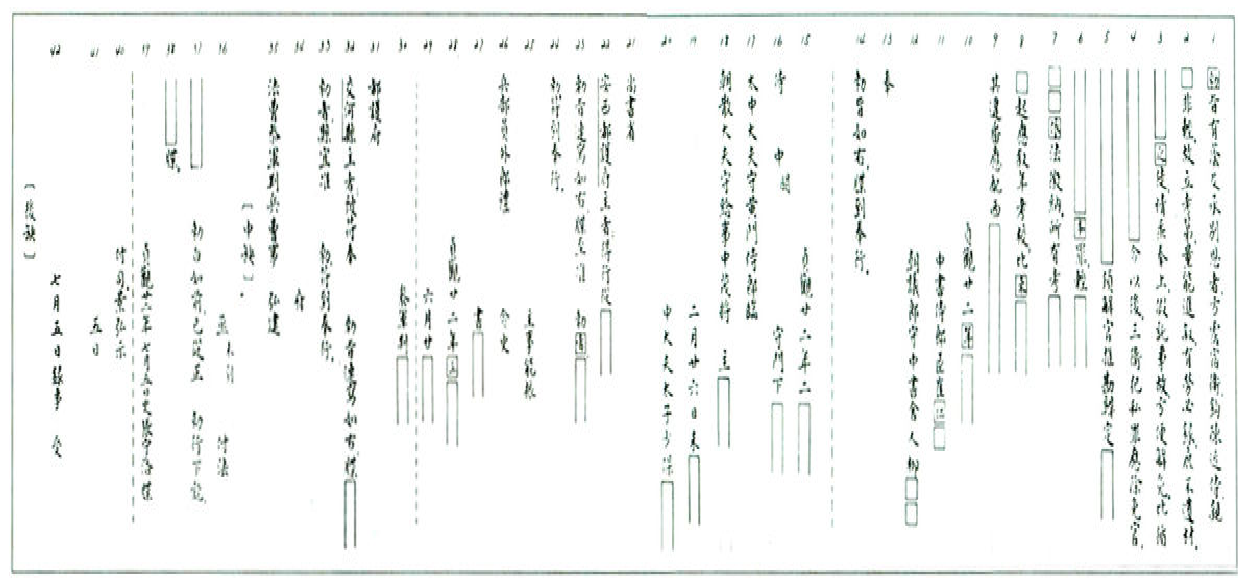


图2　吐鲁番出土《唐贞观二十二年安西都护府承敕下交河县符》录文

二　官制与法制

唐朝的官制在《唐六典》、《通典》、两《唐书》的《职官志》和《百官志》等书中都有记载但详于前期天宝以前而略于后期。而且志书对于官制的记载往往是百官的名称、品级、员额、职掌等项而缺少官制的发展和官僚体制的运作情况。

敦煌文书保存的官府文书详于后期而略于前期正可以补充史籍的不足。而且大多数是各级官府运作中的文书原件所以可以反映制度的运行侧面。比如唐朝官制规定各个官府衙门都由四等官构成即长官、次官通判官、判官、主典各有职掌。但是具体到各中央部门特别是地方官府当中四等官的各自作用如何只从规定是不能清楚地了解各自的作用的而官文书后的各级官员的签署反映了他们在官僚体制的运转中所起的作用。

传世的典籍对于唐朝中央的官制记载较多对于地方官制的记载较少《唐六典》地方官制只有一卷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却与之相反与地方官制相关的文书较多包括州郡、县、乡、里各级官吏的材料以及军事系统的折冲府、军、镇、戍、守捉等资料有助于探讨地方各级职官的制度和不同系统职官间的关系。

敦煌写本《记室备要》P.3723、P.3451bis、S.5888题乡贡进士郁知言著计三卷是为泰宁节度监军使王公准备的各种书信格式书仪上自天

子下至内外百官都有特别是中卷所收诸信札大多数是监军使与中央北司各级宦官的状启从中尉以下由高到低共有十九种内诸司使的使职名称而且都是与南衙乃至地方节镇有关联的各种使职。中晚唐朝宦官干政是唐代历史的重要内容但有关宦官的官职系统史籍记载比较零乱。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6]、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7]对宦官官制都有探讨但仍有许多问题不得其解。这本小书的发现对于唐代宦官的官制研究颇有帮助。赵和平已有初步研究[8]并将全文录入《敦煌表状笺启书仪》一书。

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一些唐朝的律、令、格、式的抄本补充了唐代志书对唐代法制的不明记载。

《唐六典》卷六称“律以正刑定罪”位于法律文书之首敦煌、吐鲁番写本中保存的《唐律》和《唐律疏议》的写本也最多。从内容上讲有《名例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诈伪律》、《捕亡律》、《杂律》包括了《唐律》十二章的大部分内容说明律在唐朝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律本原件也是我们研究《唐律》形成演变的主要证据。

“令以设范立制”是大唐帝国制度的总汇包括官制、礼制、田制、学制、选举制、兵制、赋役制等等的详细规定。唐令自武德至开元在隋令的基础上反复修订过多次比较重要的有《武德七年624令》、《永徽二年651令》、《开元七年719令》、《开元二十五年737令》但所有令书都已佚失。除了上述开元《公式令》残卷P.2819V外敦煌文书中还保存有较长的《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抄本P.4634、S.1880、S.3375、S.11446缀合对了解东宫太子属下的官僚体制很有帮助。最近我们在俄藏新刊敦煌写本中又发现唐代《祠令》残卷Дx.3558仅存三条残文应当是《永徽令》的修订本显庆二年七月以后或者说是显庆二年七月以后行用的《永徽令》[9]弥足珍贵。

“格以禁违正邪”共分为二十四篇以尚书省二十四曹为篇目编录当时制敕用为各曹司的法则是尚书省各部门职掌的详细规定。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不同时期的《刑部格》P.3078、S.4673、《户部格》S.1344、北图周69、《兵部格》P.4978等格文残卷。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认为北京图书馆藏周字51号是《职方格》抄本据原卷抄写的情况来看不是格文而可能是沙州或西州地方官府的文书[10]。

“式以轨物程事”共分为三十三篇以尚书省二十四司加上秘书、太常、司农、光禄、太仆、太府、少府及监门、宿卫、计帐为篇目是对各官府行政事务的具体规定。敦煌发现了唐开元《水部式》残卷P.2507详细规定了唐朝对水渠、桥梁的管理。另外还有《吏部式》残片P.4745。

此外新公布的俄藏敦煌文书残卷中有一件唐代法制文书编号Дx.06521图3整理者标名为“唐律”显然不确[11]。其保存残文14行包含有一道开元二十五年的《考课令》、一条同年的《户部格》以及一条可能是开元二十二年八月的敕内容都与朝集使制度有关。据考这个精写本可能是开元二十五年删定律令格式的同时所编纂的《格式律令事类》的断简。由于该书散逸已久长期以来被学界忽视但它在中国古代法律编纂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它不仅是唐代律令格式体系向宋代敕令格式体系转变的一个重要过渡而且在体例上开启了宋代法典编纂形式的先河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件敦煌文书的发现为我们认识此书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材料[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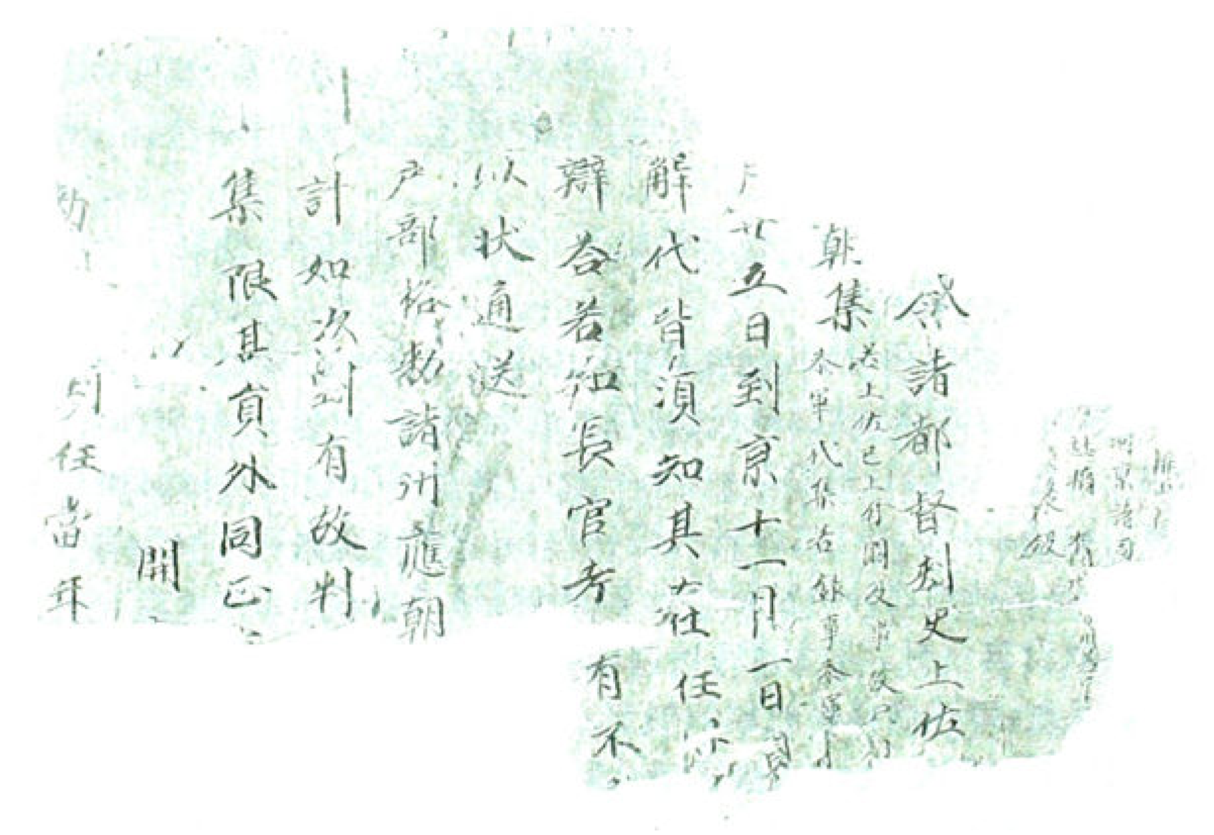


图3　Дx.06521开元《格式律令事类》

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律令格式残卷录文有山本达郎、池田温、冈野诚合编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文书》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第1卷《法制文书》[13]。刘俊文根据此书又增补吐鲁番新出资料辑成《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14]。目前由于新的敦煌文书资料的公布这两部书都有补订的必要[15]。

三　兵　制

敦煌文书特别是吐鲁番文书对于唐朝兵制的研究贡献更大。唐朝兵制的主要发展脉络是从北朝以来府兵制发展到募兵制但不论是府兵制还是募兵制其起源和发展都有许多不明之点。唐长孺先生《唐书兵志笺证》对史籍的有关记载有所清理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谷霁光《府兵制研究》对于府兵制的研究贡献较多但限于条件还没有能够利用敦煌文书。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包含有大量沙州和西州地区府兵日常勤务和征战时留下的文书说明唐朝前期府兵除了官制规定的番上宿卫之外远在边陲的府兵也起着镇戍的作用。并且随着唐朝西北地区战争形势的发展大量府兵和募兵被征发到西域前线作战和戍守使以府兵为主体的行军渐渐发展成以募兵为主体的镇军原本规模较小的镇戍也逐渐发展成大的军镇促使唐朝兵制在开元时期发展巨变以军镇为据点的节度使体制建立节度使下的募兵制成为唐后期的主要兵制。在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朝兵制变化上菊池英夫的一系列论文最有贡献主要有《节度使制确立以前“军”制度的展开》[16]、《节度使制确立以前“军”制度的展开》续编[17]、《有关唐折冲府的分布问题的一解释》[18]、《从西域出土文书看唐玄宗时代府兵制的运用上、下》[19]。

八十年代初唐长孺先生率领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整理了1959—1975年吐鲁番新发现的汉文文书其中有大量的文书涉及唐代军制的各个方面。唐长孺和他的弟子们分别加以探讨对唐代兵制作出了新的贡献。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唐长孺《唐西州差兵文书跋》[20]、《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21]、《唐先天二年713西州军事文书跋》[22]对唐朝府兵的各项制度和唐朝征发其他兵种作战的情况做了深入探讨。朱雷《唐开元二年的西州府兵》[23]揭示唐朝府兵行营制度。程喜霖在

一系列论文基础上形成《汉唐烽堠制度研究》[24]。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25]详细研究了行军体制。近年孙继民又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府兵、兵募、健儿、子弟、行军、军镇以及其他类型的军事文书加以探讨完成《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军事文书初探》[26]。通过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唐朝府兵制的运作也可以知道唐朝行军的构成及其与后来的镇军的关系以及府兵装备、镇戍、烽堠等军制的一些细节。

四　均田、赋役制度

唐朝的土地赋役制度一直是国内外唐史学界研究的重点课题。北朝到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土地所有制均田制的还授是否能够实施或者说均田制是否按唐朝法令规定的那样实行过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陆续发表的敦煌和吐鲁番文书对唐代均田制的研究以及相关的赋役制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推动。

按照唐朝制度的规定每户每年要呈报自家的人口、土地数字并保证情况属实称作“手实”。官府根据各户的手实每三年编造“户籍”把每个里的各户人家以户为单位记录户主及身份、户内口数和丁中情况、土地多少和四至。此外乡、县、州制作有不同级别的“计帐”汇总所属民户的人口与土地情况并上报中央政府。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还没有发现州县的计帐吐鲁番文书中发现有乡帐一类的文书还不能确定为“乡帐”。但是有相当一批户籍和手实保存下来清楚地记载了沙州和西州地区百姓的人口和土地情况吐鲁番文书更明确地记载了土地还授的存在为均田制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敦煌和吐鲁番的户籍文书有相当多的细节不同反映了唐朝各地的均田制不可能完全与唐令规定的一模一样。特别是吐鲁番盆地原为高昌国领土唐朝在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王国后迁徙高昌王族大姓到长安、洛阳这就为唐朝均田制在当地的实行提供了条件。但吐鲁番地域狭窄没有太多的田地使当地百姓按照唐朝《田令》规定的数额来分配所以变通的授田额是“常田四亩、部田六亩”远远不足可见均田制也不是全国都一样的制度也有因不同土地而有不同授田额的情况。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可以看出唐朝规定的丁男应授田百亩实际是国家允许授田的最高限额而不是实际授田数。如果占田逾制则国家干

预没收而吐鲁番战事频繁死退田地较多故有退田、给田文书但数额较小。达不到应受田额者可以请授但每户实际的田地数额与应受田额相差很大表明其所占有的田地很可能就是自家原有的土地而通过手实和户籍变成了官府的授田这就是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说的"因民之在田者而均之"。在户籍所记的已授田中先满足永业田剩下的归为口分田。可见均田制虽然实行了但绝不是平均分配土地看似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均田制实际上仍然是土地私有制。

与均田制相关的租庸调制度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有不少资料。其中包括官府收租的记录有纳资代役的记录吐鲁番发现有庸调布的实物还有春秋两税的征收记录等等。关于劳役不论是普通力役还是兵役都有相关的文书记载。

五十年代由于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对大谷文书的整理这批吐鲁番文书中关于田制和赋役制的材料由西村元佑、西嶋定生、小笠原宣秀、仁井田陞等人做了细致的研究成果汇集在《西域文化研究》第二、三卷《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两册中[27]。此外日野开三郎、堀敏一、池田温等人对唐代均田、赋税制度也有深入的探讨。如日野的《唐代租庸调研究》[28]、堀敏一《均田制研究》[29]、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30]等。

中国学者从三十年代以来就关注均田制问题由于资料的限制和"文革"的影响到了八十年代才较为深入地研究均田制和赋役制专著先后有宋家钰《唐代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31]、杨际平《均田制新探》[32]、武建国《均田制研究》[33]重要的文章也相当多其中如唐长孺《唐贞观十四年手实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问题》、《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34]、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所收关于均田和差科簿的文章[35]、朱雷《唐代"手实"制度杂识》、《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唐代"均田制"实施过程中"受田"与"私田"的关系及其他》[36]。目前有关均田赋役的研究已经不是热门但仍有些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山本达郎和土肥义和合编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文书》D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第2卷《籍帐》[37]是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的基础上编成的收入敦煌吐鲁番手实、户籍、差科簿类文书图版和录文是使用这类写本的最佳史料集。但《吐鲁番出土文书》收录的同类文书则需使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叁、肆[38]。已刊和未刊的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

目录可参看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39]。

从制度上来看敦煌吐鲁番文书的价值远不止这些只是材料比较零散无法一一罗列。比较重要的还应提到交通制度包括馆驿、长行马、财政制度《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市场贸易与管理体制《交河郡市估案》、市券与公验、质库制度、身份制部曲、奴婢、丁中制、和籴等等。

五　政治史

敦煌吐鲁番远处唐朝的西北边陲其保存的文书大多数是与当地和周边地域相关联的而涉及唐帝国核心的政治史材料比较少些。敦煌写本《常何墓碑》P.2640曾被陈寅恪先生用作研究玄武门政变的关键史料[40]。敦煌本《大云经疏》和一些写经上的武周政治和尚的题名图4对武周政治运作的认识也很有帮助[41]。最近发现的一首李季兰佚诗Dx.3865可能正是建中时泾原兵变中李季兰上给自称皇帝的朱泚的颂诗[42]。敦煌流行的更有名的诗歌作品是《秦妇吟》真实地记录了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后的情形已经几乎为所有历史教科书所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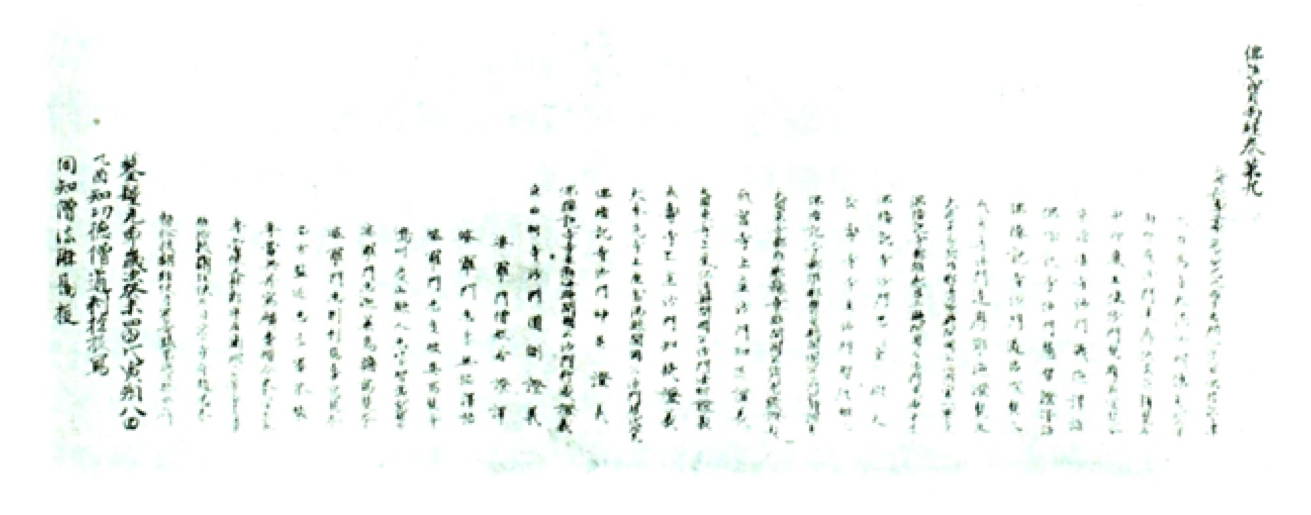


图4　S.2278《佛说宝雨经》卷九题记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涉及唐朝前期西北政局的材料相对多些这为我们今天认识唐朝经营西北特别是唐朝进入西域的历程有许多帮助。有的文书直接记载了唐朝在西域的行军或镇戍的情况是研究唐代西域史

的原始资料。这类资料不仅在敦煌汉文文书中有在敦煌藏文文书中也有十分珍贵的材料如《吐蕃王朝编年史》、《吐蕃王朝大事记》等使我们今天能够把吐蕃帝国进入中亚的历程大体上勾画出来。

森安孝夫《吐蕃的中亚进出》[43]、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44]都系统地引用了前人整理过的敦煌吐鲁番文书资料。陈国灿《安史乱后的二庭四镇》[45]、黄惠贤《从西州高昌县名籍看垂拱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46]、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47]、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域史事二题》[48]、张广达与荣新江《8世纪下半与9世纪初的于阗》[49]等文则是利用原始文书来推进唐代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然而这方面的材料比较零散还有不少工作值得去做比如最近《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所刊布的有关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的文书对理解相关的碛西节度问题就十分重要。

敦煌文书对于河西特别是敦煌地方史的研究最为重要特别是保存了丰富的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和归义军时期的文书档案资料。本书第一讲《中国历史上的敦煌》中的吐蕃和归义军时期敦煌史就是根据敦煌文书研究的成果而写成的这里不再重复。有关吐蕃统治敦煌的研究状况在下面第十一讲中有专门论述。关于归义军史我著有《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50]是对归义军政治史和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虽然解决了不少问题清理出一条归义军政治史的主线但归义军的其他方面如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都有待深入探讨。兰州大学郑炳林编有《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51]对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进行纵深的研究在经济史方面有所进步但有关民族的部分却相对薄弱甚至没有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由于有关吐蕃和归义军的敦煌资料数量最多内容繁杂可以构成这两个敦煌历史阶段研究的雄厚基础今后仍然有不少课题要做。

注释

〔1〕　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

〔2〕　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

〔3〕　东京汲古书院1996年。

〔4〕　此据中村裕一《官文书》《讲座敦煌》第五卷《敦煌汉文文献》一文所附简表549页及所引原文书增补而成。

〔5〕　参看雷闻《从S.11287看唐代论事敕书的成立过程》《唐研究》第1卷1995年323—335页。

〔6〕　收入唐长孺《山居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7〕　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
〔8〕　见《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论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
〔9〕　荣新江与史睿合撰《俄藏敦煌写本□唐令□残卷Дx.3558 初探》《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3—13页。
〔10〕　参看荣新江《唐写本□唐律□、□唐礼□及其他》《东洋学报》第85卷第2号2003年。
〔11〕　《俄藏敦煌文献》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彩版四黑白版见120页。
〔12〕　雷闻《俄藏敦煌Дx.06521残卷考释》《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
〔13〕　东京东洋文库1978—1980年。
〔14〕　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5〕　参看池田温《北京图书馆藏开元户部格残卷简介》载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等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159—175页同作者《唐朝开元后期土地政策の一考察》《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391—408页图版刊布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等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图版21号国家图书馆2000年14—15页。以及荣新江与史睿上引文和荣新江《唐写本□唐律□□唐礼□及其他》。
〔16〕　《东洋学报》第44卷第2号1961年。
〔17〕　同上第45卷第1号1962年。
〔18〕　《东洋史研究》第27卷第2号1968年。
〔19〕　《东洋学报》第52卷1969—1970年。
〔20〕　唐长孺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
〔21〕　唐长孺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22〕　同上。
〔23〕　《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
〔24〕　台北联经公司1991年出全本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出简本。
〔25〕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26〕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7〕　又见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1966年、西村元佑《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东京1968年。日本学者的均田、赋役制研究成果有姜镇庆等译《敦煌学译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
〔28〕　共三卷自家版1974—1977年。
〔29〕　东京1975年。
〔30〕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
〔31〕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32〕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
〔33〕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34〕　两文均载唐长孺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35〕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36〕　分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辑1983年《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资料》第14辑1996年。
〔37〕　东京东洋文库1984—1985年。
〔38〕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39〕　《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40］　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25—226页。

［41］　富安敦《7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那波利1976年。

［42］　荣新江与徐俊合撰《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0—72页。

［43］　《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史学科篇》第4号1983年。

［44］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45］　《唐研究》第2卷1996年。

［46］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47］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48］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1990年。

［49］　《唐研究》第3卷1997年。

［50］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51］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第十讲　敦煌学与中古社会史研究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一部分是有意留存的典籍一部分是偶然留存的公私杂文书。因此这里既有社会上层人士阅读的经典也有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写成的契约、借条、书仪、书信、账簿、课本、转帖等等是我们研究中古时期社会各阶层时极其难得的资料。姜伯勤著《敦煌社会文书导论》[1]根据敦煌资料所涵盖的范围把敦煌社会文书分成以下八章来概述第一章礼仪包括吉礼社稷、释奠、军礼傩礼、马社、嘉礼和婚仪书仪所见与《开元礼》不同处、凶礼与丧仪书仪与《开元礼》的对比。第二章氏族包括氏族谱、名族志与家传、敦煌名族钜鹿索氏、武威阴氏、济北氾氏、敦煌张氏、清河张氏、南阳张氏、陇西李氏、敦煌曹氏、谯郡曹氏、敦煌翟氏、太原阎氏。第三章学校与礼生包括官学与庙学制、寺学、课本与教育内容、技术院与礼生。第四章选举包括乡贡与制举、出土告身和告牒、使府僚佐。第五章良贱包括《二十五等人图》、放良书、归义军的驱使户、寺院依附人户。第六章城乡包括城坊结构子城、坊市制、城主、行人、乡村社会乡里、渠人。第七章教团包括僧伽组织僧尼籍、僧官、诸寺纲管、道教团体道观与道教人口、教职与法位。第八章社包括社文书的分类官社、私社、社条与社人、社司与社司转帖、社状、账历、祭社文和社斋文。这本书基本上涵盖了敦煌文书中社会层面的内容而本讲只是检取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和敦煌社会的特色对一些方面略做交代。

一　人口与家庭

1人　口

敦煌文书反映的主要是敦煌地方社会的情况所以在人口迁徙、人口分布等问题上价值不大但在研究唐代人口结构以及相关联的家庭结构时有很细致的参考材料。

敦煌出土的户籍从武周到大历年间766—779记载了每户的人口数目和变动情况如见在、身死、逃亡、出嫁等等情况一般来讲现存的户籍籍面上所记的户口数往往与实际户口数相差较大官府记载下来的文书往往赶不上实际情况的变动速度。据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分析武周到开元时期713—741沙州的人口状况是[2]

一、户口逃亡和没落的情况十分严重特别集中在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和睿宗景云年间710—712这在吐鲁番出土的西州户籍中也同样有所反映说明武周末年到开元初敦煌和高昌地区的军事活动频繁不少丁口因为随军出征而“没落”被俘或失踪未归同时也有户口逃亡和隐漏的情况这和内地的情形是一样的。

二、户籍的混乱现象十分明显身死而未剔除出嫁而仍留名于本家逃亡户仍然登录。这表明户籍籍帐表面的记载已经不能反映实际的户口情况。

三、武周时沙州每户平均口数大为减少平均每户仅2人表明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严禁“父母尊亲在者别籍异居”的敕书在敦煌没有严格执行这一现象到开元十年722被改正。

四、据《开元十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因新生、漏籍、卫士放出、从尊合贯而附籍者大大增多这是沙州按照唐朝中央政府的命令严格检括户口和整顿籍帐的结果与同一时期宇文融在全国范围内的括户有关。附籍人数的增加著籍的人口也就随之增加。

至玄宗天宝年间742—755根据保存文字较多的《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图1可以看出一、户籍所记每户的口数大为增加平均口数是9.87人比《元和志》、两《唐书》所记开元、天宝时期各州郡平均户口数要高得多。这是因为此时的家庭合籍倾向突出有些家庭是包括祖母及成婚兄弟、子女一起构成的复合家庭。同时也有籍帐作伪的原因中央对州县官的考课基准是户口的增损增加户口可以受到奖励所以把已经出嫁的女性同时登录在娘家和夫家户籍内可能还有男性冒充女性或已亡人口登录的例子。二、男女数的比例也不均衡女性的比率十分高女口大约是男口的三倍。这是因为兵役的繁重出征的男丁死而不返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也是地方官做了手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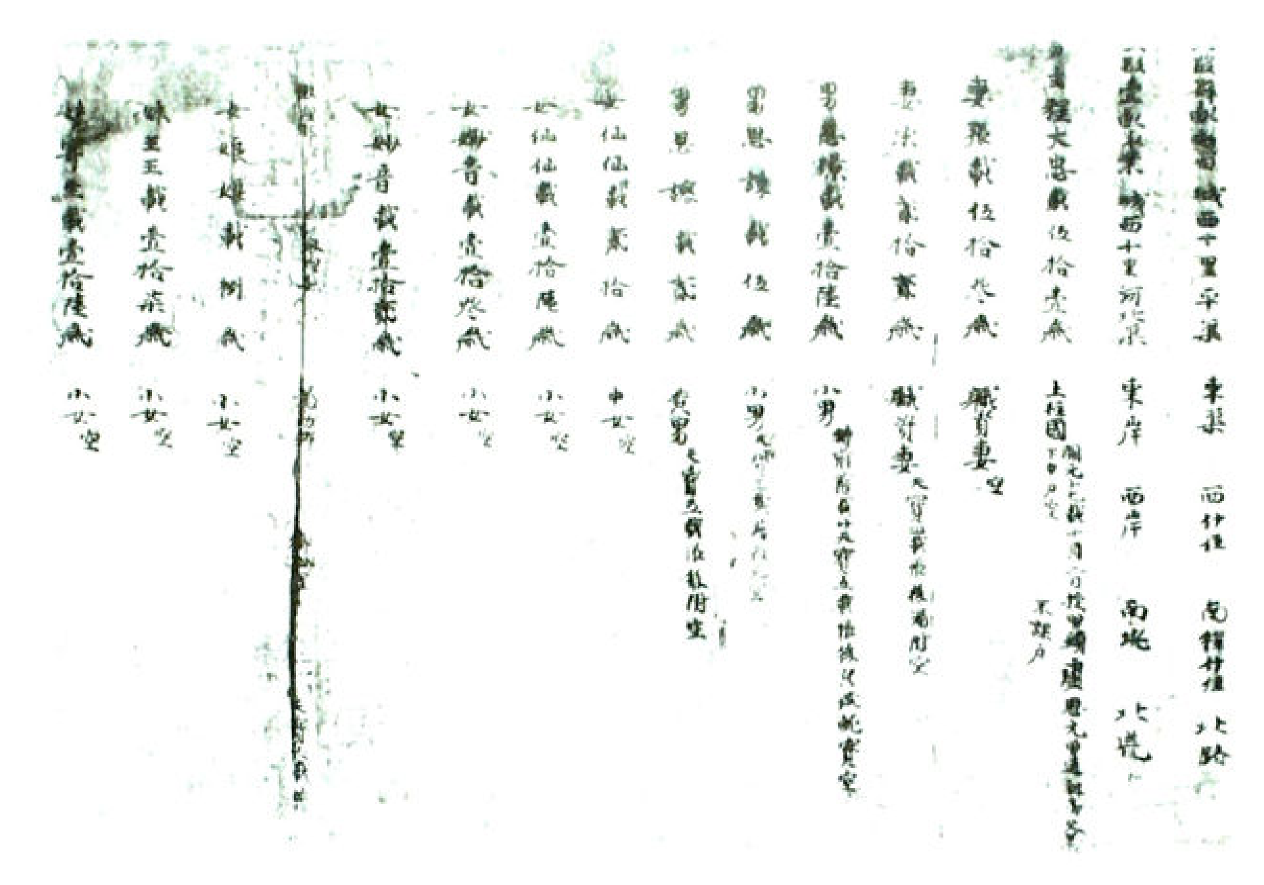


图1　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

对于敦煌户籍表面的记载目前学者们的解说尚不一致敦煌资料无疑对深入考察唐朝人口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具体素材。

2家　庭

过去研究敦煌文书者比较忽视家庭问题只不过是把家庭作为一个均田户来考虑。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家庭成为敦煌学者独立思考的个案。

关于敦煌文书反映的家庭结构问题杨际平、郭锋、张和平合著的《5—10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3]有详细的分析。他们以社会学方法概括出的四种家庭结构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其他家庭为基础把敦煌的家庭结构分成十二种制成《5—10世纪敦煌文书所见家庭结构表》安史之乱以前的敦煌家庭是以父母及未婚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占60以上。安史之乱后《大历四年769手实》反映的情况是核心家庭锐减至36.8单身家庭和其他家庭剧增原因是唐前期社会基本安

定西北地区虽然兵役繁重但对敦煌家庭结构影响不大。安史之乱给予敦煌的家庭结构以重要影响敦煌丁壮减耗单身家庭逐渐增多。

冻国栋根据吐鲁番文书也对西州家庭结构做了研究。据统计唐前期西州家庭平均4—5口与史籍所记其他地区类同。但西州因为战争频繁所以单身家庭和残破家庭普遍存在家口中非直系亲属的存在反映了一些女口失去丈夫和直系亲属后与其他亲属合籍的情况。另外家庭内奴婢、部曲、客女等贱口大量存在[4]。

二　士族与基层社会

1士　族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前期是士族社会大的家族在地方社会有着极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在文化上也处在领导的位置上有的家族成员参政成为左右一个王朝的权臣甚至登上皇帝的宝座。研究士族问题的学者往往是从一个家族入手进行个案的研究这样容易处理问题史料也比较集中。因为传世的唐朝文献中很少在某个地域范围内保存较多的记载。

敦煌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到五代宋初大族保持了他们在敦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越地位改朝换代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敦煌大族的社会地位。因此一些强有力的家族在敦煌的存在往往持续几个世纪。现存的敦煌《名族志》、《家传》、地方志、邈真赞、墓志铭和莫高窟的家窟、碑记、供养人题记等资料都集中体现了敦煌若干个大族如张氏、索氏、李氏、阴氏、阎氏等等从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吐蕃时期到归义军时代的重要地位。因此敦煌为我们提供了分析一个地域内士族发展变化的素材我们既可以研究个别家族也可以看几个大家族在一个地域中的相互关系。

由郭锋执笔的《5—10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第四章《唐以前敦煌的家族与家族关系》和第五章《唐五代敦煌的家族与家族关系》[5]分析了两汉以来敦煌大家族的发展和家族关系勾画出汉晋时期敦煌地方社会中大姓势力的形成和对地方政治文化的控制。唐朝前期人口的增加均田制的实施使敦煌大家族受到一些制约没有魏晋时那样的地方大族势力圈。但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权威瓦解大家族重新在地方

社会中发挥作用吐蕃的统治也激发汉族大姓的传统自保意识大家族之间的联系也较唐前期紧密。归义军时期敦煌社会再次出现有如魏晋时的大族势力把握政局的情况。郭锋用大量的表格来说明他的看法他还分析了敦煌家族制度和组织原则。

由于敦煌处在这样的大姓士族控制社会文化的背景下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不少研究士族的史料。如《敦煌氾氏家传》S.1889、《敦煌名族志》P.2625、《敦煌名人邈真赞集》P.4640、P.4660、P.3718、一些名士的墓志铭、某些家族修莫高窟功德记都对敦煌士族的来历和事迹有所记载而莫高窟的供养人题记和一些碑记材料还提供了丰富的大族联姻的情况是研究敦煌士族社会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绝好材料。

早年池田温撰《关于敦煌氾氏家传》[6]、《唐朝氏族志研究——关于□敦煌名族志□残卷》[7]、《8世纪初敦煌的氏族》[8]对于敦煌的《氏族志》编纂的目的以及唐朝的氏族政策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9]是把敦煌和史籍中的材料相结合就张氏家族所作的个案研究。

2社邑组织及其运营

唐朝时期地方社会有官社和私社两种组织官社属于历史传统主要的功能在于国家祭祀礼仪方面私社是民间自由结成的互助组织在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一直存在而且相当普及。

敦煌文书为我们研究唐宋时期的民间结社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我们对于民间结社的许多问题有了深入观察的可能性。通观敦煌的社邑文书虽然众多的民间结社并非一律等同但在组织形态上的一致性是很突出的。

宁可在《述“社邑”》一文中叙述了从春秋时代的农村公社组织到明清时代社邑的消失尤详于唐代。他指出“社邑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基层社会组织。其性质、类型、组织形式、活动内容、所反映的阶级关系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这已经涉及到了民间结社的几个基本课题就组织方面而言他在文中也有重要论述如私社只是部分居民多少自愿与自由的结合社的领导人由社人推举社人之间的关系是“贵贱一般”“如兄如弟”。社的宗旨、职能及社人的权利义

务已非纯依习惯和传统而是采取社条、社约等社会契约的形式加以规定并可由子孙继承等等[10]。

敦煌藏经洞保存的社邑文书主要是私社留下来的文件学者们将之分为社条、社司转帖社人间的通知书、社历收入支出账、社文、社牒状社人向社司打的报告等其中社条相当于社邑的基本法则其他社邑文书都可以看做是社条的有关规定的具体表现形式。

社条是结社时众人合议而成的规定结社的各项基本原则具体称谓还有“条件”、“条”、“条流”、“大条”、“社格”等。关于结社的目的、组织方式、社人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具体条例都是社条规定的内容。如S.6537背的《社条文样》中先写“因兹众意一般乃立文案结为邑义世代追崇件段条流一一别识”然后说“上件条流社内本式一一众停稳然乃勒条更无容易。恐后妄生毁诋故立明文劫石为期用流留〔后〕验。”[11]

一般的社邑由三官主持日常活动。三官指社长、社官和录事或指社长、社官和社老他们是社人选举产生的。一般社人入社要提出申请退社也要申请。S.5698号是份难得的有关退社的文书

> 癸酉年三月十九日社户罗神奴及男文英、义子三人为缘家贫阙乏种种不员。神奴等三人数件追逐不得伏乞三官众社赐以条内除名放免宽闲。其三官知众社商量缘是贫穷不济放却神奴。宽免后若神奴及男三人家内所有死生不关众社[12]。

这不是请求除名的状文而是在申请除名之后社官与社人商量的决议记录。神奴等三人因为家贫无力承担社中的义务在几次应交纳费用而没有交纳之后自己提出申请要求社内除名从此不再享受社内的帮助。

社内的许多其他问题同样都是要社人大会商量决定的。在《社司转帖》一类的文书中常有一种“少事商量转帖”的说法就是通知社人集合开会商量社内事务。

敦煌民间私社的组织形态因为是建立在个人自愿的基础上所以与国家组织显现出极大的不同。在社条面前社人以平等相处没有国家组织那种森严的等级序列。由于社人参与制定社条所以维系社邑运转的原则是共同制定并共同遵守的这就与国家组织由统治者制定法律全民遵守的情形有了根本的区别。三官与社人主要是分工不同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尤其是三官由社人选举产生社人大会为最高决策机关这就为避免专制国家经常出现的那种权力异化现象提供了组织保障。

社邑的文书原则是凡事有记录社务公开从而维持了必要的透明度这就为社邑的健康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技术保证。

敦煌社邑既有原始村社的互助传统又有儒家伦理主义的浓重色彩其主要职能是宗教祭祀活动和丧葬互助等。在祭祀方面有春秋二社对社稷土地神的祭祀在宗教活动方面有修建佛寺、兰若、窟龛等功德建福还有燃灯、脱塔印沙、行像等。

社邑的意义在于团结互助依靠群体的力量抵抗个体难以抵抗的灾难和难以应付的局面。按一般常识推测在一个穷人占多数的社会中毕竟是穷人更需要联合与互助。除了极度贫困者被排除在社邑之外一般下层群众都是有机会成为社人的即使社邑纳物对他们确实是一种负担。敦煌社邑虽然有不同等级的人参加但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分布毕竟以中下层为主。

在结社自愿这个前提下敦煌的社邑的建立显然是随应各种机缘的有僧人结社有女人结社有的结社是因为社人同居一巷如S.2041就是大中年间“儒风坊西巷村邻等”的结社有的是因为同在行伍而结社如P.4063的官健社有的是因所操同业而结社如渠人社和车社等。有两人、四人的微型结社S.2894背3、P.3961背有五六十人的大型结社S.4472背1—3《纳赠历》有49人签名S.1845《纳赠历》至少有62人有的多达90多人P.2738背《社司转帖》虽有残损但名单中还有90多人。这样普遍存在的社邑必然对敦煌的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13]。

关于敦煌社邑文书的整理有宁可、郝春文编《敦煌社邑文书辑校》[14]和山本达郎、土肥义和、石田勇作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文书集》第四卷《社邑及其相关文献》D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Ⅳ: She Associations and Related Documents[15]。

三　佛教教团与僧尼生活

1佛教教团

敦煌文书中蕴藏着丰富的敦煌佛教社会的各种原始材料其中尤以中晚唐、五代、宋初的资料最为丰富从敦煌历史的时区划分来讲就是吐蕃统治时期786—848和归义军时期848—1002。在利用这些资料来研

究敦煌佛教社会史方面敦煌学界取得了很多成绩。谢和耐《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16]、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17]、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18]对于敦煌佛教教团的僧伽组织和寺院经济做过深入的研究。

中古时期的敦煌社会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僧尼人数相当多特别是在吐蕃和归义军政权的鼓励下僧尼的社会地位较高教团及其依附人口占沙州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

在每个寺院的组织方面唐朝时是依据内律而组建的。在吐蕃和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寺院是属于一个教团的由都教授或都僧统以下各级僧官管理。关于整个教团的僧官体系据竺沙雅章的复原如下

吐蕃期都教授—副教授—都法律—法律—都判官—判官。

归义军都僧统—副僧统—都僧政—僧政—法律—判官。

而各寺的纲管体系是寺主—上座—都维那[19]。

总管各寺的教团机构是都司设在城内的龙兴寺。都司下有儭司管布施收入和分配行像司管佛诞日巡城行像方等道场司管设立方等道场经司管经藏灯司管燃灯此外还有功德司、修造司、仓司、常住仓司、羊司等。都司所属僧尼有僧尼籍把各个寺院所属的僧尼按寺登记在案。

敦煌寺院最盛时有十七座寺院的规模有大有小有的在城内有的在城外图2。寺院一般都有经藏、佛像等供养具、家具、瓦器、衣物等各寺都有常住什物历来登记寺院财产。寺院有依附人口即吐蕃时的寺户或归义军时的常住百姓。关于寺户制度和中古寺院经济问题详见姜伯勤上引书。



图2　P.t.993敦煌纸画吐蕃时期寺院图

2僧尼生活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一书的出版[20]学界对于敦煌僧尼的生活问题产生激烈的争论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对于中古中国佛教教团的宗教性和世俗性的不同认识。

郝春文的著作以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为主旨并对此问题做出了系统的考索。该书分别探讨了僧人出家受戒的程序和方等道场的设置、敦煌住寺和不住寺僧尼的不同生活方式以及赋役负担、僧尼与寺院常住什物和常住斛斗的关系、僧尼修习生活和参与宗教活动的情况、敦煌教团和僧尼个人的各种宗教收入来源施舍、出唱、儭利、法事、僧尼遗产处理和丧事的操办、归义军政权对佛教教团的控制与管理等问题基本上囊括了敦煌文书资料所能提供研究的各种僧尼生活的问题。

郝春文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审视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的他以敦煌文书所记的当时的实际情况为准来阐述敦煌僧尼社会生活的实况揭示

出种种与佛教戒律的规定相矛盾的地方。如敦煌僧尼住在寺外、拥有家产、纳税服役等等问题都与佛典内律的规定相矛盾而且有坚实的材料来证明这些现象的存在。这无疑加深了我们对僧尼占人口比重较大的敦煌社会的认识也有助于理解吐蕃特别是归义军长期扶植佛教的原因。

郝春文在探讨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时往往不只是从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寺院生活来看问题而是把僧尼放在更广阔的社会中去观察。这样贯穿全书的看法是新颖的即因为敦煌僧尼不全都住在寺院当中因此产生了财产问题、宗教活动不到的问题、收入问题、遗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难以用“伪滥僧”和戒律所规定的僧尼可以还俗来解释的。

但是仍有些问题不够明确。如关于敦煌有不少僧尼散众不住在寺中郝春文征引的牒状等文书有明晰的记载但他用P.4981《当寺转帖》来证明敦煌有不少僧人并不住在寺中却不够坚实因为这件《当寺转帖》似乎可以另作他解即“今缘□当寺水漂破坏”才使得僧人散住在外等到寺院决定修复时再下帖去通知散在各处的当寺僧人回来。帖中并没有说散众不知道当寺被水漂坏其居地也可能散在其他寺院。

另外作者论证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承担兵役一点似乎还有讨论的必要。吐蕃的制度和归义军的制度恐怕不同文中所引用的藏文文书《原籍表》如果是僧人承担兵役的资料也只能反映吐蕃时期的制度。作者引证冯培红先生新作《P.3249背□军籍残卷□与归义军初期的僧兵武装》[21]其所考P.3249背为归义军时期有僧兵的证据但此件各个僧兵均属某一“将”这是典型的吐蕃制度[22]。冯氏关于此件文书为咸通二年861的说法也没有充分的根据。至于S.528《僧智德状》中“口承边界镇守雍归”可以理解为移民边地的一种说法。S.4701《庚子年940十二月十四日报恩寺前后执仓法进惠文愿盈等算会分付回残斛斗凭》中“行索僧正欠麻壹硕壹斗柒升又添烽子豆三硕”后一句是否归于索僧正还有疑问因为也可以理解为报恩寺向政府交的代役租[23]。现在看来还没有归义军时有僧人武装的坚实证据当然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北图能字40号所记“父子之军”因文书前残似也不能圆满解释为僧人亦服兵役。

四　敦煌文献中的民俗资料

敦煌藏经洞保存下来的文献既有文人士大夫的遗珍墨宝又有反映大众文化生活的各种资料。后者正是传世的文献所缺少的东西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敦煌文献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宝藏但却还没有认真系统地开采。1974年罗宗涛出版了《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一书[24]把敦煌俗文学中的有关内容分类排比出来举凡饮食衣饰、建筑行旅、婚姻丧纪、教育信仰、社交礼仪等等方面应有尽有。但这些材料主要局限在变文和曲子词方面还不能全面反映敦煌的民俗。我们这里仅就某几个方面的材料加以简要的介绍。

1节　日

先说节日方面在敦煌文书中有许多属于归义军时期的账目其中有官府的财务出纳账也有一些寺院的《入破历》相当于今天的收支账目。在一些出支账目中往往记录了为准备庆祝某个节日而要支出什么东西使我们对敦煌当时的各种节日风俗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如P.4640号背面《归义军军资库司破用布纸历》记有899—901年三年内归义军官府支出各种纸的情况[25]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知一年内由归义军官府资助的赛神也就是报神的活动有赛祆神这是唐朝甚至更早以来波斯拜火教在敦煌流行的反映但这时的祆神不过是沙州民间众神殿中的普通一员而已恐怕早已失去它原来的含义。赛金鞍山神这是人们对敦煌西南金鞍山神的祭祀活动因为传说它可以“立致雷电风雹之患”[26]。一年内要多次在鹿家泉、三水池、都乡口、马圈口、平河口、百尺下分流泉等处赛神祈求水神的保佑因为在绿洲上生活的人们深知水是生命的源泉所以这种赛神的规模最大、次数最多。账目中还有“祭川原”一项恐怕也是同一类的活动。另外又有“赛张女郎神”则是求雨的活动[27]。在四月里要赛青苗神是为庄稼能够长得丰茂而祝福。

在佛寺的出支账中也保存了一批与佛教有关的节日活动。如从一件净土寺的《破历》支出账中就可以得知正月十五日要燃灯进行赛天王的法事。二月八日为传说的佛诞日要举行行像会用车载着佛像绕城而行[28]。寒食节要祭拜高僧。七月十五日设盂兰盆会还要设乐讲经。十二月八日腊八也要燃灯[29]。此外敦煌文献还记录了其他一些一年之内的经常性活动。如三长月正月、五月、九月的斋会、正月里的印沙佛会和除夕之夜的驱傩打鬼。更可宝贵的是为这些节日活动所写的种

种艺文如《社斋文》、《印沙佛文》、《二月八日文》、《灯文》或《燃灯文》、《儿郎伟》等记录了这些节日活动的过程和人们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所达到的愿望。如除夕夜的驱傩打鬼情况一首《儿郎伟》P.3552唱道"今夜驱傩仪仗部领安城大火祆以次三危圣者搜罗内外戈鋋。趁却旧年精魅迎取蓬莱七贤并及商山四皓今秋五色红莲。从此敦煌无事城隍千年万年。"在打鬼的队伍中有敦煌城东安城庙中供养的拜火教祆神后面跟着的是敦煌三危山的圣者。驱除恶鬼迎取的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蓬莱神仙和长寿的商山四皓以祝愿千年平安万年无事。这些长年唱的歌辞凝聚了敦煌民众的心声是不可多得的民俗资料。

除此之外从唐朝开始皇帝的诞日和忌辰都变成了一种节日要举行一定的庆祝或追福一类的活动敦煌地区也很重视这种活动而且一些原始的活动记录保存了下来。此外《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P.3808就是一种在后唐明宗诞辰日讲经用的文本而《张议潮国忌行香文》P.2854则是归义军节度使在唐朝皇帝忌日里行香时用的一种文范这在传世的文献中是不多见的。

2衣食住行

再说衣食住行方面。敦煌壁画中有大量的佛国人物和供养人像还有作为背景的楼台亭阁、寺院塔窟是了解各个时代衣服装饰、建筑风格的形象材料图3是《中国服饰史》、《中国建筑史》一类著作的主要材料来源之一。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也同样保存了大量有关这些方面的资料比如吃的食品原料就有一大批各种各样的交纳谷物时的记账又有许多支出面和油的《破除历》支出账。在制成的食品方面因为还保存下来一些宴设司归义军的官府之一的档案我们知道当时的面食有馎饦、饽𫗦、胡饼等从用酒的账目中知道当时有各种各样的酒和什么样的人或在什么场合下饮酒等等[30]。又如一般僧俗大众穿的衣服种类在一些《分家书》、《遗嘱》或寺院的《唱衣历》叫卖衣物的账目中有丰富的记载。有一份遗嘱中就列举了汗衫、紫绫夹裙衫、绫袄子、白练衫、紫绫履、京皮靴、腰带等等品种甚为繁多[31]。有些契约和《分家书》中则提供了居住面积和周围环境的情况[32]。至于行旅有

《过所》通行证和为旅行而做准备的种种记录如《借驼契约》等。如果有人把这些材料汇编在一起数量一定相当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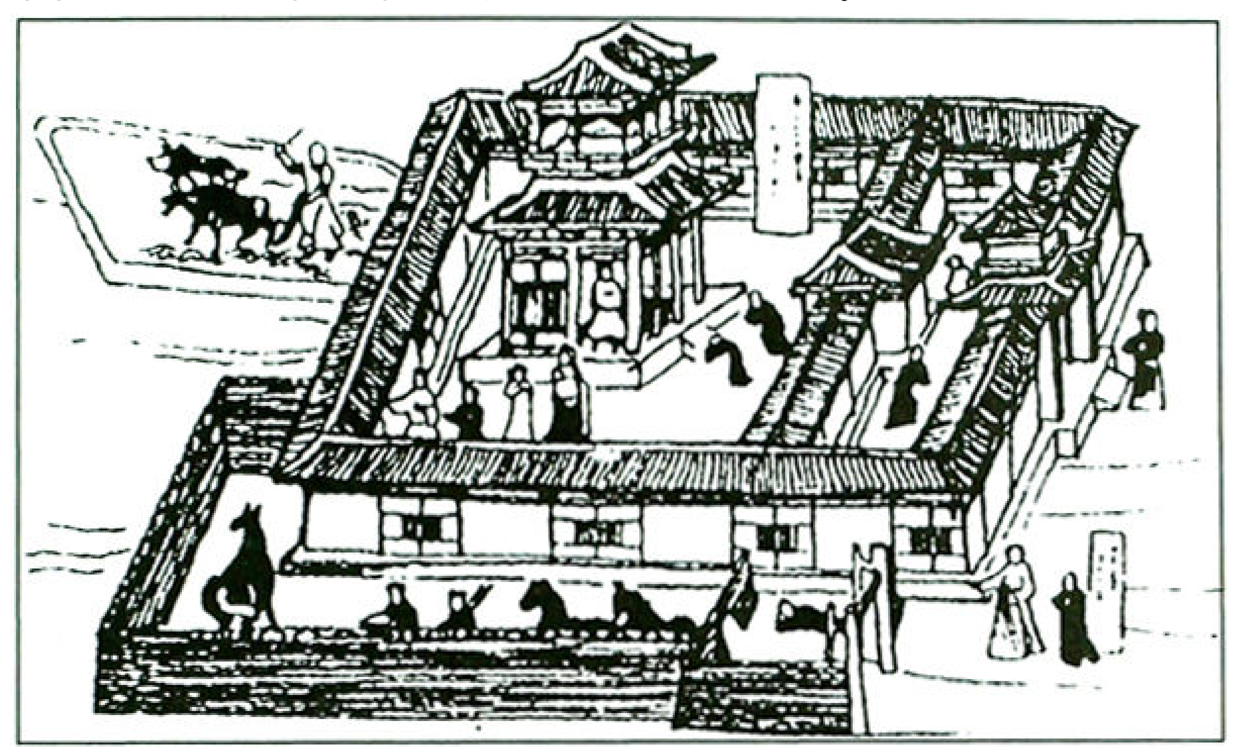


图3　莫高窟第85窟壁画中的住宅图

3婚　丧

相比而言关于婚姻和丧葬方面的资料更多而且更为完整。中国礼教发达古代关于结婚礼仪的记录并不少但记载唐朝前期制度的《开元礼》一类的官方礼典所记大多是帝王或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婚仪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六个礼仪程序。敦煌文献中的“书仪”是研究唐代婚丧的一个重要材料来源。简单说来书仪就是写信的范本因为要给社会上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男男女女准备书信范本所以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据《隋书·经籍志》和两《唐书》的《经籍》、《艺文志》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有不少书仪作品但因为实用性强变化快所以几乎都没有流传下来。敦煌保存了唐五代时期多种书仪写本主要是吉凶书仪有唐前期的也有晚唐五代的有出自中原士族杜友晋之手的《吉凶书仪》有宰相郑余庆所撰《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也有河西节度使掌书记张敖编的《新集吉凶书仪》安西四镇地区行用的《书仪镜》以及五代敦煌十分流行的《新集书仪》有不少书仪发现了

不只一件写本甚至有的有十几件抄本可见流行之广。书仪中有关婚丧的记录最多比如我们把张敖编《新集吉凶书仪》和敦煌写本《下女夫词》及一种《通婚书》合起来可以复原敦煌民间迎亲成婚的全过程其中尤以《下女夫词》的记载为生动有许多细节是《开元礼》所没有的。

《下女夫词》共有十多个抄本它是用对答对歌的文学手法详细记录了民间结婚程式的过程女夫即女婿先到女家大门女方请新郎下马在男方向女方奉献了绫罗之后女方向新郎敬上“上门酒”并诵《上酒诗》男方要作答诗。进至女家大门、中门、院内土堆和堂屋外的堂基时都要应物赋诗。然后遇到故意上锁的堂门要作诗叫门并诵《至堂门诗》。女家铺设帐仪延新郎入帐然后撒帐以祝吉庆并咏《撒帐词》。撤去帐幔新娘才走出堂门由侍娘用扇遮住送入帐幕坐在床上。然后去扇傧相请女下床与新郎同吃一盘牲牢。食后用五色绵系住二人的足趾新郎脱掉礼服新娘去掉头上花饰、帽帼。二人结发为夫妻。然后众人退出垂帘安寝[33]。《书仪》则记录了有关婚礼的往来书信样本同样展现了民间礼俗的特征。

关于丧葬方面的礼俗以敦煌写本《吉凶书仪》的记载最详。从入棺、吊丧、卜宅、大小殓、启柩、送葬、临圹、掩埋直到葬后迎神都有相应的礼仪文字。如吊词就有吊人父母亡、吊人翁婆亡、吊人伯叔姑兄姊亡、吊人弟妹亡、吊人妻亡、吊人姨舅亡、吊人小孩亡、姑亡吊姑夫、姊妹亡吊姊妹夫、吊人妻父母亡、吊人女婿亡、吊人子在外亡等各种吊答词都是《开元礼》中所没有的。另外敦煌卷子中还有一类《纳赠历》文书是邻里社人对死者家里的一种救济帮助的形式也反映了当地的民风[34]。

此外还可以通过这些书仪材料来研究唐代民间社会的等级、称谓、行第等问题。

周一良先生撰有《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赵和平有《敦煌写本书仪中看到的部分唐代社会文化生活》等利用书仪研究社会史的文章均收入两人合著的《唐五代书仪研究》[35]。书仪本文的录文大多数已经辑入赵和平的《敦煌写本书仪研究》[36]、《敦煌表状笺启类书仪辑校》[37]。

4民间信仰

敦煌地区的民间信仰是混杂的并不都是一边倒地佞佛。除了佛教之外当地还流行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在自然神崇拜上有金鞍、三危等山神也有川源、水池等水泉雷雨之神。这种多神崇拜的现象越往后越混杂。如一篇归义军时期的百姓发愿文就祈求一切诸佛、诸大菩萨、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司命、司录、土府水官、行病鬼王、疫使、知文籍官、院长押门官、专使、可韩官并一切幽冥官典等加以慈悲救护[38]。另外宋代初年节度使曹延禄写的《醮奠文》S.4400中也说到奉请东王父、西王母、北斗七星、光鼓织女、先圣先师、后师神师、七十二神符史以及五方星主、五帝之君、城社神灵、州府土地、八方神吏、十二诸神等领受醮奠。如果全面搜罗一下不难排列出敦煌民间信仰的众神谱。而且文书中还保存有各种类型的祭祀文献。如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的《祭风伯文》S.5747又如洪润乡百姓高延晟的《祭宅文》等等。

与对各种神祇的信仰相关联的是占卜风俗在民间很盛反映这一情况的是敦煌文献中有不少术数类书籍的抄本如《七曜星占书》、《相面书》、《解梦书》等还有大量的《具注历》。特别是后者是民间使用的日历里面详细记录了哪一天做什么事吉做什么事凶。这些书都是敦煌民间信仰的真实反映而且数量不在少数著作的等级、对象和用途也不尽一样是我们分析当时民间信仰方面的绝好材料也是正统的文献中不易找到的。

5娱　乐

最后还有一些写本的内容记录了当时民间的娱乐活动如《敦煌录》“鸣沙山”条记有“风俗端午日城中士女皆跻高峰一齐蹙下其沙声吼如雷至晓看之峭崿如旧。”[39]这种娱乐风俗至今仍在敦煌保持着。

敦煌壁画中也有许多娱乐活动的形象材料图4。



图4　莫高窟第156窟壁画中的乐舞百戏图

因为许多敦煌文献产生于人民大众之手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大众的生活。这些未经文人墨客修改的原始文献是研究古代中国特别是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民俗民风的第一手资料。它们的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民俗学的各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个民俗学资料的宝藏。

但是由于民俗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受重视所以敦煌的民俗学宝藏也很少有人利用。今天如果在广泛的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背景下开发利用这一宝藏将会使民俗学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注释

〔1〕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

〔2〕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3〕　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

〔4〕　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378—423页。

〔5〕　《5—10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108—196页。

〔6〕　《东方学》第24号1962年14—29页。

〔7〕　《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3卷第2号1965年3—64页。韩昇译载池田温《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68—121页。

〔8〕　《东洋史研究》第24卷第3号1965年28—52页。

〔9〕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

〔10〕　原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收入《宁可史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40—457页。

〔11〕　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50、52页。

〔12〕　同上书708页。

〔13〕　本小节参考了孟宪实《关于唐宋民间结社的几个问题——以敦煌社邑文书为中心》2000年5月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14〕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参看石田勇作书评《东洋学报》第80卷1999年69—78页。

〔15〕　东京东洋文库1988—1989年实际出版年代为2000年。参看孟宪实对本书和《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所写的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2001年413—418页。

〔16〕　中译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17〕　京都同朋舍1982年。

〔18〕　中华书局1987年。

〔19〕　竺沙雅章《敦煌的僧官制度》《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

〔2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1〕　《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

〔22〕　见藤枝晃《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东方学报》第31册1961年249—250页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39页。

〔23〕　文书全文见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三400页。

〔24〕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

〔25〕　文书全文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605—611页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三253—270页。

〔26〕　S.5448《敦煌录》语见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304页。

〔27〕　参见张鸿勋《敦煌写本清明日登张女郎神诗释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59—70页。

〔28〕　童丕《从寺院的账簿看敦煌的二月八日节》一文即运用入破历对二月八日节作了深入研究原载De Dunhuang au Japan, Études chinoises et bouddhiques offertes à Michel SoymiéJean-Pierer Drège编巴黎1996年25—72页余欣、陈建伟中译文载《法国汉学》第5辑中华书局2000年58—106页。相关研究还有王微《春祭——二月八日节的佛教仪式》原文载De Dunhuang au Japan73—96页同译者中译文载《法国汉学》第5辑107—126页。

〔29〕　P.2049Va《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计会》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617—630页。

〔30〕　参见郑炳林《唐五代敦煌酿酒业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王微Françoise Wang-Toutan《禁食酒肉——从敦煌文书看中国佛教的特性》童丕Éric Trombert《酒与佛教——8至10世纪敦煌寺院的酒类消费》均载戴仁Jean-Pierre Drège编《远东研究纪要》Cahiers d' Extrême-Asie,第11卷2000年。

〔31〕　P.3410《吐蕃某年沙州僧崇恩析产遗嘱》《中国古代籍帐研究》558—560页。

〔32〕　池田温《吐鲁番、敦煌文书所见地方城市的住居》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的历史学研究》东京1988年168—189页黄正建《敦煌文书所见唐宋之际敦煌民众住房面积考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09—222页。二文均利用敦煌宅舍买卖契约对敦煌百姓的居住面积进行了探讨池田温先生还提示了可利用分家书等材料继续研究的前景。

〔33〕　李正宇《□下女夫词□研究》《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40—50页。参看王三庆《敦煌写卷记载的婚礼节目与程序》《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533—564页。

〔34〕　参见宁可、郝春文《敦煌丧葬互助》《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32—40页。

〔35〕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36〕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

〔37〕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38〕　P.3135见黄征等《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915页。

〔39〕　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304页。

第十一讲　敦煌学与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

敦煌原本是月氏、匈奴人游牧的地方自汉代进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但仍然是与周边各民族交往最密切的地方。而且唐朝中期吐蕃曾一度占领敦煌留下了丰富的藏文文献。归义军时期与东西回鹘以及于阗王国往来频繁。因此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民族史料。

正如第二讲所谈到的那样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也保存了大量反映东西文化交往的史料为我们认识中古时期的中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都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以下着重谈几个突出的方面。

一　吐蕃史

属于西藏人自己所写的吐蕃时代的历史文献非常之少13世纪以后产生的一些教法史著作如《贤者喜宴》等也有吐蕃教法史涉及到吐蕃的王统世系、制度和政治史脉络但由于是作为佛教历史而叙述因此有许多地方被忽略或者依据后来的看法而改造。真正属于吐蕃时代的文献原本主要是留存下来的十几块碑如《唐蕃会盟碑》、《达扎路恭碑》等十分重要但所记内容有限[1]。另外还有一些保存在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中的佛经译经序和题记但也是晚期编成而保存下来的不是7至9世纪的原始材料。敦煌藏经洞发现了数千件古藏文写本大多数是佛经但也有不少吐蕃的典籍、文学作品、世俗文书加上新疆和田、米兰等地发现的古藏文文书为我们研究吐蕃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经过近百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已经大体明了。

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不仅仅是有关吐蕃统治敦煌的资料也包括吐蕃王朝本身的一些史籍和文献反映了整个藏人早期的经历和吐蕃王朝的历史进程。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吐蕃王朝编年史》共三件写本P.t.1288S.t.750、 Or.8212.187按年代顺序记载每一年内吐蕃王朝的大事包括会盟、征战、狩猎、税收等实即吐蕃王朝的编年历史。开头部分是几年合在一起的总结性记录涉及到吐蕃尚未掌握文字的年代显然是以后的追述。一件缀合写本的内容是从狗年650至猪年747一本是羊年743至龙年764可以互相印证和补充。这部编年史是研究吐蕃历史的最重要史料其中有关与唐朝征战的历史记载与唐朝史籍不完全相同而且其中还有许多吐蕃与周边民族和政权交往的历史为唐朝文献所无更为珍贵。

《吐蕃王朝大事记》P.t.1286P.t.1287图1以赞普为单元记述一代赞普在位期间的大事从传说的聂赤赞普时代到吐蕃王朝最辉煌的赤松德赞时期为我们研究早期西藏历史和吐蕃王朝内部的情况提供了详细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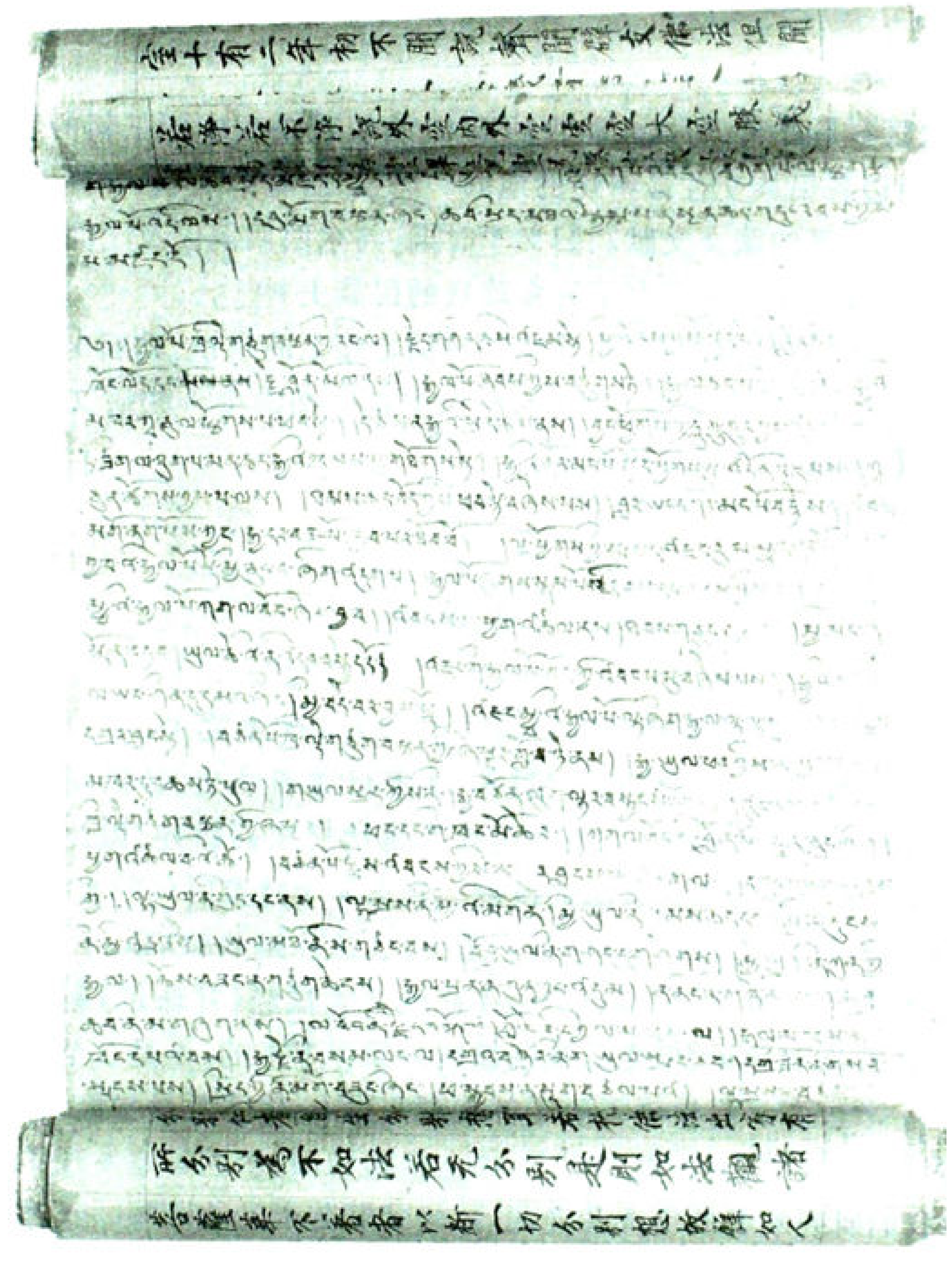


图1　P.t.1287《吐蕃王朝大事记》

涉及吐蕃王朝历史的还有《小邦邦伯与家臣名表》P.t.1286/1记录了吐蕃王朝兴起前青藏高原上各个部落或邦国的情况有十七个君长和二十三个辅佐大臣的名单。《吐蕃赞普世系表》P.t.1286/2记录了从吐蕃王朝远祖聂赤赞普以后三十九代、四十一位赞普的名字和世系也包括十六位赞普妃子的名字。《崇佛赞普名录》P.t.849记载印度和吐蕃崇

佛的国王、赞普和大德的名字所记吐蕃赞普的名称可以补上述《吐蕃赞普世系表》之缺。

以上这几部最重要的吐蕃历史文献早经巴考J. Bacot、托玛斯F. W. Thomas、图散G.-C. Toussaint转写翻译编成《敦煌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一书由于二战的原因迟到1946年才出版[2]。八十年代中国学者才见到这些文书的原卷目前已经有两个汉文译本王尧与陈践合著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3]黄布凡和马德合著的《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4]。

敦煌文书中还有不少汉藏文的文书有吐蕃王朝颁到沙州的诏令文书也有敦煌等地方官府或民众的上状如P.t.1089《戌年830敦煌官吏呈请状》叙述了凉州、沙州各级军镇的职官体系要求改善待遇是今天研究吐蕃王朝蕃汉官制和机构设置的重要资料[5]。此外还有不少有关部落、官职、告身、土地、税收、驿传、军制等方面的文书反映的不仅仅是敦煌一地的情况而可以看做是反映吐蕃王国整体的面貌。

敦煌藏文文书中还有一些反映吐蕃统治下的其他民族的文献如《吐谷浑大事纪年》Vol.69, fol.84就是记载附属吐蕃的吐谷浑王在706—715一说634—643年间的活动包括婚姻、会盟、朝觐、征伐、税收等[6]。这正好可以弥补汉文史料只记归附唐朝的吐谷浑王事迹的缺陷。

二　吐蕃统治敦煌

唐朝的史籍除了记载吐蕃攻占敦煌的史事外对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乃至河西、西域的情况都没有太多的记载。因此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乃至统治河西和西域的历史都要从敦煌、新疆出土文书中来复原。

以吐蕃统治敦煌历史来说在敦煌文书里不仅有汉文文书还有藏文写本这就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是敦煌吐蕃时期的汉文文书都不用唐朝年号纪年而使用与吐蕃的十二生肖纪年对应的十二地支纪年从786—848年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可以有几个“子年”藏文文书以十二生肖纪年情形一样因此给文书定年是首先遇到的困难。其次是吐蕃改变了唐朝的行政、军事体制而我们原本对吐蕃的制度了解甚微所以文书的内容有的很难理解。最后敦煌藏文是古藏文有不少词汇在今天的藏文里已经消失解读并不容易。因此关于吐蕃时期的敦煌历史的研究相对于其他时代要难得多。

在本书第一讲中我们已经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有关吐蕃统治敦煌的基本情况做了概述此不复赘。这里只谈谈有关的研究情况。

1961年藤枝晃发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7]主要利用汉文文书和托玛斯翻译的藏文文书对这一段时间的敦煌史做了初步的整理研究。更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匈牙利的乌瑞G. Uray和日本的山口瑞凤对敦煌古藏文文书的解读和研究他们翻译出一批重要的历史文书并就吐蕃的各种制度做了复原研究。尽管两人的观点常常相左但有关问题正是在争论中不断取得进步[8]。山口瑞凤在《敦煌的历史·吐蕃统治时期》一章中有部分成果的简要叙述[9]。可惜的是随着乌瑞的去世和山口的退休目前研究吐蕃时期敦煌史的人越来越少。武内绍人是目前研究古藏文文书的主力他的《中亚发现的古藏文契约文书》主要材料是敦煌文书除了对各种类型的契约文书加以解读外还探讨了历史背景[10]。

中国的王尧、陈践先生曾经翻译发表过一批敦煌藏文文书也就某些文书反映的史事作了探讨[11]。藏文文书译成汉文是一项必要而又艰苦的工作因为有同时代的汉文文书大量地保存下来所以需要把一些藏文术语和汉文文书中的术语沟通这需要做许多细微的考证才能更加正确地把藏文文书译成汉文。如果仅依据古藏文文书的英、法、日文译文我们也只能知其大意。因此古藏文文书的翻译应当对照同时代的汉文文书来做。

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我曾在学习了一年藏文以后摸索过有关的汉藏文文书撰有《通颊考》一文[12]考察敦煌通颊部落的来历、在吐蕃军政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它的消亡情况。这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来看吐蕃时期敦煌的许多相关问题。杨铭利用前人翻译的藏文文书加上有关的汉文材料对吐蕃统治敦煌乃至河陇、西域的历史和一些相关的文书做过研究但他受条件限制无法通检汉藏文文书因此他的《吐蕃统治敦煌研究》一书[13]只是论文合集而不是系统的研究成果。目前在敦煌历史研究中最有潜力而且也是最难的研究课题就是吐蕃统治敦煌问题希望有年轻的学者把这项研究深入下去。

三　禅宗入藏与汉藏文化交流

敦煌文书的发现不仅补写了吐蕃历史的篇章也改正了一些对吐蕃历史的误解。有关禅宗在西藏传播的历史就是一例。

据14世纪初成书的布顿《教法史》、巴氏所撰桑耶寺志《巴协》等藏文佛教史籍赤松德赞赞普统治时期以莲花戒为首的印度僧人和以摩诃衍为首的汉地僧人因为分别主张渐修和顿悟而论证不已甚至发生流血的惨剧。于是赞普召集双方论战最后摩诃衍失败被遣返汉地。然而敦煌发现的河西文人王锡所撰《顿悟大乘正理决》P.4646图2是王锡奉摩诃衍之命而写记载了摩诃衍在吐蕃与莲花戒斗法的情形结论却相反是“婆罗门等随言理屈约义辞穷”摩诃衍倡导的禅宗获得胜利吐蕃赞普宣布“摩诃衍所开禅义究畅经文一无差错从今以后任道俗依法修习。”1952年戴密微P. Demiéville出版《拉萨宗教会议》一书[14]详细阐释了《顿悟大乘正理决》及相关的敦煌文书改写了有关汉地禅宗入藏传播的历史。由此开始欧美和日本学者对禅宗入藏及相关敦煌文献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在敦煌藏文写本中发现了一大批编译自汉文的禅宗史书、语录如《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二入四行论》、《卧伦禅师看心法》、《大乘顿悟正理决》等弄清了四川成都净众宗的金和尚无相在禅宗入藏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敦煌僧昙旷奉吐蕃赞普之诏而撰写《大乘二十二问》摩诃衍在藏地传法后回到敦煌等情况[15]。

图2　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P.4646

敦煌文书所展示的汉藏间的文化交流不仅仅是禅宗入藏一件事情。由于晚期西藏的典籍受佛教的影响主要强调西藏文化的印度来源而湮灭了西藏文化从汉地借入的内容我们在敦煌藏文文书中找到了汉文古典著作《尚书》、历史著作《春秋后语》、子部教科书《孔子项

橐相问书》以及有关占卜、医药等著作的译文。还有用藏文字母拼写或汉藏对译的汉文文献如《千字文》、《杂抄》、《金刚经》、《阿弥陀经》、《般若心经》、《南天竺国菩提达摩观门》、《天地八阳神咒经》等都表明了唐朝对吐蕃在文化上的影响。

同时吐蕃的宗教、医学经过发展和完善反过来也对汉地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于河西和西域南道吐蕃占领区这种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吐蕃高僧法成在甘州、沙州等地译经传法在归义军初期仍在敦煌继续讲学培养了一批汉族弟子其佛教学说也由其汉族弟子继续传播。于阗人曾把藏文的《医理精华》译成于阗文这部重要的著作在敦煌藏经洞中保存下来。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在吐蕃对河西和西域的统治结束以后这一地区各个民族政权间相互联系时使用的是大家都懂得的共同语言——藏语来通信这清楚地表明了吐蕃的影响。

四　甘州回鹘与西州回鹘

公元840年在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受到北部的黠戛斯的打击大举西迁一部分进入河西走廊的甘州及其临近地区一部分到达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天山东部地区在9世纪后半叶逐渐形成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两个政权。过去我们对这两个回鹘政权的了解主要是新旧《五代史》和宋代史籍的记载内容大多数是朝贡的记录。敦煌位于两个回鹘势力之间甘州回鹘就是在归义军的地盘上建立的政权而西州回鹘在壮大过程中也从归义军手中夺取了伊州。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东西回鹘王国既有争夺也有交往因此敦煌文书中有许多关于回鹘的史料。

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与敦煌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是这两个回鹘政权早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敦煌文书我们才得以全面了解其内涵。我曾系统收集过这方面的相关文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东西回鹘与敦煌的关系史写过一系列论文《甘州回鹘成立史论》[16]、《曹议金征甘州回鹘史事表微》[17]、《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18]、《张氏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关系》[19]、《金山国史辨正》[20]、《公元10世纪沙州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文化交往》[21]这些文章已经整理收入《归义军史研究》[22]。可以说敦煌文书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东西回鹘对外关系史的认识。

另外敦煌汉文文书中也有关于回鹘内部情况的珍贵资料如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一说为《说三归五戒文》因为是一位汉族和尚在西州回鹘的开讲文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文中提到的官名和当地情况对西州回鹘的官制、僧官制度、宗教信仰、统治民族方面都做出全面的补充这篇讲经文就相当于一篇五代西州回鹘的传记[23]。

敦煌藏经洞还出土了一些回鹘文和突厥化的粟特语文书有一些是从西州回鹘或甘州回鹘寄到敦煌的信件或回鹘商人在沙州写的账单或回鹘人携来的宗教文献有的是佛教的图3也有的是摩尼教的内容应当是回鹘摩尼教信仰的反映。有一份突厥化粟特语文书提到沙州的景教徒十分珍贵[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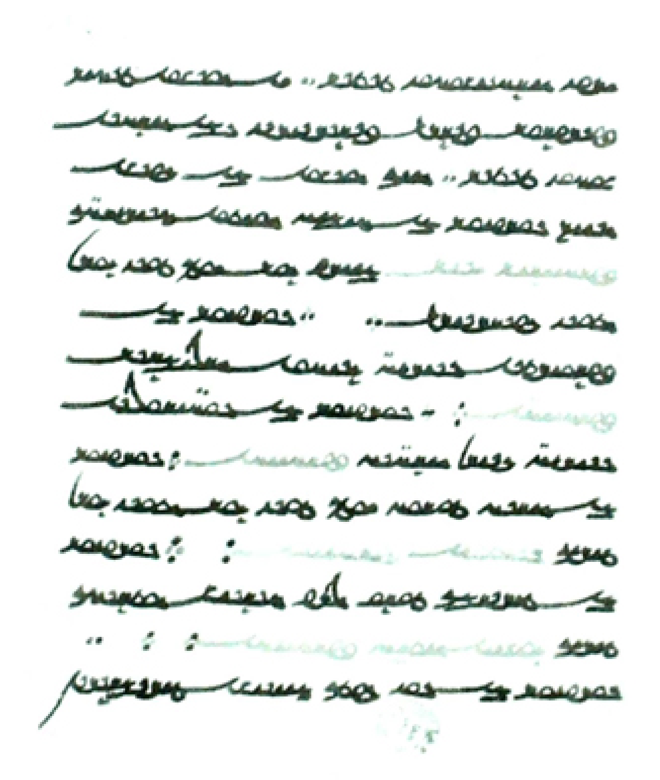


图3　回鹘文祈愿文

在此还应当说明一下"沙州回鹘"问题。森安孝夫曾提出在11世纪早期沙州存在回鹘人的集团而且随着西回鹘即西州回鹘势力的东向发展西回鹘王国控制了归义军政权。但这一观点由一些敦煌学者过分地发挥造出一个"沙州回鹘王国"来同时还把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回鹘文献统统放到1036—1067年间[25]。从藏经洞文献和文物的整体年代和这些回鹘文书的内容和文字特征都不能把它们置于1036年以后的年代当中[26]。最近"沙州回鹘王国"的观点受到森安孝夫的严厉批评[27]。

五　于阗王国

于阗位于塔里木盆地南沿是汉唐时的西域强国。

于阗和敦煌一样曾一度为吐蕃占领。于阗何时从吐蕃的统治下独立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记录估计应当在9世纪中叶与沙州张议潮起义的时间848年相距不远。偏处塔里木盆地南沿的于阗虽然早已脱离唐朝的羁縻统治但其国王仍自称为唐之宗属并积极与中原王朝加强联系。归义军政权张氏时期主要是经营河西一道但到10世纪末只保有瓜沙二州而已。914年开始的曹氏归义军政权与西面的西州回鹘及于阗王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特别是与于阗结成婚姻关系于阗王李圣天娶曹议金女曹延禄又娶于阗金玉国皇帝第三女双方保持十分紧密的交往。甚至在于阗人的心目中处在河西的归义军政权几乎成为中原王朝的代表。10世纪后期由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向于阗佛教徒发起了圣战于阗更加倚重于东方邻国借其声势以抗敌国的入侵。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从敦煌文书中看到整个10世纪于阗与敦煌交往密切双方的使者往来不断。双方的姻亲关系更加促进于阗王族和使臣不断来到敦煌甚至长期住在敦煌如于阗王李圣天的儿子太子从德。这些于阗人还在敦煌开窟造像为敦煌佛教的发展作出贡献。敦煌石窟莫高窟和榆林窟中保存了不少有关于阗的绘画资料有于阗的“瑞像图”有于阗的供养人像还有一些尚未辨别出来的于阗人绘制的洞窟。

在频繁的使节往来和紧密的婚姻联系的背景下于阗、敦煌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是丰富多彩的。P.2826号文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图4其中记载于阗王送给归义军节度使“白玉壹团”但要换取沙州工匠杨君子到于阗来。于阗盛产美玉玉一直是于阗对外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输出品送往沙州的玉持续不断其中不少玉石或成品又经沙州转运甘州、凉州、灵州乃至中原内地。从上述地区换回的丝绸、佛典、工匠又补充了于阗王国之所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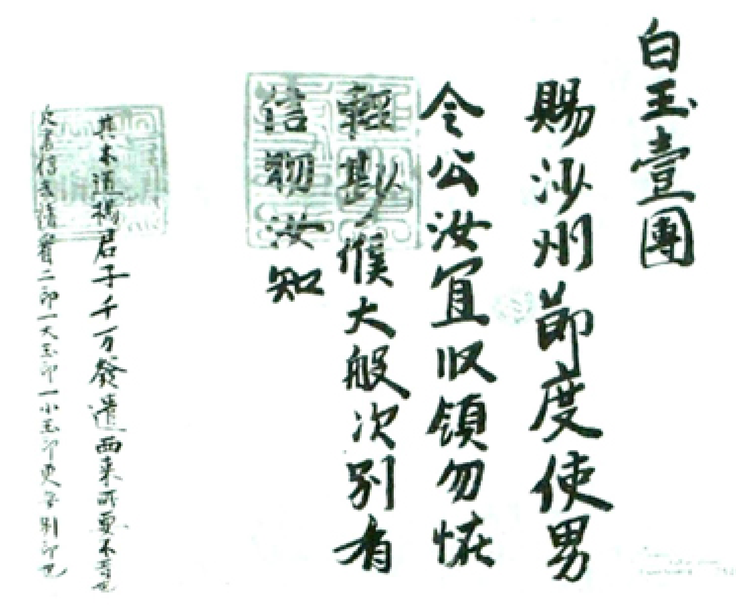


图4　P.2826于阗王致归义军节度使信

在文化方面双方也有互相影响的证据在藏经洞中保存下来特别是其中保存了一批比较完整的于阗语文献大都属于10世纪末叶是藏经洞封闭前流入敦煌或抄成于当地考虑到敦煌当时的人对于阗语不会陌生所以这些被带到敦煌的于阗语佛教文献应当是有其用途的。同时我们从这些于阗文佛典中也可以看到汉传佛教教理的影响。

公元10世纪于阗王国的王统世系基本上是靠敦煌文书而重建的有关材料的讨论和研究见张广达和荣新江合著的《于阗史丛考》所收相关论文[28]近年出版的俄藏敦煌文书对此又有新的补充[29]。

敦煌藏经洞保存的世俗文书还有待进一步的解读相信其中不少信息可以和汉文文书相发明给我们描绘出10世纪于阗历史更为丰富多彩的画面。

六　粟特聚落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敦煌文书同样有许多有价值的材料。

粟特地区处于中亚西部丝绸之路的干线上粟特民族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担当者。隋唐时期他们大批进入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是中国与中亚等地区物质和精神文化交往的沟通者。在对东来中国的粟特人的研究上敦煌也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证据。

伯希和根据敦煌发现的唐抄本《沙州都督府图经》考证出蒲昌海罗布泊南有一粟特人聚落。这个聚落是在7世纪上半叶粟特首领康艳典率人到蒲昌海南筑城定居下来后形成的。他还认为这里的粟特人对佛教的流传和景教的东渐都起过作用[30]。池田温利用各种敦煌文书研究了敦煌的安城粟特人聚落的地位和内部结构。安城位于敦煌城东五百米处是沙州敦煌县从化乡所在地。该乡有三个里750年时有户三百口一千四百人其中大部分居民来自康、安、石、曹、罗、何、米、贺、史等姓的中亚昭武九姓王国聚落大致是7世纪初形成的。在安城有当地粟特人和汉人祭祀的祆祠佛教也在粟特人中流行。8世纪初期聚落成员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唐地方政府对他们的统治不如对汉人严格。居民也有贫有富由于和汉人通婚并定居农耕几代以后逐渐汉化。8世纪中叶由于中亚地区唐朝与大食斗争激化加之安史之乱和吐蕃入侵聚落突然离散一些人成为佛寺的农奴。到了8世纪末除了留下祆祠外聚落完全消失[31]。吐蕃统治敦煌以后786到归义军时期848—1036仍有粟特人后裔在敦煌活动。郑炳林连续发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32]、《□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货卖胡粉历□研究》[33]对这一时期的敦煌粟特人作了细致的研究但其所用的有些史料是否是指粟特人还不能肯定。由于粟特人在敦煌长时间的存在和粟特文化深远的影响我提出归义军曹氏统治家族有可能也是粟特后裔[34]。

在敦煌藏经洞中还发现一批粟特语文献主要是译自汉文的佛典图5有正统的经书也有疑伪经表明原本信仰波斯祆教的粟特人到了敦煌以后受当地强烈的佛教文化的影响逐渐皈依了佛教。

图5　粟特文《善恶因果经》

七　三夷教

隋唐时期虽然儒释道三家仍然占据了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但由于国家开放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产生或流行于西亚的三种宗教即祆教、摩尼教、景教也都在此时广泛流传或正式传入中国或多或少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

敦煌写本中没有祆教经典保存下来但有关祆教的记载却非常重要。研究中国祆教的经典文章——陈垣的《火祆教入中国考》[35]根据正史的记录认为火祆之名闻中国自北魏南梁始。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对敦煌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内容的释读确证祆教早在公元4世纪初就由粟特人带到中国[36]。在敦煌文书中我们得知唐朝时沙州城东有祆祠。歌咏敦煌名胜古迹的《敦煌二十咏》也有一首《安城祆咏》。敦煌归义军官府的支出账中常常有“赛祆”的记载说明归义军时期祆教仍在敦煌流行而且敦煌的祆祠赛神已被纳入中国的传统祭祀活动当中使人们认识到祆教对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侧面[37]。藏经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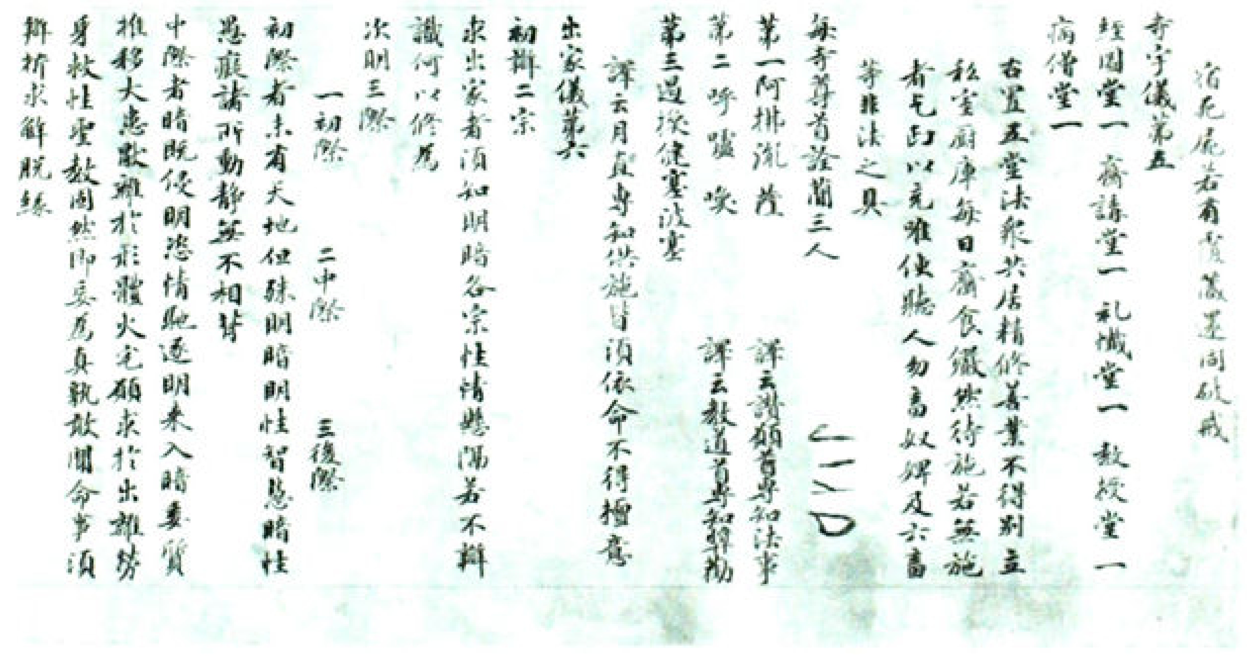
中保存的一幅祆教图像图6年代应当是10世纪的。它证明了赛祆的存在并为艺术史家判定祆教图像提供了完整的资料[38]。



图6　藏经洞保存的一幅祆神图像

敦煌发现的三种汉译摩尼教经典即《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下部赞》是每一位研究摩尼教的学者都不可忽视的。其中《摩尼教残经》很可能译自摩尼本人的七部经书之一是理解摩尼教思想的根本文献早在1913年就由沙畹Ed. Chavannes、伯希和Pelliot在《中国发现的摩尼教经典》一文中翻译成法语[39]。《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是唐朝开元年间摩尼教法师奉唐玄宗诏书而撰写的解释性文献图7对摩尼教的教义和仪轨都作了简要的介绍成为后人理解摩尼教的最基本文献。《下部赞》是一部韵文体著作包含许多首赞诗虽然表面上充满了借自佛教的词汇但本质上是忠实译自某种中古伊朗语的摩尼教赞美诗。目前这三种文献的汉文录文以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所收

最佳[40]但还需要利用西方学者解读吐鲁番伊朗语摩尼教文献的研究成果对汉译摩尼教文献的术语给予透彻的注释。



[illegible]尼尼若有覆藏還同破戒
寺宇儀第五
經圖堂一　齋講堂一　禮懺堂一　教授堂一
病僧堂一
右置五堂法眾共居精修善業不得別立
私室廚庫每日齋食儼然待施若無施
者乞匄以充唯使聽人勿畜奴婢及六畜
等非法之具
每寺尊首詮簡三人
第一阿拂胤薩　譯云讚願首專知法事
第二呼嚧喚　譯云教道首專知獎勸
第三遏換健塞波塞
譯云月直專知供施皆須依命不得擅意
出家儀第六
初辨二宗
求出家者須知明暗各宗性情懸隔若不辨
識何以修為
次明三際
一初際　二中際　三後際
初際者未有天地但殊明暗明性智慧暗性
癡愚諸所動靜無不相背
中際者暗既侵明恣情馳逐明來入暗委質
推移大患猒離於形體火宅願求於出離勞
身救性聖教固然即妄為真孰敢聞命事須
辨析求解脫緣

图7　P.3884《摩尼光佛教法仪略》

有关景教的历史记录固然以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最为重要但敦煌发现的景教写本也备受关注。伯希和收集品中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图8和《尊经》是研究景教仪式和教法的重要资料[41]。另外流入日本的被称为敦煌景教写本的还有《一神论》、《序听迷诗所经》、《志玄安乐经》、《宣元本经》和小岛靖得自所谓李盛铎旧藏的《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与《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这些散卷大多由羽田亨和佐伯好郎考释发表[42]成为人们研究唐代景教的基本文献。但是林悟殊与荣新江合撰《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从敦煌学与景教教义两方面判定上述最后两种写本不是唐代景教文献而是近世书商的伪造[43]。这一结论向前此利用这些文献所写的唐代景教研究结论提出了挑战而且为今后研究其他唐代景教文献的真实性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至于其他几种日藏文献真正得自李盛铎藏品的《志玄安乐经》和《宣元本经》似可信赖而《一神论》和《序听迷诗所经》则有一些疑问有待从各个方面加以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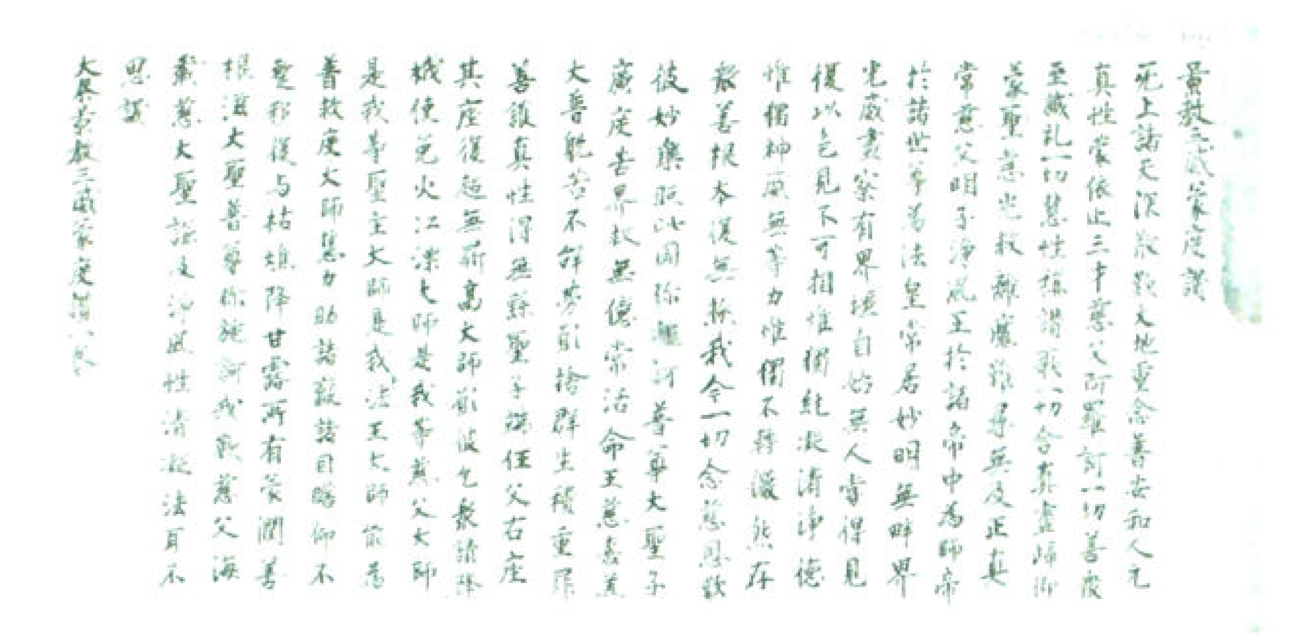

景教三威蒙度讚
無上諸天深敬歎大地重念普安和人元
真性蒙依止三才慈父阿羅訶一切善衆
至誠禮一切慧性稱讚歌一切含真盡歸仰
蒙聖慈光救離魔難尋無及正真
常慈父明子淨風王於諸帝中為師帝
於諸世尊為法皇常居妙明無畔界
光威盡察有界疆自始無人嘗得見
復以色見不可相惟獨絕凝清淨德
惟獨神威無等力惟獨不轉儼然存
衆善根本復無極我今一切念慈恩
歎彼妙樂照此國彌施訶普尊大聖子
廣度苦界救無億常活命王慈喜羔
大普耽苦不辭勞願捨群生積重罪
善護真性得無繇聖子端任父右座
其座復超無鼎高大師願彼乞衆請降
筏使免火江漂大師是我等慈父大師
是我等聖主大師是我法王大師能為
普救度大師慧力助諸羸諸目瞻仰不
暫移復與枯燋降甘露所有蒙潤善
根滋大聖普尊彌施訶我歎慈父海
藏慈大聖謙及淨風性清凝法耳不
思議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一卷

图8　P.3847《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

在吐鲁番葡萄沟的废寺中本世纪初德国探险队掘获大批伊朗文和突厥文景教文献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粟特语文书中也有景教文书。从两地文献的时间来看唐末至宋初敦煌吐鲁番两地的景教徒之间应当存在着某种联系。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从吐鲁番和敦煌写本看操粟特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徒》分类概述了吐鲁番和敦煌出土的基督教文献整理了基督教从粟特本土向东方传播的历史脉络[44]。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近年在莫高窟北区洞窟中与元代汉文文书、西夏文佛经、回鹘文残片同出的有两叶四面完整的叙利亚文《圣经·诗篇》已经由北京大学段晴博士解读[45]。这一发现大大增加了我们对蒙元时期景教传播的认识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目前还难以解释的新问题。

八　求法僧的记录

从唐朝初年的玄奘到德宗贞元年间回国的悟空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西行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充当了中印交往使者的角色。他们中有些留下了行记或其他著述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印关系史的主要依据。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无疑是求法僧著作中最重要的文献为大藏经所收因而完整地保存下来。敦煌也存有四个抄本有的距离玄奘成书

的年代不远极具校勘价值。有一件五代时期的抄本是一个要到西天取经的僧人留下的表明《大唐西域记》被后来求法的僧人当作指南。敦煌还有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的抄本但最重要的发现是找到新罗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

《慧超传》原为三卷敦煌抄本不分卷有人认为是略出本有人认为是初稿录副现存部分保存了《慧超传》的大多数内容是研究开元时期印度、中亚宗教、政治形式和佛教状况的根本文献备受研究者的瞩目。1910年就有藤田丰八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46〕以后整理翻译者还有几家其中桑山正进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的校注本最为精密〔47〕。

由于史料多少不等过去对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唐代前期。实际上晚唐五代中印之间的往来并未断绝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利用敦煌文书填补了过去中印交往史上的一段空白〔48〕。

注释

〔1〕 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黎吉生H. E. Richardson《吐蕃碑铭合集》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伦敦1985年。

〔2〕 J. Bacot, F. W. Thomas, G.-C. Toussaint,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巴黎1940—1946年。

〔3〕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增订本其中《编年史》译作“大事记年”。

〔4〕 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

〔5〕 拉露M. Lalou《公元8世纪吐蕃官吏呈请状》Revendications des Fonctionnaires du Grend Tibet au Ⅷe Siècle《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第243卷第2号1955年山口瑞凤《沙州汉人による吐蕃二军团の成立とmkhar-tsan军团の位置》《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施设研究纪要》第4号1980年13—47页同作者《汉人及び通颊人による沙州吐蕃军团编成の时期》《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施设研究纪要》第5号1981年1—21页杨铭《关于敦煌藏文文书吐蕃官吏呈请状的研究》《马长寿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363—386页。

〔6〕 乌瑞G. Uray《阿柴小王纪年》The Annals of the 'A-zha Principality《纪念乔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roceeding of the Csoma de Koros Memorial Symposium布达佩斯1978年541—548页周伟洲、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90年95—108页。

〔7〕 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东方学报》京都第31册1961年。

〔8〕 他们两人的文章都没有合集出版但前者主要发表在Acta Oriantalia Hungarica后者则在《东洋学报》、Acta Asiatica、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东洋文库欧文纪要中。

〔9〕 《讲座敦煌》第二卷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195—232页。

〔10〕 T. Takeuchi,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东京大藏出版社1995年。

〔11〕　他们的成果已结成《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12〕　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33辑1990年119—144页英文本“mThong-khyab or Tongjia: A Tribe in the Sino-Tibetan Frontiers in the Seventh to Tenth Centureis”《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第39卷1990—1991年247—299页。

〔13〕　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

〔14〕　戴密微《拉萨僧诤记》Le concile de Lhasa后改称“吐蕃僧诤记”巴黎1952年。中译本耿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15〕　参看张广达《唐代禅宗的传入吐蕃及其有关的敦煌文书》《学林漫录》第3辑中华书局1981年36—58页。

〔16〕　《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32—39页。

〔17〕　《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1—12页。

〔18〕　《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60—72页。

〔19〕　《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6年118—132页。

〔20〕　《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1992年72—85页。

〔21〕　《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1年583—603页。

〔22〕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23〕　张广达与荣新江合撰《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24—36页。

〔24〕　回鹘文书已有哈密顿J. Hamilton刊布在Manuscrits ouïgour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Ⅰ-Ⅱ巴黎1986年。回鹘-粟特文书则由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和哈密顿合刊于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伦敦1990年。

〔25〕　见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26〕　参看本书第四讲以及哈密顿《敦煌回鹘文写本的年代》On the Dating of the Old Turkish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吐鲁番、于阗与敦煌论集》柏林1996年135—145页牛汝极与王菲据稿本译载《西域研究》1995年第3期92—97页。

〔27〕　见Moriyasu Takao, "The Sha-chou Uighurs and the West Uighur Kingdom", Acta Asiatica, 78, 2000。

〔28〕　上海书店1993年。主要有《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敦煌文书P.3510于阗文□从德太子发愿文□拟及其年代》、《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29〕　张广达、荣新江《10世纪于阗国的天寿年号及其相关问题》余太山编《欧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181—192页。

〔30〕　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的康居聚落》《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第7卷1916年冯承钧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书局1957年。

〔31〕　池田温《8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欧亚文化研究》第1号1965年辛德勇译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册中华书局1993年。

〔32〕　以上三文收入《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33〕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

〔34〕　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65—72页。

[〔35〕](#)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934年校订本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

[〔36〕](#) 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37〕](#) 魏礼A. Waley《有关敦煌地区伊朗神祠的一些记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1956年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格瑞内F. Grenet和张广达合撰《粟特宗教的最后避难地——9、10世纪的敦煌》《亚洲研究所纪要》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新辑第10卷1996年。

[〔38〕](#) 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张广达《唐代祆教图像再考》《唐研究》第3卷1997年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粟特神祇图像的再考察》《艺术史研究》第2辑2000年。

[〔39〕](#) 《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第10辑第11卷第1期1913年。

[〔40〕](#) 中华书局1987年增订本台北淑馨出版社1997年。

[〔41〕](#) 吴其昱《景教三威蒙度赞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3册1987年同作者《唐代景教之法王与尊经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2001年。

[〔42〕](#) 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京都1958年佐伯《支那基督教之研究》第一、四卷。

[〔43〕](#) 《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1992年。

[〔44〕](#) 《吐鲁番敦煌文献论集》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佛罗伦萨1992年陈怀宇汉译文载《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

[〔45〕](#) 收入彭金章、王建军著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

[〔46〕](#) 北京1910年钱稻孙校印北平1931年。

[〔47〕](#)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年。

[〔48〕](#) 《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55—968页。

第十二讲　敦煌佛教、道教文献的价值

按照我的看法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藏的文献资料原本是莫高窟前三界寺的图书其最早的写经可能早到公元4世纪后半叶最晚的材料是11世纪初叶藏经洞封存前所写[1]。所以藏经洞中主要是写本文献只有少量的小本印刷品保存其中。

作为佛教图书馆的藏书当然是以佛教文献最多但中古中国的佛教寺院往往是文化中心是凝聚着精神睿智的学者的聚集之地也是一个地区典籍和文献的中心。所以藏经洞中的主体虽然是佛经但也有佛教以外的道教、景教、摩尼教经典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以及一些白话诗歌、通俗文学作品还有学童所用的蒙书和他们读书识字的课本和练习册民间社会生活中所使用的物候、日历、医药、占卜、相面等方面的图书也收藏于其中。此外因为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城镇所以藏经洞中还保存了用梵文、藏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书写的文献其中主要内容也是佛典但也有摩尼教或其他内容的文书。

一　敦煌佛典概说

敦煌文献抄写年代所涵盖的公元4—10世纪正是佛教从印度、中亚向中国传播并且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时代。处在中国文化圈内而又最靠近西域的敦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保存了藏经洞这样一座既有西北地区特色又有浓厚中原影响的佛教文库为我们审视和研究中古中国佛教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十六国时期凉州是佛典汉译的一大中心这些凉州的译经应当是敦煌佛教文库的来源之一。但是目前我们很难判断哪一件敦煌写经是最早的。过去我曾以为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图1为最早之敦煌写经该卷尾题“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一般即以为是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2]。近年来随着吐鲁番出土文书和高昌历史研究的进步我们知道吐鲁番也同样有酒泉城。因此这件出土地点不明

的甘露写经很可能是高昌甘露元年的写经与敦煌无涉。至于这个甘露年号是属于阚氏高昌王国的阚伯周460还是属于麴氏高昌王国的第二任国王麴嘉526目前还没有定论[3]。到目前为止确切属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早写经是S.797《十诵比丘戒本》图2题“建初元年岁在乙巳十二月五日戌时比丘德祐于敦煌城南受具戒”。这里的建初只能是西凉年号即公元406年[4]。当然实际上一定有早于406年的写经在敦煌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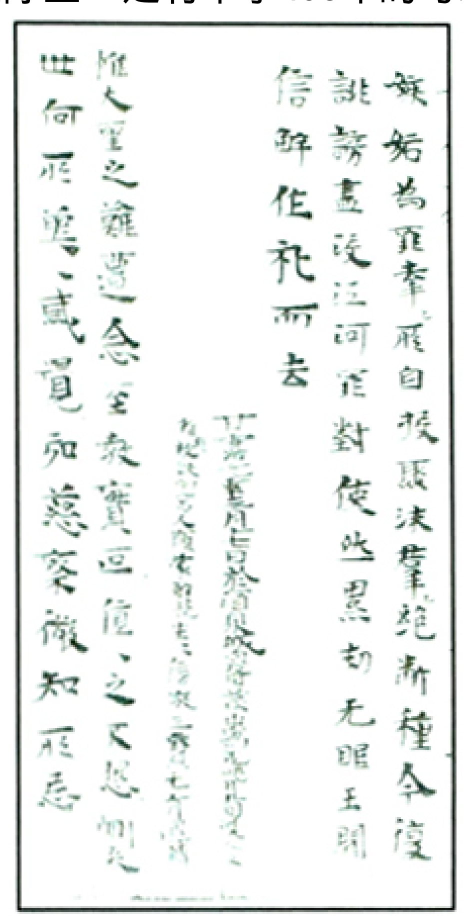


图1　日本中村不折旧藏《譬喻经》

图2　S.797《十诵比丘戒本》

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前后一批北朝系的佛典被带到敦煌。而且由于东阳王本人十分佞佛他在敦煌出资抄写了大批佛经。据现存的写经题记永安三年530写了《仁王般若经》300部[5]普泰二年532写《无量寿经》100部、《摩诃衍经》100卷、《内律一部》50卷、《贤愚经》一部、《观佛三昧海经》一部、《大云经》一部[6]永熙二年533写《涅槃经》、《法华经》、《大云经》、《贤愚经》、《观佛三昧海经》、《祖持经》、《金光明经》、《维摩经》、《药师经》等各一部共100卷[7]。此外一些南朝的写经也传到敦煌如天监五年506写《大般涅槃经》[8]、天监十八年519写《出家人受菩萨戒法》[9]等是南朝佛教北传的印证。

隋唐时期国势强盛也是佛典汉译和整理的黄金时代产生了玄奘、义净、不空等译经大师编纂了许多权威的汉译佛典目录如智升的《开元释教录》。敦煌作为唐朝的直辖州郡曾按照唐朝的诏令建立了大云寺、龙兴寺、开元寺等官寺。长安、洛阳两都新译的佛典和中原地区

流通的大部分经书都流传到敦煌。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佛典写本中以唐朝流行最广的五部大经数量最多即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和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这些佛典的现存写卷编号都在1000以上说明了敦煌和中原佛教信仰的一致性。

中唐以后讲求实践的禅宗、净土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敦煌又有大批南北系统的禅宗典籍陆续传入。而且由于吐蕃对敦煌的占领和对佛教的扶植敦煌与周边地区如凉州、逻些拉萨、西域地区的一些佛教中心的交往似乎比以前增多因为都是在吐蕃的统治范围之内虽然与中原北方地区交往减少但却和四川佛教增加了联系。更重要的是中原的禅法和禅籍通过敦煌传入西藏有些藏译的禅籍又从西藏传到敦煌并且在敦煌保存下来。吐蕃统治时期宣扬西天净土思想的《佛说无量寿宗要经》成为最流行的经典藏经洞中有数量相当庞大的一批汉文和藏文的写本保存下来[10]。

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重新和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节度使张议潮曾经把河西僧人乘恩的著作进奉给唐朝皇帝以支持宣宗、懿宗的复兴佛法运动[11]。中唐以后新译的佛经和敦煌因战乱散失的经本通过沙州教团的不断努力派人向中原王朝乞经陆续补充了敦煌的经藏。但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佛教在佛教世俗化趋向的影响下渐渐从经教佛教转向世俗佛教疑伪经盛行。在归义军初期吐蕃末期的佛教大法师法成及其弟子法镜、法海先后在敦煌讲《瑜伽师地论》、《净名经集解关中疏》、《维摩经疏》、《大乘百法明门论》等但883年以后敦煌写经题记中再没有敦煌高僧讲经的记录有的只是与民俗佛教相辅而行的开窟造像运动以及通俗的讲经和说法等[12]。

二　敦煌佛典的价值

敦煌佛典数以万计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可以举出四点作为突出的例证。

1古写本的校勘价值

至少在唐高宗到武则天时中国已经发明了印刷术但初期的印本主要是民间行用的单页佛像、小本经咒、日历以及占卜书、药方、蒙书之类的小书习惯的延续力和对佛教的虔诚使得唐朝的一般书籍和佛教典籍仍然主要是靠手写流传。中国大量印刷书籍是五代以后的事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是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开始雕印的《开宝藏》。现存的藏经大多是南宋以后的刻本历代的翻刻使佛经产生了不少文字的差异。

敦煌保存的大量写本佛经涉及经律论三藏的许多经典虽然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佛藏但隋唐时期流行的主要经典都在其中。而且有些佛典是在该经译出后不久就抄写流传到敦煌的如六百卷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宝雨经》、《佛说回向轮经》等。敦煌藏经洞还保存了一些唐代都城的官府写经经过京城各寺高僧大德的反复校对格式谨严没有任何错字是可以信赖的善本。有些佛经有许多副本可供比勘有些写本本身是经过用朱笔或墨笔校勘的。因此这些古写本在校勘后代的《大藏经》刻本上价值很高。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叶编辑《大正新修大藏经》时利用了部分敦煌写本来校勘《高丽藏》本但当时所见敦煌写本极为有限主要是矢吹庆辉摄自伦敦的写本而且《大正藏》排印上有不少错误有些甚至不可依赖。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敦煌佛教文献的写本都已经影印出版可惜还没有系统地用作校勘的资源近年来陆续印行的《中华大藏经》也没有充分取用敦煌资源因此也就没能在学术上超过《大正藏》。

2初期禅宗典籍和史料的发现

禅宗是后来居上的佛教宗派因为禅宗才是彻底地中国化的佛教而且简单易行得到唐代士大夫和下层百姓的普遍欢迎和热衷信仰并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扶植和提倡。8世纪以来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并且分成许多派别。

禅宗的盛行随之产生了大量中国禅僧所写的著作。宗密780—841曾编《禅藏》百余卷虽然早已散失但现存有《禅源诸诠集都序》[13]可以略窥唐代禅籍的丰富内容。但由于安史之乱、“会昌灭法”的打击和禅宗内部的斗争使禅宗各派势力盛衰不同以至于一些早期的禅籍渐渐亡佚其教法也随之不为后世所了解。现存最早的禅宗灯史著作《祖堂

集》10世纪中期成书85的内容记载的是江西、石头二系的历史和说教在唐朝前期和中期影响极大的牛头宗、北宗、荷泽宗的记载却不足5。宋元以来流行更广的禅史是道原法眼宗的《景德传灯录》11世纪初全书七成以上是关于江西、石头两派的灯史。根据这样的禅宗史书我们无法了解真正的唐代禅宗历史也无法真正了解中国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

敦煌保存了大量8世纪前后禅宗的典籍主要有三类

1反映初期禅宗思想的语录如据说是禅宗初祖达摩537年以前卒的《二入四行论》三祖僧璨约606的《信心铭》卧伦约626的《看心法》法融657的《绝观论》、《无心论》、《信心铭》五祖弘忍675的《修心要论》北宗六祖神秀706的《大乘五方便》、《大乘北宗论》、《观心论》南宗六祖慧能713的《坛经》南宗七祖神会758的《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直了〔见〕性坛语》、《南阳和上问答杂征义》、《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等等〔14〕。

在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六祖坛经》。1928年出版的《大正藏》第48卷刊布了矢吹庆辉找到的敦煌本《六祖坛经》原编号S.377现编号S.5475的录文。虽然这个本子讹误字极多但比较后代的传本少了不少文字和一些段落让人们重新考虑《坛经》的本来面貌。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知道敦煌写本中有五个《坛经》抄本其中最好的写本是现存敦煌市博物馆的任子宜旧藏本但各本的内容是一致的〔15〕。

另外记载南北禅宗辩论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也是初期禅宗历史上的要籍。它和其他神会684—758语录的发现填补了禅宗思想史的重要篇章。

2禅宗灯史主要有反映北宗灯史的杜朏《传法宝纪》和净觉《楞伽师资记》提供了北宗的传法世系和不同的说法特别是8世纪上半叶北宗兴盛的情况。《传法宝纪》是成书于唐玄宗初年713年左右的一部北宗灯史早已佚失敦煌写本中发现有P.2634、P.3559、P.3858、S.10484四个写本神会在开元二十年732滑台大云寺无遮大会上曾激烈地攻击北宗僧人普寂在嵩山“立七祖堂修《法宝纪》”的做法可见此书在当时影响之大。但比较敦煌写本中保存的两种北宗灯史《传法宝纪》不敌《楞伽师资记》的数量这反映了开元以后《传法宝纪》的重要性日益减弱。《楞伽师资记》是稍迟于《传法宝纪》成书的又一部北宗灯史也早已失佚。迄今为止学者们已经在敦煌写本中找到八件《楞伽师资记》写

本其中三件可能属于一个写本所以共代表了六个写本系统S.2045、P.3294、P.3436、Dx.1728P.3537S.4272、P.3703、P.4564。《师资记》盛行的年代似略晚于《传法宝纪》所以成都净众宗的僧人把对北宗的攻击集中在净觉的《师资记》上而不是开元时期更为流行的《传法宝纪》看来不是偶然的。1971年柳田圣山在《初期的禅史》第Ⅰ卷中发表了《传法宝纪》和《楞伽师资记》录文和译注[16]。

通过这两部灯史和《定是非论》参考史籍我们得知在号称“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张说《大通禅师碑》的神秀入寂706后其弟子普寂651—739统帅法众与另一弟子义福658—736一起开法授徒这就是宗密所说的“能师慧能灭后二十年中714—734曹溪顿旨南宗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北宗炽盛于秦洛”。开元二十年732慧能弟子神会曾在滑台向北宗挑战但被御史告发一贬再贬被弃置于江南。安史之乱爆发后神会以主持戒坛度僧为郭子仪的朔方军筹款有功战后被肃宗诏入内廷供养并在洛阳造荷泽寺宣扬南宗教法。从此南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些禅宗史上的内容如果没有敦煌禅籍是不可能清晰地知道的[17]。

敦煌发现的另一部重要的禅宗灯史是记载剑南地区的保唐宗净众宗的《历代法宝记》约774年成书特别是无相和无住的禅法以及这支禅宗派别的历史。这部书在敦煌十分流行现已发现有S.516、S.1611、S.1776背、S.5916、S.11014、P.2125、P.3717、P.3727、F.261、石井光雄积翠轩文库藏本、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本等多件抄本有许多研究唐代四川佛教史和政治史的资料保存在这部篇幅较长的史书中。1976年出版的柳田圣山氏《初期的禅史》Ⅱ即《历代法宝记》的录文和译注[18]。

3古佚佛典对佛教史的价值

中古时期的一些古佚经典曾经在佛教史上起过作用但因为早已失传所以后人对它们的内容不甚了然造成佛教史上一些空白。敦煌文献发现后学者们马上意识到古佚经典的重要价值。早在北京图书馆入藏敦煌写本之初佛教学者李翊灼先生就从中分辨出159种古佚佛典编成《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日本学者矢吹庆辉专门到伦敦收集敦煌古佚经典编成《鸣沙余韵》图录。日本佛教界编纂《大正藏》时除了把有关敦煌佚经编入相关部类外还特别用第85卷《古逸部·疑似部》校订了188种敦煌古佚佛典这是《大正藏》比其他藏经更具

有学术性而且成为国际通行版本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取材大多数就是敦煌写本[19]。

禅籍也是古佚佛典的一部分其价值不仅仅在佛教已如上述。其他的古佚经典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北朝系统的佛经注疏

因为隋唐统一中国以后南朝系的佛教学说被当作正统的教法而得以保存和发扬而北朝系统的学说只是在北方的一些地方继续流传后来就湮没无闻了。敦煌北朝写本佛教注疏的发现可以部分复原北朝系的学说从而也就可以说明隋唐佛教思想的一些来源问题。

2三阶教经典

三阶教是6世纪后半魏州信行540—594禅师宣扬的一个佛教宗派其“三阶”的说法是佛灭后500年是正法时期人生活在净土世界其后500年是像法时期再后是末法时期后两个时期人生活在三乘世界也叫五浊诸恶世界。信行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末法时期要以施舍、礼忏、苦行来求得解脱。三阶教的否定现世说引起统治者的不安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唐武后证圣元年695、圣历二年699、玄宗开元元年713、开元十三年725五次禁毁三阶教经典三阶教典籍在中国渐渐绝迹但部分流传到日本和新罗。敦煌文献中却保存了一批三阶教的经典吐蕃时期的一份敦煌龙兴寺的藏经目录上就登记着不少三阶教的经典。矢吹庆辉把敦煌和日本的经典收集起来著《三阶教之研究》[20]大体上复原了三阶教的基本情况。

3中唐以后新译的经论和编纂的经疏

安史之乱以后河西地区不为唐朝所有这里新译的经论和编纂的经疏往往不为传世藏经所有。其中主要是吐蕃统治时期昙旷和法成的译著。

昙旷是凉州人年轻时在长安唯识学最高学府之一西明寺学习以后回河西传教。由于吐蕃的由东向西攻占河西土地昙旷也随着西逃的民众从凉州进入沙州。虽然身处乱世而不废著述昙旷先后完成《金刚般若经旨赞》、《大乘起信论广释》图3、《大乘起信论略述》、《大乘入道次第开决》、《大乘百法名门论开宗义记》、《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又应吐蕃赞普的请求撰《大乘二十二问》回答赞普的问题。昙旷把长安的法相唯识学说搬到敦煌对敦煌佛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著作有大量抄本就是明证[21]。

图3　昙旷《大乘起信论广释》

法成是吐蕃统治敦煌末期到归义军初期的高僧本人应当是藏族名'go Chos grub号“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先后在甘州、沙州等地讲经、著述、翻译敦煌文献中保存有一批他从汉文译成藏文和从藏文或梵文译成汉文的佛经其著述不多但有集成类的著作以及一批听讲僧人听他讲《瑜伽师地论》的笔记本。法成的佛教学受到昙旷的影响也大量介绍了印度的佛教教学此后敦煌的佛教教学都是法成的弟子所继续的[22]。

此外据上山大峻的研究古佚经疏中比较重要的还有《净名经关中疏》、《四分戒本疏》、《法华玄赞》、《解密解脱要略》、《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疏》等[23]。

4疑伪经

疑伪经是中国僧人伪托如来所说而编造的佛经是中国民间社会的思想表现不仅是研究思想史的素材也是研究社会史的重要资料。由于历代整理佛典的高僧极力排斥疑伪经所以大量疑伪经都已失传但敦煌的僧人没有如此高的佛学水平他们抄写、保存了不少疑伪经典这些经典大量是晚唐以后的写本也是当时世俗佛教发展的印证。

据牧田谛亮《疑经研究》的统计在斯坦因收集品中主要的疑伪经就有《佛说解百生怨家陀罗尼经》、《金有陀罗尼经》、《赞僧功德经》、《三万佛同归根本神秘之印并法龙种上尊王佛法》、《佛说七千佛神符经》、《佛说无量大慈教经》、《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太子因缘修道经》、《佛说七女观经》、《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地藏菩萨经》、《劝善经》、《新菩萨经》、《救护众生一切苦难经》[24]。此外敦煌写本中常见的疑伪经还有《父母恩重经》、《善恶因果经》、《高王观世音经》、《阎罗王授记经》等等。据牧田谛亮的研究这些疑伪经编纂的目的大体上有六类一是附会统治者的意识如《宝雨经》中编造的部分二是对统治者政策的批判如三阶教经典又如《首罗比丘经》这些经典常常被反叛者所利用三是调和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如《父母恩重经》、《盂兰盆经》等四是对某种特定教义的鼓吹如倡言末法思想批判现实教团的《佛说般泥洹后比丘十变经》还有因观音信仰、地藏十王信仰流行时产生的经典五是标有现实社会中特定人物名字的经典利用这些人物的故事来达到某种宣教的目的如《高王观世音经》、《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六是为了治病、祈福而编造的经典如《佛说延寿命经》等[25]。这些疑伪经许多都是中古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写照对于理解民间信仰考察民间社会、揭示民间动乱根源以及探讨某种信仰对社会文化的影响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太史文S. Teiser在《十王经以及中国中世纪佛教的炼狱观念之形成》中指出的那样因为在少数人才有受教育机会的社会里宗教观念的传播往往与经典无关而是用通俗的文本、仪式、绘画等艺术形式为传播途径的。敦煌不仅有大量《十王经》写本而且有许多绘图本和图卷图4这些写本的形式也是便于携带的册子反映了这种世俗宗教在民间传播的情况[26]。



图4　绘图本《十王经》

由于有些疑伪经对于现实的统治阶级威胁很大所以往往一出现就被禁止没有能够流传下来。还有的疑伪经出自民间不够典雅被排斥在正统大藏经之外也渐渐散失。敦煌保存的疑伪经典大多数后代没有传本因此显得更为重要。疑伪经的另一个保藏地是日本的寺庙近年陆续刊行的《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也包含了对疑经的研究成果[27]。

三　敦煌的道教文献

李唐在创业时得到道教图谶的帮助并且因为与老子同姓故以老子为远祖尊崇道教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敦煌本是佛教圣地在朝廷尊崇道教的风气影响下也建立了开元观、神泉观等道观抄写了大量的道教经典。

《老子道德经》是道教的根本经典之一敦煌不仅有大量抄本而且还发现六种注疏即河上公注、想尔注、李荣注、成玄英义疏、唐玄宗

注及疏、佚名注。其中《老子想尔注》和成玄英《义疏》是《道藏》未收的佚书。《老子想尔注》共两卷唐人称出自张鲁或张道陵之手敦煌残卷S.6825有饶宗颐先生做的《校证》[28]从内容看是五斗米道信徒的著述反映了早期道教思想十分珍贵。

从敦煌道教写本的数目来看北朝末年成书的《升玄内教经》和隋唐初增补成书的《太玄真一本际经》图5是广泛流传的两部道经分别有22件和119件写本吐鲁番写本中也有残片发现但以后这两部道经都先后佚失今本《道藏》分别只存有一卷内容。敦煌写本为研究这两部道经的产生、流传和影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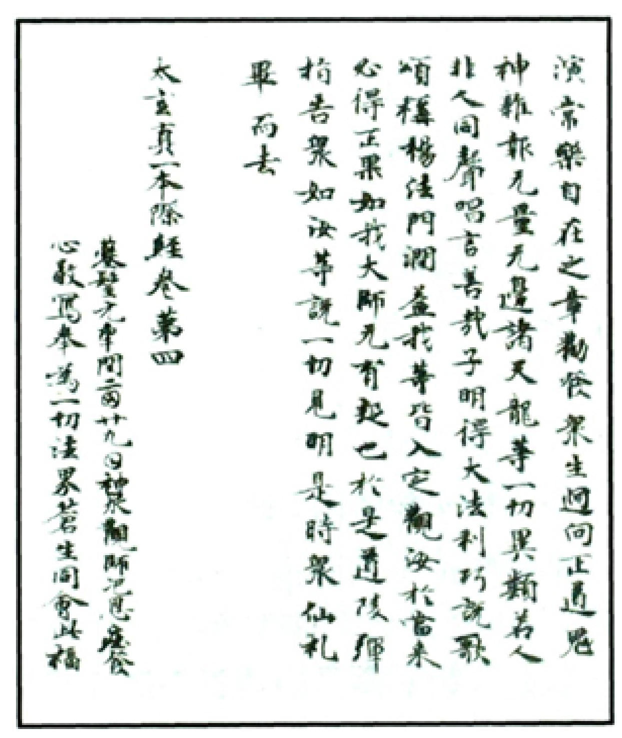

演常樂自在之章勸發衆生迴向正道思
神雖飛无量无邊諸天龍等一切異類若人
非人同聲唱言善哉子明得大法利巧說歎
順稱揚法門潤益我等皆入定觀汝於當來
心得正果如我大師无有異也於是道陵仰
指告衆如汝等說一切凡明是時衆仙礼
畢而去
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四
儀鳳元年閏三月廿九日神泉觀師汜思莊發
心敬寫本為一切法界蒼生同會此福

图5　P.2806《太玄真一本际经》

道教形成于东汉末太平道随着黄巾起义的失败而基本灭亡。流行于巴蜀地区的五斗米道首领张鲁在汉献帝永安二十年215归附曹操信众迁往北方中原地区与官方合流魏晋以来称作“天师道”。东晋南渡许多天师道家族南迁在滨海地域流行。南北朝时期道教内部兴起“清整道教”运动即整合道教经教科仪去除“三张伪法”向经教道教发展。南北朝末期产生的十卷本《升玄经》就是在魏晋玄学的重玄学说和鸠摩罗什传播的大乘般若空宗思想的基础上建立道教义学的结果反映了道教在佛教的刺激下提高自身思辨水平的努力。同时这也是南北朝末期南方玄学思潮和南方道教思想对北方影响的结果是适应全国统一趋势而整

合各个道教宗派教义的结果符合当时北周统治者的要求因此对于北周以道教教义为主的通道观学说及其所编纂的道教类书《无上秘要》产生直接的影响。

《本际经》是隋朝道士刘进喜所编原本五卷。后由道士李仲卿增补为十卷两人同为长安丰邑坊清虚观道士活跃于隋朝和唐朝初年。《本际经》继承了《升玄经》的思想把道教义学理论旨趣进一步深化同时更加重了南朝经教体系的成分是陈寅恪、唐长孺关于“南朝化”特色的又一个证明。《本际经》的抄本最多其“护国”、“净土”等思想也符合唐朝官方的国泰民安思想唐玄宗时曾两次下诏令天下道士转写《本际经》[29]。

敦煌道教写本中还保存有道教佚经《老子化胡经》。老子化胡说早在东汉桓帝时就出现了。西晋道士王浮根据传说编成《老子化胡经》称老子出关西越流沙入夷狄为佛教化胡人显然是道教徒为攻击佛教而编造的。在南北朝隋唐的佛道斗争中产生了一系列《化胡经》类的著作从唐朝开始统治者为调和二教矛盾不时禁毁《化胡经》至元代彻底消亡[30]。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不止一种《化胡经》其中有十卷本《化胡经》的序、卷一、二、八、十和《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是今天研究佛道论衡和思想史的重要素材也是研究唐朝对外关系史的参考资料。

敦煌道教经典的丰富内容还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地方欧美、日本的道教研究已成为风气中国年轻学者也在努力[31]。

至于道教在敦煌的发展演变有姜伯勤《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一文详述[32]。

附　唐代西州的道教

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灭高昌迁徙高昌国王室麴氏和一些大家族如张氏到长安和洛阳同时设立西州使之同于内地的州县并很快将唐朝的一整套政治军事制度推行到吐鲁番盆地。从目前所见文书中有关佛寺的记载一些家庙形式的佛寺名称不见了代之以规范的两个字命名的寺院这大概是唐朝对高昌国佛教教团的整理结果即王延德所谓“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33]。虽然李唐王室极力尊崇的是道教但迄今尚未见到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唐初道观的记载所以估计在佛教势力强盛的高昌

要迅速改变人们的宗教信仰并非易事所以道观并没有随着唐朝势力的到来而马上建立。

反映唐前期西州道教信仰的文书材料是吐鲁番阿斯塔那332墓出土的唐写本《五土辞》及《祭五方神文》年代在龙朔元年661前后[34]。这些文书的内容根据的是汉代的谶纬学说所反映的是东汉时流行的醮宅仪和醮墓仪[35]。这种道教醮仪和汉唐时期的国家礼祭有共通之处它反映了唐朝统治吐鲁番盆地的初期道教仍保留着较为原始的风貌。

目前所见吐鲁番文书中最早提到道观的纪年文书是阿斯塔那189墓出土的《唐开元四年716籍后勘问道观主康知引田亩文书》其中有“观主康知引”[36]此文书当在开元四年后不久写成最晚不会晚于开元八年再造籍时。文书没有留下道观的名字不免遗憾。但观主姓康是个粟特人的后裔颇耐人寻味。

西州道观的建立始于唐玄宗时期并不偶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唐朝诸帝中以玄宗崇道最为积极。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开元天宝时期唐朝在西域已站稳脚跟而且在西州的统治已经半个多世纪新王朝的思想意识也渐渐输入并慢慢流传。

西州道观的建立是道教在吐鲁番盆地确立的重要标志因为有了道观就有了出家道士也有了教规和正式的经典是名副其实的道教了。迄今所见西州道观计有1总玄观见阿斯塔那184墓出土《唐开元八年麴怀让举青麦契》[37]2龙兴观见阿斯塔那509墓出土《唐西州高昌县出草帐》[38]3安昌观见大谷文书《唐开元十九年731正月十三日西州天山县到来符帖目》[39]4紫极宫见阿斯塔那506墓出土《唐天宝某载□仙牒为本钱出举事》[40]据德藏吐鲁番文书Ch.1046TⅡ4042《唐安西坊配田亩历》紫极宫在安西坊5唐昌观见阿斯塔那509墓出土《唐唐昌观申当观长生牛羊数状》[41]。从开元中到宝应、大历间不过二十多年道教在如此远离唐朝统治中心的西州发展起来不能不说是唐朝的成功。而且阿斯塔那509墓出土的《唐西州道俗合作梯蹬及钟记》表明西州道观有观主、威仪、錬师和道士组织已很完善另外还有不出家的道士们即地方的道门领袖[42]他们对道教的推动作用可能更为重要。

吐鲁番墓葬中尚未见到有随葬的道教经典但盆地其他遗址的出土物中已知有不少道经及有关道教的文献残片保存下来《道德经序诀》大谷8111号、《道德经河上公注》出口常顺藏卷、《太上洞玄灵宝无

量度人上品妙经》德国印度艺术博物馆藏MIK Ⅲ 7484/T Ⅲ S 96号、《太上业报因缘经》大谷文书、出口常顺藏卷、《太上洞玄灵宝升玄内教经》德国国家图书馆藏Ch.935/T Ⅲ 2023号、Ch.3095v/T Ⅱ T 1007号、《洞渊神咒经》大谷8103—8105。

唐玄宗先天、开元间曾命两京诸道学大德们编《一切道经音义》又发使诸道搜访道经加以校勘辑为《道藏》其目录名《三洞琼纲》共著录三千七百四十四卷一说五千七百卷[43]。《册府元龟》卷六四○贡举部记"天宝元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其洞灵等三经望付所司各写十本校定讫付诸道采访使颁行。"玄宗开始把官本道经颁发各地。《唐大诏令集》卷九载天宝八载闰六月丁酉大赦天下制曰"今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管内诸郡转写。其官本留采访使郡太一观持诵圣人垂训。"敦煌写本中有一大批道教经典年代以玄宗时最多推测其中当有天宝所颁官本道经但没有直接的证据。最近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第七卷收有Dx.0111Dx.0113《老子道德经》写本其背面纸缝间钤有"凉州都督府之印"[44]。凉州为敦煌郡所属之河西道采访使驻地唐朝法令文书例由凉州颁下如P.4634S.1880S.11446S.3375《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P.2819《公式令》、P.4745《吏部格》或《式》残卷均钤有同一印鉴。这件《道德经》和其他唐朝令式一样也是官颁文本无疑。幸运的是保存文字只有17行的MIK Ⅲ 7484《度人经》其背面纸缝处恰恰也钤有"凉州都督府之印"[45]。由此可以推知吐鲁番出土的这些楷书精写的道教典籍其来源很可能是天宝年间的官颁写经[46]。

注释

[1] 参看本书第四讲《敦煌藏经洞的原状及其封闭原因》。

[2]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76页No.37。

[3] 参看吴震《敦煌吐鲁番写经题记中"甘露"年号考辨》《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17—27页。王素《吐鲁番出土写经题记所见甘露年号补说》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等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244—252页同作者《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147页No.296。

[4]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80页No.57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110—111页。

[5] 北图藏殷字46号题记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114页No.193。

[6] P.2143题记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116页No.196。

[7] S.4415题记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119页No.206。

[8] S.81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100页No.150。

[9] P.2196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107页No.177。

〔10〕 参看张广达《欧美汉学论著选介·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敦煌藏文写卷注记目录》《汉学研究通讯》第10卷第3期1991年182—188页。

〔11〕 参看荣新江《法门寺与敦煌》《'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66—75页。

〔12〕 参看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九章第二节《9、10世纪敦煌佛教的盛衰》269—279页。

〔13〕 关于《都序》的敦煌本参看田中良昭《敦煌本□禅源诸诠集都序□の残巻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5卷第1号1976年107—112页同作者《敦煌本□禅源诸诠集都序□残卷考》《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第37号1979年51—71页冉云华"A Study of Ta-ch'eng ch'an-men-yao-lu: Its significance and problems"《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533—547页同作者《敦煌本□禅源诸诠集都序□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敦煌学》第12辑1987年5—12页后者收入作者《中国佛教文化研究论集》台北东初出版社1990年161—174页。

〔14〕 参看田中良昭《敦煌の禅籍》《禅学研究入门》东京大东出版社1994年。

〔15〕 参看邓文宽与荣新江合著《敦博本禅籍录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6〕 其后的发现见荣新江《敦煌本禅宗灯史残卷拾遗》《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231—244页。

〔17〕 参看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京都1967年。

〔18〕 以后的资料参看荣新江《敦煌本禅宗灯史残卷拾遗》。

〔19〕 第一辑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于1995年12月出版。

〔20〕 东京1927年。

〔21〕 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第一章《西明寺学僧昙旷と敦煌の佛教学》京都法藏馆1990年。

〔22〕 上山大峻《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之研究》收入《敦煌佛教の研究》。

〔23〕 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对这些经疏有相应的论述。

〔24〕 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京都临川书店1976年38页。

〔25〕 同上书40—84页。

〔26〕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4年。参看他最新的文章《图写炼狱——十王经绘图本研究》Picturing Purgatory. Illustrated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戴仁J. -P. Drège编《敦煌绘画论集伯希和与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纸本白画与绘画研究》Images de Dunhuang. Dessins et peintures sur papier des fonds Pelliot et Stein巴黎1999年169—197页。

〔27〕 牧田谛亮《今后疑经研究的课题》《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474—480页。

〔28〕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29〕 参看万毅《敦煌本道教□升玄内教经□与□本际经□研究》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万毅《敦煌道教文献□本际经□录文及解说》陈鼓应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3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367—484页。

〔30〕 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国学季刊》第4卷第2号1934年1—122页刘屹《敦煌十卷本□老子化胡经□残卷新探》《唐研究》第2卷1996年101—120页。

〔31〕 陈鼓应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3辑为敦煌道教研究专号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32〕 见《道家文化研究》第13辑25—78页又收入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266—320页。

〔33〕 《宋史》卷四九○《外国传》高昌条。

〔34〕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285—300页同书图录本第叁册1996年152—158页。

〔35〕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150—151页刘昭瑞《吐鲁番阿斯塔那332号墓方术文书解说》《文物》1994年第9期54—57页。

〔36〕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237页图录本第肆册1996年109页。

〔37〕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287页图录本第肆册130页。

〔38〕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23—25页图录本第肆册262—263页。

〔39〕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361页。

〔40〕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十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283页图录本第肆册571页。

〔41〕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144页图录本第肆册338页。

〔42〕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137—139页图录本第肆册335页。

〔43〕　参看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114—122页。

〔44〕　《俄藏敦煌文献》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319—320页。

〔45〕　1996年8月笔者在调查完柏林所藏吐鲁番文书后道经巴黎回国曾将此印原大摹本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卷子上的同一印铃对照可以堪同。

〔46〕　以上附录系缩写自荣新江《唐代西州的道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7—144页。

第十三讲　敦煌四部书抄本与中古学术史研究

在这一讲中我想介绍一些敦煌留存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的情况。敦煌的四部书抄本一方面作为北朝隋唐五代的典籍反映了中国中古学术史的一般情况另一方面作为敦煌地区留存的写本反映了敦煌地区的学术文化水平以及这些写本图书在当地的功用。有些宗教文献、科技类材料、俗文学类作品也应当作书籍对待因为已另外单独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四部书是中国学者最早关注的材料罗振玉的研究主要是四部书。王重民是集大成者1957年把他自己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汇为《敦煌古籍叙录》计经部24种史部25种牒、户籍除外子部62种集部33种含俗文学作品。今天看来需要极大地增补不论是从种类上还是从数量上。

一　经　部

自十六国以至隋唐敦煌一直有一些大学问家在此讲学、著述。唐代敦煌立有官办学校教授中央政府规定的儒家经典。藏经洞中保存的经部著作从六朝到五代宋初的抄本都有有些可能旧为私家藏书更多的写本则是公私学校的课本、教材。儒家的十三经除卷帙过多的《周礼》、《仪礼》和唐人不重视的《春秋公羊传》及南宋增入的《孟子》无抄本外[1]其他各经都有几种或几十种抄本甚至还有不少古佚注疏。

敦煌发现的《周易》写本都是当时流行的王弼注本而没有郑玄注本。用这些唐人写本校勘宋以后的刊本立刻就可以发现唐抄本在校勘上的价值其例证不胜枚举。此外还有《周易经典释文》抄本与今本相异处甚多已汇校入黄焯《经典释文汇校》。

六朝和唐代初年所抄写的《古文尚书》的发现在经学研究上意义重大因为天宝三载744唐玄宗命集贤院学士卫包把古文《尚书》改成今文以后民间流行者均为改字的今文本。幸好唐初人陆德明撰的《尚书

释文》中在音义里保存了一些隶古定本的字可惜到北宋开宝五年972宋太祖认为陆氏的解释与唐玄宗所定今文不符令陈鄂删去于是隶古定本《尚书》终于绝迹于天壤之间。直到敦煌本出人们才又知道《古文尚书》的模样由此得知宋代郭忠恕所定《古文尚书》及《释文》以及由此而来的薛季宣《书古文训》不过是摭拾字书而成实是伪本。而且清代许多考据家争论不已的许多字只要看一下这些写本就可定谳[2]。目前所找到的三十多件《古文尚书》残卷图1不仅有改字以前的写本也有改字以后的写本。有的早期写本用今文注古文有的写本文字上还有四声标识使人们对《古文尚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即改字之前已有今文夹杂在一些写本之间改字之后也还有些古文的遗存。这种随着由隶变楷的字体变化而变化的古书形式在靠手写流传的年代不能不出现因人而异的现象。除《古文尚书》外敦煌也发现了《今文尚书》和唐写本《尚书释文》。由于这些古抄本对经学研究十分重要顾颉刚与顾廷龙积数十年的工夫收集整理成《尚书文字合编》把敦煌、吐鲁番和日本传存的抄本影印出来供学者比对研究[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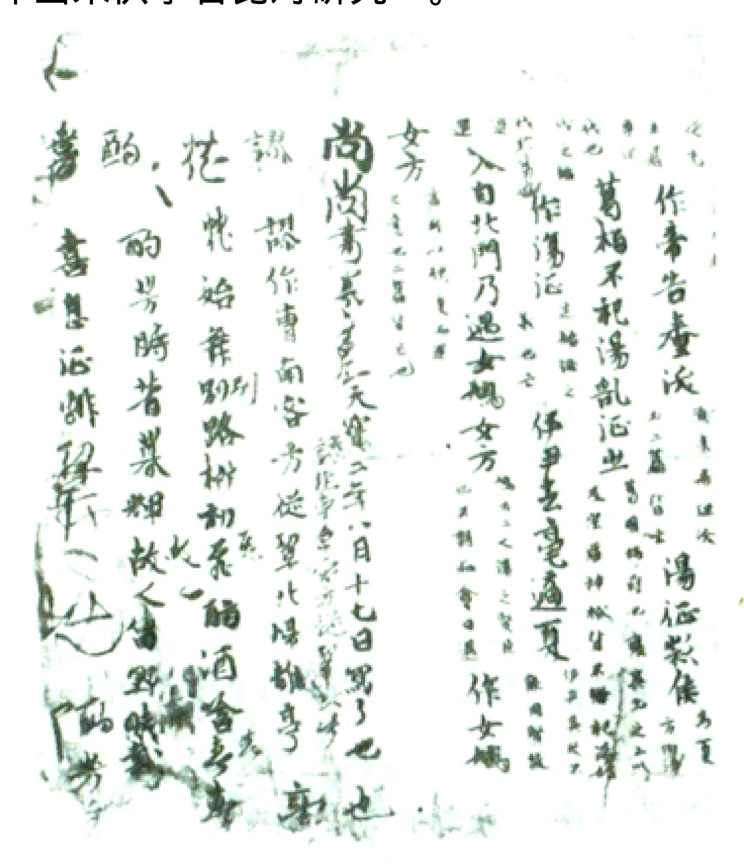


图1　P.5557天宝改字前一年所写《古文尚书》

敦煌本《毛诗》类著作有《毛诗故训传》、《毛诗正义》和所谓《毛诗定本》而最重要的发现是两种久佚的《毛诗音》。其中P.3383《毛诗音》残卷可能即晋人徐邈所撰保存了古音近千条。徐邈是郑玄之后第二个给《毛诗》作音注的人他的书是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毛诗音义》的蓝本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清代著名辑佚家马国翰曾辑徐邈书得音250余条和这件唐初写本相比不可同日而语[4]。另一种《毛诗音》S.2729可能是晋唐间的某种《诗音》汇编本之类[5]。

《礼记》有白文本、郑玄注本和唐玄宗御刊删定的《礼记月令》写本但最重要的是久佚的徐邈《礼记音》S.2053残卷虽然仅存181行却可以订正马国翰辑本误辑和其他错误多处[6]。

《春秋》三传自晋室南渡以后太学不置《公羊》、《谷梁》《左传》独尊。唐朝刘知几著《史通》举《左传》三长揭《公羊》、《谷梁》五短更进一步确立了《左传》的地位这在藏经洞出土文献中得到真实反映。据统计杜预集解本《春秋左氏传》共有三十多件并且有专门摘录嘉言懿行的节抄本而《春秋谷梁传》只有六件《公羊传》则付阙如。

《孝经》和《论语》是唐朝科举制规定的必读物必须在试九经之前就先把它们读通。因此敦煌出土的《孝经》、《论语》两种最多既有官府用的课本也有私塾用的教材其中有不少写本是学童的抄本讹俗字满纸没有多少校勘价值但可以考见当时的教育情形和方式。

这两种书的写本中最重要的发现是郑玄注解的发现。

《孝经郑氏解》是久佚的古籍清儒的辑本疏漏很多。敦煌本比旧辑序文多了15倍注文增加1/4。另外还有《孝经郑注义疏》、唐玄宗《御注孝经》以及1—2种不知名的《注疏》[7]。《论语郑氏注》也是唐以后久佚的重要典籍。因为隋唐统一南北后用南方流行的何晏《论语集解》而北方流行的郑玄注《论语》渐渐消亡。但唐朝的北方地区如敦煌、吐鲁番私塾中还用《论语郑氏注》因而得以保存。在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五十年代以来陆续也有发现。这些敦煌和吐鲁番的写本数量较多除了使人们得见郑注的原貌外同时也说明这种北朝盛行的注本在隋唐统一南北经学后仍在西北地区广泛流传。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汇集了大多数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辑得文字一半以上并做了精心的校勘[8]。

敦煌发现的何晏撰《论语集解》则代表中央政府规定的课本共有六十多件抄本可见其流行整理本有李方《敦煌<論语集解>校证》[9]。此外P.3573被认为是梁皇侃的《论语疏》单行本但也有人提出这个写本可能是据《皇疏》所作的讲经提纲[10]。此外还有唐玄宗《御注孝经》。

二　史　部

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正史类书有《史记》、《汉书》、《三国志》和《晋书》。

《史记》、《汉书》在敦煌、吐鲁番都有发现表明两者的崇高地位和流行广泛。吐鲁番发现的一件写本一面是《史记》另一面是《汉书》[11]尤其可以明证两书一并流行的情况。

正史类的书中以晋人蔡谟的《汉书集解》最重要。此书是蔡谟集中应劭以来各种《汉书》注解而成在唐颜师古的注本流行以前主要是通行蔡氏的《集解》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以及《史记》的《索引》和《正义》都曾引用其书。因此它的发现不仅有功于《汉书》也有助于其他古籍的整理研究[12]。对于此书的性质也有不同的看法。此外颜师古注本也有留存。

《三国志》在吐鲁番地区曾发现过三件大概都是十六国时期的写本早于南朝刘宋的裴松之注本可以据知《三国志》的最初形态也可以校订宋刊本的讹误[13]。敦煌研究院藏有一叶《三国志》抄本但有些专家认为可疑[14]。

《晋书》是唐太宗御定的史书敦煌有抄本不足为奇。除《晋书》外敦煌出土了此前诸家《晋史》的代表作——孙盛的《晋春秋》即《晋阳秋》。此书是晋朝人记晋朝事所以较他书详细有些甚至为唐修《晋书》及清儒所辑诸家《晋史》所不载。1972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吐鲁番的高昌国墓葬中找到《晋春秋》的残卷证明孙盛此书在西陲的流行[15]。

杂史类中有写本较多的是晋人孔衍的《春秋后语》。唐刘知几《史通·内篇》说“孔衍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

十余年行事。”颇适合于一般读者所需所以在唐代周边地域如敦煌沙州、吐鲁番西州以及周边民族或国家如吐蕃、南诏、日本也颇有流行。但宋代以后此书不被重视。大约元、明之际已经失传。明清以来陆续有辑佚之作但所得不多。敦煌发现的写本共十三件虽然不是全部但足以排出十卷的次第得知全书的大概。此外还有赵、韩、魏、楚四篇的一种略出本[1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还被译成藏文流传藏文残卷P.t.1291也在藏经洞中发现实在是千古难得的巧事[17]。最近在吐鲁番写本中找到《春秋后语》卢藏用注本可以见唐本原貌[18]。

属于历史方面的还有唐虞世南《帝王略论》、李筌《阃外春秋》以及一些敦煌地方史的著作如《敦煌氾氏家传》、《敦煌名族志》、张球《南阳张延绶别传》、《归义军名士高僧邈真赞集》、扬洞芋《瓜沙古事系年》等都是很有价值的佚书或敦煌地方文人编纂的书籍。

藏经洞出土的一批地理著作也十分引人注目。迄今为止敦煌写本中只发现了三种属于全国总志类的地理文献却都是佚书。

《天宝十道录》敦煌市博物馆藏10—76号图2写本首尾残存160行记有陇右、关内、河东、淮南、岭南五道一百三十八州府的简要情况包括州府等第、名称、距两京里程、土贡、公廨本钱数、所属县名等第、县管乡数、公廨本钱数有朱笔校勘、增订文字格式谨严当属地志类文献抄本无疑有的学者注意到它所记录的公廨本钱数的重要性因称之为“郡县公廨本钱簿”似未达诂。对比贾耽《贞元十道录》的体例考虑到本书不分卷实用性强随时改订等特征可以判断其为官府所编“十道录”类的著作。据其所记州县名称的改易情况可以推测是天宝初编成因此可以称之为“天宝十道录”。写本虽残但保存了许多唐朝最盛期的珍贵史料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时的行政区划、天宝元年州县名称的变更、各州县的公廨本钱数、土贡以及陇右、关内、岭南诸道边疆史料有不少是其他史料中所未见的[19]。



图2　敦煌市博物馆藏《天宝十道录》

《贞元十道录》P.2522矩形长条残纸两叶双面书写存字16行记剑南道十二州的州郡等级、名称、距两京里程、所管县名、等级有的州兼记古迹、土贡等。1913年罗振玉考订其为已佚的贾耽《贞元十道录》“略出之本”[20]。以后学者均以“贞元十道录”称之对比权德舆《魏国公贞元十道录序》《全唐文》卷四九三所记贾书情形罗氏比定不误。敦煌残卷虽然字数不多但可以窥见原书体例和格式并保存有若干其他书失记的剑南道史料[21]。

《诸道山河地名要略》P.2511写本首残尾题有“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知为大中时翰林学士韦澳书原本九卷又名《处分语》《新唐书·艺文志》系“纂次诸州境土风物及诸利害”而成以供宣宗处分地方事务时使用《通鉴》二四九。残卷存206行文字所记为河东道晋、太原、代、云、朔、岚、蔚、潞等八府州部分每州府下记府州名称、等第、距上都里数、建置沿革、郡望地名、山川、民俗、物产最后是处分语。尾题后有题记“八月七日戊辰记”依朔闰推之当为懿宗咸通九年868八月七

日抄写题记时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在京师长安此卷应是归义军使者匆匆抄于长安而带回敦煌的写本字体有些在行草之间。若然则宣宗宫中所用《处分语》到懿宗时已流出内廷甚至远到敦煌了。本书作为晚唐的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在编纂上有所增损改易如民俗、事迹等项对后世地志体例颇有影响。而其抄录《元和志》之处亦有校勘价值[22]。

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一些方志其中以关于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的方志最多。这些反映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的方志对于敦煌学研究来讲似乎比上述总志更为重要。迄今为止已知的敦煌方志有唐前期的《沙州图经》卷一S.2593、卷三P.2005、P.2695、卷五P.5034有晚唐五代宋初的《沙州伊州地志》S.367、《沙州志》S.788、《寿昌县地境》祁子厚藏卷、《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P.2691旧称“沙州城土境”和《敦煌录》S.5448[23]。

这些方志的母本应当是唐高宗时编纂而玄宗时增补的官修《沙州图经》又称作《沙州都督府图经》其书原为五卷记沙州和敦煌、寿昌二县及所属石城、播仙二镇的山川、河渠、泉泽、驿道、城塞、学校、祠庙、古迹、祥瑞、歌谣等现存之卷一残卷只有开首六行文字卷三有两个抄本存甘泉水以下至卷尾歌谣共513行保存了敦煌县的大部分地理资料卷五为寿昌县部分包括石城、播仙二镇残存181行文字多有缺失但因为敦煌文书中其他有关寿昌县的材料保存比较完整所以内容大体可以复原所记为寿昌的栅堡、佛寺、学校、社稷、山川、泉湖、渠涧、古迹和石城镇的山脉、城堡、物产、道路、古迹、祠寺最后为播仙镇部分仅存首部残文[24]。《沙州图经》提供了详细的敦煌历史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材料也保存了不少已佚的敦煌历史典籍和故事是研究敦煌历史、地理和敦煌文书最重要的参考文献。此外《沙州图经》的发现也为方志学研究提供了一件唐代图经的真本而且保持着原来的抄写格式使人们对方志的起源和最初的变化有了深刻的了解。

李正宇指出《沙州志》与《沙州伊州地志》原为同书的不同抄本所见极是后者的题记表明是光启元年885沙州文人张大庆自灵州安慰使处抄得知原本为中原王朝传存的志书。两写本记敦煌、寿昌县部分较《沙州图经》简略但增加了陷蕃与张议潮收复的记载弥足珍贵。后者所记伊州及所属三县文字完整无缺保存了建置沿革、公廨本钱和户数、寺观、烽戍、风俗、物产、山川、祆庙、军镇、部落等记载是现存有关伊州地区的最详细记载史料价值极高。

《寿昌县地境》是据《沙州伊州地志》和《沙州志》的母本中寿昌县的部分精简而成的删去五代时已经消失的地理单元。据卷尾题记该写本可能是敦煌文人翟奉达编纂并于天福十年945上给寿昌县令的依李正宇说。此卷原藏敦煌私家四十年代向达先生在敦煌考察时从友人处转录一份以《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为名发表了录文和相关问题的考订〔25〕。事实上在1941年完稿之《重修敦煌县志·方舆志》未刊稿本中有敦煌文人吕钟抄本因系录自原卷所以较向录为佳。李正宇在《笺证》中据吕氏抄本释录把《地境》的研究推进了一步。惜此卷原本目前仍不知所在。

前人拟名为"沙州城土境"的P.2691李正宇拟名为《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并认为是抄自乾祐二年949沙州归义军官修之志书详本。其说可取唯所拟现在这个名字恐非原名只能姑且用之。此卷著录沙州地理虽甚简略但有关敦煌诸山脉为他书所缺而且前有关于敦煌莫高窟创建于永和八〔九〕年癸丑353年说均为敦煌史地研究的重要信息。

《敦煌录》作为方志的特色是增加了人文地理的成分特别是关于莫高窟的记载是其他敦煌方志所没有的。写本是册子装字体不佳封面一页上有"道真"的题名似乎表明这个写本是属于位于莫高窟前的三界寺僧人道真所有甚至也可能就是他编纂的因此才特别突出莫高窟的地位。

《西州图经》P.2009写本首尾残存56行精抄本格式谨严惜仅存十一条道路、二所山窟和一区古塔的记载。早在1909年罗振玉即从伯希和携至北京的原本录出刊于《敦煌石室遗书》并考证成书于乾元以后贞元以前。1913年又影印于《鸣沙石室佚书》便于学人利用。本书虽残存文字不多但对研究西州通往外界的交通道路和伯孜克里克、吐峪沟两所石窟都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而且在吐鲁番文书的考释上不时可以从中得到补证。

《兴平县地志》S.6014仅存七行文字所记为京兆府兴平县祥瑞等事郑炳林先生考证为唐高宗时编纂的《兴平县地志》〔26〕。

敦煌写本中还有一些地理行纪也很重要其中玄奘《大唐西域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求法僧的著作已见第十一讲这里谈谈敦煌保存的宇内行记它们都是巡游佛教圣迹的记录其中尤以五台山为多。

《诸山圣迹志》S.529、P.2977两写本中S.529正面为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状背面为一僧人旅行记始于五台山所经之地包括太原、幽州、定州、沧州、汴州、扬州、洪州、杭州、抚州、福州、泉州、广州、韶州、洛京、关中等大半个中国后又记庐山、峨嵋山、罗浮山、终南山、嵩山、华山等地寺院圣迹。刘铭恕拟名为“诸山圣迹志”《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为学者遵用。然而因为写本文字潦草墨色浅淡释录极为困难[27]目前尚没有好的录文发表《英藏敦煌文献》发表的图版较缩微胶卷清晰但仍不及原卷。P.2977所抄只是《诸山圣迹志》的五台山部分。

《五台山行记》P.3973、P.4648、S.397、P.3931共有四种是晚唐、五代时期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流布于敦煌的反映。在这四种五台山行记中P.3973是某人从晋北入代、经雁门关而到五台山的日记P.4648是某人自怀州、泽州、潞州到太原的日记S.397则是从太原经忻州到五台山的日记除行宿外两卷主要记每日巡礼佛教寺院的情形P.3931杂纂卷中保存了《印度普化大师巡礼五台山行记》也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这位印度僧人巡礼五台各寺的情况[28]。

三　子　部

把医药、天算和释道类排除在外敦煌的子部书仍很多。

儒家类有《孔子家语》S.1891即三国魏王肃重编本存《郊问》第二十九末12行和《五行解》全篇为唐以前抄本可以校订毛晋汲古阁影宋本[29]。

兵家类的《六韬》P.3454是北宋删定之前的原本残卷存200行足以窥见太公原本的面目。

术数类的书抄本很多种类也不少这和唐五代民间占卜的盛行有关而处在沙漠之中绿洲孤岛上的人们除了祈求各种宗教神祇外还要求神问卜才觉得安稳。过去学者对术数类的写本关注较少研究成果也不多只有一些简单的跋文和个别文书的考订。最近黄正建出版了《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对这组文献做了系统的分类和整理[30]。以下依据黄氏的《研究》把主要的占卜书介绍如下

一卜法类分作八小类1以《周易》六十四卦占卜的易占有《易三备》和其他易占书2以水、火、木、金、土五兆局来占卜吉凶的五兆卜

法所存写本中以P.2905写本最完整3用十二枚棋子占卜的灵棋卜法4以十二枚铜钱占卜的《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5以竹筒中的九枚算子来占卜的《孔子马头卜法》6用34个算子按卦象占卜的《周易卜法》7占十二时卜法又称“周公孔子占法”8其他杂占法。二式法类有六壬式法和遁甲式法两类写本。三占候类有《悬象占》、《西秦占》、《五州占》、《太史杂占历》《乙巳占》云气占图3和其他四种。四相书类有许负《相书》或同一系统的著作、靨子图黑子图、面色图。五梦书类可细分成六小类即《新集周公解梦书》、《周公解梦书》、解梦书两种和占梦书两种。六宅经类有五姓宅经和其他宅经。七葬书类有《阴阳书·葬事》、《葬书》、《葬录》和有关山冈地脉类的占书。八时日宜忌选择类有杂抄、七曜直、六十甲子历、神祗出行、推忌日月、杂写等。九禄命类包括星命术文书和禄命术文书。十事项占类有占病、占婚嫁、占死丧、占走失和逆刺占。十一杂占类。这些占卜文书有些是正式的书籍但许多都是民间应用的图书不登大雅之堂因此在传统的四部书目中没有著录。这些资料对于社会史研究可能比学术史更为重要。



图3　气象杂占

杂家类有《刘子新论》北齐刘昼撰有P.3562、P.2546、P.3704、P.3636、S.12042、罗振玉旧藏本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刘幼云旧藏本北图新0688号七件抄本而且和田发现的汉文残片中也有一件《刘子》可见这部书传播广远。林其锬、陈凤金合著的《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31]校录了其中六种写本。

还有李文博《治道集》宋以后久佚敦煌发现P.3722和S.1440两写本约得原书的1/8可以略知其“所论治理之要”。

小说类中的《搜神记》、《还冤记》、《启颜录》、《周秦行记》提供给我们许多与传世文本对照研究的问题。

敦煌的类书写本很多特别是民间所用的各种小类书更为流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唐杜正伦的《百行章》此书宋以后亡佚但敦煌发现的写本可以恢复它的全貌。又有唐杜嗣先《兔园策府》、于立政《类林》、李翰《蒙求》、李若立《籝金》以及《语对》、《琱玉集》、《新集文词九经钞》、《杂钞》一名《珠玉钞》等不少可以用残卷拼成完本而其中征引的史籍又含有不少佚书是辑佚时不应忽视的一批材料。王三庆所编《敦煌类书》把已知的类书残卷系统地分类整理有录文、校注和很方便的索引[32]极便学人。

四　集　部

敦煌俗文学作品十分有名相比之下人们却不太注意属于上层士大夫的文集。这些别集或总集种类虽然没有经、史、子三部多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写本。如P.2819《王绩集》是该书五卷本的最早写本隋释道骞的《楚辞音》是久佚的著作十分重要《故陈子昂遗集》足资校勘。

以晚唐人刘邺的《甘棠集》为例此书宋以后亡佚敦煌发现的P.4093《甘棠集》写本乃天壤间仅存之孤本赖王重民先生慧眼从数千件文书中检出且首发其覆考定其书即《新唐书·艺文志》别集类著录之“刘邺《甘棠集》三卷”[33]。写本共30册叶分作四卷存文八十八首保存了全书的大半内容。而且这种产生于晚唐时期专为方镇幕僚撰写公文时参考之用的唐代文集在唐朝文书和文献学上自有研究旨趣同时也可以解决一些中晚唐历史中的疑难问题。最近赵和平在前人整理研究的基础上著《敦煌本甘棠集研究》一书对本书做了精心的校录和详细的注释[34]。

总集中以《文选》写本最多有萧统原本也有李善注本还有一种佚名的《文选音》。最近几年由于敦煌吐鲁番写本的大量影印出版也推动了对《文选》写本的校勘和研究先后出版了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35]、罗国威《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36]、罗国威《敦煌本文选注笺证》[37]、傅刚《文选版本研究》[38]。饶著是影印敦煌吐鲁番写本《文选》的集大成之作。罗氏的《研究》是对《文选》写本的校录和

考释而他的《笺证》是对日本永青文库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文选注》的整理研究。傅著是对写本和刻本《文选》各种本子的系统研究[39]。

诗歌总集有《玉台新咏》但更使人振奋的是发现了崔融编《珠英学士集》、蔡省风编《瑶池新咏集》以及另外几种《唐人选唐诗》除可校勘刻本唐诗异字外其中还有不少《全唐诗》未收的佚诗仅《珠英学士集》就有27首。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瑶池新咏集》Dx.6722、Dx.6654Dx.3861、Dx.38723874、Dx.11050这是近年新刊俄藏敦煌残卷中保存的珍本有书题图4共计残存四位女诗人的诗作23首其中李季兰7首元淳7首张夫人8首崔仲容1首。占《瑶池新咏集》全部23人115首诗作的五分之一。《瑶池新咏集》也称《瑶池新咏》是见诸文献著录的唐人选唐诗中惟一一部女诗人诗歌选集也是中国古代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女诗人诗歌选集。原书早佚在俄藏敦煌本发现之前我们只能从宋人的文献著录中了解其大致的收录范围和所收诗人诗作的数量。《瑶池新咏集》残本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宋前女诗人选集传本的空白也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考察唐朝女性诗人群体的创作问题[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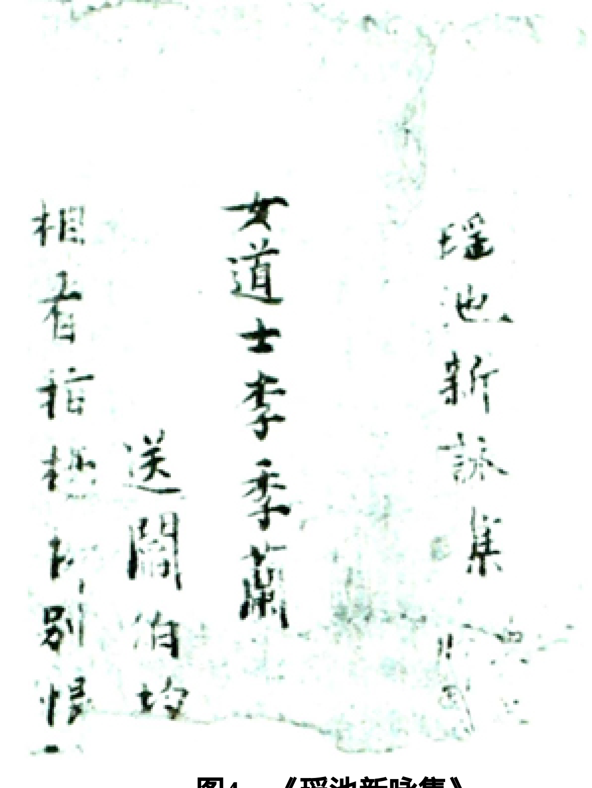

瑶池新詠集
女道士李季蘭
送閻伯均
相看指楊柳別恨

图4　《瑶池新咏集》

近代以来人们开始补《全唐诗》敦煌写本是一个重要来源但这项工作还没有彻底完成。由于补《全唐诗》的影响使得敦煌诗歌的整理一直是以同作者或同类诗放在一起的方法来整理的这样往往割裂了敦煌本原卷抄写的诗歌内在的理路违背了原编者的抄写原则。王重民先生曾把P.2492诗集写本著录为“白香山诗集”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刻本《白氏长庆集》也把它作为附录附印书后广为人知。然而最近我们发现俄藏Дх.3865是紧接P.2492诗之后的诗册散页两件可以直接缀合俄藏卷除了接着法藏卷的白居易《盐商妇》外以下还有李季兰诗首句“故朝何事谢承朝”、白居易《叹旅雁》、《红线毯》、岑参《招北客词》显而易见这个卷子只是唐朝一个诗文合抄集而不是白居易自己的诗集[41]。可见敦煌诗集抄本的形态与今人的别集不同整理敦煌诗歌应当充分尊重原卷诗歌的次序和同卷上相关联的其他内容。基于这种认识而精心整理敦煌诗集的著作是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42]不论从校录之精审还是对原作之忠实都可以作为今后四部书整理工作的典范。

注释

〔1〕　参看陈铁凡《三近堂读经札记》《敦煌学》第1辑1974年108—109页。

〔2〕　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收入《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8—10页。

〔3〕　《尚书文字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4〕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36—38页及同书38—42页转载之刘诗孙《敦煌唐写本晋徐邈毛诗音考》。

〔5〕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42—44页。

〔6〕　同上书48—49页。

〔7〕　陈铁凡《敦煌本孝经类纂》台北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同作者《孝经郑注校证》台北国立编译馆1987年。

〔8〕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所遗残片见荣新江《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拾遗》《文物》1993年第2期56—59页。

〔9〕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0〕　李方《唐写本论语皇疏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8年第2期。

〔11〕　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饶宗颐编《华学》第3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312页。

〔12〕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76—81页。

〔13〕　片山章雄《吐鲁番、敦煌发现三国志写本残卷》《东海史学》第26号1991年33—42页图一。

〔14〕　刘涛《书评敦煌书法库》《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1996年405—407页。

〔15〕　王素《吐鲁番所出□晋阳秋□残卷史实考证及拟补》《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期25—47页陈国灿、李徵《吐鲁番出土东晋写本□晋阳秋□残卷》《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152—158页。

〔16〕　康世昌《□春秋后语□辑校》上下《敦煌学》第14—15辑1988、1990年91—187、9—86页王恒杰《春秋后语辑考》齐鲁书社1993年李际宁《□春秋后语□拾遗》《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1995年335—338页。

〔17〕　此卷最初由今枝由郎先生考订为《战国策》见所撰“L' identification de l' original chinois du Pelliot Tibétain 1291- traduction tibétaine du Zhanguoce”Acta OrientaliaHung.34.1—3198053—69。王尧、陈践先生从其说并据《战国策》、《史记》文字还译为汉文载所著《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82—99页。其后马明达先生据王、陈二位的汉译判定其为《春秋后语》的藏译本见所撰《P. T. 1291号敦煌藏文文书译解订误》《敦煌学辑刊》第6期1984年14—24页。

〔18〕　荣新江《德藏吐鲁番出土□春秋后语□残卷考释》《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2期71—73页。

〔19〕　荣新江《敦煌本□天宝十道录□及其价值》唐晓峰等编《九州》第2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较好的录文和校注有两家吴震校录本载《文史》第13—14辑中华书局1982年马世长校录本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

〔20〕　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

〔21〕　荣新江《敦煌本□贞元十道录□及其价值》《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2000年92—99页。录文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22〕　录文见上注引郑炳林、王仲荦书。

〔23〕　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均有录文和校注但敦煌以外的内容不录。

〔24〕　迄今为止最好的整理本还是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山川出版社1975年。

〔25〕　《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5卷第4期1944年。其后森鹿三《东洋史研究》第10卷第2期1948年、唐耕耦《释录》、郑炳林《校注》、王仲荦《考释》均有录文所据都是向达录文。

〔26〕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9—200页。

〔27〕　郑炳林《校注》曾做录文并加注释因所据胶片不佳错误较多。

〔28〕　日比野丈夫《敦煌的五台山巡礼记》《小野胜年博士颂寿记念东方学论集》京都1982年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有些录文欠佳。

〔29〕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149—150页。

〔30〕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

〔31〕　上海书店1988年。

〔32〕　高雄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3年。

〔33〕　《敦煌古籍叙录》302—303页。

〔34〕　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

〔35〕　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36〕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37〕　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

〔38〕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9〕　关于以上四种书的优劣参看徐俊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67—381页。

〔40〕　荣新江、徐俊《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同作者《唐蔡省风编□瑶池新咏□重研》《唐研究》第7卷2001年。

〔41〕　荣新江、徐俊《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67—73页。

〔42〕　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第十四讲　敦煌学与语言文学研究

敦煌文献中也有不少语言和文学资料。语言方面不仅有关于汉语音韵、训诂、文字的书籍也有大量的可供研究中古和近代汉语的资料还有更可宝贵的几种非汉语资料即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等。文学方面最有价值的是为传统士大夫所扬弃的俗文学作品有讲经文、变文、缘起故事、词文、话本、俗赋、曲子词、通俗诗等等不仅可以见唐五代民间文学的实况也可由此得知后代戏曲小说的来源。

一　汉　语

1音　韵

在音韵学方面敦煌文献主要有两个贡献。一方面是《切韵》及《切韵》系韵书的发现包括早已失传的隋仁寿元年601成书的陆法言《切韵》原书抄本、唐长孙讷言仪凤二年677著成的《笺注本切韵》、增字加训本《切韵》、王仁昫作于神龙二年706的《刊谬补缺切韵》、孙愐作于开元二十年732的《唐韵》、五代时的刻本《切韵》。这一系列《切韵》系的韵书不仅可以考见《切韵》的原貌并借以了解中古的音系也可以明了从《切韵》到《广韵》的发展变化。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收集整理了这些韵书残本并做了总论和分别的考证[1]。

另一方面是提供了考察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材料。这种材料包括用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拼写汉字的写本和敦煌抄写的书籍与文书中所夹杂的大量同音通假字。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收集整理学者们已经对晚唐至宋初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所在的河西地区的方音有了深入的认识并总结出若干区别于其他方音的特征[2]。

2文字与训诂

敦煌发现的字书抄本据朱凤玉的研究分类除去上面已经谈过的胡汉对照的译字书外可分作五类1童蒙诵习的识字书有周兴嗣《千字文》、马仁寿《开蒙要训》、佚名的《新合六字千文》、《百家姓》。2解释音义的字典有顾野王的《玉篇》。3要用杂字的字书如《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4刊正字体的字样书如郎知年《正名要录》、杜延业《群书新定字样》、佚名《时要字样》。5解说俗语的字书如《碎金》又称《字宝》图1、《白家碎金》[3]。这些字书除了与普通的字书具有同样的功能外有两点最重要一是有些是专门解释口语词汇的书如《碎金》还有《俗务要名林》分类辑录日常用语并加以注释都是可以补充正统辞书的重要工具书对于阅读敦煌文书尤具参考价值。二是提供了唐朝一些字样书如S.388《字样》辨别形近义异和别体俗书指明正字高宗武后时书《正名要录》是分别古今字形和辨别音同字异的书《时要字样》是分辨同音异义字的书为我们了解不同时期的文字形态和意义提供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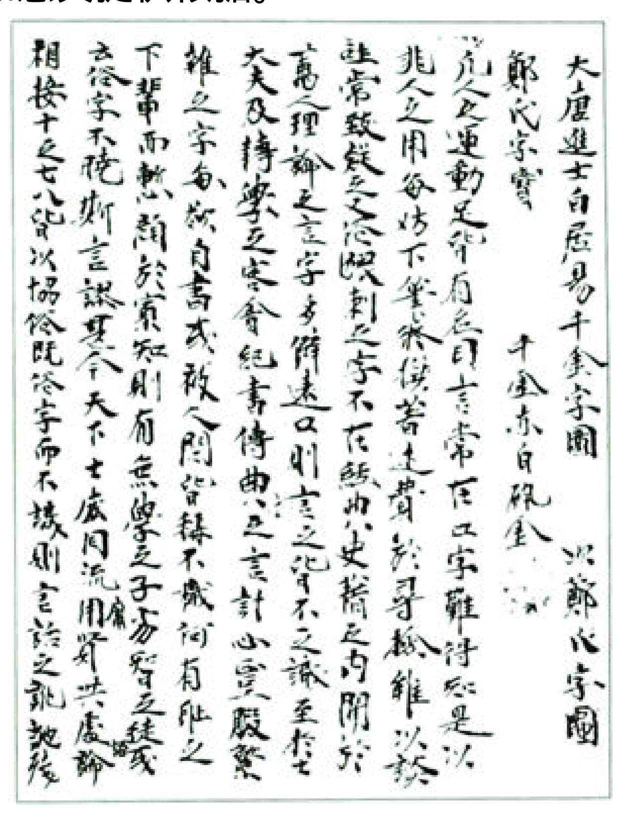


图1　P.2058《碎金》

敦煌文书大部分是写本时代的产物文字不规范特别是俗文学作品、世俗文书当中有大量的俗字给使用这些资料的学者带来许多麻烦

不弄懂字义有时对文本的理解会谬以千里。因此考释俗语词是敦煌语言文字方面的学者一直努力从事的工作。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是集中阐释变文词义的著作[4]。近年来张涌泉先后出版《汉语俗字研究》[5]、《敦煌俗字研究》[6]对俗字的考释贡献最多。

二　胡　语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非汉语文献又叫做“胡语文献”。其中最多的是藏文文献。敦煌的藏文文献主要是吐蕃统治敦煌期间786—848年所写但也不排除以前所写的文献材料在这一时期才带到敦煌而且我们确切知道还有一些属于吐蕃统治以后甚至晚到10世纪的藏文文献和文书也保存在其中。这些藏文有的是9世纪初吐蕃厘定藏文之前所写文字与今天的藏文不同即使是与现行藏文基本一致的这次厘定以后的藏文写本因为有的是行书无头字有的词义今天已经消失因此解读起来有相当的难度特别是没有对应文本可资对照的世俗文书还有不少没有翻译出来。因此藏文写本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还需要把解读出来的藏文文书与汉文文书相对照或许可以揭开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许多未解之谜。

维吾尔族先民使用的回鹘文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文字借自粟特文由于后代的回鹘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文字也改用阿拉伯文所以这些内容以佛教、摩尼教为主兼有一些世俗文书的敦煌发现的回鹘文写本也是通过学者们多年的努力才逐渐读懂的。我们笼统称之为敦煌回鹘文文献的材料应当区分为两组。一组是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年代应当在1006年以前主要是从甘州回鹘或西州回鹘王国带到敦煌的文献和寄来的信件等。另一组是莫高窟北区洞窟发现的佛教经典有写本也有刻本它们和同一地点出土的回鹘文木活字一样是属于元朝时期的回鹘文文献。两者有时被学者混淆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学术争论。

于阗文是古代西域于阗今新疆和田的居民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支由于于阗人在公元11世纪以后渐渐被维吾尔人同化其语言文字也逐渐消失等到20世纪初在和田和敦煌两地被发现时已是完全不懂的“死文字”图2。经过语言学家多年的努力现在大多数于阗语的文献已经解读但还有不少敦煌出土的译自汉语佛典的于阗语文献没有比定也还有相当数量的世俗文书没有圆满地翻译出

来。这些材料主要是属于10世纪的文献与沙州归义军的汉文文书可以相互发明因此还有待深入研究。

图2　P.3513于阗文写经

粟特语文献是从中亚来到敦煌的粟特人所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其中有他们经商的记录更多的是他们信仰佛教以后抄写的佛教典籍其中大多数是汉语佛典的粟特语译本。因为粟特语同样是一种“死语言”而且到目前为止粟特本土所发现的粟特语文献还没有敦煌发现的多。敦煌粟特语佛教文献因为多译自汉文所以可以利用汉语来解读其词汇因此敦煌粟特语文献在解读整个粟特语文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敦煌还有少量梵文文献藏经洞外有西夏文题记莫高窟北区发现有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叙利亚文文献如果加上吐鲁番、库车、和田等地发现的各种语言文字资料更是无法在本讲的篇幅中列举。以上只是概要的介绍相关的文书内容和整理情况已见本书其他相关部分此不赘述。

三　俗文学

敦煌藏经洞保存的文学作品有两类一类是传世文人诗文的抄本如《文选》、李白、白居易等的诗赋这些属于文人士大夫的正统文学作

品另一类是俗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种类繁多有讲经文、变文、缘起故事、词文、话本、俗赋、曲子词、通俗诗等等在形式和体裁上都有别于正统文学呈现出唐五代民间文学多彩多姿的面貌为俗文学研究者开辟了新的天地。真正意义的“敦煌文学”应当是指敦煌保存的俗文学作品。

除了诗、词、赋之外人们最初看到这些讲唱体裁的文学作品时还不知道如何称呼它们。王国维最早称之为“通俗诗”或“通俗小说”。后来罗振玉又把它们称之为“佛曲”。但经过向达的批驳大多数学者放弃了“佛曲”的称法根据一些作品名称中的“变”字把这类作品统称之为“变文”。1957年向达、王重民等人合作编辑了《敦煌变文集》[7]是对这类作品的一次集大成工作推动了敦煌俗文学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细致人们渐渐不满足于笼统的“变文”一名而是根据作品本来的名称和体裁区分为几种各具特征的作品形式[8]。以下对各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简要作一介绍使人们对敦煌俗文学的内涵有个初步的了解。

1讲经文

佛教进入中国后为了宣扬自身的教义很早就有了讲经的制度。在对下层百姓进行宣传时为了做到通俗易懂往往并不完全按照佛经原文的顺序而是随时根据听众的口味增加其中的故事情节有铺陈有删减这种讲经叫做“俗讲”。俗讲的仪式有和讲经不同的地方在法师和都讲二人升座后要先唱一首七言诗体的《押座文》来静摄座下的听众作为讲经的引子。为了把教义解释给大众讲经的法师要用“唱导”或“转读”等方法来吸引听众使佛经通俗化。所谓“唱导”就是用因果报应或譬喻故事等来通俗地讲解佛经义理。“转读”又叫“唱经”是指在讲经时要使音调抑扬顿挫用悦耳动听的声腔乐调来感化听众。俗讲所用的《押座文》和讲经底本——讲经文在敦煌有不少发现其中有些讲经文是经过法师的反复使用、多次修订的文本而有些写本抄有多首《押座文》大概是供讲经法师随时选用的。

敦煌发现的讲经文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维摩碎金》、《维摩诘所说经讲经文》、《佛说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盂兰盆经讲经文》、《长兴

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最后一种尾题《仁王般若经抄》是敷讲《仁王般若经》的文本。俄藏敦煌写本中有一种题名为《双恩记》的讲经文据内容也可以称之为《大方广佛报恩经讲经文》。这些讲经文的内容大多出于唐五代流行的几种大经和汉族特别喜欢的报恩类伪经因为增加了许多虚构、想象、比喻、渲染的成分又是散韵相间重复讲唱所以篇幅一般比佛经要长。虽然现在看到的讲经文多是残本但仍有一些连续性的鸿篇巨制如《维摩诘经讲经文》已经孕育了后代章回体白话小说的雏形。讲经文大概是这类讲唱体俗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种作品对其他俗文学作品影响很大。



《降魔变相》

2变　文

从体裁结构上看变文和讲经文一样都是韵散结合、说唱兼行的通俗文学作品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二者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仔细加以对比可以发现变文从题材到内容是与讲经文有所区别又有所联系的。大概在唐朝中叶随着俗讲的盛行这种讲唱活动已从寺院走出而进入民间的大街小巷讲唱的内容和形式也产生了变化讲经文在向变文演化。在内容上除了讲解佛经故事外也开始说唱起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伍子胥、王昭君甚至当代的英雄人物张议潮、张淮深也成为主题在形式上虽然有些变文还保留了押座文、转读唱呗的仪式或如“经名题目唱将来”这类被认为是讲经文特有的词句但大多数作品更注重故事本身的宣讲作者可以更自由地发挥尽情歌唱。即使是讲佛教故事的变文也都去掉了讲经文中“经”的部分而只取其“对白”和“吟唱”部分。那么为什么把

这种从讲经文发展而来的讲唱文学作品叫做变文呢说法很多至今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有的认为“变”字译自梵文变文文体来自印度有的认为变文是中国本土固有的文体演变而来的[9]。变文简称为“变”而我们前面介绍的各种经变画也简称“变”由此看来“变”的直接意思是“变易”含有今天所说的“故事”的意思变文就是讲故事的文本。与之相对应的“变相”就是故事画当时一段段变文的讲唱可能是配合着一幅幅变相同时进行的。P.4524就是把《降魔变文》和《变相》写绘在正背面的实例图3莫高窟晚唐壁画《劳度叉斗圣变》也是根据《降魔变文》绘出的说明了变文的含义和它与变相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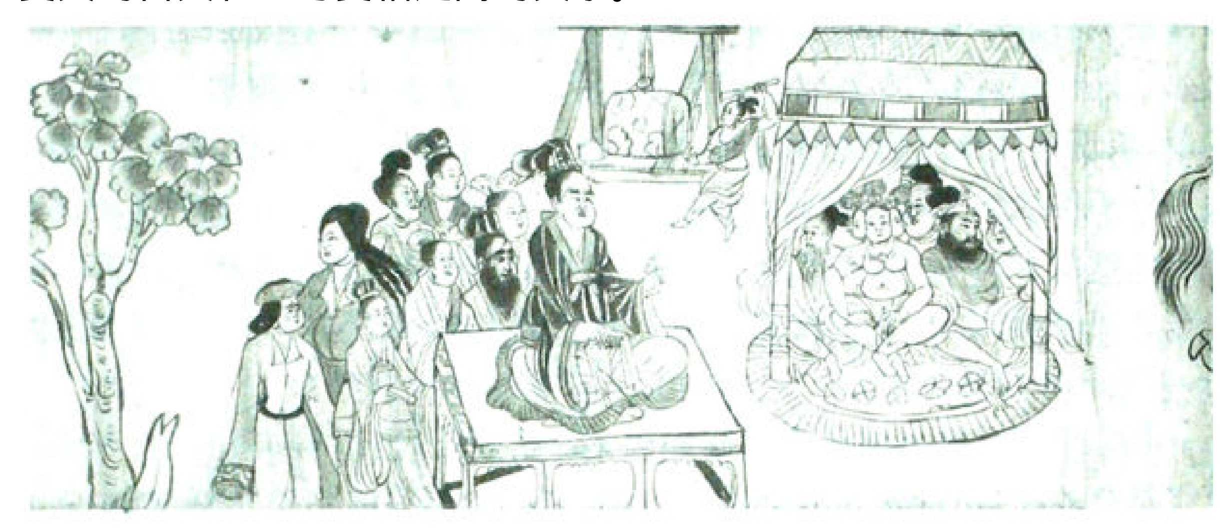


图3　P.4524

属于变文的写本很多有些原来就明确标示为“变”或“变文”另一些则是按照变文特征而拟定的名称。归纳起来讲唱佛教故事的变文有《八相变》、《破魔变》、《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频婆娑罗王后宫綵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地狱变文》等。有的变文如《目连变文》因大众的喜闻乐见先后产生过几种文本内容大同小异。讲唱中国史传故事和英雄人物事迹的有《舜子至孝变文》、《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刘家太子变》、《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图4、《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关于历史人物的变文大多是以史书记载为依据同时吸收大量的民间传说使那些不识字的大众能理解故事的内容。作者的虚构和想象使故事情节复杂人物形象生动。这些传统的故事题材大概不仅仅是敦煌民众喜爱的对象也在全国许多地区流通盛行。唐人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的诗所记就是四川演唱《王昭君变文》的事。因此这些传统题材的变文影响深远对后代小说、戏剧都有直接的影响大同小异的故事有的甚至在今天的舞台上还能看到。《张议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是歌颂晚唐归义军第一、二任节度使的文艺作品应当出自敦煌文人的手笔它们是敦煌当地所写的文学作品的代表作。同时这种纪实性的文学作品虽然不无夸张之处但仍不失为研究归义军史的重要资料。

图4　P.2553《王昭君变文》

3因　缘

佛教僧侣在利用俗讲的方式向民众传播佛教时除了有用两人对讲的形式来宣扬教义外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由法师一人来说法根据佛经来讲解佛教教义。与两人讲经相对应的是讲经文而与说法相对应的俗讲可以称之为“说因缘”或“缘起”。其仪式是由一人讲说选取一段佛经中的故事或僧传中的一段传记加以编排敷衍也有的照本宣科。其所用的底本一般称作“因缘”有的也叫“缘起”简称之为“缘”。因缘本是佛教经典的一类讲唱文学作品吸收而用为名称但它的体制要比佛典灵活得多有散韵相间写成的也有只是用散文形式写成的。敦煌发现的这类作品有《难陀出家缘起》、《悉达太子修道因缘》、《太子成道经》、《太子成道因缘》、《欢喜国王缘》、《丑女缘起》又名《丑女金刚缘》、《金刚丑女因缘》、《四兽因缘》、《目连缘起》、《佛图澄和尚因缘记》、《刘萨诃和尚因缘记》、《隋净影寺沙门慧远和尚因缘记》、《灵州龙兴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缘记》等有的学者把《频婆娑罗王后宫䌽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也放在这一类里。它们的内容有的是叙述佛祖出家修道及度化众生的故事有的是阐释教义或叙述神灵感应的故事更多的则是叙述善恶因果报应的故事。

4词　文

敦煌俗文学作品中有一些标明为“词文”或“词”的可以自成一类。它们的体制多由长篇韵词构成篇幅宏伟语言通俗有的略有散文叙述作为歌唱前的说明。这类作品的代表是《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和《董永词文》都是长篇的韵文。又有《季布诗咏》、《下女夫词》也被看做是词文。有的学者还把《苏武李陵执别词》归入这一类只是此卷虽标名为词但散说多于韵语有的学者认为应归入话本一类。词文实际上是用歌词写成的长篇叙事诗如《季布骂阵词文》共640句4474字七言一句一韵到底没有说白显然是由一个人来演唱的。这种形式对后代的鼓书、弹词、影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词文应当是从变文的韵词部分发展而来的它们的内容主要取材于史传故事、民间传说并吸收了民间歌谣的养分而没有发现与佛教有关的内容。词文的内容和形式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如季布辱骂汉王但最终又被汉王录用为官的故事共有10个写本可见其流传之广。

5话　本

唐朝民间的讲唱形式除“讲经”、“转变”之外还有一种“说话”在俗文学作品中就有相应的讲经文、变文和话本。唐代话本应是变文散文部分的发挥与词文恰好相反这种重说不重唱的文体更注重故事本身的完美。它的叙述方法是要把一个故事的起首结尾来龙去脉交待得一清二楚而且语言通俗解释周详。敦煌发现的话本有《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诗》、《孔子项讬相问书》、《秋胡小说》、《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冥记》等内容取材广泛有古代的名僧道士、帝王将相的故事也有民间传说。如果把有些话本和它所主要依据的史传文字相比较就不难看出作者通过想象和虚构所进行的艺术创造。如敷演隋代名将韩擒虎故事的《韩擒虎话本》大致是根据《隋书·韩擒传》唐人讳省“虎”字的线索加以虚构而成。从杨坚称帝建隋韩擒虎灭陈并威服大夏单于事到他死后作阴司之主首尾完整。其中如与突厥使者赌射和一箭双雕的描写是从贺若弼、长孙晟的事迹中移植的而韩擒虎出使大夏和番则纯为虚构。但这些艺术性的刻画却把韩擒虎智勇双全、赤胆忠心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听众面前。唐朝的话本应是宋元话本乃至明清白话小说的直接来源。

6故事赋

在属于可以用来讲唱的俗文学作品中还有一类是用“赋”来命名的。从形式上看一般都是篇幅不长用白话写成四言和六言句式杂以散说个别作品则为五言白话诗体。敦煌发现的这种白话所写的故事赋有《燕子赋》、《韩朋赋》、《晏子赋》、《齖𪘨书》。有的学者认为《孔子项讬相问书》也属于这一类。故事赋作品篇幅虽短但幽默风趣、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它们取材于民间传说有一定的思想性寓意深远。如《燕子赋》就是用燕子、雀儿、凤凰等之间的寓言体故事讥讽贵族对小民的压迫反映了唐代的世态人情和一些社会问题。

以上六类作品为英图、法图和北图所收藏者基本上都收入王重民等所编《敦煌变文集》因此得到充分的研究。但由于俗文学作品来自民间这些写本中的俗字、别字非常多校录工作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因

此自1957年以来产生了一批考辨字义的论著使得敦煌变文的整理在整个敦煌文献整理中独步于前。其间比较重要的成果有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10]、周绍良、白化文等《敦煌变文集补编》[11]、项楚《敦煌变文选注》[12]而以黄征、张涌泉的《敦煌变文校注》[13]为集大成的著作。《校注》剔除了《变文集》所收的四种确定为非变文的作品《下女夫词》、《秋吟》、《搜神记》、《孝子传》增补了新发现的资料共计收录86种作品基本囊括了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所有敦煌变文类作品。本书的注释主要集中在俗语词而名词及典故之类则一般不注因此一般的人要读懂变文有时还是要参看项楚的《敦煌变文选注》其中有27篇变文类作品的详尽校勘和注释注释包括了作品本事、俗语词和所涉人物、典故、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

7俗　赋

赋是中国文学史上很早就产生的一种文学形式。汉魏六朝时文人作赋之风大盛保存下来了许多作品。文人作赋大多整齐严练音韵谐婉属对工巧。而与之有所不同的是汉魏以来民间流行着一种自成系统的俗赋只因为历来不被重视所以大多已经湮没无闻。但是在敦煌写卷中却可以找到一些俗赋的遗篇它们主要有《秦将赋》、何蠲《渔父歌沧浪赋》、《去三害赋》、张侠《贰师泉赋》、《子虚赋》、赵洽《丑妇赋》等等。敦煌俗赋与文士的律赋骚体不同多用方言俚语文句兼杂骈散有些则引入五言或七言诗有如长篇的古诗。这些俗赋的题材大多选自古代史传人物如秦将白起、汉贰师将军、晋人周处等。俗赋和敦煌讲唱类俗文学作品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是俗文学研究中不应忽视的内容。整理本有伏俊连《敦煌赋校注》[14]、张锡厚《敦煌赋汇》[15]。

8曲子词

以前人们都认为“诗衰词继”。五代时期后蜀赵崇祚编的《花间集》十卷自来被认为是最早的文人词集。自从敦煌写本中发现了唐五代民间曲子词人们才对词的起源和风格有了全新的认识和评价。特别是比较全面地看清了唐五代民间词的原貌并且发现了民间词的总集——《云谣集杂曲子》。

现存的敦煌曲子词数量繁多时代久远内容广博曲调多样。已经整理出的曲子在一千首以上其中有的曲辞保存有曲调包括普通杂曲、定格联章和大曲还有不少亡佚曲调的曲辞。可见敦煌虽地处边陲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民间曲子词是十分流行的。从内容来看最早的文人词总集《花间集》中的作品大多是写女人娇娆之态的淫巧侈丽之词。而敦煌民间词的内容却十分广泛其中有的写男女情怀如爱慕、闺怨乃至龃龉有的写景咏物也有的批评时政反映人民疾苦如征夫思妇之怨、士子不遇之恨还有的记英雄勇武写人生处世之道佛、道、医理、民间传说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和民间生活的种种情况。敦煌曲的作者阶层不一文辞风格也不一致但绝大部分为无名氏的作品朴素、清新是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是最早整理曲子词的合集校录出162首唯其所收录者为严格意义的曲子词〔16〕。以后又有任半塘《敦煌曲校录》〔17〕、饶宗颐《敦煌曲》〔18〕等续有增补。1987年出版的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19〕收词最多体制最巨但对文字多有臆改受到项楚的批评〔20〕。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著的《全唐五代词》也收录了新整理的敦煌曲子词〔21〕。

9通俗诗

敦煌出土的白话通俗诗作非常之多这和唐朝人盛行吟诗有关也和文人诗向通俗化的发展有关。这些唐人的通俗诗因为不被后世文人所重视所以许多早已亡佚有些虽然留存但也被摒弃于正统的诗歌总集之外《全唐诗》也不收录这类作品。因此敦煌发现的白话通俗诗在文学史特别是俗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中最有名的要算王梵志诗了。

从历史记载来看王梵志应是唐初的一个通俗诗人但敦煌发现了如此之多的王梵志诗集图5使人觉得这种诗不像是同一个人所作而是梵志体诗的合集。王梵志诗文字极为通俗易懂大多是反映社会不平等描写民间疾苦的同时也有一些消极悲观的思想因果报应的说教甚至还有一些专讲哲理的诗作。可以说王梵志诗是唐代通俗诗的代表作。前人很早就开始整理王梵志诗而校勘最精注释最详者当属项楚《王梵志诗校注》〔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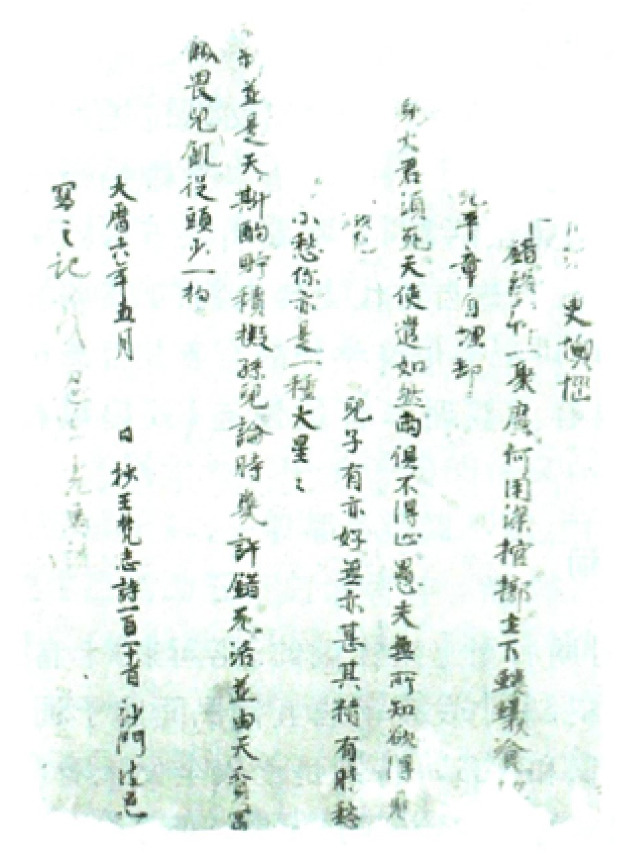


图5　俄藏法忍抄本《王梵志诗集》

此外比较重要的敦煌通俗诗还有《敦煌二十咏》用通俗的语言歌咏了敦煌地区的名胜古迹、英雄人物具有文史双重价值。长篇诗作有《古贤集》用七言的形式历叙先代贤人的事迹有劝导学童行孝好学的功用因此文字浅显通俗。还有歌咏节气的《二十四气诗》有讲述佛教思想的《九想观诗》有各种内容的单诗。

总之敦煌俗文学作品非常丰富绝不仅仅限于以上几项内容。好在学术界对俗文学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整理出不少作品选集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台北学生书局增补本1994年。

〔2〕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1933年高田时雄《敦煌资料所见汉语史研究——9、10世纪的河西方言》东京创文社1988年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作品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193—217页邓文宽《英藏敦煌本□六祖坛经□的河西特色——以方音通假为依据的探索》收入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

〔3〕　朱凤玉《敦煌写本碎金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12—14页。
〔4〕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新二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增补定本新三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5〕　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6〕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
〔7〕　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合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8〕　参看周绍良《唐代变文及其它》和《敦煌文学刍议》两文均收入《敦煌变文刍议及其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本讲的叙述在很多方面是本之于周先生的说法而不把俗文学作品都看做变文。
〔9〕　有关讨论的文章集中收入潘重规编《敦煌变文论辑》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81年和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比较全面的讨论见梅维恒V. H. Mair《唐代变文》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杨继东、陈引驰汉译本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较新的看法有姜伯勤《变文的南方源头与敦煌的唱导法匠》饶宗颐编《华学》第1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149—163页。
〔10〕　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84年。
〔11〕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12〕　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
〔13〕　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4〕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
〔15〕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16〕　商务印书馆1950年1956年修订再版。
〔17〕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
〔18〕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1971年。
〔19〕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0〕　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巴蜀书社2000年新版。
〔21〕　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22〕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第十五讲　敦煌学与科技史研究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写本中保存了一些珍贵的科学技术文献。其中尤其以实用性的医书、药方、算经、日历为多。现简要介绍一些主要的科技文献及其在科技史研究上的价值。

一　天文学

天文学的基础是星象的观测而天空中闪烁的群星对于古人来说又是那样的神秘所以在世界各个文明古国里天文学和占星术混在一起很早就形成并且日益复杂。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在战国时代初步形成当时有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家学说他们各自记录下观察星宿的结果绘成星图附上卜辞流传下来。到三国末年东吴太史令掌管星历的官陈卓把甘、石、巫咸三家的成果加以总结纳入自己的书中可惜陈氏的著作和三家的原著后来都失传了。我们有幸在敦煌遗书中找到了一件唐武德四年621写的《星占书》残卷P.2512。其中记录了甘、石、巫咸三家内外官星283座1464颗星和唐初编成的《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所记陈卓记录的三家星数完全吻合与唐《开元占经》比较互有脱漏可以相互补充。而《晋书·天文志》和《隋书·天文志》是把三家星合并起来记录的《开元占经》是以石氏星经为主的敦煌这部《星占书》则是分别记录三家星经以赤色表示石氏以黑色表示甘氏以黄色表示巫咸这种分别记录的形式表明《星占书》是比上述三种唐代星占资料更早的一部著作。其星座后有11项星占文字大概都是来自陈卓的著作。这部书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天文学水平极有帮助。同卷三家星经前有《二十八宿次位经》这里记录的二十八宿的数据也较《晋书·天文志》所记李淳风的记载要早。此外同卷还写有五言的《玄象诗》用通俗的诗句来描述星躔方位反映了唐初天文知识的普及情况。

与上述《星占书》相应的是唐初绘制的一幅星图S.3326的发现。图中根据甘、石、巫咸三家的著作和星图绘制了1348颗星用三种不同的颜色来区别三家的星宿它的十二次起迄度和《晋书·天文志》所记陈卓

的十二次起迄度完全相同表明了它与三家星图的渊源关系。此图按十二月每月太阳位置顺序沿赤道带分成十二段紫微垣以南诸星用圆柱投影法画出而紫微垣则画在以北极星为中心的圆形平面投影图上图1。其说明文字与李淳风《乙巳占》和瞿昙悉达《开元占经》相同表明都是来自同一史源。据科技史家考证这是世界现存古代星图中年代最早、星数最多的一张备受中外科技史家的重视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分册中就复制刊布了这件星图并且给予高度的评价[1]。但他把这幅星图摹写的年代定在公元940年马世长根据卷中“民”字避唐太宗讳缺末笔、不避唐睿宗“旦”字讳、卷后接着描绘的电神图中人物服饰的特征认为抄绘于唐中宗时期705—710[2]。此星图前为《气象杂占》后为《解梦及电经》一卷。



图1　S.3326星图紫微垣部分

另外敦煌市博物馆也藏有一件敦煌星图编号076号学界称之为“敦煌星图乙本”而称S.3326为“敦煌星图甲本”。乙本前残仅存紫微垣部分有星名32个星138颗用黑、红两种颜色标识[3]。此卷和甲本相同后面抄《占云气书》一卷[4]而全卷背面是唐天宝年间742—755抄写的《十道录》[5]。该卷正背面内容都是唐朝政府规定私人不得收藏的天文、兵

占和官府图籍表明这个卷子很可能是当时敦煌县或沙州官府所藏文本[6]。

敦煌藏经洞中还保存了一批日历残卷相当于我们今天用的日历本因为有吉凶注记所以称作“具注历”。这些历书大多数是在敦煌与唐朝中央政府脱离联系无法得到中央政府颁发的历法时由吐蕃占领下的敦煌官府或归义军节度使手下负责占卜星历的官员编制的为当地官府和民间所使用唐朝人称这种历为“小历”以区别于政府颁发的历书。有少数历书是从外地传入敦煌的如S.P.10刻本《中和二年壬寅岁882具注历日》是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的印本可知是从四川传到敦煌的。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具注历总共有近50件。最早的一件是吐蕃戊子年808的历书[7]吉凶注记比较简单最晚的一件是归义军淳化四年癸巳岁993的历书。敦煌历书大体上是由简到繁繁本的历书序言有年九宫图、年神方位图、推七曜直日吉凶法及各种杂忌法等月序中有月大小、月建干支、月九宫图、得节之日、天道行向、月神日期方位、四大吉时和日出入方位。历日本身内容有八项1日期、干支、六甲纳音、建初十二客2弦、望、藉田、社、奠、腊3节气、物候4逐日吉凶注5昼夜时刻6日游7人神8蜜日注。科学与迷信的内容都集中于此因此敦煌历书既是研究古代历法编纂史和古代天文学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唐五代民间信仰和民间节日的极好素材。

过去人们只知道唐代民间小历盛行在唐朝政府的官历颁布下来之前小历已经遍满天下[8]但一直不清楚它的具体情况。敦煌具注历的发现使人们搞清了这些具注历置闰立朔的一些基本情况及其与中原历日的关系如朔闰往往不同还知道了七曜日即今天的星期注记的地方特征。只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是一件件实际应用的历书而不清楚编纂这些历书的基本原则因此我们还无法据此编制出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历日谱。在我们看到一件属于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时如果没有当年的日历留存下来我们无法将其纪年准确地比定为公历的月日这一工作仍有待解决[9]。

有关的天文、历法方面的文献已收入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10]。

二　数　学

不论是地方官府还是民间百姓计算收入支出是少不了数学的帮助的所以藏经洞中发现一些唐人写本《算经》并不是偶然的。除了实用目的而产生的算书外藏经洞中应当还有作为书籍流传的算学书。

在这些写本中P.2667是一部算学书籍的抄本其中保留有“营造部第七”的子目和另外两个残失名称的子目共存13题8题在“营造部”中算题的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建筑、织造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不仅是研究数学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其他方面的参考文献。过去一般都把这件《算书》定为唐朝的作品但菊池英夫通过对其中所记军事制度的分析认为成书于唐初或稍早的时候[11]。郭正忠在此基础上全面讨论了书中的丁中制度、仪同军制、步里之制、米粟的计量单位以及反映边地兵戎岁月的背景认为成书于西魏或北魏后期不晚于北周后期[12]。这一说法基本成立使我们更加珍视敦煌的这一发现。

另有三件写本是同一种《算经》的抄本P.3349、S.19、S.5779相互校补大致可以得见写本的原貌。从内容来看大多数文字是引自《孙子算经》。《孙子算经》是南北朝时编撰的一部数学书伪托为孙武所作。唐朝初年此书和《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一起被列为学校中“算学”科的教科书所以影响很大。但今天我们见到的《孙子算经》曾经后人的改窜和《隋书·律历志》引用的《孙子算经》的有关记载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敦煌本《算经》一出这类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使我们对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度量衡制度和各级间的换算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敦煌还出有一种《立成算经》S.930是前人从未见过的实用性数学著作。中国古代演算数学题是用筹来算不用纸笔所以也就没有数码。这件《立成算经》抄本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出现了唐人手写的数码字。这些数码字没有表示空位的零号是按算筹记数的纵横相间规则记下了一系列数码除个位数之外还有十位数和百位数数码。虽然还不能说这些数码在唐朝就用来作运算了但却是宋以后开始普遍运用数码的渊源同时也有助于了解古代的筹算制度。

敦煌发现的算书不仅有科学史上的意义也是研究北朝隋唐历史和社会的珍贵参考资料[13]。

三　医药学

中国古代药物学产生得很早传说远古的神农氏始教民尝百草的滋味从此药物学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本草学逐渐发展起来。最早的本草书是传为神农氏所作的《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实在汉晋之间计收药草365种以符合一年的天数。南朝梁时陶弘景又增补了后来发现的医用药草365种并为之作注名为《本草集注》。可惜的是《神农本草经》和陶弘景的《本草集注》在宋代就失传了。幸运的是一部几乎完整的《本草集注》图2在失传之前存入了敦煌藏经洞1914年被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劫往日本次年就由罗振玉影印出版了[14]。此卷现存龙谷大学图书馆近年由上山大峻组织人整理并按原大影印极便学者研究参考[15]。敦煌本《集注》使人重见千年以前的古籍可以了解陶氏原书的本来面貌也可以订正许许多多后代本草著作引用陶书时断章取义所造成的讹误使人们得以考知《本草集注》在药物分类、采治方法等方面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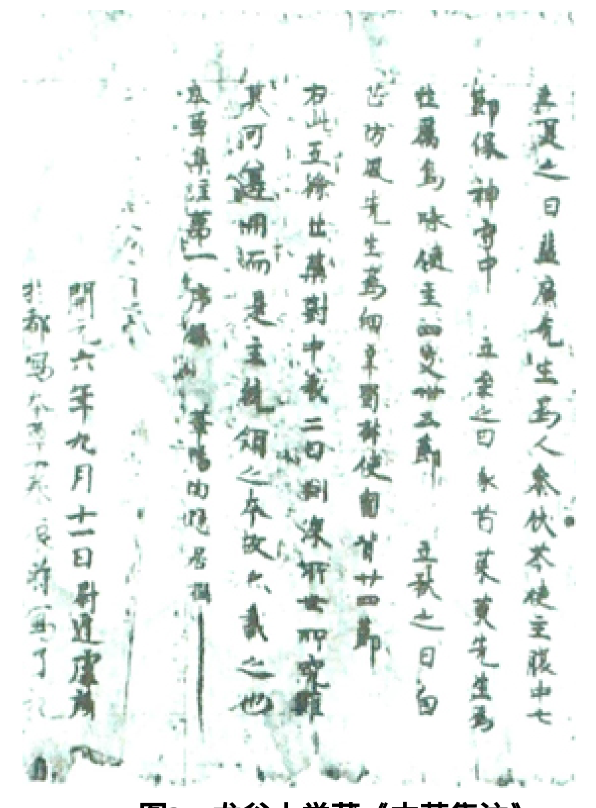


图2　龙谷大学藏《本草集注》

唐朝时期药物学知识进一步丰富。唐高宗时唐朝政府组织人力由李勣、苏敬主持编成《新修本草》二十卷。此书记载了九类844种药

物而且图文并茂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颁药典也是此前一千多年药物学知识的集大成著作但北宋以后也失传了。日本保存了该书的部分残本[16]敦煌发现的多件《新修本草》写本S.4534、S.9434、P.3714、P.3822以及未刊的北图和李盛铎旧藏本有些恰好可以补日本传本之阙也可以校订传本之误。本草类的著作往往一字之错关系重大所以古本校勘的价值比其他类书更形重要。《新修本草》的残卷是十分值得重视的珍贵医籍。

敦煌医药类写本中另一引人注目的著作是唐人孟诜原著、经张鼎补充的《食疗本草》一书S.76。此书共收药物207种以专讲动植物的营养和药用医疗价值而独具特色。编者总结了扁鹊、华佗等人的治疗经验又曾跟随名医孙思邈学习所以此书是价值颇高的著作但也在宋朝以后亡佚人们只能从北宋唐慎微编的《经史证类本草》的摘录中略知一二。敦煌发现的《食疗本草》仅存药26种约为全书的1/10但可以借此看到原书的风貌得知《证类本草》等引用取舍的情形使人们了解唐朝人对食物疗效认识的水平[17]。

敦煌还发现过一种唐初写本《脉经》P.3287也是一种佚书保存了一些失传的诊法、药方和脉学理论可以和《黄帝内经》、《难经》、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王叔和《脉经》等脉学专著相印证对于校正《黄帝内经素问注》等权威著作也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此外敦煌卷子中还有张仲景《伤寒论》、《五脏论》佚名《明堂五脏论》、《平脉略例》等医学理论著作。不少医书都是合抄在一起的如S.6245背S.9431S.9443S.8289就连续抄写了《五脏脉候阴阳相乘法》、《占五脏声色源候》、《平脉略例》、王叔和《脉经》透露出医书流传的形态。

敦煌写本还有S.6168、S.6262《灸法图》图3、P.2675《新集备急灸经》、S.5737《灸经明堂》等灸疗和针灸方面的专著。



图3　S.6168《灸法图》

更具有民间应用价值的是医方书敦煌写本中有大量医方刨除重复总计约有一千数百个唐五代时抄写的药方保存下来可以得知这些药方在当时临床各科的应用范围极广药物剂型和用药种类也非常多样化。

除了新刊俄藏敦煌写本大多数敦煌医药文献已经收入马继兴等编写的《敦煌古医籍考释》[18]、《敦煌医药文献辑校》[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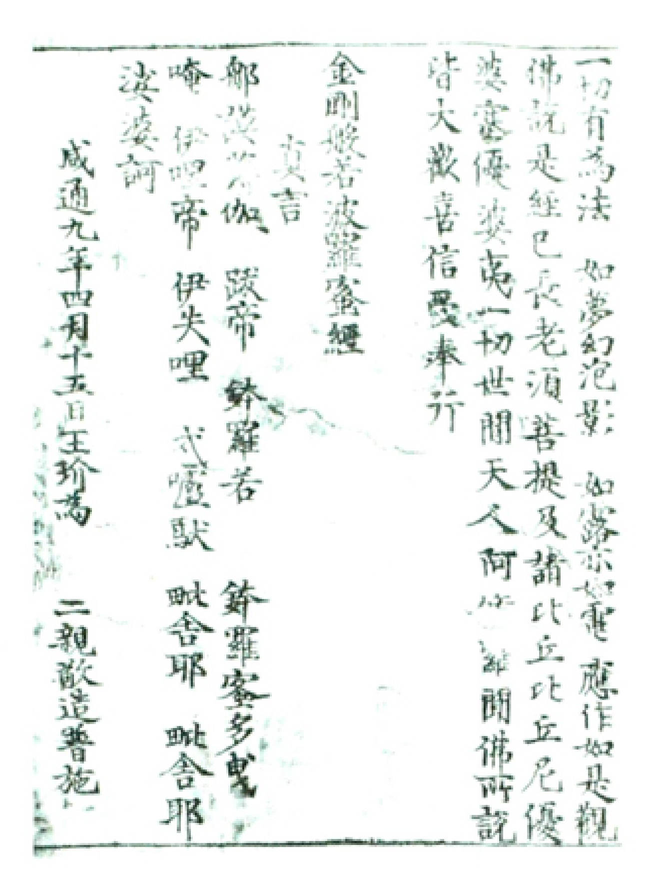
还值得提到的是藏经洞出土的藏文和于阗文写本中也有几种珍贵的医药学著作如藏文的《火灸疗法》、《杂疗方》等代表了藏医学的成就[20]而于阗文的《医理精华》和《耆婆书》则是印度医药学的代表[21]。至于汉、藏、印三个系统的医药学文献汇于一处藏入一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值得琢磨的。

四　造纸和印刷术

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在搞清中国造纸和印刷术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敦煌写本和印本成为丰富而有价值的直接物证。

考古发现证明西汉时中国人已经发明了造纸术。经过东汉蔡伦的改造之后纸在中国逐渐普及取代先前的竹木简牍和绢帛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敦煌藏经洞中保存的最早一批写本和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发现的几封纸本粟特文古信札成为西晋和十六国初期纸向西传播并取代木简的有力物证。在8世纪以前中国的造纸术并不是停步不前的敦煌保存的4—8世纪连续不断的写经纸为造纸术研究者提供了一部完整的纸谱使人们对中国造纸术的进步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如今敦煌纸仍然是造纸史家继续研究的对象而且成为每一部造纸史著作不可缺少的原始材料〔22〕。

印刷和造纸一样并不是某个人的天才发明而是从劳动中逐渐产生的新技术印刷术产生的时间因此也就难以指出确定的年代。大致说来唐朝初年已经发明了印刷术但开始时并不是用来印书籍而是印刷那些大众化的商品如民间使用的日历、占卜书或大量印行以为功德的佛经、佛像。这些印刷品是不被上层统治者重视的而日历一类还要严加禁止所以很难流传下来。敦煌当地流行的这几种印刷品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坦因劫走的《金刚经》刻本图4有图有文而且明确刻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时在公元868年是迄今人们所能见到的世界上第一件标有年份的木板印刷品〔23〕。此外敦煌藏经洞中还保存有晚唐、五代、宋初刻印的佛经、佛像、陀罗尼、押座文、《切韵》等等有些书籍写本还注明是从某种印本上过录下来的。这些印本或文字记录证明除敦煌印制的外还有唐朝都城长安东市、四川成都等地产品它们为中国早期印刷史提供了实物和史料证据。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
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
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真言
那謨薄伽 跋帝 鉢羅若 鉢羅蜜多曳
唵 伊哩帝 伊失哩 戍嚧馱 毗舍耶 毗舍耶
莎婆訶
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 二親敬造普施

图4　咸通九年刻本《金刚经》

敦煌发现的科技史料远不止上述几种其他零散的篇章也不乏有价值的材料。如今藏敦煌市博物馆的《占云气书》虽与行军占候有关但所保存的彩绘云图和文字说明是气象学研究的珍贵史料。又如参照《水部式》、《敦煌地区用水细则》和《沙州图经》及户籍可以了解唐代沙州全境的水利工程设施情况和其经营管理的方法。还有一件关于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残卷记录了科技史上的中外交流是十分难得的史料。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元代洞窟中找到了不少回鹘文木刻活字证明了维吾尔族的先民在传播印刷术上的贡献也部分说明了敦煌、吐鲁番出土大批回鹘文印刷品佛经的原因。至于那些藏在宝库中还没有被识别出来的科技史料还有待人们的继续努力。

注释

〔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译本第四卷天学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211—213页。

〔2〕 马世长《敦煌星图的年代》《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兰州1987年367—372页。

〔3〕 夏鼐《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李国豪等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51—162页。

〔4〕 何丙郁、何冠彪《敦煌残卷占云气书研究》台北艺文印书馆1985年。

〔5〕 马世长对全卷正背面内容都进行过细致的研究见《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6〕 参看荣新江《敦煌本天宝十道录及其价值》唐晓峰等编《九州》第2辑1999年116—129页。

〔7〕 据传四十年代在敦煌发现的《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二年451历日》现藏敦煌研究院一般认为是最早的敦煌历本但因为这件写本来历不明此处不计。

〔8〕 《册府元龟》卷一六○《帝王部》革弊二。

〔9〕 参看藤枝晃《敦煌历日谱》《东方学报》京都第45册1973年377—441页。

〔10〕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作者本人之补正载《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141—156页。

〔11〕 菊池英夫《敦煌发现的算书所见军制模式之研究》《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第35号1990年57—83页。

〔12〕 郭正忠《一部失落的北朝算书写本》《中国学术》2001年第2辑商务印书馆207—232页。

〔13〕 参看许康《敦煌算书透露的科学与社会信息》《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96—103页。

〔14〕 《吉石盦丛书》影印本第一集1914年。

〔15〕 《敦煌写本本草集注序录·比丘含注戒本》京都法藏馆1997年。

〔16〕 《新修本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7〕 此书有谢海洲、马继兴等辑本《食疗本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

〔18〕 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

〔19〕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20〕 罗秉芬、黄布凡《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

〔21〕 参看陈明《印度梵文医典药理精华及其敦煌于阗文写本》《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115—127页同作者《敦煌出土的梵文于阗文双语医典耆婆书》《中国科技史料》第22卷第1期2001年77—90页。

〔22〕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23〕 邓文宽《敦煌三篇具注历日佚文校考》《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108—110页考证俄藏Dx.2880残片是《唐太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则是目前经过考证而得知确切年代的最早印刷品。

第十六讲　考古、艺术视角中的敦煌

敦煌学是由于藏经洞的发现和对其中珍藏的敦煌写本的研究而产生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藏经洞所在的敦煌石窟的重要性。人们发现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一样同样蕴藏着历史、社会、民俗、文化等丰富的内涵当然最主要的价值在考古学和艺术史方面。敦煌考古和艺术的研究也一直处在中国石窟研究的前列弄清楚敦煌石窟的内涵有助于研究中国的其他石窟从某种意义上说敦煌石窟的研究对整个中国考古和艺术的研究作出过贡献。

以下简要介绍莫高窟的形制雕塑、壁画、图案的内容[1]这是我们认识其他石窟的基础也是研究文献资料时应当作为参考的另一个方面。

一　石窟形制与艺术风貌

从广义上来讲敦煌石窟应包括敦煌的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的榆林窟、东千佛洞以及肃北的五个庙石窟。狭义的敦煌石窟即指莫高窟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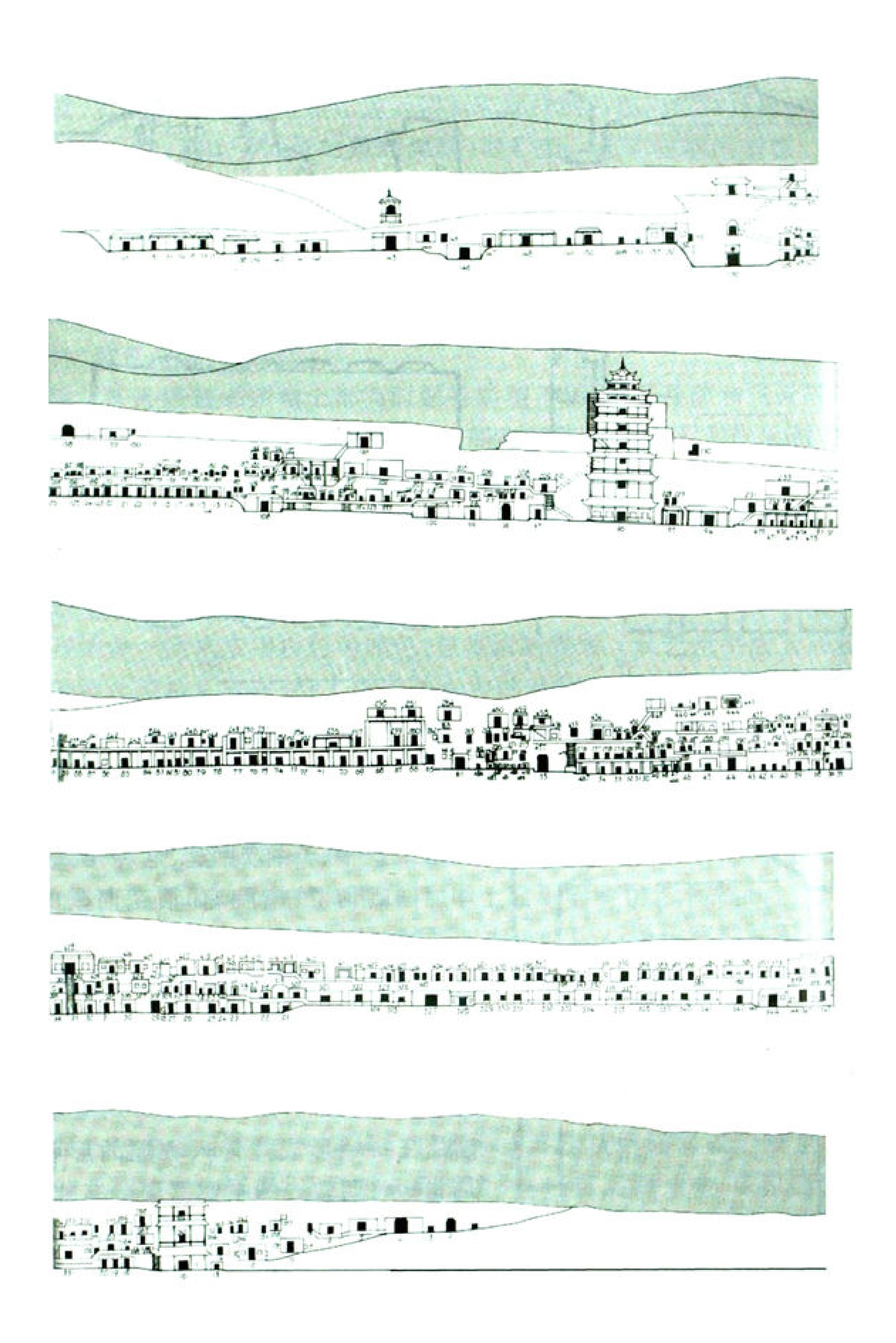


图1　莫高窟洞窟位置图由南至北

敦煌石窟艺术是由洞窟形制即建筑、塑像和壁画三部分组成的形式和内容构成一座石窟的整体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佛教的演化不断变换着格局和题材。莫高窟自前凉建元二年344或前秦建元二年366开凿以来经过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代近千年的陆续修建形成内容丰富、形制多样的巨大石窟群。已经编号的洞窟有492个保存了四万五千多平方米的壁画二千四百余身彩塑按照它们的艺术风格特点可以分为北朝、隋、唐、五代宋初、西夏、元等几个发展阶段[2]。

现存的北朝时期开凿的洞窟有30多个。洞窟的形制有三种一、禅窟图2。主室为方形或长方形覆斗形顶正壁开凿一大龛塑佛像南北两壁凿出两个或四个小禅室供僧侣在里面结跏趺坐修禅观像。这种形式是从印度的毗诃罗僧院窟演变而来的通过西域传入敦煌。二、中心塔柱窟图3。洞窟为长方形中间偏后部凿出方形塔柱直通窟顶四面开龛塑佛像及侍从供僧侣及男女信徒绕塔观像。窟顶前部作“人字披”形后部用平棋顶。这是在西域形成并传入敦煌的形制也是北朝时期敦煌的主要窟形。三、“覆斗顶窟”图4。石窟呈方形顶为倒斗形正壁开龛塑像。这种窟形在北朝晚期出现主要仿自汉晋以来的宫殿建筑形式也叫“殿堂窟”隋唐以后成为敦煌石窟的主要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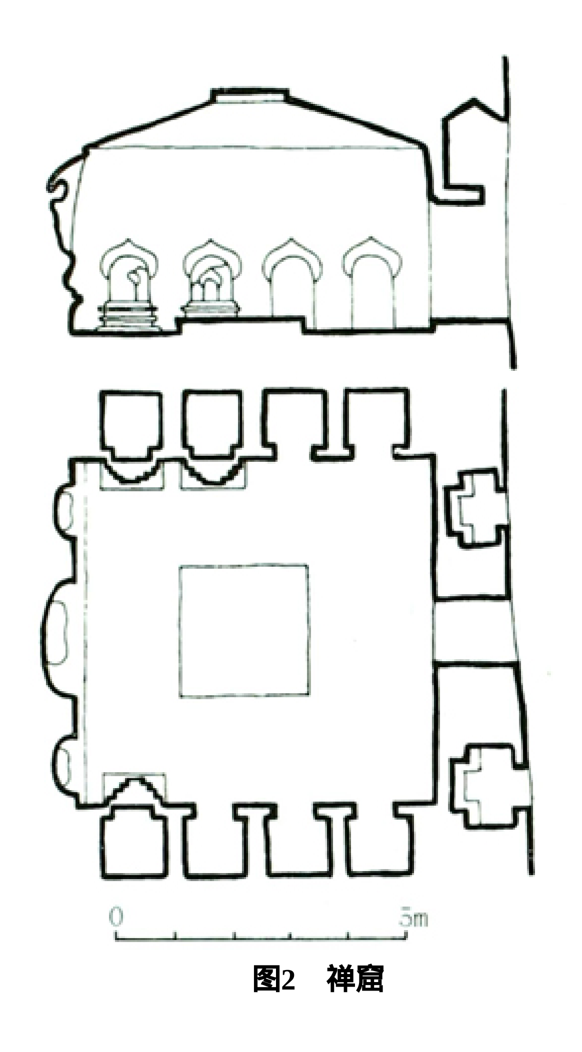


图2 禅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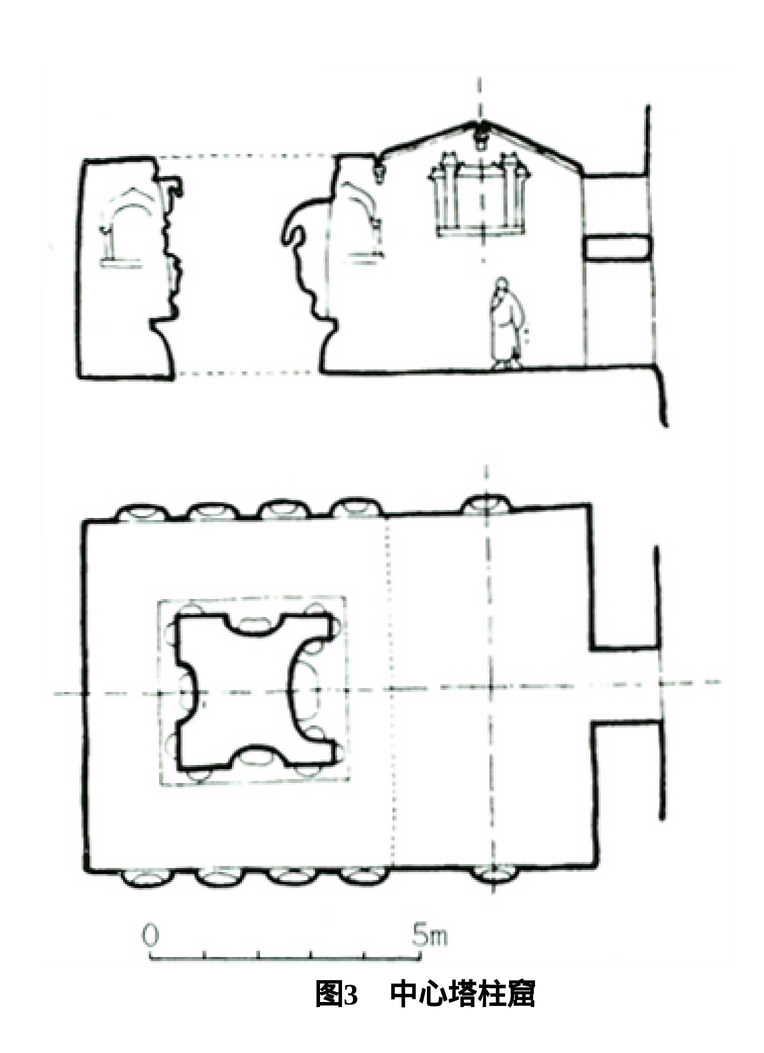


图3　中心塔柱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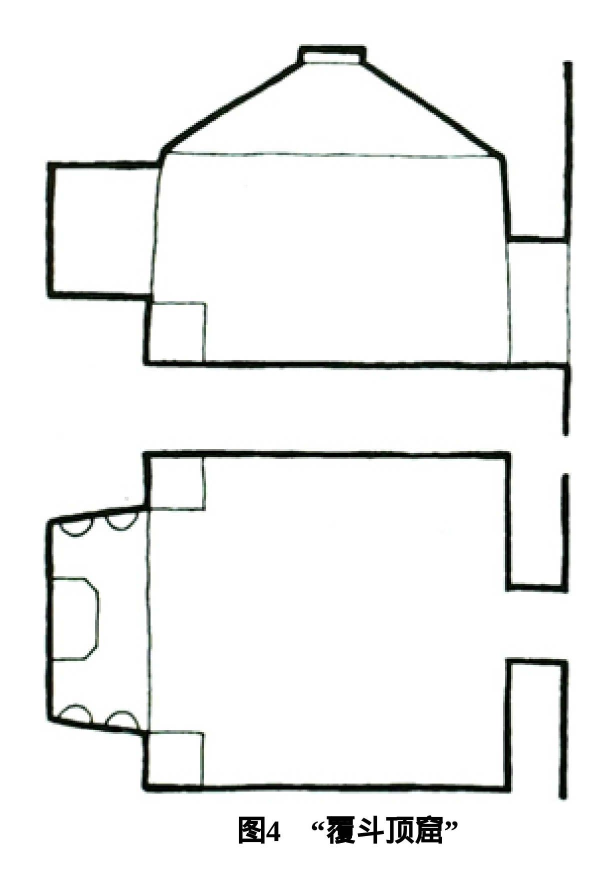


图4 “覆斗顶窟”

莫高窟所在的鸣沙山崖体在地质上属玉门系砾岩层由砂和小石粒胶结而成质地松软不适宜制作像云冈石窟那样的石制圆雕和浮雕。当地的匠师因地制宜制作了大量的敷彩泥塑即彩塑。北朝时期的塑像主像一般是释迦牟尼或弥勒两侧有夹侍菩萨像又有释迦、多宝并坐像、菩萨像和禅僧像等。北周时期出现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一铺的组合像。早期塑像一般具有印度、中亚的简朴风格。北魏晚期随着北魏王室的西来敦煌传入了中原甚至南朝的一些艺术风格塑像脸形消瘦褒衣博带大冠高履追求一种“秀骨清像”的风采。

除了中心塔柱和四壁上部有时贴有影塑千佛、供养菩萨和飞天等像外窟室顶部和四壁一般都绘满壁画。顶部和四壁上部绘天宫伎乐和装饰图案四壁中部位置适中处除某些窟绘千佛外大多绘释迦牟尼生前生后的本生故事或佛传故事如萨埵那舍身饲虎、月光王施头等等以方形或长方形的单幅画面连续成横卷形式的连环画。四壁的下部为供养人像、力士、药叉或装饰花纹。北魏壁画多用土红为底色以青、绿、赭、白等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后来多用白色为底色显得清新雅致。从艺术手法上来看北朝的壁画比较粗犷放达给人以遒劲有力的感觉在

画面中突出人物正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说的“人大于山”的“古人之意”。

隋朝统一了南北佛教在隋文帝、炀帝的支持下迅速发展敦煌莫高窟也掀起了一个造窟热潮短短三十余年洞窟大量增加现在仍然保存的就有七八十个比现存早期200年间所开洞窟的总数还多一倍而且从形式到题材都冲破了北方佛教的局限形成承上启下的隋代艺术特征。

隋代的洞窟形制是对前期的改造和发展。中心塔柱窟的柱子正面一般不再开龛塑像而是在前面设置三尊巨型塑像。一佛二菩萨立像成为洞窟主体中心塔柱退居次要的地位反映了北朝小乘思想主导下个人静修思想的衰落。隋朝还出现了另一种中心塔柱窟中心柱的上部呈倒塔形直通窟顶塔刹四龙环绕象征着须弥山。后来倒塔干脆被取消中心柱变成佛坛。最终连佛坛也不要了敦煌的石窟形式终于从塔庙变成了殿堂。殿堂窟延续北朝晚期的形制除了正面开龛者外还有三面开龛、依壁造像等多种形式这种中国化的建筑形制从隋朝开始成为敦煌建筑结构的主流。

洞窟形制的变化是为了适应群塑和大幅经变画的出现。隋代彩塑继承了北周时开始出现的群像形式在一龛内以佛像为主尊两侧侍立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形成三至七身为一铺的群塑组合。因为出现了凸字形的重层龛口龛内显得宽敞开阔群像不会给人以重叠拥挤的感觉。塑绘技术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摆脱了千篇一律的模式突出了个性的刻画如第419窟皱纹满面的迦叶[3]是其中的代表作。塑像的衣饰、璎珞、背光采用了波斯锦的纹样重彩装金的手法使塑像显得金碧辉煌绚丽多彩。

随着主张累世修行的小乘佛教思想为宣扬顿悟成佛而至极乐世界的大乘思想所取代隋代壁画的布局和内容都有所变化。一般在正壁龛内及龛外两侧画佛弟子及诸天四壁上沿绘伎乐飞天壁画中部主体位置上除千佛外又有说法图和经变画下部画供养人及药叉窟顶为平棋、藻井或千佛和经变。在本生故事外出现了新的经变画而且最终跃居主导地位这是隋代绘画的创新如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等虽然还比较窄小、简单但却为唐代大幅经变画的出现开了先河。隋代艺术从早期的粗犷遒劲走向细腻圆润晕染与素面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取代了传统的叠染对山石背景的勾勒赋彩标志着向写实的山水画的发展。

唐代是敦煌艺术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二百多个。洞窟形制以殿堂窟为主龛形和数量都有变化。后期往往在长方形的主室龛内凿出凹形低坛坛上立塑像。唐朝前期出现了一种大像窟高在30米以上后室为方形正壁为一身石胎泥塑大型倚坐像绕像凿出供巡礼的隧道。唐朝后期又出现了两种窟形一种是在方形的殿堂窟中壁面不开佛龛而在中间设置方形佛坛塑像其上有背屏通顶。另一种是大卧佛窟平面呈横长方形盝形窟顶后部凿出通窟宽的涅槃台其上塑佛涅槃像。

唐代的塑像技术进一步提高所有的塑像都用圆塑的形式前期的浮塑很少见了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或再加二力士的七身一铺或九身一铺的群像成为主要形式。特别是随着唐朝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在武则天延载二年695由禅师灵隐和居士阴祖主持建造了第96窟的"北大像"高达33米。到开元九年721由僧处谚和乡人马思忠主持建造了第130窟的"南大像"高26米。唐代的塑像强调写实追求刻画人物的性格。那些腴肌秀骨、丰满而不显得臃肿的女性化菩萨塑像尤其姱丽悦目。

唐代的壁画内容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经变画成为主流。前期流行观无量寿经变、阿弥陀经变、东方药师变、弥勒经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等后期又出现了金刚经变、金光明经变、华严经变、楞伽经变、报父母恩重经变、劳度叉斗圣变等。还出现了如意轮观音、不空羂索观音等密宗题材。又有与上述题材密切配合的佛教感应故事画、瑞像图等。供养人像已经从北魏时的数寸小像变成二三尺乃至等身高的大像甚至第156窟出现了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夫妇的大型出行图[4]。壁画的内容最清楚地反映了唐朝净土思想的流行民俗佛教的发展。佛教世俗化的结果使供养人的地位提高甚至把世俗统治者的功绩大面积地绘在佛窟内部。在绘画手法上除了敷彩晕染的水平进一步提高外表现中国传统绘画六法之一"骨法用笔"的线描成为描写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经变画的主要技法。第220窟的维摩诘经变中的维摩诘居士[5]目光炯炯奋髯蹙额侃侃而谈的样子使人想起瓦官寺顾恺之所绘的那幅"光照一寺"的维摩诘经变图。

五代宋初是归义军曹氏统治敦煌的时期914—1036属于这一时期的洞窟约100个但其中大部分是利用旧窟改造、重绘而成的。新建的窟不多形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长方形的主室中间设方形佛坛坛上塑像有

背屏连接窟顶窟顶为覆斗形基本沿袭唐代后期的格局。另一种是没有佛坛的覆斗形窟在墙的四角凿小龛绘四大天王像。洞窟甬道顶一般作梯形。在下层的大窟前多建有木结构的殿堂成为前殿后窟的格局。并加修了部分洞窟的木构窟檐和连接上层洞窟的栈道。

这一时期的塑像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在组合上都和唐代基本相同。只是在中原五台山文殊菩萨崇拜热潮传入敦煌后产生了第61窟以文殊为主像的塑像形式可惜原像已毁仅存基座。

壁画的题材和画法也是沿袭唐朝变化不是太大。经变画仍是主要的题材但除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外没有新的内容。佛教史迹画和瑞像图有所增加这和倡言佛法行将毁灭的末法思想在敦煌的流行有关。在五台山文殊崇拜热潮的推动下出现了第61窟西壁的五台山图。此图高近5米长13.5米贯通全壁面积达60平方米是莫高窟最大的一幅壁画。它把五台山周围约250公里内的山川形势和寺塔圣迹缩写了下来有各种人物的活动场面宗教与世俗的内容都非常丰富[6]。曹氏时期的供养人像更加高大一般在2米以上第98窟的像将近3米。另外曹氏时期在整修一些崩毁的洞窟崖面时创造了一种绘在露天的大型壁画并采用细沙调和石灰的类似湿壁画的画法所以历经千年而保存完好。大概是因为与中原往来不便颜料来源不足这一时期的绘画缺少朱红和石青、石绿等色因此色彩显得不够鲜艳。

西夏和元朝的统治共三百多年仍然在陆续修建特别是改建敦煌石窟。在窟形和塑像的改造上没有什么创新。西夏在壁画的题材上没有什么新内容但在构图上却锐意简化经变中的人物几乎和千佛像难以区分构图和人物形象遵循着不变的程式显得呆板而没有生气用色比较冷淡。

元代信奉西藏的密教壁画以密宗曼荼罗为流行的主题内容出现了与汉画风格不同的藏画形式给人以阴森、神秘的感觉。但出于当时汉族工匠之手的密宗绘画其淡色的烘染和兰叶描法都达到了高超的技艺。

二　雕塑艺术

莫高窟的佛教塑像总共有2415尊。从纵的角度看经过一千多年的不断塑造它们形成了一列中国乃至世界都很少见的佛塑长廊。这里的

佛塑有早期犍陀罗艺术风格也有唐代长安和洛阳的肥美风貌。从横的角度来讲它们组成一个佛塑的世界虽然对于佛教形象的塑造必须遵循某些固定的程式如佛的“三十二相”要依样模制但敦煌的塑匠却在狭窄的题材所容许的范围内创造出许许多多各具特点的作品寄托着当地工匠的理想和对美的追求。

敦煌彩塑的主要题材是佛、菩萨、释迦弟子、天王、力士和高僧等上面介绍了各个时代塑像的题材变化和艺术总貌以下将着重介绍一些塑像以集中说明莫高窟佛塑艺术的主要成就[7]。

早期的一种交脚而坐的菩萨像十分引人注目其代表作是第275窟的本尊交脚菩萨像图5[8]。像高3.34米坐方座上座两侧各蹲一只狮子宝冠上有借业力而出现的化生佛像左手施与愿印右手腕处断掉。上半身通肩的天衣作锯齿纹下身裹裙紧贴大腿而隆起的线状衣褶上施阴刻线的手法。这里的衣纹表现方式受到了印度、西域的影响但整个身体的表现手法则和中国传统的汉魏俑的表现手法一致。这种交脚菩萨像一般都认为是即将从兜率天宫降生人间成为未来佛的弥勒菩萨。佛经宣称“弥勒之世一种七收树上生衣随意取用。山喷香气地涌甜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们通过忍辱苦修信奉弥勒可以在“来世”上升兜率天宫享受天国的快乐。莫高窟交脚弥勒菩萨塑像的本尊地位正是北朝时期中国西北地区弥勒菩萨信仰兴盛的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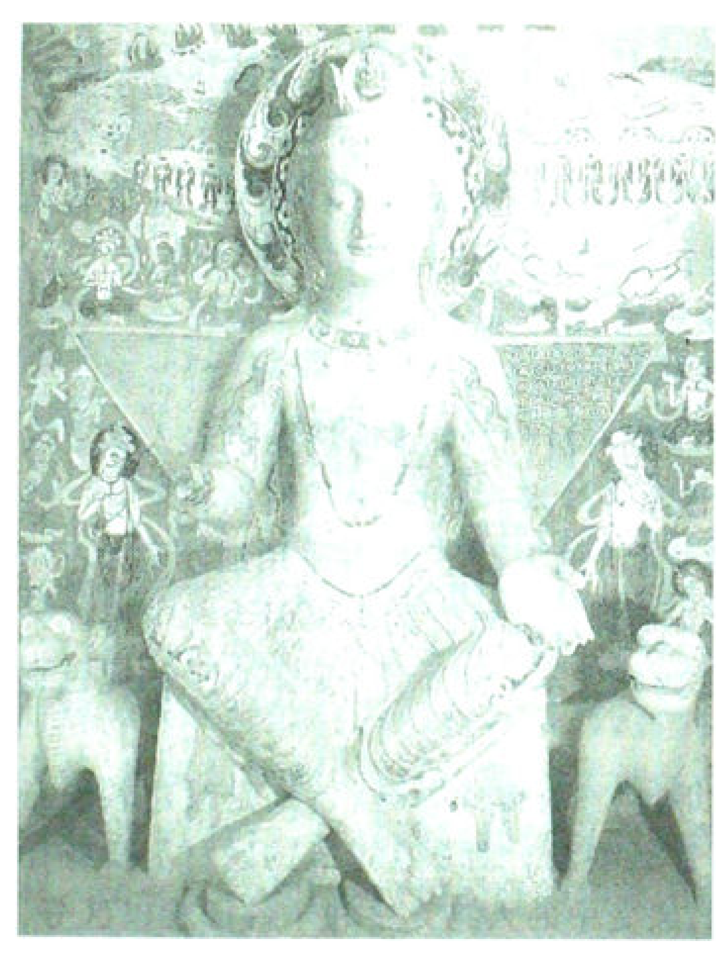


图5　第275窟交脚菩萨像

现世的佛释迦牟尼像是洞窟中最重要的礼拜对象也是雕塑家精心刻画的中心形象既要表现出佛的庄严高大又要流露佛的仁爱慈祥。第259窟北壁下层北朝时期的坐佛图6[9]肉髻高耸额头宽大两肩两肘舒展自然姿态雍容大度表现出佛的宁静和庄重。另外雕塑家通过对嘴角的精心细腻的刻画使面部含笑而情不外露佛的庄严中又包含了一种仁慈的情态表现技巧极其高超。



图6　第259窟北壁坐佛

第328窟西壁龛内居中的坐佛图7[10]是盛唐时期712—786塑像的代表作之一它高2.19米肉高髻螺发细微而且刻痕深脸为椭圆形弧长的描眉修长的眼睛方正的鼻子弯曲的胡须纯厚的嘴唇。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抚膝威严端庄显得浑重有力。但衣纹柔软特别是紧贴莲座的衣襟露出底下一片片莲花的挺实就像真的一样加上颜色的处理更是灿烂多彩。



图7　第328窟西壁龛内坐佛

唐朝初期虽然统治阶级极力扶持道教但是佛教的势头仍不可抵挡在地方上佛教的地位一步一步地上升佛教的造像也日渐增大加高。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到武则天崇佛的浪潮来临时敦煌出现了高达33米的大佛像即第96窟的“北大像”[11]。高大的佛像占据了整个洞窟窟前建有

楼阁可以供人在近处观看佛的慈容。可惜因为近代作了补修加色不免有些失真但丰满的脸庞刻成波浪纹的肉髻都还可以看出一些旧时的风貌。这座延载二年695建造的大像和武则天出资助建的洛阳龙门奉仙寺大佛的表现手法极为相似因此可以认为这座大像的兴建和武则天上台后大力弘扬佛法让全国各地建寺造像有关它表明中原的雕塑样式强烈地影响了敦煌。

开元九年721建造的第130窟“南大像”[12]高26米洞窟进深仅10米所以塑匠利用西壁断崖的砂砾岩先凿出内胎再敷泥塑成。塑匠们有意加大头部的比例而且把五官的起伏也加以夸张这样既可以利用光影的效果使面部显得十分清晰也使站在下面仰视的人能看清细长的眼睛和眉毛有棱角的嘴唇和丰润饱满的双颊使佛的尊容显得更加威严和慈祥。

除了站立或倚坐的主尊像外中晚唐时出现了表现释迦牟尼佛涅槃相的卧佛塑像。涅槃简言之就是死亡的另一种说法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佛在经过80年的教化众生之后于中天竺国拘尸那城跋提河畔的娑罗双树下用了一天一夜说完《大般涅槃经》夜间“右胁而卧汨然大寂”。佛的圆寂并不如同一般人的死亡它是对生、老、病、死等各种苦难以及它们的根源即各种烦恼的彻底断灭涅槃是佛教所讲求的所有修习应该达到的最高理想。第158窟的大卧佛像就用高超的艺术手法表现了右胁而卧的释迦涅槃相[13]。佛的螺髻整洁神情安详表现了内心的安静丰满的面部微含笑意丝毫没有世间凡人临终时的痛苦和悲哀就好像一位慈祥的哲人正舒适地入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卧佛背后弟子信徒们种种悲痛欲绝的形象。这些举哀弟子有的用壁画表示有的用塑像表现但现存的塑像多经后人的装修早已面目全非。敦煌研究院的陈列馆中还保存着几块保持旧貌的举哀弟子残塑头像有的强忍着巨大的悲痛有的号啕大哭有的默然无声表现出悲痛、惋惜、无奈、迷惘的各种神情。如果说158窟涅槃像是刻画内心世界的代表作那么这几件举哀弟子的残头像也可以说是在表现各种人物个性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菩萨是心入佛道的众生佛经中常提到的菩萨有文殊、普贤、观世音、大势至等艺术家们塑造菩萨像要较塑造佛像自由得多因此也就更能表现他们的艺术才华。

北朝后期的塑像和早期的交脚菩萨像已有区别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从中原传到敦煌莫高窟使西域风格的佛教形象渐渐中国化。第428窟北周时塑造的菩萨像[14]脸形变圆额头变窄两颊显得丰满口鼻显得小巧虽

然身体上下比例不当手脚也还没有做细微的刻画但姿态优雅呈现出少女般冰清玉洁的姿容特别是通过嘴唇的细微变化眉眼的微妙动作表现出内心宁静、安详的姿态给人以一种女性特有的温柔和美丽的印象。

唐朝的写实风格和对崇高、美好理想的追求在唐代菩萨造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产生了一大批风格秀丽典雅的作品。其中的杰作之一就是第328窟的胁侍菩萨图8[15]。菩萨一腿盘在莲座之上另一腿从座上自然垂下即所谓“游戏坐”。面部俊秀双眸低视表现出沉静和对世上众生的关怀。上半身肥瘦适中裸露的肌肉在柔和中有适度的紧张身上的璎珞、彩带等装饰华丽鲜明谨严的造型使得塑像庄严而不落俗套体现了菩萨的深沉和智慧。这尊造像不仅是敦煌莫高窟彩塑中的代表作也是整个唐代的雕塑艺术杰作之一。第45窟西壁龛内的胁侍菩萨图9[16]也是艺术家对美的追求的集中表现。头部向右略微倾斜面带微笑。全身重心落在一只脚上腰部微扭使全身变成“S”形加以洁净的皮肤华美的衣饰俨然一尊亭亭玉立的少女秀美多姿妩媚可爱好像举步就能走出宗教世界而回到人间一样。



图8　第328窟胁侍菩萨



图9　第45窟胁侍菩萨

唐代的供养菩萨像也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地。第328窟龛内胡跪的供养菩萨图10[17]身体比例合适面部、身体等每一处刻画都十分细致特别是通过文静的面部所表现的内心的虔诚俨然是一个佛教精神的结晶品。目前我们在莫高窟328窟中只能看到西壁龛内北侧的一尊供养菩萨

与之对称的南侧一尊早在1924年就被美国人华尔纳盗走现藏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专门研究东方艺术史的华尔纳从数千尊塑像中选中这尊供养菩萨像也说明了这尊塑像的强大艺术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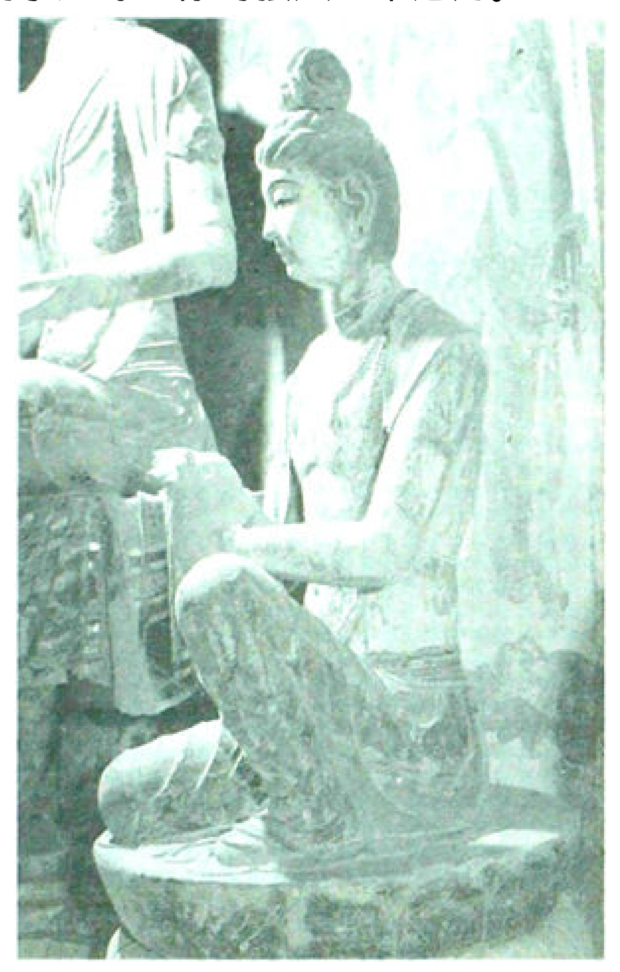


图10　第328窟龛内供养菩萨

更讨人喜欢的大概还是第384窟龛内北侧的盛唐供养菩萨像图11[18]。她的发髻高耸眉眼修长双颊丰满而不过分躯体柔和而不造作双手合十眸子凝视这里跪着的好像不仅仅是一尊供养菩萨而且还可以说是一个虔诚祈祷的美丽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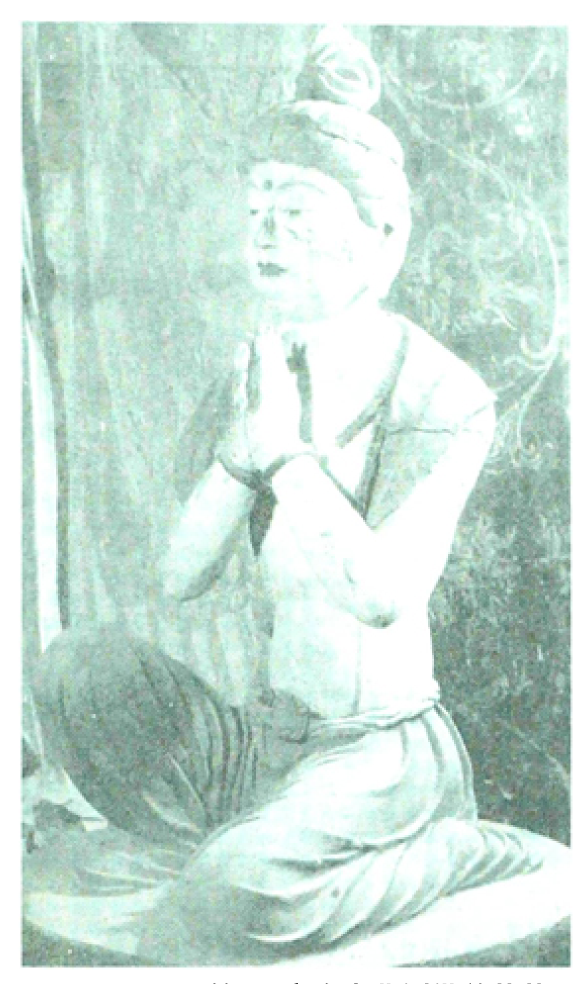


图11　第384窟龛内北侧供养菩萨

与旁边站立的妩媚多姿的女性化菩萨相比立于本尊两侧的佛弟子迦叶和阿难则是艺术家对男性的刻画而两者又各具特征。迦叶以常修头陀苦行著称号“头陀第一”塑像也真切地表现出他的这种精神面貌。如第419窟西壁龛内的隋代迦叶像图12满脸皱纹双眼深陷张口露出残缺不全的牙齿颈肩的瘦骨和简单朴素的袈裟十分形象地刻画出一个饱经风霜、苦行磨练的胡僧形象。此外如第328窟、第45窟盛唐时的迦叶[19]虽然有各自的个性特征但整个形体的结构和高度写实的技巧表现出他被誉为“头陀第一”的品格。释迦牟尼佛的另一位大弟子阿难聪明伶俐乐观恭顺因博闻强记被称作“多闻第一”。隋代开凿的第427窟中心柱西向龛内北侧的阿难像[20]塑造出一个颖慧俊秀的少年弟子的形象光光的头顶显示出智慧沉静的面部表情表现了聆听释迦说法时的专注与谦恭。另外第328窟和45窟盛唐塑阿难像[21]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杰作第45窟青年阿难的面部刻画细致入微图13在倾心听法的文静表情中透出一丝

会心的微笑好像他纯真至极的表情里面蕴含着不知多少佛教的哲思这是给青年的僧人们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迦叶和阿难的塑像是莫高窟彩塑中最具个性特色的人物形象。



图12　第419窟迦叶



图13　第45窟阿难

天王和力士是佛教的守护神他们的使命是叫各种恶鬼不得侵害佛教天国。唐代塑造的天王形象艺术造诣极高与菩萨像表现的女性的优美相反它夸张地表现了男性的刚毅和力量。天王像一般是身穿盔甲腿裹行縢脚着毡靴攒拳怒目显示出武士的威严、勇猛、正直、坚毅的性格。天王有汉式天王如第46窟四壁龛内北侧像图14〔22〕有西域胡式如第322窟四壁龛内北侧像〔23〕这是唐朝统一西域并努力保持西域领地的反映也是当时汉蕃兵将共同战斗在西域的艺术展现。力士往往裸露上身艺术家对于裸露的部分作了合理的夸张使肌肉凸起青筋暴露两眼圆睁架式威猛显示其蕴藏内部的力量随时都可以迸发出来扫除邪恶主持正义。



图14　第46窟四壁龛内汉式天王

晚唐时大部分塑像由于程式化的倾向而显得呆板值得一提的是第17窟中高僧洪䛒的真容塑像[24]。像高0.94米结跏趺坐作禅修像身穿水田袈裟通肩裹体面部刻画细致写实表现出庄重矜持的神情。简洁的造型真实地显示了这位高僧的深悟意境是细腻刻画人物性格的佳作。洪䛒去世前是总管包括莫高窟在内的归义军一十六所寺及三所禅窟的河西都僧统他死后塑造的这身真容像应当出自当时敦煌境内最高超的匠师之手。

三　敦煌壁画

如果说塑像是一个洞窟的中心那么壁画就是洞窟的主体内容它的题材广泛场面宏大天上人间过去未来包罗万象美不胜收。总面积达45000平方米的壁画如果按自身高度一字排开有30多公里长不要说细细地看就是坐上汽车扫一眼也要一个多小时。这里的介绍只能就其中最主要的内容简单地谈一谈。

1佛说法图

早期洞窟的显著位置都绘有说法图是描写世尊在苦行六年后向弟子说法的情形。佛趺坐或站立中央手作“说法印”手势佛头有项光身后有火焰头上有幢幡宝盖两旁侍立佛的大弟子迦叶和阿难。再外面一层是胁侍菩萨根据不同的佛经本尊和菩萨的名目也不同。如依《华严经》就以毗卢舍那佛为本尊以文殊、普贤为左右胁侍二菩萨分掌“德”、“智”二门。如依《阿弥陀经》则以阿弥陀佛为本尊以观音、势至为胁侍二菩萨分别主“悲”、“智”二门。早期说法图佛比菩萨要大一倍用来表示尊崇菩萨像上有飞天舞动翻飞。隋代说法图各尊像的比例渐趋自然飞天也更为活泼可爱与空中的花饰相映成趣。但随着唐代气势恢宏的经变画的出现说法图渐被取代或进入净土经变中成为经变画的一部分。

2佛传图

释迦牟尼佛的图像除说法图外还有连续性的佛传图。佛传大小乘的解释不同主要有八相即下生、入胎住胎、出胎、出家、降魔、成道、初转法轮、入涅槃叙述释迦成道行化的主要事迹。敦煌壁画的佛传图以第290和第61窟保存的比较完整它们是根据汉译佛典《修行本起经》、《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普曜经》等的内容敷演而成的第290窟总共有87个画面分上中下三栏绘在主室前部人字披形窟顶的东西两斜披[25]。第61窟的则分作33扇屏风画在主室南、北壁后半段和西壁下部[26]。

佛传图的主要画面和情节如下佛由燃灯佛护送从天而降乘白象入母胎。国王夫人同时梦见有乘白象菩萨入胎。占相者说此子生下当成佛国王欢喜。十个月以后四月八日那天摩耶夫人出游兰毗尼园攀无忧

树枝太子从右胁降生。太子初一坠地向十方各行七步右手指天说“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三界皆苦吾当安之。”每步均生莲花。天空中天人散花奏乐九龙吐水为太子浴身。母子还宫国王出迎。太子长大成人后见人间生、老、病、死各种苦难闷闷不乐意欲出家。国王命令严加守卫宫城内外以防太子出走。于是太子乘马逾城离宫由夜叉开道天人导引而行。太子落发出家四处访道最后入山中苦行在尼连禅河中洗澡诸天散香花遍于河中。魔王波旬听说菩萨来到境内命令诸魔女往菩提树下以绮言妖姿诱惑释子但菩萨不为所动。魔王又令夜叉用山石、兵器并毒蛇、恶火等进攻菩萨又被菩萨眉间放出白毫相光破灭魔众伏地。降魔是佛传图中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如第428窟北壁降魔图[27]释尊左手执袈裟一角施降魔印右手抚膝结跏趺坐。左右立魔王及男女魔众背光后也有手执毒蛇、弓箭、刀、杵作攻击状的群魔场面极为动人。菩萨成道为佛后为众生转大法轮。经传道说法终至涅槃。第158窟中唐绘弟子及各国王子举哀图[28]有的举刃自残有的抱头痛哭胡僧梵相表情极其生动。印度、西域佛传图还有再生说法和八王分舍利一节敦煌则绘出八方起塔供养舍利作为终结。敦煌的佛传图由山水切隔成连环画式的一个个画面形象地展现了佛的一生内容之丰富、完整应是首屈一指的。

3本生图

在早期的佛教经典中吸收了许多印度古老的民间寓言和故事颂扬释迦牟尼在降生于净饭王家为太子之前就已具有悲天悯人的伟大人格他终成正果是因为积善历劫多世的报应。这些释迦牟尼在前生相传有500年积行善业的故事叫做阇陀伽Jataka即本生故事。根据集录这些故事的《本生经》所绘的本生图是对佛的善行的形象模写比文字更能感召凡人。

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中多绘有本生故事画。常见的有尸毗王本生、月光王本生、九色鹿本生、睒子本生、善事太子本生、须大拏本生等等。现在选取其中的一种本生图简述之以见一斑。

第257窟西壁九色鹿本生[29]采用汉代画像石的横卷形式从两头开始中间结束描绘出八个场面图15。佛经说有一人坠入水中将被淹没在水中挣扎呼救正逢菩萨化身的九色鹿路过水边闻声而至不顾安危跳入水中将溺人驮上岸来。溺人愿作奴仆以谢救命之恩鹿只请他不要泄露自

己的住处溺人应诺而去。当时这个国家的王后梦见一鹿身毛九色双角如银想剥取鹿皮作衣。国王于是悬赏捉鹿溺人见利忘义密告国王鹿的住处。国王率兵入山捕鹿四面合围鹿无处逃脱走到王前揭露溺人贪图富贵出卖救命恩人。国王以鹿有功于人放鹿归山下令全国禁止捕猎九色鹿。溺人也得到报应周身生疮。王后则因阴谋未逞恚愤而死。九个画面都是选取的关键情节特别是溺人告密的场面最能表现人物的神情。那个侧身依偎在国王身边的王后回头看着跪在宫门外的溺人右臂撒娇地搭在国王肩上食指翘起在国王肩上扣打长裙下露出光脚晃动着翘起的拇指。这些生动的细节刻画深深表露了她促使国王加害九色鹿的内心活动。而正义的九色鹿却一反佛经中“长跪问王”的原形昂然挺立在国王面前控诉溺人的丑恶行径——这里倾注了画家强烈的感情。本生图是人们对那些超乎常人的自我牺牲的菩萨圣行的歌颂这在月光王以头施人、萨埵那太子以身饲虎等故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它们内容通俗易懂情节生动有趣对佛教的教化、传播、普及作用极大因此在北朝洞窟中数量很多内容多有重复但情节、景物和表现技巧方面又有所区别形成各个时期的不同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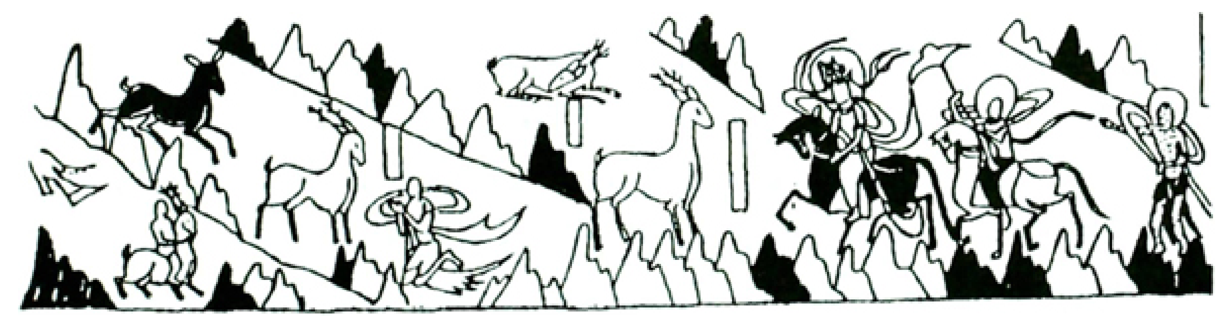


图15　第257窟西壁九色鹿本生局部

4菩萨图

　　菩萨最早是作为佛的胁侍出现在壁画上的随着佛教向世俗化、民间化发展一些菩萨的地位日趋重要终于单独成铺受大众供养。如果把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藏经洞出土的绢画合起来看重要的菩萨像有文殊、普贤、观音、大势至、地藏和引路菩萨。其中文殊、普贤是释迦三尊中的左右胁侍文殊骑青狮居左普贤乘白象居右在所有菩萨中地位最高。文殊的悟道和普贤的行愿是入佛的二大法门所以在唐代华严宗、净土宗并盛的情况下二者也同样成为壁画的主要题材。

开始文殊、普贤多是左右对称出现绘于洞窟西壁龛外帐门两侧。中晚唐时期规模逐渐增大而且出现了牵狮驯象的“昆仑奴”。与此同时清凉山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的说法日益流行。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宰相王缙在五台山建金阁寺五台山佛教益盛文殊在此显灵说法的声名远扬吐蕃、新罗、日本、渤海等四方各国的僧侣络绎不绝地前来瞻礼。到五代后唐同光二年924五台山文殊崇拜之风也随着沙州归义军曹氏政权的使者首次入京朝贡而传入敦煌。同光三年925三月二十五日归义军节度押衙翟奉达请人根据中原传来的画样在自家的窟中绘制了一幅引人注目的“新样文殊”像图16[30]。所谓“新样”就是突出文殊菩萨的重要打破以前文殊、普贤对称出现的惯例使文殊单独出现。画面上文殊菩萨正面端坐在青狮之上手执如意面目端庄。前面为善财童子捧物相迎左面的牵狮人由胡装的于阗国王换下了昆仑奴于阗王头戴红锦风帽身穿四楑衫朱红袍足登毡靴手握缰绳叉开双脚作牵制狮子前进状。狮子则回首怒吼与之呼应。人和狮子均为五色祥云所托。这幅出自曹氏归义军画院所属画师之手的新样文殊线描流畅晕染也处理得比较好加上后来被宋代壁画覆盖住直到1975年才重新揭露出来所以保存完好不失为莫高窟晚期的成功之作。这幅新样文殊中文殊菩萨的单独出现和于阗王换下昆仑奴等反映了敦煌地区文殊信仰的兴盛和与中原、于阗等地文化交往的情况。新样文殊后来还在敦煌雕成印板广泛流传。在这种背景下才有曹元忠统治时期944—974莫高窟第61窟文殊堂的开凿[31]。



图16　第220窟“新样文殊”像

5经变图

隋唐时期也就是敦煌莫高窟的最盛期由于大乘佛教的广泛流行大乘佛典的艰涩难懂的文词已不适应一般俚俗大众的需要于是产生了用于俗讲的讲经文和在民间演唱的变文。它们散韵相间文字通俗语言生

动更易于传情达意。与之相辅而行的是“变相”。“变相”是把佛经中可以表现的内容用绘画的方式表现出来绘在墙壁上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莫高窟看到的壁画绘在绢幡上的就是藏经洞出土的绢画或者幡画它们是在俗讲时挂在梁柱上的。

从唐代开始经变画大盛占据了洞窟中的主要壁面由于佛教宗派的不同各个时代流行的佛教思想不同反映到壁画上就使得经变画种类繁多花样翻新。有法华经变、维摩经变、弥勒经变、药师经变、阿弥陀经变、观经变、华严经变、地狱变、金刚经变、楞迦经变、金光明经变、报恩经变、报父母恩重经变、天请问经变、劳度叉斗圣变等等这里只选取最重要的变相图做简要介绍。

佛本生故事主要宣示佛的人格之伟大佛传故事则宣扬佛的苦行和法力。这些渲染虽然神妙但佛与人终究是对立的。大乘净土宗以法门传入人心使人们都去追求而达到净土世界与诸菩萨一起修行这样人的一生即使常苦却能在死后忘却一切污秽的世事找到欢乐的归宿。这一说教切合民心因而从唐代开始净土宗在民间最为盛行敦煌壁画也以净土经变最多。达到净土世界有多种修持方法弥勒净土说要求人们念佛以修来世的福业东方药师净土说则是用念佛来消灾延寿以修当世的福寿而阿弥陀净土说则是用念佛来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种说法虽然不同但经变的表现形式却有相似之处。

莫高窟第220窟南壁的阿弥陀变[32]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铺。图中所绘西方极乐的净土有八宝池池中以金沙布地莲花盛开阶道以金银琉璃合成楼阁由金银玛瑙为装饰树上的花果也是珠宝缀成百乐齐奏舞伎随着节拍翩翩起舞形成光怪陆离的道场。阿弥陀佛结跏趺坐在池中央莲台上观音、势至二菩萨胁侍左右四周天人眷属围绕充分表现了“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西方净土世界。

第220窟北壁绘的是与南壁西方净土变相对的东方药师经变[33]。画面主体是七身药师佛手执钵、锡杖或数珠两旁有日、月光菩萨及诸圣众、十二神将空中有天花飞舞前置灯明台两侧皆有灯树重楼虹桥之外是规模宏大的乐舞场面两边是乐队中间两对舞伎胡腾飞舞与阿弥陀净土同一匠心。

弥勒经变有上生、下生两种上生经讲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为天人说法。从隋代开始一般用单幅形式绘于窟顶人字披或平顶。主要描绘弥勒坐兜率天宫大殿两侧层楼中有伎乐楼侧为天人听法构图比较简

单。下生经主要是说弥勒菩萨降世为佛度众出家以及弥勒净土的丰盛太平。唐代以后上生、下生多绘于一图以下生为主如盛唐时的第445窟北壁弥勒下生经变[34]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弥勒居中而坐两旁是法华林菩萨和大妙相菩萨及众菩萨、弟子、天人下部中间为穰佉王施七宝两侧绘穰佉王及后妃、太子、大臣、彩女等剃度出家又有婆罗门拆幢、龙华三会等情节以及弥勒净土的一种七收、树上生衣、路不拾遗、女人五百岁出嫁、老人入墓等等内容十分丰富并且从现实生活中吸收了不少内容如一种七收就描绘了耕田、播种、收割、扬场、入仓等农业生产全过程还有婚丧嫁娶等许多生动的画面为今天了解当时下层劳动民众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形象的参考资料[35]。

以《妙法莲华经》为依据的法华经变在唐代前期形成了它的巨型完整结构成为敦煌壁画中画面最繁、变化最多的一种。它的构图形式不一有的以佛和《序品》内容为中心在四周环绕各品的故事情节有的则单独成幅如从《观世音普门品》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观音经变。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第217窟南壁《化城喻品》中的山水人物画图17。佛经中在解释《法华经》宣扬的“一佛乘”时举了个“化城”的故事说一群人到远方求宝至一险恶无人处因疲惫已极而产生了退还的念头。于是有一位“强识有智慧”的导师采用“度脱”众生的方便法门变化出一座城来其中有楼台亭阁流水园林让众人休息。众人进城后又产生安稳下来的想法于是导师把城化灭告诉众人这只是暂时休息之所应继续“勤精进”而共同到达宝物所在之地。画面上河水蜿蜒曲折伸向天边山峦重叠耸峙使道路回旋宛转在山间盆地画出一座西域风格的城廓行人们三五一组被自然地分散在山间表示故事中不同时段的情节有的骑马缓行有的驻马歇息有的策马奔向化城这些不同场合的画面在同一空间里被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一幅完美的山水人物图[36]。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法华经变中看到行船、战争、刑法、盗贼、医疗、宅院、宝塔等多种多样的生活场面和富有特色的景观[37]。



图17　第217窟南壁《化城喻品》中的山水人物画

敦煌壁画中的维摩变是根据鸠摩罗什译本《维摩诘所说经》绘制的主要表现的是《文殊师利问疾品》也就是《维摩经》的核心部分[38]。其大概情节是在毗耶离城有一位居家信佛的大居士名叫维摩诘精通大乘佛教哲理而且能言善辩。时在家装病释迦牟尼知道后派十大弟子、四大菩萨前去问疾可谁都怕被他驳倒而不敢去最后只好派智慧最

胜的文殊师利菩萨前往。于是文殊在前往听法的众菩萨、天人的簇拥下进入毗耶离城。莫高窟在隋代即已出现维摩变但画面很简单。自唐贞观年间627—649开始维摩变的规模变得宏大起来如第220窟和盛唐时期的第103窟都是以窟门为界把“维摩示疾”和“文殊来问”分别画在东壁南北两侧使画面宽阔可以比较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形象。如第220窟的维摩诘[39]手握羽扇凭几而坐虽然面部略带病容但身体向前微倾目光炯炯咄咄逼人朱唇方启洁齿微露神思飞扬胡须奋张可以说是一幅传神的肖像画佳作。而对面的文殊则从容就坐举止端庄神态自若与慷慨激昂的维摩诘形成对比。与此构图基本相同的第103窟维摩变[40]在艺术手法上着力于线描大概正是盛唐著名画家吴道子首创的“落笔雄劲傅彩简淡”的新画风。值得一提的还有第220窟文殊像下的帝王图图18图中汉族模样的皇帝头戴冕旒身着衮衣一副中华帝王衣冠在大臣、侍从的簇拥下高视阔步器宇轩昂与传世的唐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历代帝王图》相比毫不逊色。



图18　第220窟帝王图

在晚唐流行的经变中最富戏剧性的要数劳度叉斗圣变了。因为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了《降魔变文》的抄本所以知道这种经变画是根据变文绘出的而不是直接来自某种经文[41]。经变画在变文渲染的购园波折和斗法的紧张气氛之上进行了艺术形象的再加工创造出宏大感人的画面其中以第9窟和第196窟的两幅保存比较完整。故事的经过和主要场景如下舍卫国大臣须达为爱子求婚而至王舍城大臣护弥家不期遇佛皈依佛法立志于舍卫国为佛立精舍佛派舍利弗与之前往择园建舍。六师外道劳度叉闻后要求国王允其与佛家比试法术以性命作抵押。画面除在下部分散表现了上述场景外主体是舍利弗升狮子座于东劳度叉居宝帐中于西相对斗法。劳度叉先化出一山被舍利弗化出手执金刚杵的金刚力士击碎劳度叉化作一头水牛舍利弗化作狮子咬牛颈项血流满地劳度叉化作七宝池舍利弗化作六牙白象以鼻吸干池水劳度叉化作毒龙推波作浪舍利弗化作金翅鸟啄龙眼目劳度叉化作夜叉鬼舍利弗化作毗沙门天王执枪托塔恶鬼跪地求饶劳度叉化作一树枝叶繁茂舍利弗化作风神持风囊鼓风大树连根拔起草木随风而倒烈火顺风烧向劳度叉的阵营只见劳度叉的帷帐倾斜宝座摇摇欲坠慌乱的外道徒众拽绳打桩攀杆系索扶梯支帐但双足离地有的已被狂飙吹得满地乱滚欲止不能。劳度叉目瞪口呆举止失措。外道阵营一片混乱相继投降剃发出家皈依佛法。画家在这里巧妙地调整了《变文》的斗法次序用狂风席卷劳度叉阵营作最后一个回合扩大了“风树之斗”的场面可以说是创造性的发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6瑞像图

除了上述几类壁画外还有一些画面较小却很有价值如佛教史迹画和瑞像图特别是瑞像图在一所洞窟中有着其他壁画所无法取代的功用。

瑞像图主要流行于晚唐、五代、宋初的洞窟中它们被彩绘的位置除第220窟已毁的一组绘在主室南壁外几乎全都画在特定的部位即甬道顶部南北披、主室覔顶四披等令人仰望谛视的部位。瑞像图的总数大约有三十余幅这些瑞像大多是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西域特别是于阗、中原等地显示灵迹的形象如第237窟就有佛在毗耶离巡城行化紫檀瑞像、观世音菩萨于蒲特山放光成道瑞像、于阗媲摩城中雕檀瑞像、中

天竺摩诃菩提寺造释迦瑞像、迦叶佛从舍卫国腾空而来于阗固城住瑞像、陈国圣容像、分身瑞像、于阗海眼寺释迦圣容像、于阗坎城瑞像、酒泉郡释迦牟尼瑞像、中天竺波罗奈国鹿野院中瑞像、盘和都督府御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天竺国白银弥勒瑞像、摩揭陀国须弥座释迦并银菩萨瑞像、中天竺摩迦陀国放光瑞像等等[42]真容和具有放光、飞来等灵异正是瑞像区别于其他诸佛像而成其为瑞像的条件。这种具有固定形式的显灵瑞像其功用不仅仅像一般说法、本生、佛传、经变画那样是为了宣扬佛教而主要是在佛教末法思想开始传播敦煌及其周围地区战乱相寻社会动荡不安的形势下着眼于用灵瑞来护持日益受到各种威胁的佛法并且庇护统治阶级和僧俗徒众的利益[43]。瑞像虽然构图简单而且程式化严重但它反映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使人们对佛教思想的发展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加深了认识也为佛教图像学提供了一批标准佛像是绘画史的宝贵资料。

四　石窟装饰图案

敦煌石窟中的图案是把洞窟建筑、塑像和壁画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它们衬托出作为石窟主体的塑像和壁画同时也独立存在成为敦煌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壁画和塑像相比图案的描绘限制较少可以使艺术家未得施展的技巧在这里充分表现因此敦煌的图案纹饰多变纷繁复杂并且历久不衰不断吸收新的营养创造新的形式[44]。

图案主要用于装饰窟顶的人字披、平棋或藻井、龛楣、佛背光以及各处边缘部分所用的花纹形式多种多样有团花、半团花、联珠、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葡萄纹、回纹、棋格纹、几何纹、彩铃、帏幔、流苏、山、云、各种卷草、孔雀、鹦鹉、三兔、飞天、舞童等等。

早期中心柱窟的前部窟顶起脊成人字形斜坡在坡内用土红作椽柱而间隔出若干长方形格绘制图案其中以忍冬、莲花为主穿插各种禽鸟如孔雀、猕猴、鹭鸶、双鸽等又有散花或奏乐的飞天、伎乐天姿态窈窕仪容柔雅颇具韵味。

早期另一种窟顶是在中心柱的四周用花边分成若干呈棋盘式的正方形格每格绘一图案称作平棋图案。这种图案一般是中心画莲花、水

涡纹四角有忍冬、莲花、飞天、伎乐、火焰等。早期图案色彩为青、绿、黑、赭、白色调偏冷但简朴大方。

仿自中国古代屋顶建筑结构的藻井是隋、唐以后窟顶图案的主要形式。在下大上小的倒斗形窟顶上所绘的藻井图案总共有四百余幅是敦煌图案的代表。每个时期的藻井图案各有特点就是同一时期的不同藻井也不完全相同一般来说藻井的中心绘一朵盛开的大莲花在五彩的色轮上用白色短弧线描绘出莲瓣使莲花既具有立体感又好像是在色轮上自由地旋转。外围四周围绕着石榴纹、葡萄纹等边饰四面垂华幔饰彩铃重萼复瓣有的达六七层之多花形结构饱满色彩用石青、石绿、朱砂、黑白等交错其间相互映衬显得鲜艳绚丽且层次分明富丽堂皇。有的藻井图案在莲花外绘四身飞天以飘着彩云的蔚蓝天空为背景环绕莲花嬉戏、散花。再外一层是数身伎乐飞天载歌载舞吹奏乐曲增加了音乐的旋律和舞蹈的节奏感。

藻井的画面大使艺术家对花草的每个细部描写都能畅尽其意也使各种花卉的美能全部展示出来如在藻井的边饰中可以见到低垂宛转的花朵昂扬向上的花蒂含苞欲放的花蕊剖形露籽的石榴曲折缠绕的花枝千姿百态的花瓣可谓繁花似锦。

在每座佛龛的上部都有一块弓形的装饰空间称作龛楣图案。龛楣的上沿是代表佛光的火焰纹中间尖突形状就像菩提树叶。下沿沿龛口浮塑出隆起的龙身和鱼鳞纹有的则平绘出龙、鱼纹两端塑龙头或螭首有的则用忍冬花。早期的龛楣图案在“坐禅苦修”的佛教思想支配下往往绘一幅装饰性的苦修图佛龛顶部作为供僧侣在山中打坐参禅的庐庵中间绘五色火焰、莲花纹、忍冬纹和各种动物、化生童子、伎乐天等。隋代时龛楣加大而且强调火焰用熊熊燃烧的火苗组成的火焰纹构成尖顶状的龛顶气势逼真。龛楣内部以化生童子为中心两侧用忍冬纹、莲花纹、火焰纹等陪衬。加上用黑、青、绿、红及金色等重彩涂染描绘使画面颜色浓郁、鲜丽生气勃勃。

佛教传说佛和菩萨甚至某些高僧可以放出神光表示他们的法力和威仪。神光在头后称“头光”或“项光”在身后称“背光”合称“光背”。光背图案也是敦煌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图案大多用火焰表示光明再用花卉作陪衬比较简单粗糙。唐代摆脱了火焰纹形式而用多层同心圆来表示光圈层层外射画面也日益丰富多彩。各层光圈之间装饰以莲花为主的各种花卉纹样色彩富丽形成美丽的花环。如第321窟的莲

花光背图案莲花共五圈用石青、石绿朱砂、酱红等色叠晕而成中心是四个对称的莲花花苞合成一朵卷瓣莲。周围再绘四个饱满的蓓蕾蓓蕾上各生出两片小叶连续环绕。圆圈外用白描绘出连续性的朵朵团花使花形清楚明快。

在窟顶与四披壁画交界处在不同内容的壁画间隔处以及龛边、莲座和藻井图案中有大量的边饰图案起着装饰、分隔画面的作用这些边饰形形色色变化无穷。早期的边饰是以大波浪形作为主体结构向二方连续展开以龟背纹忍冬和几何纹忍冬为最主要的纹饰在形式各异的忍冬纹中间夹杂着联珠、龙、凤、虎、鹰、猴、鸟、孔雀等动物使规整的纹样不至于滞板。隋朝时期大概受到波斯萨珊王朝织锦纹饰的影响开始出现对兽联珠纹边饰有对马等形式如第277窟西壁龛顶上方的对马联珠纹边饰[45]把对马绘在连环的联珠纹内并用丰厚的忍冬花叶间隔开两匹对马使边饰既对称又连续。除此之外隋代还有飞马、团花、童子等主要边饰形式第427窟横贯窟顶的波形忍冬童子边饰[46]长约10多米是大型边饰图案之一。波形忍冬缠枝卷曲变化多端化生童子弹琴吹笛稚气可爱。唐朝边饰盛行用卷草纹纹饰各不相同有的长达10余米而不重复枝叶翻转仪态万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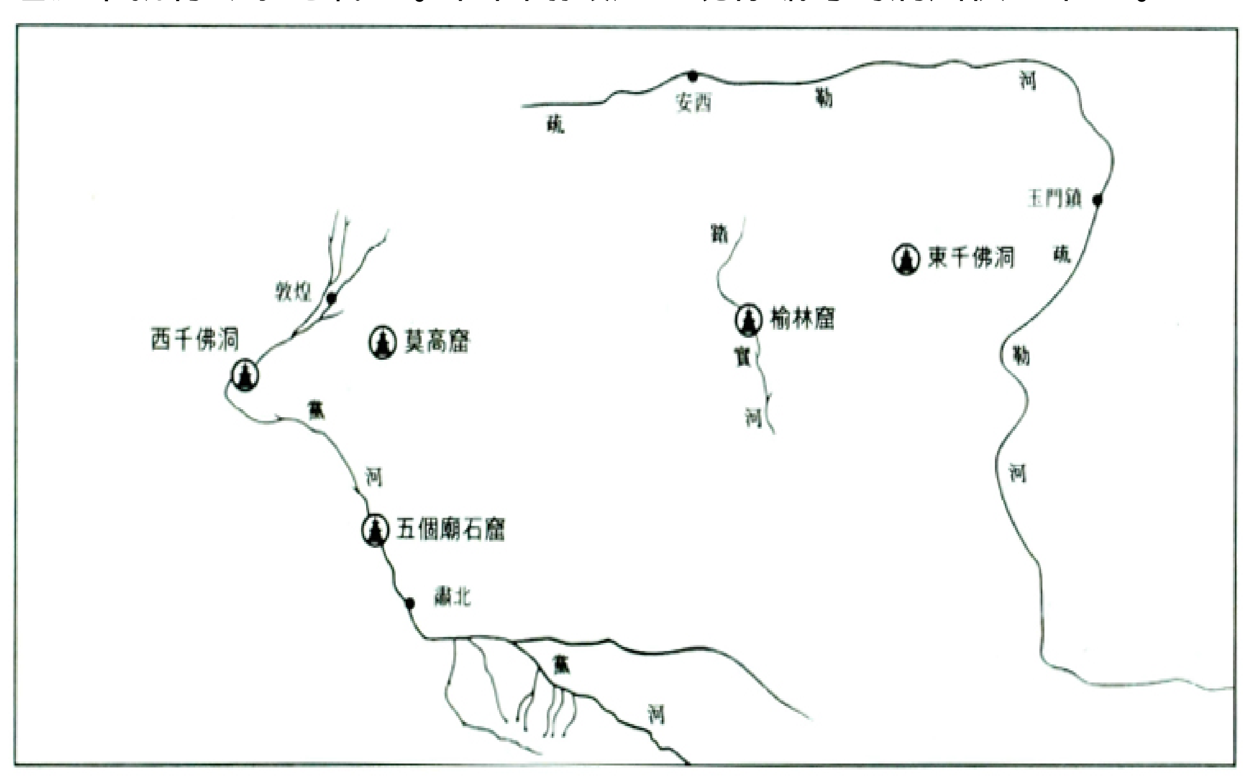
这些装饰性的图案并不是没有生命的自然物的艺术化它们也是佛国世界中的一员。如以牡丹、莲花的特征为根据绘制的一种团花图案——宝相花就象征着佛、法、僧三宝的“庄严相”而圣洁的莲花、童子的化身都深有寓意。当然作为装饰图饰的飞天和伎乐天应当是最生动活泼的形象备受人们的喜爱成为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的美好艺术形象仅莫高窟一处就绘有四千五百余身。飞天的佛教名称是香音神能歌善舞每当佛在讲经时众飞天就凌空飞舞奏乐散花。早期的飞天虽矫健有力粗犷奔放但形体较短显得有些呆板。隋唐以来飞天婀娜苗条凌空倒立的身体飘逸飞扬的长带姿态柔美满壁飞扬加之线条纯熟色彩豪艳风神气韵构成一幅仙子下凡的景象。

此外彩塑和壁画中的佛、菩萨、供养人的服装上绘有精细的染织图案表明了各个时期人们对服饰的要求这种图案以唐代时的最精美除宝相团花、小簇花、对鸟、对兽等主要形式外还有波斯的联珠立鸟纹锦、葡萄缠枝纹锦等反映了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五　莫高窟以外的石窟群

除了莫高窟之外敦煌、安西境内的西千佛洞、榆林窟、东千佛洞、五个庙石窟也属于广义的敦煌石窟范围现分别简单介绍如下。

西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西南30多公里处在党河北岸临流绝壁之上凿崖为窟。因为岩层虽然和莫高窟同属玉门系但所含砾石远较莫高窟粗大所以洞窟崩塌比较严重洞窟的木结构阁道及前室大多崩毁。1983年我去攀临时只能沿着凿通窟壁的险道前进一面即是峭壁悬崖脚下的党河在深深的河谷间蜿蜒东流。这里环境幽雅又有树影水声是古代寿昌县城东的一处佛教圣地开窟当不在少数唐朝官府编纂的《沙州图经》中就有专条记载[47]。但因塌毁严重现存编号的洞窟仅16个[48]。



地图4　广义的敦煌石窟分布图

洞窟大概始凿于北魏时期魏窟和莫高窟北魏窟形制一样。中间是中心塔柱四面开龛塑像四面壁画有佛趺坐说法图和贤劫千佛及伎乐天一类。中心柱下部和四壁佛像下绘金刚力士像。佛塑像则为早期的犍陀罗风格。从北魏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陆续都有兴修窟中有武则天"如意元年五月"的题记"年"、"月"二字皆用武周新造字说明这里同样受到中原王朝的强烈影响。壁画的内容也和莫高窟同时代的洞窟内容大体相同。如第15窟有中唐时期画的观无量寿经变。但第12窟北周窟中就出现了劳度叉斗圣图[49]开莫高窟唐代特别是晚唐流行此

图的风气。窟中的供养人像也十分引人注目其中有于阗嫁给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的公主李氏又有回鹘可汗供养像为宋朝初年西州回鹘曾占领敦煌的说法提供了形象的证据另外还有西夏的供养人像。

榆林窟俗名万佛峡位于安西县城南约70公里处发源于南山的踏实河经此处蜿蜒北流两岸峭壁耸立如若劈削而成。洞窟就开凿在踏实河东西两岸的峭壁上现存洞窟共41个。榆林窟所在的河谷东西宽不过百米春夏之际红柳掩映杂花蒙茸也是一处佛家圣境。

榆林窟大概始凿于北魏经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陆续兴建。在现存的东崖30窟西崖11窟中有唐代3窟、五代8窟、宋代13窟、西夏4窟、元代4窟、清代9窟归义军曹氏时期开凿和重修的洞窟占总数的1/2以上。

榆林窟的洞窟形制基本上和莫高窟各个时代的洞窟形制相同但洞窟中的一些精美画面却可以和莫高窟最精美的壁画媲美。其中以第25窟的作品最值得细心观赏。第25窟位于东崖中部有前后室前室为横向的长方形主室为方形中部设方形佛床上为佛塑像已毁。根据窟中的古藏文题记和一些吐蕃人形象知该窟是776年吐蕃占领瓜州以后建造的属于唐代中期。洞窟的顶部为倒斗藻井但已坍毁前室和甬道在五代时作了重新修绘但主室四壁还保存着唐代精美的壁画原貌[50]。

和莫高窟唐代壁画题材一样第25窟壁画的主题主要宣扬大乘净土思想。主室幅面最大的南北壁分别画表现净土信仰的观无量寿佛经变和弥勒净土变。观经变用三联式中间是西方极乐世界绘无量寿佛结跏趺坐于中间莲座上观音、势至菩萨以及诸天人、侍从围绕两旁众圣人均在七宝池中的宫殿楼阁之上阁台之间有曲栏桥梁相连前面是两组乐队吹奏各种乐器中间的舞伎作快速旋转的胡旋舞。七宝池中莲花盛开化生童子自由自在地游戏各种珍禽宝鸟飞翔其间绘出一派佛国的净土极乐情景。南壁左、右二联分段画未生怨故事和十六观想修行法感化教育人们如何进入净土世界。北壁的弥勒变与上面介绍的莫高窟弥勒变大同小异。该窟除了场面宏大、人物和自然景物都绘写精细的经变画外主室门两侧的文殊、普贤像也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技法。文殊的坐骑青狮怒目翘尾张口大吼昂首欲奔驭狮的昆仑奴双手紧拉缰绳咬紧牙关用力制止狮子起步狂奔。与此相反普贤的坐骑六牙白象却慢慢悠悠俯首帖耳缓缓而行昆仑奴怒眼圆睁举鞭欲打企图让它快些前进。两种不同生性的动物和同样人物的不同神态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此外主室

东壁的密宗画八大菩萨曼荼罗以及前室门南北的南方毗琉璃天王和北方毗沙门天王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五代宋初的曹氏归义军时期榆林窟也是曹氏家族成员经常光顾的地方有许多供养人像保存了下来。如第16窟的“北方回鹘国圣天公主陇西李氏”就是曹议金的回鹘夫人[51]。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德、曹元忠、曹延禄的画像和题记也都能在榆林窟中见到。

西夏统治瓜、沙地区的中心在今安西境内因此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丰富多彩甚至可以补莫高窟的不足。如第3窟东壁正壁南侧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变图[52]是用汉族和党项族相混合的艺术手法来绘制的一幅密宗画它着重描绘了菩萨的千手中所执的各种法物以及一些人物较多的场景其中有华盖、玛瑙、摩尼宝珠等法器、宝物有刀、矛、斧、钺等兵器有锯、锄、斗、尺等生产工具有龙、牛、鸡、狗等动物荷叶、棉花、葡萄、宝树等植物有塔、寺、殿、阁等建筑物甚至有酿酒、犁耕、锻铁、商旅等各行各业活动的场面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展示了西夏的社会生活风貌和真实的历史画面。同窟东壁的文殊、普贤图[53]从构图上看颇具匠心。文殊、普贤乘青狮、白象居于茫茫云海中心前后左右都簇拥着各种风格的侍从背景是耸峙的山峰葱郁的树木楼阁掩映其间彩虹横绝山畔。不论是水墨画法的山水还是精心白描的人物都可视为西夏壁画的代表作。普贤像侧还绘有唐僧取经的画面[54]三藏法师玄奘合掌望空礼拜孙悟空牵着满载佛经的白马图19他的猴相和《西游记》中所描写的没什么两样。此外第2窟的水月观音图[55]画观音潇洒自若地坐在岩石上神思遐想身边彩云环绕脚下碧波荡漾青石、绿竹、红莲以及观音的金身、朱裙交相辉映富丽多彩。



图19　榆林窟第3窟唐僧取经图

榆林窟的西夏壁画可以说是敦煌壁画中西夏时期的代表它除了继承敦煌壁画的主题和技法外还吸收了宋朝的白描人物画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一些成就并为莫高窟和榆林窟元代壁画的某些技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东千佛洞位于安西县东南105公里处洞窟原来开凿在河床峡谷的两岸崖壁上今河水已断流干涸河滩上长着骆驼刺等野草崖前没有高大树木早就人迹罕至十分荒凉成为野兽出没的场所。这里地质结构与敦煌莫高窟一样属玉门系砾岩结构但质地比较疏松。在两岸崖壁上保存下来的洞窟共23个东崖9窟分上下两层排列有壁画、塑像的窟共3个。西崖14窟也分上下两层有壁画、塑像的窟共5个总共编作8个号按时代来划分有西夏3窟、元代3窟、清代2窟属于晚期敦煌艺术遗存。

洞窟形制大多是只有主室的单室窟正壁两侧下部各向里凿出一条可供信徒们作旋转礼佛的马蹄形通道窟顶为复斗形藻井窟前的木构窟檐建筑都被拆毁他用。塑像一般都经清代改装只可以从中窥见一二早期的形迹。因没有保护壁画也塌毁脱落严重或者蒙上厚厚的尘土使画面模糊不清。

第2窟是西夏时期开凿的年代最早而且壁画的艺术成就也是东千佛洞各窟中最高的。洞窟为长方形后凿马蹄形通道。窟内塑像完好为清代改妆。主室四壁是各种题材的曼荼罗如北壁有净土曼荼罗、八臂观

音曼荼罗南壁有药师净土曼荼罗、十一面观音曼荼罗等但大多已经模糊不清只有藻井中心的坛城图还比较清新。马蹄形通道中保存了几幅比较精美的壁画如南壁的唐僧取经图绘三藏法师玄奘和猴面孙悟空师徒二人可与榆林窟第3窟的唐僧取经图相媲美也说明了这一唐朝前期发生的故事在西夏时就已流传广远像瓜州这样边远的地区尚且如此中原就可想而知了。北壁的水月观音也和榆林窟第2窟的水月观音同一形制同一风格可称佳作而涅槃图中的弟子举哀图和体态优美的菩萨像在白描、敷色等技法的运用上都十分熟练。此外甬道画有西夏供养人题记为西夏文为敦煌晚期石窟艺术研究增加了新的形象和文字资料。

五个庙石窟位于敦煌县城南60公里处现属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辖境南距肃北县城所在的党城湾20公里发源南山的党河经此处北流五个庙石窟就坐落在党河上游左岸一个叫做狼湾的山沟里窟前是盆地林木茂密。

五个庙石窟一带原是个石窟群后来就只剩下5个窟了所以当地的蒙古人称之为“五个庙”庙即石窟之意。目前只剩下4个窟编作4号从窟形和壁画内容看有北魏1窟后经西夏或元代重修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3窟。北魏窟为中心塔柱窟其余都是分前后室的长方形窟前室均毁主窟为人字披顶正壁凿出佛坛塑像但塑像均已毁坏仅有部分壁画保存下来。其中第3窟内容比较丰富正壁北壁佛塑像已毁两侧绘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共七身色彩华丽。东壁绘维摩变西壁绘劳度叉斗圣变与莫高窟晚唐以来的题材相同南壁左右两侧绘十六臂和四臂观音属密宗绘画。第4窟东壁有文殊像有众多部众随侍可惜已模糊不清但旁边的回鹘文题记隐含着一些新的信息。第1窟西夏或元代重绘的炽盛光佛像上方两侧绘有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与敦煌莫高窟第61窟甬道所绘黄道十二宫相似为天文史和中西科学交流提供了新证[56]。

此外在五个庙以南约5公里处也即肃北县城北约12公里处党河东岸吊吊水沟中还有一所石窟称为一个庙石窟仅有1窟保存有壁画但漫漶不清或经后代涂抹。剥掉表层后发现了“本镇游奕使”等人的供养人像应当属于曹氏归义军时期。当时归义军在今肃北县城东南2公里处的党城遗址设紫亭镇是瓜沙二州所辖六镇之一位于归义军辖境的南界为统治当地各族百姓、守卫边防的重要门户和军政中心。所以在这一带留存有五代、宋初修建的石窟是不难理解的。可惜的是后来这里成为荒凉

之地与敦煌的联系不便更没有保护措施使石窟破落不能完整地反映当时边地文化的面貌。

注释

〔1〕 以下叙述主要参考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同编者《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册文物出版社1982—1987年。

〔2〕 以下关于洞窟形制的叙述参考了萧默《敦煌莫高窟的洞窟形制》《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187—199页。

〔3〕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79。

〔4〕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图版133—138。

〔5〕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图版34。

〔6〕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图版55—64。参看赵声良《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研究》《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

〔7〕 邓健吾曾依时代顺序概述了敦煌彩塑见所撰《略论敦煌彩塑及其制作》《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198—210页。

〔8〕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图版11。

〔9〕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图版25。

〔10〕 同上三图版114。

〔11〕 见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纽约1925年书前的照片第2讲图6拍摄时正值敦煌地震把大佛前面的楼阁震塌而显露出正面的慈容。

〔12〕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图版120。

〔13〕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图版63。

〔14〕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图版160。

〔15〕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图版115。

〔16〕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图版128—129。

〔17〕 同上图版119。

〔18〕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图版22。

〔19〕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图版117、128。

〔20〕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54。

〔21〕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图版116、130。

〔22〕 同上图版149。

〔23〕 同上图版17。

〔24〕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图版126。

〔25〕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图版176—177。

〔26〕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图版65—67。参看万庚育《敦煌莫高窟第61窟壁画佛传之研究》《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册1985年84—164页。

〔27〕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图版163。

〔28〕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图版64—65。

〔29〕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图版44。

〔30〕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图版20。

〔31〕 参看荣新江《敦煌文献和绘画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55—62页。

〔32〕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图版24—26。

〔33〕　同上图版27—29。

〔34〕　同上三图版175—177。

〔35〕　参看李永宁、蔡伟堂《敦煌壁画中的□弥勒经变□》《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247—272页。

〔36〕　秋山光和《唐代敦煌壁画中的山水表现》《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202—203页。

〔37〕　参看施萍婷、贺世哲《敦煌壁画中的法华经变初探》《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177—191页贺世哲《敦煌壁画中的法华经变》《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127—217页。

〔38〕　关于维摩变参看贺世哲《敦煌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8—67页。

〔39〕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图版34。

〔40〕　同上图版155。

〔41〕　参看李永宁、蔡伟堂《□降魔变文□与敦煌壁画中的“劳度叉斗圣变”》《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册165—233页。

〔42〕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图版104、106、108—109。

〔43〕　参看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1986年69—147页。

〔44〕　参看欧阳琳《敦煌图案简论》《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下册1987年43—72页。

〔45〕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120。

〔46〕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59。

〔47〕　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137、152页。

〔48〕　西千佛洞的图录附载于《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49〕　《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版218—220。

〔50〕　《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版12—43。

〔51〕　《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版57。

〔52〕　同上图版144—148。

〔53〕　同上图版158、165。

〔54〕　同上图版160。参看段文杰《玄奘取经图研究》《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1—19页。

〔55〕　《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版137页。

〔56〕　参见孟嗣徽《炽盛光佛变相图像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1—148页。

第十七讲　敦煌写本学

宋代以后中国的图书主要是以刻本形式流传的因此形成一整套有关版本的学问在确定年代等问题上颇见功效。宋代以前书籍主要是以写本的形式流传但迄今还没有正式的“写本学”著作问世原因之一是学者不容易接触如此众多的写本原件特别是英、法两国所藏种类较为丰富的敦煌写本应当是确立写本学的主要根据。日本的藤枝晃先生和法国的戴仁教授是从书籍史角度研究写本最有成就的两位本讲主要依据他们的研究成果简要介绍作为书籍的敦煌写本的外部特征[1]。

一　纸张和形制

中国古代的书写材料有甲骨有金石春秋战国以来的书籍往往是用竹简和丝帛来抄写简重而难以携带帛贵而难以普及抄写和阅读书籍主要是贵族的事。虽然说西汉时期就已经发明了纸但直到东汉中期才有蔡伦用廉价的材料来制造纸张促进了纸的应用。从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纸取代木简的时间大概在魏晋时期而且时间较长各地的情形也不会完全一样。

敦煌吐鲁番保存的写经表明从十六国早期开始西北地区抄写佛经就使用纸张了。较好的抄写图书的纸是麻纸唐人又称作小麻纸。麻纸的好坏可以从麻丝的均匀程度看出来我们可以通过显微镜来观察一般长安或中原的写经纸麻丝分布十分均匀而一些麻丝较粗且分布不均的纸大概是敦煌本地所产。在敦煌虽然纸有好坏但从十六国时期以来没有停止使用。而西域南道在吐蕃占领时期8世纪末至9世纪中阻断与中原的往来因而没有中原纸张的供应以至于回过头来用起木简了所以我们不应该用一般的木简使用年代来判定这些吐蕃时期的木简的年代。其实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纸也是缺乏的所以佛寺往往把废弃的唐朝官文书收集起来用背面抄经。到了归义军时期好纸是由官府控制使用的归义军的军资库司负责纸的管理和支用[2]一般佛寺和民众所用的纸往往是十分粗糙的纸或者背面已经写了字的纸。

抄写图书或佛经的纸按传统的中国尺度来说是1尺乘1.5尺或1尺乘2尺相当于26×39cm或26×52cm。其高度1尺=26cm是木简的高度所以说纸作为书写材料取代了木简但它的规格还是从木简书写形式来的纸上划的竖线实际就是把纸区分成一支支的简。这种从木简高度而来的尺在唐朝被称作“小尺”所以用小尺所限定高度的纸张就被称作是“小麻纸”了。唐朝官府文书的用纸规格与书籍不同是按照唐朝官尺的1尺乘1尺或1尺乘1.5尺相当于30×45cm这个高度要比书籍的高度略高一些所以造成一些佛寺在用唐朝官文书抄写佛经或装裱与经卷宽度大体相同的经帙时往往把官文书纸的天头地脚裁掉一些以致损失掉一些文字[3]。与此同时我们在考察写本的年代时也不能用写经纸的规格来判定官文书的年代。

比较讲究的书在抄写之前要先把纸放到黄檗浸泡的水中染潢这样可以防止虫蛀。我们看到的六朝隋唐时期的精抄本纸张都呈黄色就是上潢的结果。英国图书馆最近出版了一本用科学手段研究敦煌写经纸上的黄檗的专著[4]。

被用来抄写图书的标准纸的上下要划横线中间相距18—19cm然后再分割成宽1.5—1.8cm的竖线使每行抄17个字因为每张纸的宽度不同所以一纸上所写的行数有20至31行不等最普遍的是一纸28行。最标准的写经是一纸28行一行17字这样人们可以很容易计算出一部经大体上的字数和用纸多少。

抄写经书时正文的前面要写题目、撰者或译者这个题目称作“首题”或“内题”一般用全称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有时还有品名而卷尾的题目称“尾题”则往往用简称如“金光明经”。卷子本的书籍要经常展开所以卷首最容易脱落而残缺而卷在里面的尾题保存较多。因此我们今天常见到的是简称的尾题所以在正式编目和指称敦煌写卷的名称时要根据尾题复原首题使用全称。

一部书或佛经是一张纸一张纸顺序抄写的等全书抄完后再把纸张按顺序粘贴起来以一卷为单位形成一个卷子图1所以古书即使到了版刻时代还是分作一卷一卷的。应当注意的是纸叶的颠倒错乱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抄好以后就粘错了一是后来纸叶脱胶散落图书馆修复人员在复原时粘错了。例如P.3726P.4660P.4986《邈真赞集》现在的顺序和每一单篇赞文的年代顺序正好相反可以推测是抄者当时按年代先后抄基本上是一叶一篇赞文层层累积为一叠然后就一张张粘起来了

形成了现在这种样子。我们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把这些纸叶的顺序倒过来而中间那些没有明确纪年的赞文也可以根据前后赞文的年代来大体上系年了[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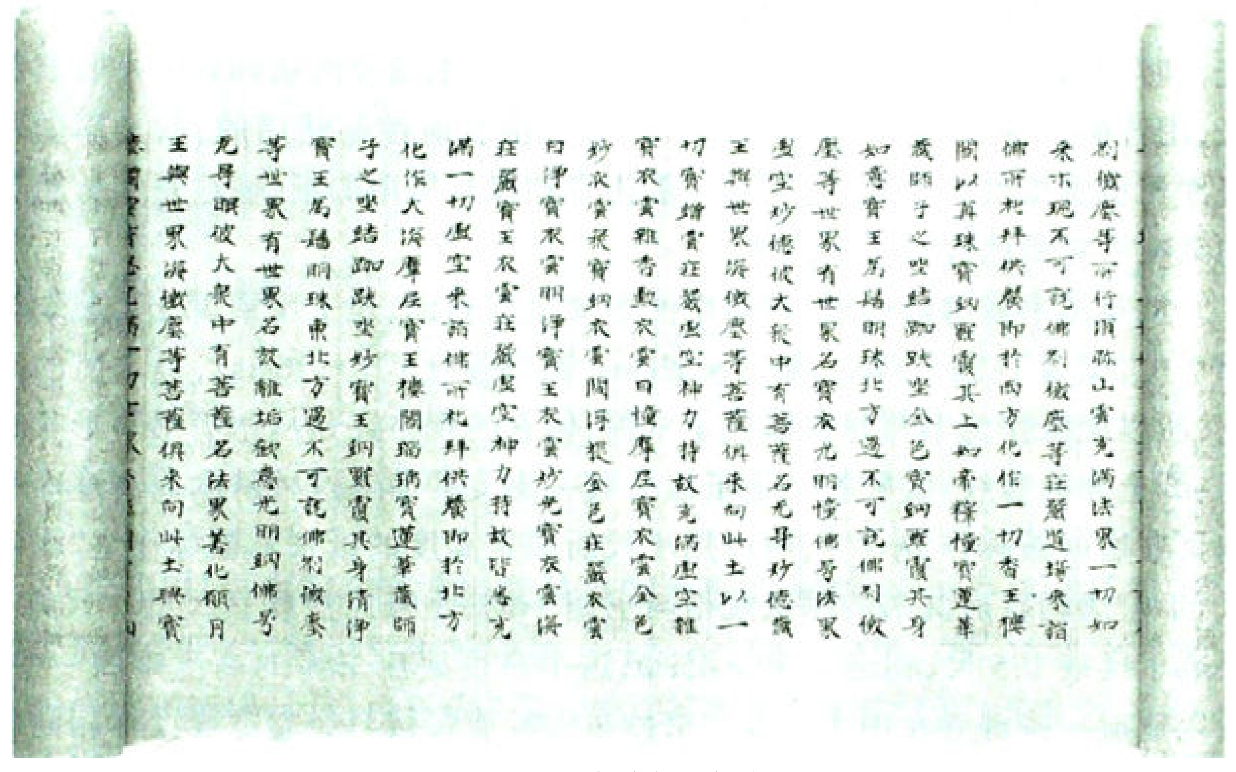


图1　标准的写经卷子

卷尾如果有空常常写题记最标准的写经是一定要写题记的即使没有纸也要加纸写完。题记一般包括年代、抄写者和供养人的姓名、发愿文但大多数题记比较简单甚至只有一个人名。敦煌写经中有一组咸亨二年671至仪凤二年677唐朝长安宫廷所写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妙法莲花经》图2其尾题包括年代、抄写者、用纸数、装潢手、初校、再校、三校和四位详阅以及监督者的署名格式极其谨严是最标准的唐人写经题记[6]。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一书[7]专门收录写本题记收罗宏富而且每条题记都有详细的参考文献索引便于对比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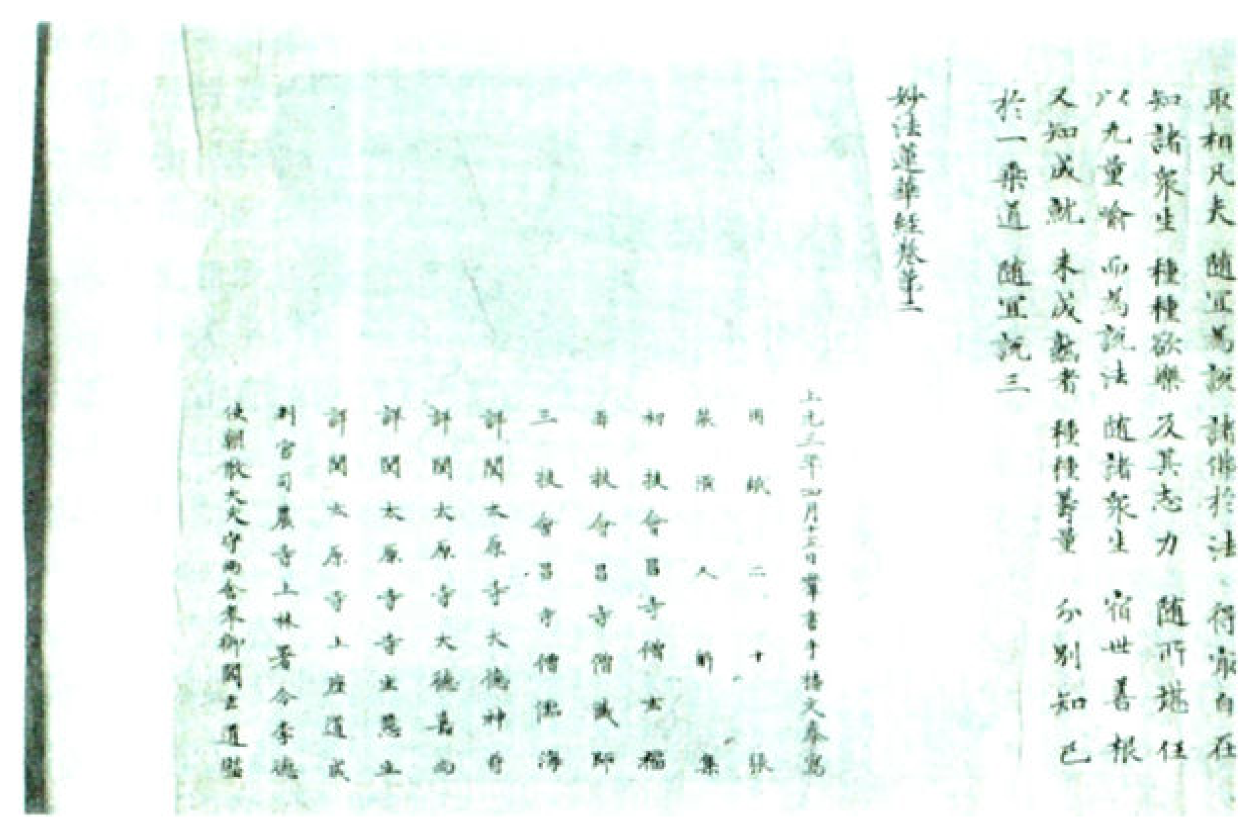


图2　上元三年676唐朝长安宫廷写《妙法莲华经》

有的佛经首尾有寺院或个人藏经的印记。主要有1“三界寺藏经”长方形阳文楷书墨印2“净土寺藏经”长方形阳文楷书墨印3“报恩寺藏经印”长方形阳文篆书红印。其他还有几个寺院藏经印但不敢肯定是敦煌寺院所有。还有一枚“瓜沙州大王印”有的人读作“瓜沙州大王印”使用年代和所有者目前尚无定论。

尾题或题记后的纸叶边缘有时加木制或竹制的轴用来卷经卷。在纸的开头一端有时也装一个木条木条上加一丝带以便捆扎卷子。在纸卷开头的背面有时写书题称作“外题”其下面有时还写所属寺院和个人的名字如“界”指三界寺。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斯坦因所获敦煌卷子上往往外题的地方是由斯坦因的中文秘书蒋孝琬据正面内容给予的题目有时也写在卷子背面的某些地方[8]。辨认的方法是这些题名或注记的上方几乎都有传统数码标记因为这些数码往往用红钢笔水所写过去我们在缩微胶片和分辨率不高的照片上难以看出所以要格外小心切莫把这些文字看成是古人留下的而信以为真。比如《英藏敦煌文献》所拟S.328的名字“列国传”就是蒋孝琬所拟似不如用今天人们所习用的“伍子胥变文”[9]。

以一卷为单位卷起来的卷子一般直径在一寸左右。有的经只有一卷而且文字较少则直径要小得多。把平均十卷或十二卷用包裹皮包起来就成为一帙。这种包裹皮就叫“帙”、“帙子”、“经帙”也叫“经巾”它们有的是用丝绸制作的十分讲究有的是用竹制的也有的是用普通的麻布或皮纸制作的。帙的里面系住一根带子可以把卷子捆扎起来。帙的一头有时是尖状的系出一根带子来把包裹好的经卷捆起来。帙的外面一般是用丝锦装饰上面写经名帙号如我们在第四讲中提到过斯坦因所获四十卷本《摩诃般若经》第二帙上面就写着“摩诃般若海”。又如敦煌研究院藏麻布经帙上有“宝女所问经等帙殷”和“正法念处经第三帙美”的注记。这些是晚期敦煌藏经所用的帙因为它们都能对应于《开元录·入藏录》所记录的经名和千字文编号。敦煌在归义军时期才开始用《千字文》帙号以前则有不同的安排藏经顺序的方法[10]目前敦煌发现的经帙上的注记文字还不能全部解明原因之一是斯坦因、伯希和在盗宝时把佛经和经帙分离从而打散了原来的藏经顺序。

除了上面所述标准的写经外敦煌写本中还有不少其他类型的写经。

有一种细字写经每行用小字可写34字为标准写经的两倍这样可以节省纸张。还有经折装写本图3即把卷子每4至6行折叠一下形成一侧像手风琴一样可以自由打开任何一处这是受印度或吐蕃所使用贝叶形书籍的影响而在8世纪末叶出现的[11]。到9世纪前半叶又出现了新式的册子本图4一般是5至7张纸一折叠再把一叠叠纸的折叠一边缝合就成为册子本了很像今天的线装书。这种册子本比较小便于携带和细字写经及经折装写本一样大概都是为个人所用的文本。比如我们现在见到的《六祖坛经》主要都是册子本表明它们最初是由个人收藏使用的而不是寺院图书馆的正式藏书[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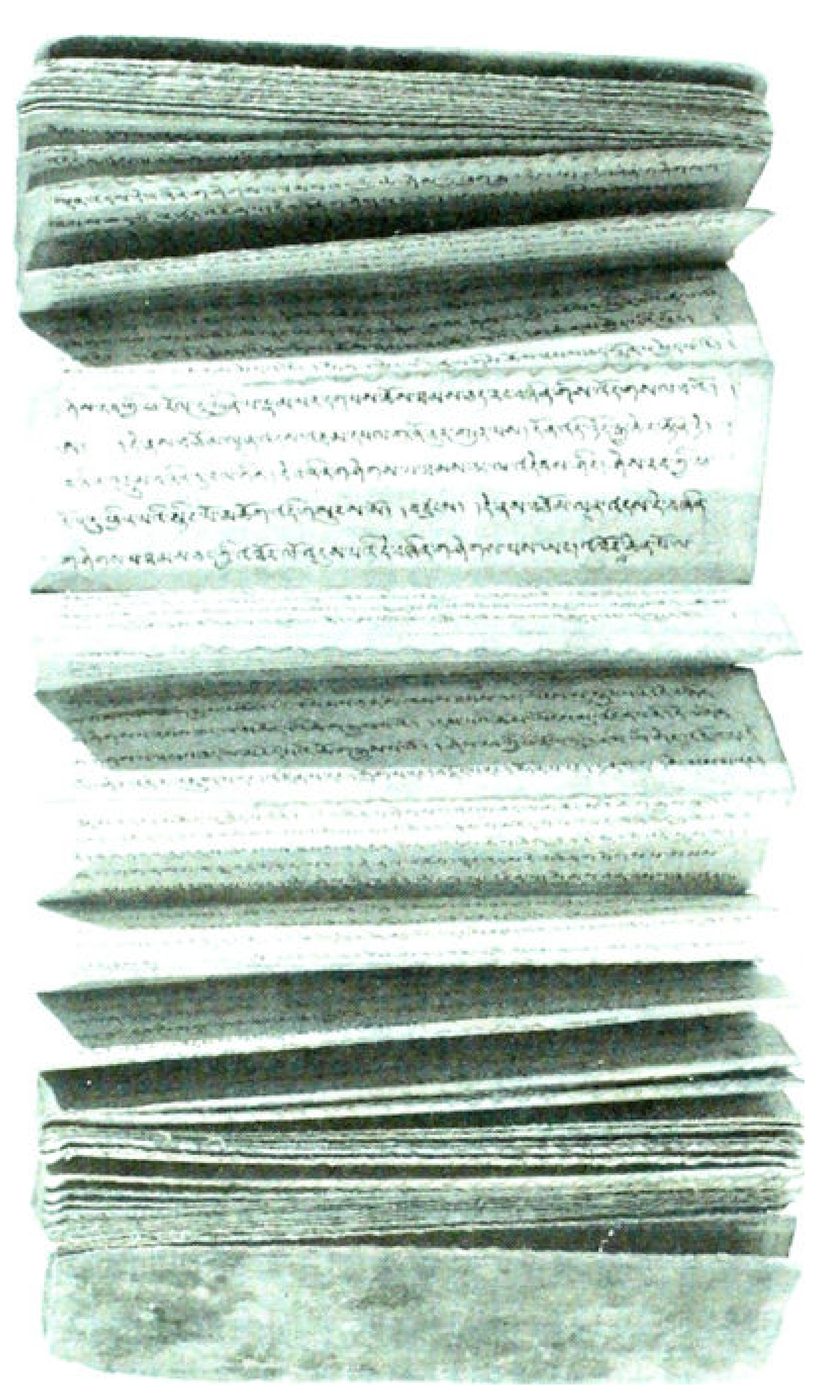


图3　经折装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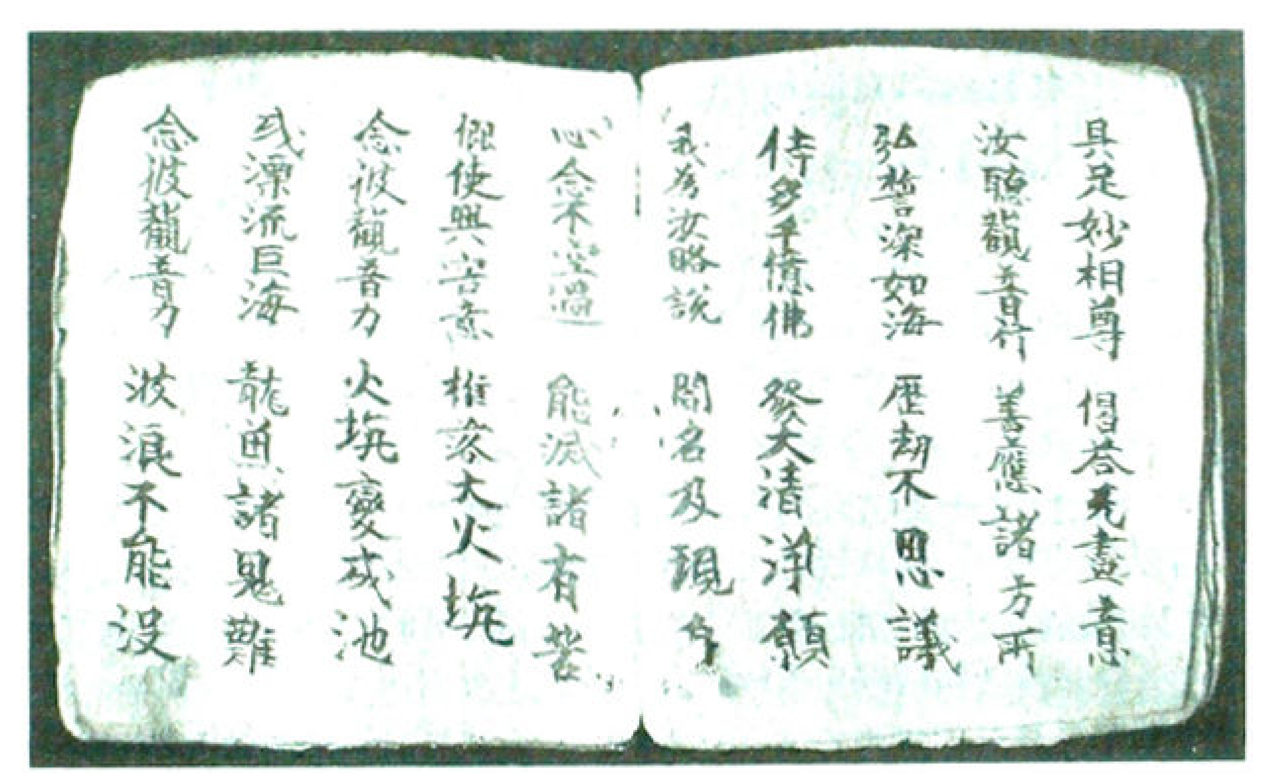

具足妙相尊 偈答無盡意
汝聽觀音行 善應諸方所
弘誓深如海 歷劫不思議
侍多千億佛 發大清淨願
我為汝略說 聞名及見身
心念不空過 能滅諸有苦
假使興害意 推落大火坑
念彼觀音力 火坑變成池
或漂流巨海 龍魚諸鬼難
念彼觀音力 波浪不能没

图4　册子本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也流行贝叶形的梵夹装写本图5纸叶为长条形藏文是沿长边横着写汉文则是沿长边竖着写。一般的贝叶在长条状纸叶左右中间部位有两个圆孔以便系绳汉文写本有时只钻一个孔或者仅仅划出圆孔而不透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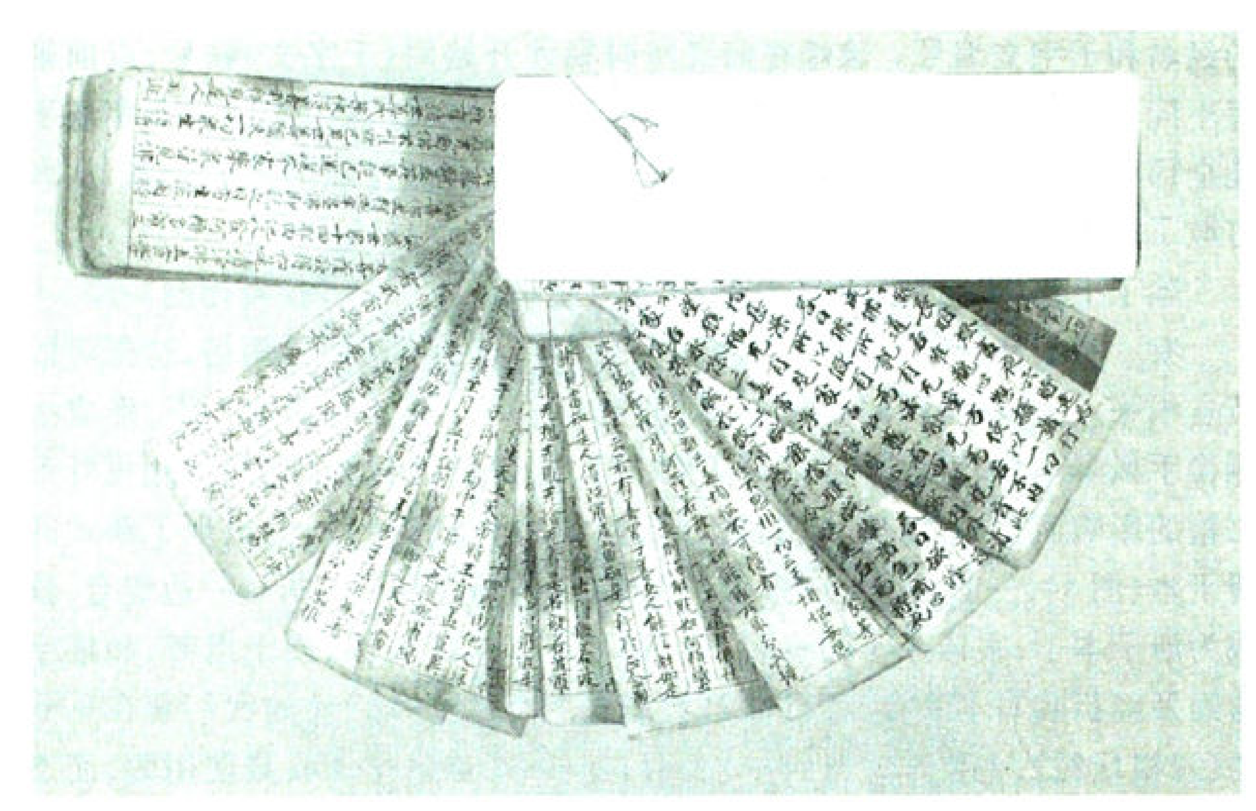


图5　梵夹装写本

此外还有素经写在绢上的经、佛塔形写经、扇面写经等。

二　字体和年代

敦煌卷子跨越了从公元5世纪初到11世纪初的六百年的范围吐鲁番出土写经的年代还要更早一些其间的书法并非一成不变我们从书法的变化中可以大体上判断一个写本的年代。

公元5世纪正是中国书法从隶书变为楷书的时代经过一个长期的过渡阶段到了隋代可以说已经变成正楷了。唐朝前期正规的写经都是正楷到了吐蕃统治时期书法开始不够整洁以后的归义军时期书法水平普遍较差。藤枝晃曾选取斯坦因收集品中近三十件写本从406年到986年按近乎均匀的年代间隔来排列依原件大小影印在日本的书法刊物《墨美》第97号上[13]以见各个时代书体的演变。后来他又把英藏敦煌写本中属于5、6世纪的纪年写本影印刊布在《墨美》第119号上[14]。这为我们根据书法来判定敦煌其他没有年代的写本时代提供了一个工具手册可以随时比照。

由隶变楷的原因藤枝晃认为是由于毛笔的不同造成的即隶书是用书写汉代木简的鹿毛制的木笔所写而楷书的发达是由于使用了从南方发展起来的用兔毛制成的竹笔隋朝统一中国以后这种南方的书法流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到吐蕃统治敦煌以后当地人无法从中原获得毛笔除了使用比较粗糙的毛笔外还使用吐蕃人书写藏文时用的木笔[15]。

从书法来判断写本的年代是有风险的因为书法因人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同时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作品模仿性很强唐朝人照样可以写出很好的隶书甚至篆书我们应当把握的是社会风尚和有影响的书体。

早期的书法资料较少难以究其详情。到了北魏延昌初年6世纪二十年代早期敦煌地区有一个由令狐崇哲主持的官方写经机构他们抄写了一批佛典都写有题记并在卷尾加盖黑色“敦煌镇印”图6。这批写经书法相似代表了敦煌写经的一个时代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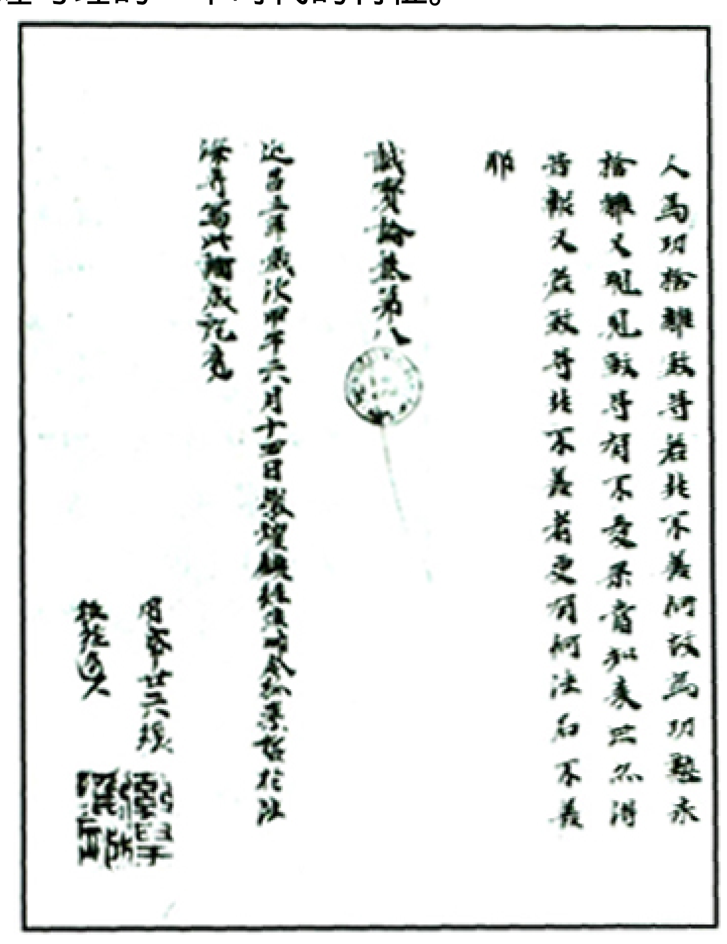


图6　P.2179令狐崇哲写经

前面已经提到过公元6世纪三十年代东阳王元荣供养了一大批写经部分在敦煌藏经洞中保存下来。这批写经的书法要比令狐崇哲写经更

加流畅因此推测是东阳王从中原带来的书手所写的。

隋朝统治中国带来了书体的“南朝化”。到了唐朝初年在大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人的影响下书法渐渐趋于标准的唐朝经生体。

上述咸亨二年671至仪凤二年677唐朝长安宫廷所写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妙法莲花经》最后署名的监督人有两位前段时间是虞昶即虞世南的儿子后段时间是阎玄道因为唐初画家阎立德子名玄邃因此推测这里的阎玄道很可能是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的子、侄辈中人[16]。显然这些唐朝的宫廷写经直接受到当时最好的书法家的书体影响代表着当时书法的较高水平。

武则天曾经在载初元年689造“照”、“载”、“初”、“年”、“月”、“日”、“星”、“正”、“天”、“地”、“君”、“臣”十二个新字以后又陆续发明出“授”、“证”、“圣”、“国”、“人”等五字总共十七个武周新字一般行用到武则天统治结束的神龙元年705。这些字在写本中出现特别是在官府文书中出现可以作为判定其写于武周时代的标志。但是这些新字在朝廷正式废弃之后有时候仍然继续使用因为抄书手有时只是照抄旧本而不去做相应的改动所以也就把武周新字一起抄上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只是出现个别的新字而不是全部特别是常用的“年”、“月”、“日”等字往往在后来的写经上不再使用了[17]。其实不仅仅是武周新字有被后代抄书手照抄下来的情况就连有些写经后面的题记也有被原封不动地抄下来的所以我们也不能仅凭题记的年代来定抄本的年代。

吐蕃和归义军时期都曾有过官府组织抄经的活动但并没有见到形成一种统一的书体。

三　写本的正背面关系

除了写本形制、书法字体等方面的问题外还应当注意的问题是写本正背面的关系。

正式的书籍和写经不论儒家经典、佛教和道教文献背面都是不写其他文字的。但是有的典籍在唐朝是珍贵的到了吐蕃和归义军时期可能就不受重视于是有人在背面涂鸦也是在所难免的。更多的情况是寺院把公私文书收集起来用反面抄写佛经。

唐朝的文书档案一般保存九年存在州县的籍库当中。当这些官文书废弃以后由于这些纸的质地较佳所以往往会被再次利用最普遍的用途一是用来抄书特别是寺院中用来抄经一是用来裱糊东西如吐鲁番文书中所见裱糊的鞋样、帽子甚至棺材或敦煌藏经洞所见裱糊的经帙因为经帙经常翻阅而易破所以寺僧用官文书的硬纸来加固。

敦煌地区在吐蕃占领以后切断了与中原的联系纸张供应紧张所以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大量唐朝的官文书被用来抄经。如P.3559《唐天宝十载751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的背面就抄写了一组禅宗文献图7S.514《唐大历四年769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的背面抄的是《众经要攒》图8。唐朝的官文书对于历史研究意义重大备受关注。但有时候我们得到的文书已经是残片看似相同的字体应当属于同一件文书但不能明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此时背面的内容有时会帮我们大忙。如1983年土肥义和发表了在伦敦未刊敦煌残片中找到的两件可以缀合的天宝年间敦煌县受田簿S.8387S.9487与此同时丘古耶夫斯基发表了同样类型的三个残片少者只有两行文字多者六行。池田温发现它们的背面抄写的都是吐蕃统治时期的著名学僧昙旷的《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下于是可以把这四个残片的背面按照《大乘起信论略述》的全文把相对位置考订出来甚至可以根据佛经一行的字数推断出正面《田簿》各片间的距离其中S.8387S.9487和Dx.3160两片之间只有一行之差[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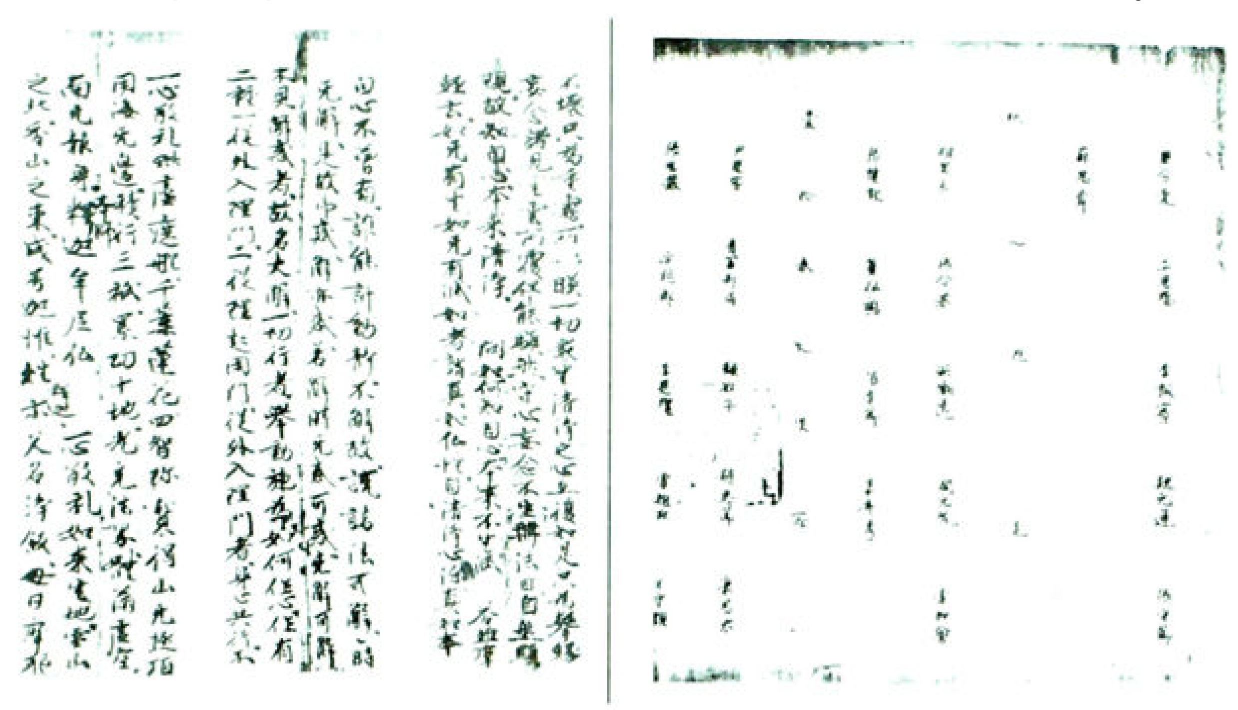


图7　P.3559《唐天宝十载差科簿》正禅宗文献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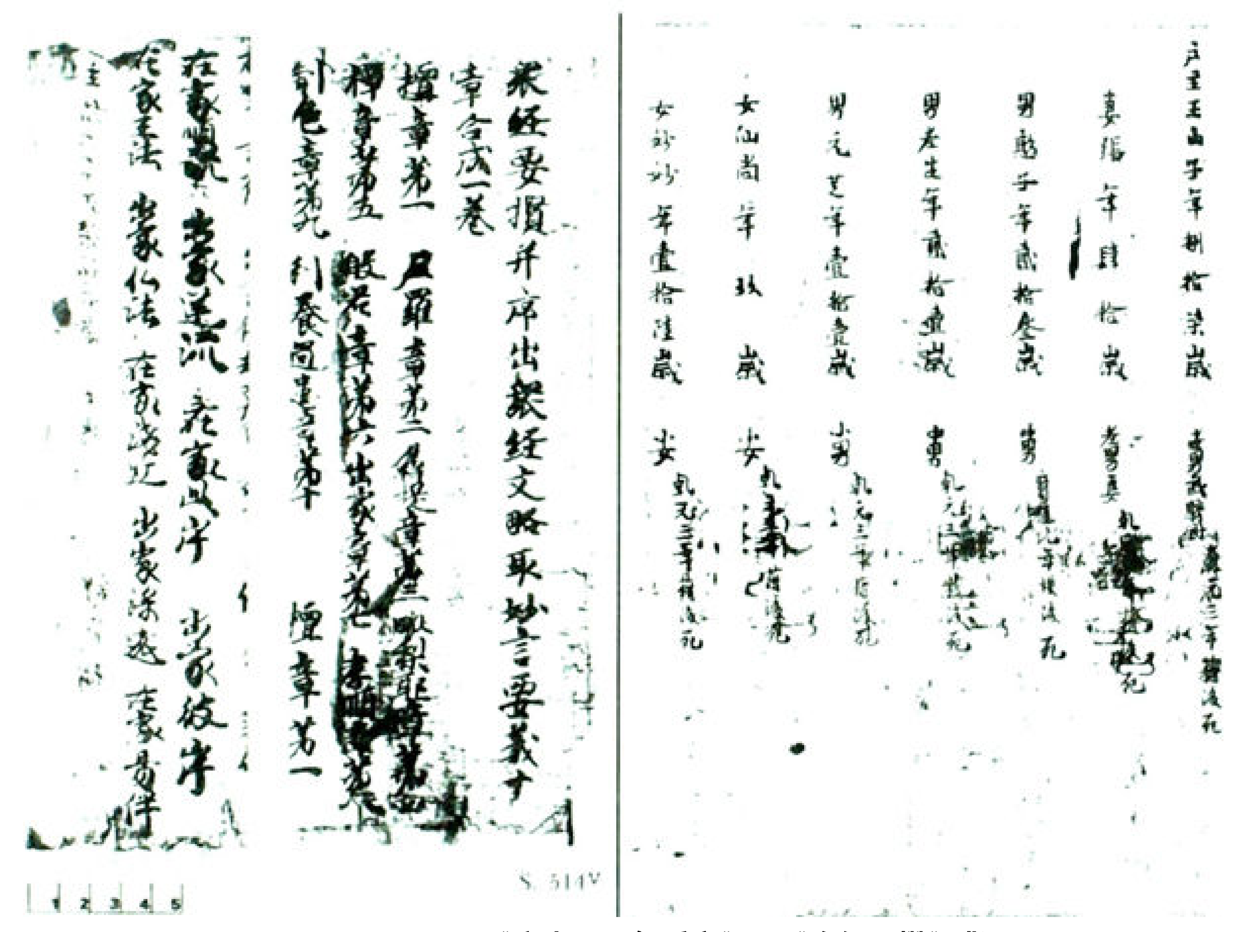


图8　S.514《唐大历四年手实》正《众经要攒》背

一些胡语文献解读本身就十分困难要把残片加以缀合更非易事。日本学者利用对汉文文献的熟悉成功地利用正面所抄的汉文佛经来比定背面所抄的于阗文或粟特文文献大大推进了这两类文献的研究[19]。

类似的例子还有相信今后在研究中会有更多的发现。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目前各个敦煌收藏单位所定的正面Vecto、背面Verso是图书馆员随意而定的比如在英国图书馆往往把卷在里面的一面当作正面或把文字多的一面当作正面如上举S.514就是把《众经要攒》当作正面而把《唐大历四年769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当作背面事实上唐朝的手实这种官文书绝对不会用佛经的背面书写的。所以真正的正、背面与英图所定恰恰相反。由此可见我们在确定写本的正、背面时应当首先根据内容来确定。

敦煌文书种类繁多形式也多种多样不论形制还是文字都还有一些方面我们这里没有论述如不同地区写本的判别、标点符号、朱笔改写或印记、原卷与复制的不同等等随着敦煌写本学的不断完善我们可以不断增补。事实上对于写本外观的判断要通过观察原卷或最佳的影本反复对比积累经验才能在遇到新的写卷时给出一个基本正确的判断。

注释

〔1〕　特别是藤枝晃“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A General Description Ⅰ”《人文》ZinbunNo.91966年1—32页Ⅱ《人文》No.101970年17—39页徐庆全、李树清汉译荣新江校《敦煌写本概述》《敦煌研究》1996年2期96—119页。范围更为广阔的讨论见藤枝晃《文字の文化史》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1991年重版列为《同时代图书馆丛书》第83种翟德芳、孙晓林汉译本题《汉字的文化史》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

〔2〕　卢向前《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3〕　参看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概述》饶宗颐编《敦煌文薮》下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124页。

〔4〕　P. J. Gibbs and K. R. Seddon, Berberine and Huangbo: Ancient Colorants and Dyes伦敦1998年。

〔5〕　参看荣新江《敦煌邈真赞年代考》饶宗颐编《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354—360页。

〔6〕　藤枝晃《敦煌出土の长安宫廷写经》《塚本博士颂寿记念佛教史学论集》京都1961年647—667页。

〔7〕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

〔8〕　参看方广锠《斯坦因敦煌特藏所附数码著录考》《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526—534页。

〔9〕　荣新江《英藏敦煌文献定名商补》《文史》2000年第3辑116—117页。

〔10〕　参看方广锠《8—10世纪佛教大藏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1〕　戴仁《敦煌的经折装写本》《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粹》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577—589页。

〔12〕　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3〕　藤枝晃《敦煌写经の字すがと》《墨美》第97号1960年1—40页。

〔14〕　藤枝晃《北朝写经の字すがた》《墨美》第119号1962年1—36页。

〔15〕　藤枝晃《敦煌遗书之分期》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12—15页。

〔16〕　由于唐初政治斗争成败的影响阎立德之子阎庄就没有在史籍中留名赖新出墓志方知其事迹。见臧振《西安新出阎立德之子阎庄墓志铭》《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455—462页。

〔17〕　参看王三庆《敦煌写卷中武后新字之调查研究》《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437—464页。

〔18〕　池田温《唐代敦煌均田制考察之一——以天宝后期敦煌县田簿为中心》《东洋学报》第66卷1985年1—30页孙继民汉译文载《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312—335页。

〔19〕 熊本裕H. Kumamoto《Thyai Pada-tsa关连于阗语二断片》Two Khotanese Fragments concerning Thyai Pada-tsa《东京大学语言学论丛》Tokyo University Linguistics Papers第11卷1991年101—120页吉田丰Y. Yoshida《龙谷—柏林藏吐鲁番伊朗语写本缀合项目的初步成果》First Fruits of Ryukoku-Berlin Joint Project on the Turfan Iranian Manuscripts《亚洲学刊》Acta Asiatica第78卷2000年71—85页。

第十八讲　敦煌写本的真伪辨别

1900年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发现的公元5—11世纪初所写的文献没有及时完整地得到保护。看管洞窟的王道士开始是少量地送人。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攫取到一大批。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又取其精华。1910年清朝学部收取劫余之物不够干净使得1911—1912年的大谷探险队、1914年的斯坦因、1915年的俄国奥登堡等人又都多少不等地获得了一批批敦煌写本。而民间流散在甘肃乃至全国和海外公私收藏者手中的也不在少数。

除了英、法、中、俄四国国家图书馆或科学院中的藏品外许多流散在外的敦煌写本逐渐成为北京、天津、上海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收藏家的玩物或者进入古物市场成为商品。一些古物商人为了牟取暴利仿造敦煌卷子并且在市场上或私下里交易。这些伪卷有的造伪水平极高几经周转有的落入私家与真卷混在一起有的进入博物馆或图书馆成为国家珍藏的“宝物”。随着近年来一些来历不明的敦煌写本小收集品的发表辨别其中的伪本是敦煌研究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课题也是敦煌学界面临的新的挑战。

一　关于伪本的最新说法

过去我们知道英、法、俄国所藏以及北京图书馆1910年入藏品和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写本都是真真切切的敦煌文献虽然在英、法、俄所藏写本中有同一探险队把其他地方出土的文书混入的情况也有这些敦煌写本入藏英、法、俄国的博物馆或图书馆以后混入了其他探险队在中国新疆、甘肃等地所获古代写本或印本的情况如莫高窟北区、吐鲁番、和田、黑城文献但从来没有听说其中混入了今人伪造的写本。

然而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1997年6月23日发表《英国图书馆发现数百件敦煌赝品》一文图1介绍了英国图书馆国际敦煌学研究项目负责人魏泓Susan Whitfield博士转述的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教授的观点即早在1911年中国北京的官员李盛铎就开始制造伪敦煌写本在

1937年李盛铎死后他的八个儿子继续这种作伪的活动直到五十年代。这种伪卷很早就流入敦煌1911年以后来敦煌的大谷探险队、斯坦因、奥登堡都曾买到这些伪卷[1]。

Hundreds of fakes found in library's Chinese collection

By Dalya Alberge, Arts Correspondent

THE British Library has discovered up to 600 fakes in its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manuscripts. New tests have revealed that they are the work of 20th-century forgers.

Earlier this century, it has emerged, library staff were duped into acquiring scrolls supposedly dating from AD 400 to 1025. Genuine items would be worth tens of thousands of pounds today.

Susan Whitfield, the British Library's curator of Chinese manuscripts, said that some may have been manufactured in a massive forging operation run by a Chinese collector whose eminent reputation gave him a respectability that buyers did not question. Shengduo Li's activities lasted from 1911 until the 1950s, and began when he persuaded a Chinese official to divert to his house an ox cart transporting a large collection of real manuscripts from the Silk Road site of Dunghuang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Forged copies were later reproduced by the hundred. Serial numbers on the authentic manuscripts were altered to tally with the forgeries. After his death in 1935, Li's eight sons carried on the business.

The fakes are scrolls imitating the authentic examples and range up to 30ft long. Dr Whitfield said: "They are surprisingly long. You'd think they'd fake short ones." They primarily feature Buddhist sermons and canonical texts.

In authenticating the collection, part of the library's research centres on dyes, paper and ink. They have drawn on the expertise of Kenneth Seddon, Professor of Chemistry at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who has developed a new analysis. Dr Whitfield said: "Previous methods to discover what paper or textiles were dyed with had been destructive. He's developed an undestructive technique which can analyse an area of just 1mm by 1mm."

Most of the manuscripts have a yellow dye — the Buddhist colour signifying solemnity. Every genuine manuscript has been found to have been dyed with a substance from the bark of the amur cork tree. The forgeries all fail the test; scholars have yet to establish the substance used.

Demand for ancient treasures is keeping modern forgers in business. Dr Whitfield said that 95 per cent of manuscripts on the market from before AD 1000 were forgeries.

In fairness to her predecessors, the British Library has 15,000 manuscripts in the entire collection and is not alone in having been duped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library is staging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ch forgeries. It includes a public lecture on July 3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n Russell Square.

The subject is sensitive. Dr Whitfield said that Japan refused to accept that mistakes had been made. Akira Fujieda, of Kyoto University, who will attend the conference, believes that his chapter on forgeries was omitted by government publishers from a 1965 catalogue on Kyoto's Dunghuang collection.



A forgery, left, and the real thing: inconsistency in the thickness of strokes is one of the differences

图1　1997年6月23日英国《泰晤士报》

伦敦的英国图书馆一向以收藏全世界最精美、最可靠的敦煌写本而自豪现在竟然被指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五百多卷敦煌写本中有许多是伪卷。为此英图中文部在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召开“20世纪初叶的敦煌写本伪卷”研讨会邀请世界上主要敦煌吐鲁番写本收藏机构的代表和敦煌学界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这一问题。会上日本学者石塚晴通教授明确表示了藤枝晃教授和他自己的看法“斯坦因第二次探

险队和伯希和探险队之后各国探险队所买的写本一多半约80是假的”并对比一些写本字体的演变和书写材料如纸笔的变化确指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卷子S.6383、6688、6830、6957、6577、6568、6536、6580、6476等为伪卷其理由是纸张不同字体差异和铅笔划栏等。英国图书馆把相关的写卷从库房拿到会场便于更多的专家仔细观察一些与会者表示很难认同石塚氏的看法如英国的韦陀R. Whitfield、法国的戴仁J. -P. Drège、俄国的孟列夫L. Menshikov和我本人基本上都不同意20世纪初叶敦煌就有伪本买卖的说法并讨论了二十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些真正的伪本[2]。我在会上发表《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还特别指出李氏本人并没有作伪作伪者是李氏的外甥陈益安[3]。

《泰晤士报》的有关报道由莫武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书法》1998年第5期。史树青先生对此发表短文《大英图书馆藏敦煌写经无伪品》指出所谓李盛铎组织人伪造敦煌写经的说法没有根据。他以亲身调查的结果揭示出天津冒称李盛铎而作伪的人叫陈逸安[4]。这和上引拙文从其他人的记录中所得知的作伪者名字基本相同只有一个字是音同字异应当是同一个人无疑。藤枝晃先生在探索敦煌写本真卷的基本特征的同时对来历不明的敦煌写本抱有极高的警惕心理。1961年当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原京都大学同事塚本善隆先生邀请他参加整理该馆所藏守屋孝藏氏收集的敦煌写经时藤枝先生因为感到写本有伪而拒不参加。时过境迁以后1986年他在《京都国立博物馆学丛》上发表了《关于“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指出他对这批藏品怀疑的主要根据是上面所钤的李盛铎藏书印[5]。他的这一看法由京都国立博物馆扩大到所有日本的小收藏品由“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扩大到所有盖着李盛铎藏书印的写本。日本的报刊对此加以报道如《每日新闻》1986年1月22日所载一文即称日本所藏敦煌写本的98是伪物1988年8月藤枝先生应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在参观北京图书馆展出的敦煌卷子时他当面告诉笔者中国所藏的小收集品和日本一样大多数是假的。近年来他对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写经卷子也产生疑虑由此认为伦敦所藏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敦煌卷子可能也有伪物。藤枝先生还以八十六岁高龄亲自参加英图的“20世纪初叶的敦煌写本伪卷”学术研讨会并发表《敦煌真本特征图示引言》会后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作了讲演。我有幸与藤枝先生同场发言同台讲演为他对敦煌写本学的执著追求而深深感动。

但是敦煌写本的真伪问题牵涉到我们对于一大批写本是否在研究中加以利用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弄清楚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建立在这样的伪本基础上如果是的话那么这样的研究成果就将大打折扣。与此同时如果这些写本是真的敦煌写本的话把它们误当作伪本而剔除于研究范围又会极大地伤害敦煌学的正常研究阻碍敦煌学的发展。因此敦煌真伪写本问题不得不予争辩。

二　敦煌写本的真伪辨别

所谓伪本是指今人用各种方法、程度不同地仿制的敦煌写本。自1985年以来我有机会先后走访过英、法、俄、日、美、德、香港、台湾、中国大陆许多公私收藏敦煌写卷的单位和机构也一直在关注写本的真伪问题。以下根据我的经验特别以我深入调查过的有关李盛铎所藏真伪写卷的问题为例来谈谈敦煌写本的真伪辨别问题。

要判断一件写本的真伪应当注意的问题很多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1要明了清末民国的历史和相关人物的事迹

按照指称大谷探险队收集品、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和奥登堡敦煌所得有赝品者的说法当1910年清朝政府把斯坦因、伯希和劫余所敦煌写经运回北京后商人们就知道敦煌写本的样子故此仿造然后在敦煌卖给了大谷探险队、斯坦因和奥登堡。

这种说法纯属想象。因为第一如果是敦煌当地人仿造的话根据当时民间流散的敦煌真卷的情况敦煌人并不难得到真卷何必作伪第二从斯坦因等人的记录来看当时敦煌的文化水平很低我们很难想象当地人能够伪造出像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得的那样精美的写经我们也很难想象他们具备了仿造法成讲经记录本的文化水平。第三假如说是兰州、北京等地的商人造了伪卷而拿到敦煌去卖的话我们很难相信这种长途贩运的买卖是否做得成或者说是否值得做。因为如果我们熟悉清末民初河西的社会状况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记录斯坦因敦煌之行的《沙埋契丹废址记》读一读华尔纳记录1924年敦煌之行的《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读一读常书鸿记录四十年代去敦煌的《铁马响叮当》我

们不难体会民国初年跋涉在河西道路上的艰难而且要提防土匪和饥民的打劫。

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说20世纪一十年代敦煌确实有伪卷存在并且骗过了没有什么考古学知识又在此前没有见过敦煌写卷的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的话我想是骗不过斯坦因的。斯坦因曾经在第一次中亚探险中识破和田制造假古董的团伙的阴谋而他在第二次中亚探险中获得了数以万计的敦煌真本他既有防伪的机警又有破伪的对比资料不太可能受此欺骗而把假古董千里迢迢地运回伦敦。

《泰晤士报》的记者当然不知道多少李盛铎其人其事就是藤枝晃先生从他的文章中看出也主要是依据人名词典来解说李盛铎的生平。事实上李盛铎并非简单的人物。据我收集的资料李盛铎1858—1937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人。1889年中殿试一甲第二名榜眼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任国史馆协修。曾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京师大学堂总办。1898年署理使日钦差大臣。回国后历任内阁侍读学士顺天府府丞署理太常寺卿考察宪政大臣。1905—1906年任驻比利时钦差大臣获英国剑桥、牛津两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09年回国。1911年2月任山西提法使11月晋布政使12月署理巡抚。后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政治顾问历任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参议院议长等。1920年以后退隐不问政事。李家累世藏书多有秘籍。李盛铎出使日本时得日本目录学家岛田翰之助购得许多日本、朝鲜古本。编有《木犀轩书目》、《木犀轩宋本书目》、《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德化李氏行笈书目》其藏书题记由后人编成《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6]。

熟悉清末民初历史掌故的人都知道1910年当甘肃解送入京之敦煌写卷抵达北京后不久李盛铎因为与押运敦煌写经的甘督何彦升子鬯威震彝有亲戚关系遂伙同刘廷琛等人攫取到一批敦煌写卷。由于李盛铎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故所得多为佛经以外之四部典籍、景教文献及公私文书数量质量均堪称私藏敦煌写卷第一家。李氏曾自编过所藏敦煌写本目录即《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共著录432号从中可见他选择之精[7]。因此我们应当承认李盛铎藏有直接来自藏经洞的真本写卷而且他所得到的是一批精华。

但是指称李盛铎伪造敦煌写经的人却对李盛铎藏有从甘肃运回的真实敦煌写卷避而不谈。他们所指为李氏伪造的卷子多是根据其上所

钤李盛铎的藏书印。其实这是不明了李盛铎整个藏书及其印鉴情况所致。李盛铎晚年因涉官司藏卷始由子女分次售出。1935年12月15日及21日《中央时事周报》刊有《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此目底本即《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共著录敦煌写本432号李氏所藏精品都在其中。据报称这批写本以八万元日金售诸日本。在京都大学羽田亨纪念馆中有一些羽田氏留下来的敦煌写卷照片图2我们把其上所钤李盛铎的印鉴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所藏李氏旧藏宋元善本书上的同一印鉴做了对比再与上述目录勘同可以判断出是摄自这批写本表明这批写本售到日本时羽田亨曾加以研究[8]。这批材料现仍密藏在一个日本私家迄今没有公布[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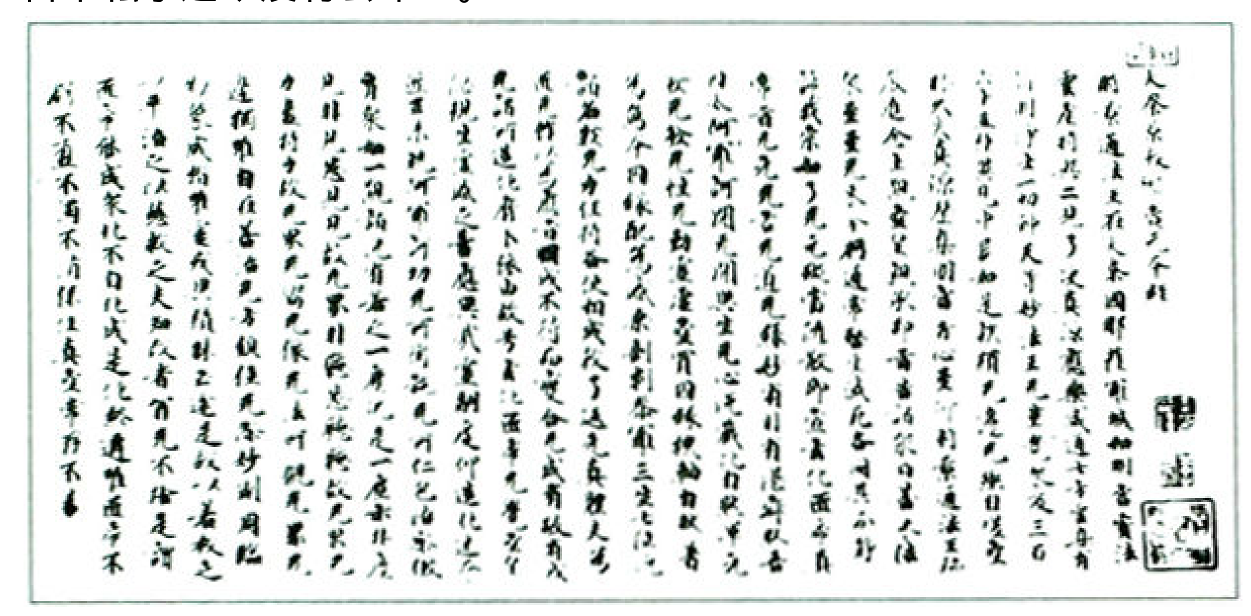


图2　京都大学羽田亨纪念馆藏李盛铎旧藏卷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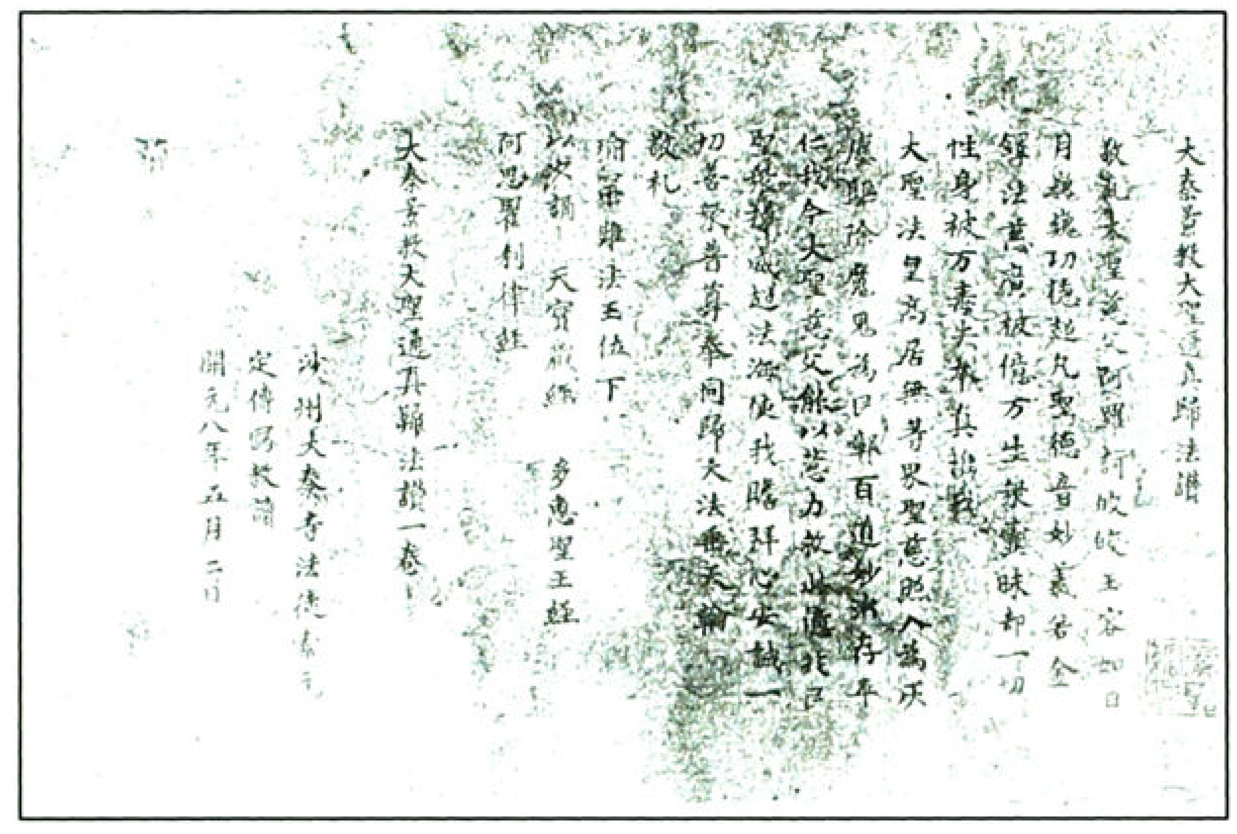
至于李盛铎的善本书在1937年他去世后最终售诸北大图书馆。可惜的是北大在李盛铎死后收购其藏书时没有把其印章一同购买。恽如莘《书林掌故续编》记载“传闻李盛铎的印记都流落在北平旧书店中店主凡遇旧本便钤上他的印记以增高价。”[10]李家的善本书有名可以增值。李家的敦煌卷子更有名因此也就有了大量印有李盛铎印的敦煌卷子出现。李盛铎印鉴的流失为这种造假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造假者可以用真印印在伪卷上也可以模造一个假印印在价值本不高的真卷上以李家真卷的名义来求得高价。

迄今为止我们找不到李盛铎本人造伪卷的直接证据学界风传李盛铎家有造伪卷的作坊主要依据实际是许多伪卷上多钤有李氏藏书印但

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印鉴是何时印上去的因为它们很可能是李氏藏书印散出以后被他人印上去的也有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李氏藏书印。

2要弄清藏卷的来历

我们可以以小岛文书为例来说明。所谓小岛文书是指本世纪四十年代日人小岛靖得到的《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两件写本图3。其中《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有尾题“沙州大秦寺法徒索元定传写教读开元八年五月二日。”《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的尾题作“开元五年十月廿六日法徒张驹传写于沙州大秦寺。”如果真是开元年间的景教文献那么确实价值连城。而这两件写本经过日本景教研究专家佐伯好郎和东方学家羽田亨整理刊布[11]成为以后景教研究的基本文献。


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

瑜罕難法王位下
以此讚天寶藏經
阿思瞿利律經　多惠聖王經
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一卷
沙州大秦寺法徒索元
定傳寫教讀
開元八年五月二日

图3　小岛文书之一

然而有关“小岛文书”的来历迄今为止我们所知均本于佐伯好郎的说法“1943年2月及11月畏友小岛靖君从故李盛铎氏之遗爱品中发现由李氏的遗产继承人相让得到的”并且说“同年末”小岛氏把这两篇经典的

照片“寄赠”给他。为了表示对小岛氏的敬意佐伯好郎把这两篇经典命名为“小岛文书”以A、B相区别。又云“小岛文书B”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已幸运地带到日本而“小岛文书A”即《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的原件却于1945年9月从天津撤退混乱之际与小岛氏其他贵重物品一起被盗业已去向不明[12]。

可是我们知道李盛铎卒于1937年2月4日在此之前已经把家藏敦煌写本售于日本某氏在此之后不久全部藏书又售归北京大学图书馆怎么可能在李氏卒后六年即1943年2月还会有敦煌卷子被“发现”并转让给小岛。

我从写本的来历上觉得这两件小岛文书十分可疑于是和研究景教的林悟殊先生一起进行深入调查从小岛文书上的印记、所谓李盛铎题记、开元题记和文本内容等多方面综合考察结果认为小岛文书很可能是某一或某些古董商人在李盛铎去世后伪造出来的作伪者对于杜撰唐代景教文献、李氏题记等所需的背景知识远为不足故我们不难发现其间之漏洞。我们宣布从严谨的科学态度出发对于名为小岛文书的《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这两件写本我们不能轻信其为出自敦煌藏经洞的唐代景教文献也不应在有关景教史或敦煌史的研究中无条件地引以为据[13]。这一看法已经得到许多敦煌学者的肯定。

因此弄清楚一件散藏敦煌文献的来历有时是判断其真伪的最好出发点。同时了解一件藏经洞文物的流传过程也可以确定其作为真品的价值。比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像也有人认为是假的。正如本书第三讲所详细叙述的那样我们可以明了从这件绢画于1904年由敦煌王宗海送给叶昌炽又在1930年由上海中国书店主人金颂清出售然后到入藏弗利尔美术馆的全部过程再加上对绢画的技法、题材、题记内容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我们可以相信这件美术品的真实性。

3要弄清文书的格式

我们如果看多了敦煌写本就会对敦煌写经、敦煌公私文书的格式和书法都有所认识藤枝晃、戴仁也为我们总结出敦煌写本外观的不少

特征但也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值得考虑进去。下面以有邻馆藏长行马文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1956年《墨美》第60号刊出长行马文书专号收藤枝晃先生长文《长行马》发表了23件文书的图版并附有录文和考释。1990年9月16日由京都大学砺波护先生联系藤枝晃、池田温、陈国灿先生和我一起参观了有邻馆藏卷。观摩完这些长行马文书后藤枝晃先生据上面的李盛铎收藏印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和纸张的厚度与一般唐代官文书的不同对他早年发表的这些文书提出怀疑而池田温先生从文书内容着眼认为今人很难作伪。1991年我转赴伦敦在英国图书馆整理未刊敦煌残卷发现S.8877、11450、11451、11458四号经帙上揭出的一批文书与有邻馆这组长行马文书字体、内容关系密切有的署名判案者为同一人显然是同组北庭地区长行马文书无疑。而且我在1991年7月走访圣彼得堡时发现东方学研究所所藏Dx.354号中的八件残文书也是同组文书。英、俄所藏文书的背面纸缝上都有原文书的编号与《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十册所收《唐天宝十三——十四载交河郡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正同。英藏文书是揭自经帙无疑这些被古代敦煌僧人用来裱糊经帙的文书大多按经帙的大小作了切割一般不宽于28厘米。试看藤枝晃《长行马》一文所给出的有邻馆文书的宽度均在27—28厘米之间与英藏的情形全同。唐朝官文书的用纸高度一般在30厘米因此在把官文书糊在经帙上时文书上下往往会被割掉一行或半行字这就是我们在有邻馆藏许多文书上所看到的情况。细看有邻馆藏的一些文书正背面还可以发现一些没有揭干净的残纸片如第13号背有残经块第30号也有没揭清的残片贴在文书上。由此不难判断有邻馆的这组北庭长行马文书也是揭自一二个敦煌藏经洞散出的经帙。由此可以推测有邻馆文书是经过水处理后揭下来的纸张已经变形不可能与标准的唐代官文书纸张厚度相同因此藤枝晃先生提出的纸张厚度不符的理由不能成立而印鉴也可能是以后人加盖上去的。所以有邻馆长行马文书的真实性似无疑义。唯有第41号一件字体与众不同书法不像唐朝官吏书写文书的笔法格式也很别扭内容也没有超出其他长行马文书的文字图4—5很可能是后人在唐朝旧文书上加笔写成的也就是说纸是真的文书是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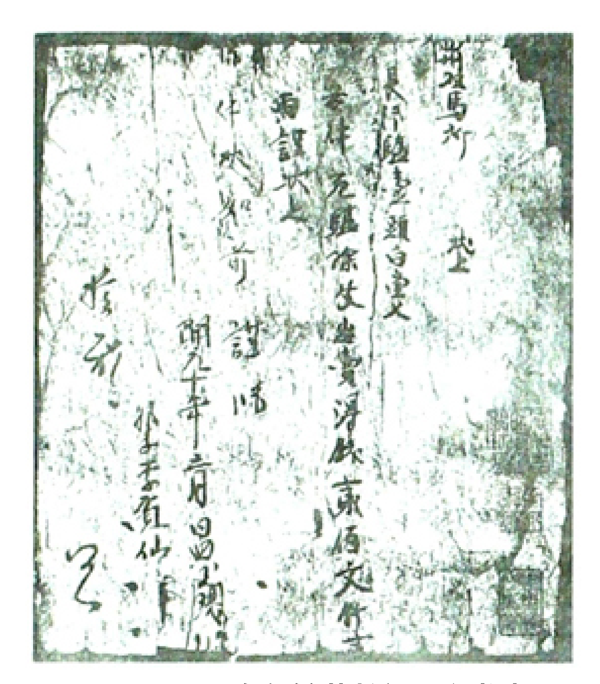


图4　有邻馆藏长行马文书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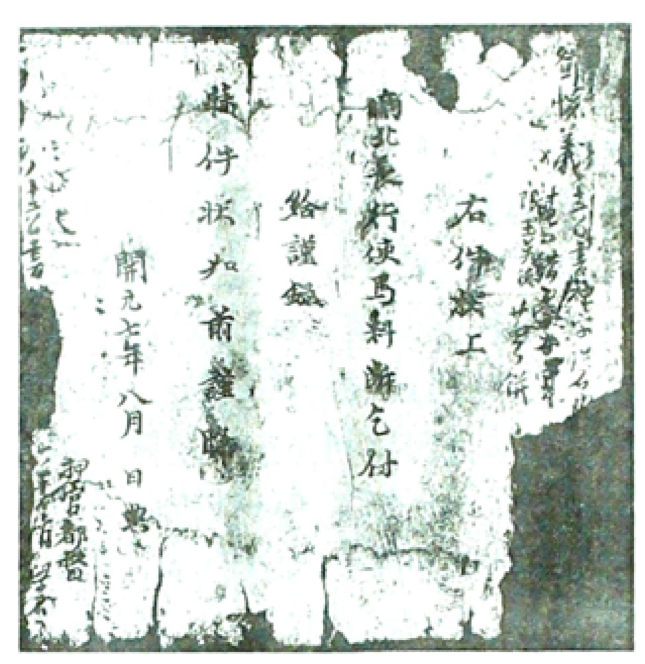


图5　有邻馆藏长行马文书伪

造伪者有时会利用已有的敦煌写本特别是在普通的写经后面添加题记。但不同时代的题记也有一定的格式文字也有一些惯用语造伪者所见不多因此常常露出马脚。如书道博物馆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题记图6先写发愿文最后是“大唐开国武德二年四月八日”[14]格式与一般的题记不同而且年代中“开国”的写法也无他例非常可疑。还

有上举小岛文书《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都有开元年间“沙州大秦寺”的说法而据《唐会要》卷四九所载诏书天宝四载745九月唐朝才把全国的波斯寺改称作大秦寺。作伪者不懂景教历史出了硬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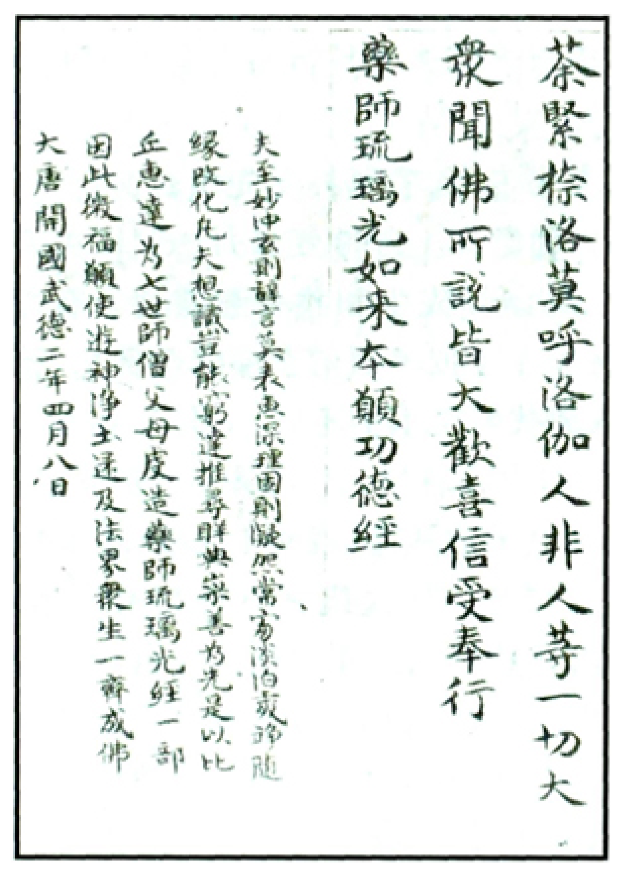

荼緊㮏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一切大
衆聞佛所説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夫至妙冲玄則辭言莫表其深理固則凝然常寂淡泊寂靜隨
緣改化凡夫想識豈能窮達推尋群典衆善為先是以比
丘惠達為七世師僧父母庱造藥師琉璃光經一部
因此微福願使遊神淨土速及法界衆生一齊成佛
大唐開國武德二年四月八日

图6　书道博物馆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题记

总之敦煌写本的真伪鉴别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写本内容、题记和收藏印是三个应当分别考虑的因素有的三者全是真的有的写本是真而题记、印章是假有的印章是真而写本是假有的三者全是伪造。基于我们对李盛铎藏卷的真伪认识再来看一些散藏的收集品我们不否认有些敦煌卷子上有伪印的事实但这还不能证明卷子本身也是伪造的。有些卷子纪年较早使人颇感怀疑。但有些世俗文书是今人很难伪造的。中日收藏写卷者也多从书法角度着眼所以造伪者多写佛经或四部书。要判别一个写卷的真伪最好能明了其来历和传承经过再对纸张、书法、印鉴等外观加以鉴别而重要的一点是从内容上加以判断用写卷本身所涉及的历史、典籍等方面的知识来检验它。我们不应轻易否定有价值的写本也不能把学术研究建立在伪卷基础之上。

注释

〔1〕 Dalya Alberge, "Hundreds of fakes found in library's Chinese collection", Times, Monday June 23, 1997。

〔2〕 参看荣新江《“20世纪初叶的敦煌写本伪卷”学术研讨会简介》《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179—182页。会议论文集即将出版。

〔3〕 中文本《李盛铎写卷的真与伪》载《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1—18页。英文本将刊会议论文集。

〔4〕 《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3日。

〔5〕 《京都国立博物馆学丛》第7号1986年153—173页。

〔6〕 关于李盛铎生平参看张玉范《李盛铎及其藏书》《文献》第3辑收入《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郑伟章、李万健《李盛铎与木犀轩》《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苏精《李盛铎木犀轩》《近代藏书三十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

〔7〕 稿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录四就是王重民先生让人抄录的这个目录但抄手不够认真有不少错误和删节。

〔8〕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18页。对于羽田照片的详细考察记录见池田温《李盛铎旧藏敦煌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专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29—56页。

〔9〕 落合俊典《羽田亨稿□敦煌秘笈目录□简介》《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91—101页。

〔10〕 转引自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28页。

〔11〕 佐伯好郎《清朝基督教の研究》东京春秋社1949年1-24页羽田亨《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及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残卷につこて》《东方学》第1辑1951年1-11页该文已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京都1958年292-307页。

〔12〕 上引佐伯好郎文。

〔13〕 林悟殊、荣新江《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香港《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敦煌学专号1992年19—34页。

〔14〕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178页No.481图207。

后　论

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敦煌学之所以一直作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而长盛不衰原因之一是敦煌文献收藏单位在不断地公布新材料敦煌学者也在不断地思考新问题。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敦煌文献四大藏家的最后一家——俄藏敦煌文献开始全面公布北图也开始发表内容可观的未刊资料而中国各个小馆藏的资料也陆续公布出来其中不乏文献精品如北京大学、天津艺术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敦煌研究院、上海图书馆的一些藏卷。这些出版物为21世纪的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全新的材料。但敦煌学研究要保持其世界学术新潮流的地位还需要我们思考新问题利用新方法做出新贡献。

敦煌写本的编目、整理、校录、考释和敦煌学的个案研究仍将在21世纪持续下去而且相信会做得越来越精细。但从敦煌学的资料来看还有不少课题值得开拓。这里仅从四个方面来展望一下新时代的敦煌学。

1中古时代的宗教史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圣地敦煌藏经洞中出土的写本主体内容是佛教文献。藤枝晃教授曾经警告敦煌学界伯希和从汉学角度选取敦煌写本中的世俗文书把大多数敦煌学者引入到社会经济史和文学方面的研究中去了而忽视了敦煌写本的主题是佛教。日本学者曾经从宗派的立场出发对禅宗、净土宗等不同佛教宗派的文献作过细致的研究。在这些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各个宗派间的关系、佛教宗派与世俗社会的关系、佛教教团与统治集团和下层民众间的关系等等问题仍然有着广阔的天地。

道教是另一个重要的宗教史研究课题因为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道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从被农民起义利用的“三张伪法”变成李唐王朝

的“国家宗教”其历史过程值得深入探讨。敦煌文献中因为保留了许多南北朝到唐朝时期的道教佚经极大地丰富了道教史的内容。在这一领域欧美和日本学者贡献尤多。道教是更具中国特色的宗教也和中国的政治、社会紧密相关值得从社会史的角度来深入研究。敦煌文献的另一特点是具有唐代边疆的边缘性和远离政治中心的民间性道教典籍也不例外由此还可以考察道教的地方特性和对西域影响的深度问题。

从西亚、中亚传入的祆教、摩尼教对北朝、隋唐社会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祆教是古老的波斯发源的宗教由于粟特人的中介而广泛流传于中国北方。粟特地区持续不断的考古和粟特语文献的陆续解读使我们可以重新阐释敦煌吐鲁番汉文文献和图像资料中的祆教内涵并由此扩展到整个中古中国一些现象的理解。吐鲁番出土了大量的中古伊朗语和回鹘语的摩尼教经典利用这些伊朗语学者解读的材料与敦煌出土的汉文摩尼教经典相发明仍是研究摩尼教在中国流行问题的重要课题。

2唐朝各个阶层的社会和文化

敦煌莫高窟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集中而且最丰富的唐朝文化景观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也是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最为集中和最为丰富的唐朝图书博物馆了。但在唐朝时期这里不过是边陲城市周围的一所佛教石窟而藏经洞文献在我看来也不过是敦煌十七个寺院之一——三界寺图书馆的藏书。不论绘画还是文献都无法与同时期的唐朝都城——长安和洛阳相媲美。然而不论长安还是洛阳以及唐朝大大小小的州郡地面的建筑现在都已经荡然无存而中原和东南文化昌盛之区由于没有西北干燥的自然保存条件留存下来的文献往往都是出自社会精英阶层人物之手的著作它们反映了唐朝的上层社会和精英文化但这并非唐朝社会和文化的全貌。敦煌的绘画和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唐朝社会文化的立体图像这里既有经师们读的《尚书》、《礼记》等儒家圣典也有学仕郎抄写的《论语》、《孝经》练习册既有高僧读的唯识学经书也有老百姓听讲的变文既有文人雅士读的《文选》和李白诗歌也有农夫乡民唱的俚曲小调既有艺术家创作的壁画雕塑也有画工照猫画虎的平庸复写。我们从文献和绘画中可以看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的不同景象。这样丰富多彩的立体画面是在敦煌之外很难集中找到的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3吐蕃王朝对敦煌的统治与汉藏文化交流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乘虚而入占据了唐朝河西、陇右大片领土。自786年至848年吐蕃王朝一直占领敦煌对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阶段留存下来了丰富的藏文和汉文材料但由于古藏文资料的语言障碍和吐蕃时期十二生肖纪年法在文书系年上造成的困难使得敦煌学界对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研究远远不能与其前的唐朝时期和其后的归义军时期相比。但随着大量古藏文文书渐渐有了汉、日、英、法文的翻译以后必将推动这方面的历史研究。而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也正是吐蕃王朝从唐朝大力汲取文化营养的时期敦煌文献中保留了大量的汉藏文化交流的史料涉及唐朝政治制度的影响汉地禅宗的输入其他宗教派别的渗透等方面这些课题都可以由此而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

4用本民族的史料研究西北民族史

敦煌不仅出土了大量的汉藏文写本也有多少不等的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等语言文字所写的文献和文书莫高窟的壁画上除了与写本同样的文字外还有晚期的西夏文和蒙古文。在这些语言文字当中有些更是属于自11世纪以来就灭绝的“死文字”但它们记录了丝绸之路上各个民族的历史特别是操各自语言的本民族的历史。敦煌位于东西南北各民族交往的孔道上沿丝绸之路的各个古代民族对于东西方文明的传播都有所贡献这可以从敦煌出土的这些各民族文献材料本身得到印证。同时由于这些民族传世的文献绝少或是根本没有传世作品过去我们对于这些民族的认识都是来自其周边较大的政治、文化势力的记载如汉文中各个封建王朝正史的四夷传观念上不免有所偏见取材上也有不少限制。敦煌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大量各民族语言的材料包含有大批文书档案真实地记录了这些民族的历史。但由于这些文书解读上的困难真正的历史研究恐怕要在本世纪才充分开展起来。

我们乐观地相信只要把眼界放宽各个学科之间能够相互沟通加强国际协作取长补短不断总结提高思考新问题敦煌学仍然能够在21世纪保持青春活力继续开拓出学术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一　主要参考文献解说

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

　　五十年代一本全面介绍敦煌及敦煌学对中国学术史的贡献的入门书内容略显陈旧但并未完全过时。因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影响着敦煌学的入门人对学术史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作者是《泰晤士报》记者利用西方探险者的记录撰写的通俗敦煌、新疆考古历史读物语言生动观点平实情节吸引人远胜于探险者的本人记录。能读英文原著更佳Peter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the Search for the Lost Cities and Treasures of Chinese Central Asia, Hong Kong 1980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有上海书店重印本。

　　斯坦因关于他三次中亚探险的讲演稿的中文翻译是中国读者了解斯坦因及其敦煌盗宝的主要史源。但这并非斯坦因的正式考古报告记载比较简单。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在多次走访调查的基础上对欧美、日本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的考察报告按收藏单位介绍各国的收集、收藏、整理、研究情况。

藤枝晃著翟德芳、孙晓林译《汉字的文化史》知识出版社1991年。

　　关于敦煌写本及其他文字载体的通俗著作集中了作者多次访问欧洲所见敦煌原卷的心得体会是作者建立“写本学”的初步成果。

林聪明《敦煌文书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

　　有关阅读、使用敦煌文书的基本方法的详细介绍但书中图版经过修饰不够真实。

王重民等《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年。施萍婷等《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

截至六十年代已经公布的北图、英图、法图三大馆藏敦煌写本的目录是很长时间里人们利用敦煌文献的指南。王重民先生的后记颇多心得体会。《新编》虽然未脱旧目格局但内容有很大的补充也订正了许多错误。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涉及敦煌学各个方面的参考工具书极富参考价值。但研究成果截止到1994年底有些词条撰写年代更早已经不能代表今天的研究水准。

宁可、郝春文《敦煌的历史与文化》新华出版社1993年。

有关敦煌历史和莫高窟史的通俗读物取材丰富文笔流畅可惜限于体例没有出注。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中古中外关系史的佳作也可作为利用文书研究历史的范例来看。

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作者利用敦煌文献、图画等研究中国艺术、宗教、礼乐文明的论文合集所涉广泛而且深远极富参考价值。

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

分礼仪、氏族、学校和礼生、选举、良贱、城乡、教团、社等八章对有关敦煌文书加以分类介绍兼有作者的研究结晶。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归义军史的初步总结主要集中在政治史和归义军对外关系史方面。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利用敦煌文书研究敦煌僧尼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揭示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生活中与戒律相违背的情况以及许多传世文献所不及的生活细节。

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

结合敦煌石窟现状和敦煌文书的有关记载考述敦煌莫高窟的营建历史并探讨了围绕莫高窟的佛教教团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问题。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华书局1979年。

有关敦煌经史子集四部书的提要、考证文字汇编是利用敦煌文献的主要参考书。

荣新江《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与方法论的探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

有关敦煌学的论文、书评等合集内容涉及藏经洞文献的性质、敦煌写本真伪、研究方法等问题。

谢和耐等《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

收集了当代国外研究敦煌学最有代表性的法国学者的一组论文其中关于敦煌写本学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参考因为法国学者得地利之便可以多次仔细地直接观察原卷。

二　一般参考文献

因为敦煌学的范围广泛读者若对某类问题感兴趣的话可以根据郑阿财、朱凤玉主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0年查找中日文论著。日文论著可查李德范、方久忠编《敦煌吐鲁番学论著目录初编日文部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1995年以前出版的专著可查《敦煌学大辞典》著作类。1995年以后的新书可查《敦煌吐鲁番研究》专刊北京大学出版社每卷后附的“新书目”。敦煌学的论文主要刊载于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先生主编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敦煌研究院的《敦煌研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敦煌学辑刊》等刊物上。

后　记

敦煌学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研究方向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过多次课。撰写一本敦煌学讲义的想法很早就盘桓于心中但因冗事繁多而无暇顾及。由于朱庆之教授的鼓励张文定先生的督促这半年来陆续着手整理讲义编次旧文。这原本看似容易的事也并不简单。因为敦煌学原本就不是一门有系统的学问所以过去我讲敦煌学的课程时也没有一定之规。除了最基本的内容外每次总是想换些新的内容因此我的讲义是不固定的有不少临时加进去的内容没有形成文字而有些思考成熟的问题已经写成文章发表。这次编纂一方面是把有想法而没有文字的部分写出来另一方面是把已经发表的文章整合到讲义中去。

敦煌学的内容比较庞杂因为我主要是给历史系的学生上课所以还是偏重历史和文献方面。十八讲的内容大体上有六个方面一是敦煌简史第一、第二讲二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文物流散、研究的历史第三至第八讲三是敦煌材料的史学研究问题第九至十一讲四是各种敦煌文献及其价值的介绍第十二至十五讲五是对敦煌石窟各个方面的概说第十六讲六是敦煌写本外观和辨伪问题第十七、第十八讲。这样大体上囊括了敦煌学的主要内容而又突出了历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撰写敦煌学讲义与其他学科的讲义有所不同的是我不仅要依靠史料更大程度上是要依靠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因此本书包含了比较多的注释这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敦煌学的研究现状所决定的。我倒是希望借此方法给想深入一步的学子多提供一些参考文献的出处免去他们的翻捡之劳。

无论如何撰写敦煌学讲义是一个新的探索必然有一些错误没有发现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本书的编写获得了北大教材基金的资助。余欣、王静、孟宪实、姚崇新、雷闻、朱玉麒诸位同学帮助做了一些文字和校对工作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最后我还要感谢历年来选修过我的敦煌学课程的同学教学相长每次上课我都会从同学们那里得到启发乃至教益这也正是我们这些教书匠工作中的最大乐趣。

2001年7月18日

Table of Contents